

《湘学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伟光

副主任 曹普华

委 员	王伟光	曹普华	路建平	张海鹏
	朱有志	刘建武	贺培育	刘云波
	汤建军	唐浩明	王继平	朱汉民
	李育民	李跃龙	杨念群	黄俊军
	李 斌	郭 钦	陶庆先	周建刚

主 编 贺培育

执行主编 李 斌

副 主 编 毛 健

编辑部成员 李 斌 毛 健 马延炜

李 超 张利文 张 凯

目 录

【湘学人物】

罗泽南“读书明大义”的人生价值取向	成晓军	3
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孤独先行者		
——郭嵩焘其人其事及其思想	郭汉民	18
民国学者唐大圆行迹考述		
——兼评“东方文化”思想	张利文	30
论王船山诠释视域下《大学》的“内圣”“外王”观	李玮皓	50

【湘学文史】

湘乡、涟水流域文化与毛泽东	李跃龙	67
黄河流域先民入湘与南北交通雏形	蒋响元	81
元代湖南学记文与官员教育政绩关系考论		
——以衡州路学校为例	彭曙蓉	98
明代班军家族的军役承充		
——以衡州卫罗氏为个案	张爱萍	121

【湘学文献】

《湘勇原流记》的版本流传与湘军史实解构	李超平 朱耀斌	139
濂溪学序跋的内容与价值	王晚霞	162

【人物年谱】

谢振定年谱	梅国华 梅 婷	177
《湘学研究》征稿启事		221

湘学人物

罗泽南“读书明大义”的人生价值取向

成晓军^{*}

摘 要：罗泽南之所以能成为晚清湘军中一位精神领袖人物，原因在于他能勇敢面对困境，意志坚定，目标明确，专心读书做学问，追寻古圣先贤脚步而前行。更为可贵的是，他做到了知行合一、身体力行，能将自身才识与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相融合，置自身安危得失于不顾，竭力辅助曾国藩成就功业。罗泽南这种“读书明大义”的人生价值取向，不仅在他短暂的人生中得到充分诠释，而且深深影响到一大批湘军将士。

关键词：读书；治学；人生目标；价值取向；知行合一

在中国古圣先贤们的理想人生价值取向中，一个人从小就应锐意进取，树立远大志向，竭尽全力朝着“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完人的目标迈进，成为一位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识于一身的有用人才。这才是人生大义所在，人生价值所在。而对这一人生大义的阐发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则是通过刻苦读书做学问来获取理论认知，在人生经历中发挥出实践效果的。在这种人生价值取向的吸引、激励和规约之下，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有许多刻苦读书的有用人才出现。即使到了晚清时期，在曾国藩湘军集团中，刻苦读书的有用人才也大有人在。罗泽南就是

^{*} 成晓军，惠州学院教授。

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曾国藩心目中,罗泽南是一个“读书明大义”^①的有道君子。那么,罗泽南通过读书做学问,所明大义又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曾国藩明确指出,这就是罗泽南能够做到“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②也就是说,罗泽南不管自身境遇多么不顺,总是专心致志于读书做学问,追寻古圣先贤的脚步而前行;罗泽南不管自身境遇多么艰难,总是竭尽全力为治国平天下去积聚才识,并在实践中尽情加以发挥。本文围绕这个主题做些分析考察,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一、刻苦问学以求“拔俗而入圣”

罗泽南(1808—1856),字仲岳,号梅杰,湖南湘乡善庆乡(今双峰石牛乡)人。因其所居之地名罗山,峰峦罗列,故自号罗山。

罗泽南“读书明大义”人生价值取向的形成,及其在人生经历中的尽情阐发,首先与其祖父对他的影响密切相关。由于罗泽南父亲体弱多病,一家人生计主要靠其祖父和母亲来操持。他的祖父罗拱诗,勤劳朴实而又非常重视耕读传家。据罗泽南在《先大父六艺公事略》一文中记述:父亲三岁时,祖母贺氏就病逝了。此时,祖父年方 20 余岁,但他“不续娶”,直至 76 岁去世,这 50 余年间,既当爸又当妈,撑持门户,辛苦异常。祖母病逝后,“家益贫”,祖父迫于生计“出为人治贾”,带着幼子即他的父亲在身边,辗转衡阳、安化及陕西兴安等地,前后近 10 年帮人做生意。每到一地,“即命子从师以受业”。然而,当他祖父结束帮工回到家乡时“旅囊萧然”,不得不让儿子休学。“吾父以贫,故废学。”这对“深以不学为憾,思欲有以竟其志”的罗泽南祖父来说,实在是一件很痛心而又不甘心的事情。于是,他自陕西归来以后,即在家乡做点米酒生意,“最勤俭,十余年中得鬻田十亩余,自耕之”^③,并竭尽全力让孙辈们读书学习。在罗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岳麓书社 2011 年版,第 71 页。

②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 2011 年版,第 343 页。

③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126 页。

泽南四五岁时，祖父就教他识字读书，六岁时进入伯父家馆开始接受系统的蒙学教育后，祖父对他仍督教不辍：“四书《章句》《集注》及五经注疏之有关于要义者，令读之。时教以待人事长之则。”^① 罗泽南因聪明好学，深得祖父喜爱，10岁时离开伯父家馆“出外就傅”。然而，此时“家中食不足，且贫债，公悉售田以偿之”。这就是说，为了交付学费，让罗泽南顺利入学，他的祖父不得不把仅有的10余亩薄田全部卖掉。进而，因家里实在贫穷，为了解决罗泽南在学校的吃饭问题，他的祖父不得不多次将自己在外帮工时添置的比较体面的衣服卖掉换米，即使让家人忍饥挨饿也要让罗泽南填饱肚子：“日尝不举火，馆中食缺，公典衣给之，寒暑之服，屡质之于市。得米令家人省食，或两升或三五升，公亲携之馆，至则殷殷诫之。”有好心的邻居或亲友见到这种情形，建议罗泽南祖父将他送去学一门手艺赖以生存。但他的祖父明确表示：“吾不能以田地贻子孙，独不能以书贻之乎？命应饿死，不读书遂能免耶？”古圣先贤们常说：良好家教家风对人的成长至关重要。而在其中，至亲长辈们的一言一行，则深深影响着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等诸多方面。古圣先贤们也反复强调：寒门出孝子贤孙。罗泽南不仅自幼从祖父那里，接触、感悟到有关“耕读传家”“读书明大义”等读书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教诲，而且生长在贫寒之家，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祖父为了让他安心读书，卖田地、卖衣服，“得米令家人省食”的点点滴滴。从而，祖父的良苦用心，自幼就在罗泽南的内心扎下了根基，化作一股锐意进取的动力，吸引、激励他朝着“读书明大义”的道路迈进。正如罗泽南在其祖父1830年去世后感言：“先大父之所以贻我后人者，至矣！勤俭自持，乐善不倦，以生平未学之故，欲竟其志于后嗣。不以困苦易其心，积累之厚，曷其有极！”此时，罗泽南已24岁，尚未取得秀才功名，不免心生愧疚：“小子南既不能奋志典籍，慰其心于生前，又不能立身行道，显其名于殁后，继志之谓何？吾其何以为人？”^② 罗泽南痛下决心继续拼搏，一定不能辜负祖父对他

①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26—127页。

②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27页。

殷切期盼。

对罗泽南“读书明大义”人生价值取向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至亲长辈，则是他的母亲萧氏。她生长于湘乡一个耕读并重之家，虽只活了41年，但在读书做人方面，对罗泽南的熏陶、指引之功是不可忽视的。据《湘军人物年谱》（一）记述：萧氏“性纯厚，家贫，夙夜勤苦，孝以奉翁”。她常常在罗泽南从塾馆回家夜读时，利用燃烧的糠米或松香的光亮纺纱织布，陪伴着儿子刻苦读书。同时，她很重视对罗泽南人品操守的引导：“课子女整饬有法，先生每自馆归，取先正格言及古人行事之可法者示之曰：‘此皆汝外祖之所以语我者，汝志之勿忘。’”^①由此可见，罗泽南在刻苦读书做人方面，打上了母爱母教的深深印记。

天资聪颖的罗泽南，自幼深受长辈影响，尤其受到祖父言行的激励和感化，刻苦用功学习，奋进不辍。然而，因他“为文即不求与时合，”注重对古圣先贤思想学说在文章中的阐释和发挥，“每于世道人心，摭写透辟”^②，又不太注意传统制艺文字的外在范式，所以在19岁之前曾七次应童子试均名落孙山。年满19岁，罗泽南不得不出外设馆授徒以维持生计，同时继续苦攻科考之业、探寻古圣先贤之学。就在这一年，他的母亲因病去世。五年后，他的祖父也离开人世。从而，罗泽南自19岁开始边设馆授徒，边继续学业，直至33岁考中秀才。这10余年间，罗泽南先后肄业于湘乡涟滨书院、双峰书院及长沙城南书院，且在這些书院附近设馆授徒以养家糊口。尽管罗泽南在中秀才10年后即43岁时，才由秀才被郡县保举为“孝廉方正”即拥有任职县级教育官员的资格，但是他在刻苦治学“拔俗而入圣”方面的进取，获得了公认的成果，人品和学识远近皆知，深受士林同仁的爱戴和钦敬。他遗留于世的重要学术著作，如《西铭讲义》《人极衍义》《小学韵语》《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周易附说》《皇舆要览》等，大都是在这时期写作而成。据罗泽南在《常言》（笔者注：后改名为《人极衍义》）中自述其治学经历：“予逐年始得宋儒之书，读之，

① 梅英杰等：《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页。

② 梅英杰等：《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页。

因复求之四子《六经》。至道精微，固非愚昧所能窥测，然已知圣贤之道，不外身心。往日之所学，末学也。乃益叹大父之训为不可及。今年馆陈氏尚友山房，正昔年大父携米送吾读书处也。课读之暇，披览旧典，心有所得，随笔之于书，名曰《常言》，非敢以为窥大道之奥。亦以书吾所见，不自忘焉尔。”^①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罗泽南不仅仅是为应付科考获取功名而读书。他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从古圣先贤那里寻求人生大道大义之所在：“人欲行道，必先存理；人欲存理，必先扩识；人欲扩识，必先立志。其所谓立志者何？曰：‘学圣人也。’”^② “人之为学，必先立志。……夫所谓立志者，志为圣人而已矣。”^③ 在罗泽南的心目中，怎样才算学圣人呢？圣人之学是什么呢？这就是：“治国平天下，必先格致、诚正、修齐，始为有本学之学。”^④ 他同时强调，学圣人及学圣人之学，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或理论上而不落实到行动上，“惟徒习夫记诵词章之学，则不复求乎身心性命之学。不求乎身心性命之学，则道遂不能明而不能行。”^⑤ “若徒诵于口耳，而不先以躬行，是无源之水，必不能放乎四海；无根之木，必不能荣其枝叶也。”^⑥ 一言以蔽之：“古人之学，言与行合而为一者也。”^⑦ 这样才叫真学问，才算真正学到了圣人之学。正因为罗泽南读书做学问的目的很明确，立志学做圣人的愿望很强烈，从而他能做到不为生计艰难所困，不为功名迟迟所困，不为家境贫寒所困，“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执着读书做学问，从中吸收、扩充、历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才，去尽力实践、诠释大义大道的人生价值取向。对此，他在《寄谢大春池书》中说：“泽南与阁下，贫士也。饥寒交迫，变故频加，泽南之贫较阁下为更甚。……人苟奋志道德，此本然之良，当下便可做去，即困苦难堪，其心自坦坦荡荡，绰有馀裕。……

① 梅英杰等：《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6页。

②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1页。

③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91页。

④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92页。

⑤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2页。

⑥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92页。

⑦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92页。

泽南险阻崎岖，半生历尽，犹幸强自支持，颇不为世俗所动。”^①的确，罗泽南在这里说的是实情，他的人品和学识远近扬名，尤其是在学术上成果斐然，来之不易。这是他谨遵祖父遗愿，特别是在读圣人之书、探寻圣人大义大道之中，得到引导、激励，产生的结果。面对家境贫寒而又“变故频加”的人生境遇，他没有妥协低头，没有消沉自弃，而是胸怀坦荡，昂首前行。

人世间最痛苦最悲伤的事情，莫过于失去至亲至爱的人。罗泽南饱尝失去亲人之苦，10年之内，11个亲人相继病亡，尤其是1832年3个月之内，2个儿子先后夭折，给他带来了巨大痛苦。他在《哭儿诗》中怀着极度悲怆的心情说：“夜台有伴兄随弟，妆镜无心母哭儿。药岂伤人疑有误，德难延嗣只增悲。”^②1835年夏秋之交，湖南发生百年一遇的旱灾，瘟疫盛行，罗泽南从长沙参加省试后徒步赶回湘乡。夜半叩门，听到呻吟声不断，得知侄儿“日方病剧”；又听到夫人哭声凄惨撕人心肺，得知第三子兆杰已于两天前离开了人世。此时，罗泽南饥饿难忍，“问夫人索米为炊，启盎视之，无一米之存”。转而见夫人因“连哭三子丧明”，次日侄儿也气绝身亡。^③面对家庭“变故频加”的悲惨境遇，罗泽南将其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转化到“拔俗而入圣”的治学之中。正如他在回忆这段艰难生活历程时说：“吾年十九，训蒙糊口。遭家不造，大故频加。先母歿，越五年大父又弃世。十年之中，兄嫂姊妹相继逝者十一人。妻以三丧子故，伤甚两目俱盲，耳又重听。吾亦善病，潦倒坎坷，几无安日。奔走衣食之余，窃自乘夜读书，冀成先志。所居穷僻，师承无人，萤灯糠火，夜以继日，盖留心词章者有年。”^④这就清楚说明，“读书明大义”的人生价值取向，吸引、支撑、推动着罗泽南去主动应对一切艰难困苦，吸引、支撑、推动着罗泽南做到“不忧门庭多故，只忧拔俗而入圣”，笑对人生，以苦为乐。

①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7页。

②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9页。

③ 梅英杰等：《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页。

④ 梅英杰等：《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页；又参见《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31页。

正如他在《罗山吟》一诗中说道：“家住罗山第几曲，破屋三间白云覆。翠带翻风草叶长，暖声喧晓禽言熟。夜深雨露响丁东，梦里糟床郁奇馥。起来高旭照庭除，春暖朦胧犹未足。”^① 这样的人生境界，一般人是很难达到的，但罗泽南达到了。罗泽南的人品和学识远近闻名，受到人们爱戴和钦敬，主要原因当就在这里。

二、竭尽才识“以济天下”

如前所述，罗泽南“读书明大义”的目的，一是为了“拔俗而入圣”，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他反复强调，家中“变故频加”不要紧，要紧的是克服一切困难，去了解、领悟、掌握圣人之学。同时，他还反复强调，最重要最关键在于，将圣人之学从理论层面融入实践层面。他说：“知之而不行之，所知尚为空言，究与吾身无补。”^② 他与朋友通信时明确表示：“勿为俗说所牵引，勿为俗情所摇夺，斩钉截铁，硬起脊梁做去，庶可乘时精进，渐臻圣贤之阃域。功名得失，不必憧憧于心。”^③ 正是在这种人生信念引发、激励之下，罗泽南面对家境贫寒且“变故频加”，自身功名又迟迟尚未显达的客观现实，没有消沉，没有怨天尤人，“不忧生事之艰”，竭尽才识以助曾国藩。

揆诸史料，可以看到，罗泽南实心扶助曾国藩，竭尽才识“以济天下”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凭借手中团勇势力，为稳定湖南地方秩序，逐渐增强曾国藩帮办团练大臣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1852年9月上旬，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合围湖南省城长沙，地方封建统治秩序大乱。罗泽南应湘乡县令朱孙诒之召，在县城与刘蓉募练乡勇以自卫，“仿戚氏法部署其众，教之击刺，勸以忠义，纪律肃然”^④，被湖南巡抚张亮基奏保“以训导归部铨选”。1853年初，守制尽

①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页。

②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2页。

③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96页。

④ 梅英杰等：《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页。

孝于湘乡的曾国藩，奉命以帮办团练大臣身份至长沙。与此同时，罗泽南亦应巡抚张亮基之召，与弟子王鑫率领湘乡团勇进驻长沙。然而，曾国藩虽为朝廷命官，但旧有绿营将士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幸亏作为同乡好友的罗泽南忠心辅助，精诚合作，“讲求束伍技击之法，晨夕训练”，使团勇势力有所扩展，他的地位才渐趋稳定。随后，罗泽南受张亮基、曾国藩派遣，率领所部团勇先后镇压桂东、衡山一带小股农民起义，并进援江西、力保南昌，又“回剿茶陵、攸县等处”，于是年底回到长沙。

第二，力助曾国藩“别树一帜”募练湘军并商定出师东征大计。

1853年罗泽南奉命赴湘南、江西及湘东等地“剿匪”，11月返回长沙准备休整之际，曾国藩已从长沙移居衡州。正因募练湘军事务和朝廷谕旨急催出师东征而心烦意乱的曾国藩，立即专函罗泽南速赴衡州面商湘军营制的健全优化和出师东征大政方略的定夺。曾国藩在衡州练兵之初就抱定一个信念，必须编练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的新式武装，让广大将士具有“忠义血性”“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与动议者之一的王鑫，没有多大分歧。但是，他们在出师东征的大政方略和具体指向上产生了明显分歧。曾国藩请罗泽南亲赴衡州面商一切，并恳请罗泽南以老师身份劝说王鑫。曾国藩告诉罗泽南，他与王鑫在出师东征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王鑫主张“率师急行，专由陆路”；他则主张“明春始发，水陆并备”。二是王鑫想独统湘勇3000人，“一手经理”，不受他人牵制；他则坚持“划开数营，各立营官”，统一调遣。三是对于新募之勇，王鑫认为“业经亲选，无可再拣”；他则认为“多有可汰”。四是在东征具体进军目标上，王鑫想趁“援鄂之际，乘势东下，一气呵成”；他则认为，援鄂是短期目标，“与此后之长征，截分两事”。曾国藩在专函最后，恳请罗泽南“细察四者不合之故，而必求此后诸事合一之道”，切望其与刘蓉、郭嵩焘、王鑫仔细谋划，“匡我不逮”，且能“慷慨长征”^①，鼎力相助。应当说，曾国藩的考虑格局深远，切实可行，而王鑫的考虑稍欠深远周全，且对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这场生死大

^①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46页。

搏斗的惨烈性、持久性问题，显然是估计不足的。

在这一关系到好友曾国藩及湘军前途命运，关系到国家社会安危的重要时刻，“读书明大义”的罗泽南没有半点犹豫。他不顾鞍马劳顿，来不及安排家事，顾不上继续科考获取更高功名，迅即于是年年底抵达衡州，全力协助曾国藩改定湘军营制，优化出师东征方略。

曾国藩在衡州练兵之初，规定湘军陆营最基层单位为队，每队十人，另什长一人，伙勇一人；队之上为哨，每哨八队；哨之上为营，每营四哨，另设亲兵六队。针对这个营制存在的不足，罗泽南在 1853 年底至 1854 年初这一两个月时间里，配合曾国藩经过全面深入思考，对其做了一些调整：各哨增加长伙若干名，减少用作战的正勇去从事运输、搭棚、挖壕等后勤工作之累，使原来每营 360 人增加到 500 左右。经过调整之后的编制，从作战角度而言，明显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种火器及长短兵器的作用；从对军队的节制这个角度而言，由于采用了“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的选拔方式，“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连。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①。与此同时，罗泽南又与曾国藩对湘军兵勇的待遇，做了比绿营兵更为优厚的改定。自罗泽南于 1853 年年底到达衡州之初，就正式改定了湘军粮饷章程，明确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 50 两，办公银 150，夫价银 60 两，三项共计 260 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全部包括在内。其他各弁兵每月饷银分别为：哨官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这种特别优厚的经济待遇，无疑将极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励下层民众，尤其是那些贫寒文生参军参战的积极性。而在东征方略的优化问题上，罗泽南完全赞同曾国藩的意见，主张先肃清湘北，经略湖北、江西、安徽，然后进击浙江、江苏，直捣太平天国都城金陵。

1854 年 2 月下旬，曾国藩与罗泽南等统率湘军一万七千余人从衡州正式开抵长沙。考虑到稳定湖南大后方局势和筹集湘军饷糈的重要性，罗泽

^① 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 1983 年版，第 337—338 页。

南暂时留守湖南，曾国藩亲临前线统兵督战。然而，新练之湘军在与太平军交战的两三个月时间里，不少弊端立即凸显出来。尽管水营在湘潭战役中取得胜利，但进击靖港、岳州相继不顺，始终未能迈出湖南一步，受到清朝朝廷严词斥责。于是，曾国藩在罗泽南的全力协助下，对湘军表现出的弊端做了详尽分析，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整顿的基本原则是：凡溃散之勇不再召回，溃散的营官、哨长回营以后也一律裁去不用。这为湘军军心的稳定尤其战斗力的提高打下了制度基础。

第三，独当一面力助曾国藩规略湖北、江西。

经过整顿后的湘军水陆各营共计两万余人，自1854年7月下旬攻占湖北重镇岳州之后，兵锋直指武昌。随后，罗泽南与塔齐布密切配合，先后攻占崇阳、江夏等地。但因太平军倾全力设防，迫使湘军驻足纸坊一隅不能继续前进一步。于是，曾国藩在1854年10月中旬召集水陆诸将讨论进攻武昌的具体方案。在这次集议上，罗泽南“晓畅兵机，善于筹谋”的才识得到突出表现。他认为，只有全力进攻花园获胜后，才能乘势扫清鲇鱼套等地太平军据点，武昌才有可能收复。与此同时，他主张分兵进击洪山以防太平军突围反击。与会者对此用兵方案展开了激烈讨论。曾国藩最终采纳了罗泽南提出的分兵进击洪山、花园，然后以花园为据点，再向武昌进击的意见。其中辅攻洪山一路由塔齐布统领，主攻花园一路由罗泽南统领。由于对军情分析准确，兵力部署到位，湘军水陆各军密切配合，终于1854年10月11日至13日相继攻占花园、鲇鱼套等武昌外围重镇，14日则从太平军手中正式夺回武昌。由此，罗泽南善于谋略，优于用兵，敢于攻坚的才识尽显。正如曾国藩在奏折中评述：“武汉克复，有提臣塔齐布之忠奋，有李孟群、罗泽南之谋略，有杨载福、肖捷三等之勇鸷，故能将士用命，迅克坚城。”^①罗泽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接连受到曾国藩保荐，官至道台职位。

湘军自攻占武昌后，按照曾国藩与罗泽南等人预定的东征计划，水陆并进，兵锋直指江西湖口、九江一带。罗泽南与塔齐布密切合作，统领湘

^① 《曾国藩全集（奏稿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76页。

军陆师于1854年10月下旬至12月间，先后攻占兴国、广济、黄梅等地。1855年1月上旬，所部进抵九江城下。九江为太平军重点设防之坚城，湘军无法正面攻城，罗泽南向曾国藩建议：暂且避开九江坚城，“先绝其外援”。他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为陆师稳居盩山，水师从浔城而下八里江，水陆配合，“从容以图之，自足以制贼之命”。中策为浔城水师如速下八里江，则陆师应从盩山“暂且驻营姑塘，与水师相依护”。下策为陆师如因水师不利，则应“遽退浔城”^①。曾国藩虽然采纳了罗泽南不急于猛攻九江城而“先绝其外援”的建议，留塔齐布继续围攻九江，由罗泽南部移扎湖口县之盩山以阻扼湖口太平军上援九江的通道，但是并未将浔城水师调赴八里江，水陆两军无法紧密配合。1855年2月中旬，湘军遭到太平军重创，曾国藩的座船被焚烧，文案散失，幸有罗泽南火速回援救护，才得以转危为安。事后，罗泽南对曾国藩坦诚相告，详细分析此次遭受重挫的原因，他说：此前“营中谋士，从下策者多，尊意亦主此说，泽南窃惑之”。理由是：“我军转战千里，贼所畏惮，一退浔城，则贼之气大长，必至袭我后路，并力浔城，而安庆之贼纷纷上矣。……水师在浔江者，亦有不能久驻之势，而姑塘战船，终无复出之日。如此举动，实有害于大局。”^②应当说，罗泽南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正当湘军久攻九江不下、连遭重创之际，坐镇九江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组织精锐，兵分三路展开西征，于1855年4月初第三次攻占武昌。在此危急形势下，曾国藩将湘军大营移居南昌，以便“坚扼中段，保全此军”^③。4月中旬，罗泽南奉檄至南昌，与曾国藩面筹用兵方略后，统率所部经三个月苦战，先后克复弋阳、广信、德兴、景德镇等重镇。正当罗泽南打算以景德镇为据点徐图发展之际，奉曾国藩之命于是年7月中旬又率部回援南昌以救省城空虚之危。此时，鄂、赣两省形势异常严峻，曾国藩处境艰难。就是否由罗泽南部进击义宁的问题上，曾国藩与江西巡抚陈启迈产生了意见分歧：陈启迈主张派罗泽南援攻义宁，曾国藩则坚持由罗泽

①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08页。

②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08页。

③ 《曾国藩全集（奏稿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54页。

南暂驻南昌，配合湘军水陆各军在湖口的战斗。在这个问题上，罗泽南真正体现了“读书明大义”的人格魅力。他从大局着眼，不太赞同同乡好友曾国藩被动困守南昌的意见。他的理由是：“今日之忧，不在湖口之难复，而在湖口之难守。”因为湖口为湘军与太平军必争之地，“与贼相持于无已，非长策也”，所以“为今之计，惟以复武汉为要着”。而义宁当江西、湖北两省之要冲，尤为江西腹心之患，须急攻并稳控此地以为规复武汉之根本。罗泽南向曾国藩坦诚表示：“请麾下即为布置，另择一人以统湖内之水师，泽南请先以义宁自效。克复义宁，即请随同麾下进征武汉，斯为上策。”^①从而，曾国藩在罗泽南的细心开导下，眼界豁然开朗，停止与陈启迈的意气之争，速派罗泽南统率诸营进击义宁。罗泽南不负曾国藩所望，经10余天苦战，于1855年8月下旬收复此城。事后，曾国藩奏陈朝廷：罗泽南“专善察看山势，迂道数十里，力争鳌岭要隘，杀贼之多，与去年半壁山相等。前此克复广信府，此次克复州城，并关系数省大局，为功甚伟”^②。鉴于此，清朝朝廷给予罗泽南布政使衔的嘉奖。

第四，回援武汉不惜身死以救曾国藩江西之危。

1855年秋冬，以石达开为首的西征太平军势力同时活跃于鄂、赣两省，湘军疲于应付，无法遵旨东进安徽和江浙等地。如何破解困局，成为湘军统帅和鄂、赣两省地方督抚面临的难题。新任湖北巡抚胡林翼认为，要扭转被动局势，就必须首先全力收复武汉。他建议曾国藩暂时放弃重兵围攻九江、湖口的计划，派罗泽南部迅速回援武汉以图根本。但是，曾国藩以湘军水师被太平军切断成内湖与外江两个部分，陆师统领塔齐布又病逝于军中，能够倚为长城的只有罗泽南为由，拒绝了胡林翼的多次请求。在这个问题上，罗泽南本人的态度很明确：武汉为东南要害所在，必须从太平军手上重新夺回。而崇阳、通城、兴国、大冶均为太平军占领区域，湘、赣大局受其牵制，只有兵援武汉，扫清外围障碍，九江、湖口之危乃至整个江西之危才可立解。他向曾国藩坦诚表示：“泽南奉委从戎，力小

①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09页。

② 《曾国藩全集（奏稿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08页。

任重，夙夜祇惧，常自恐其有失。然苟有可以效力之处，虽备极艰险而不辞。倘不遗葑菲，欲俾以剿崇通、援武汉之重任，则愿益以千人以厚其势，予以数月之饷以储其粮，虽自知其不才，亦愿枕戈尝胆，以从事其间，以歼此一隅之群丑。成败利钝，古人亦难逆睹，泽南亦惟尽其事之所当为，与夫力之所能为者，以不负委任之至意而已。”^①江西局势之危是暂时的，只要咬牙坚持，回援武汉成功，危局即可扭转。曾国藩由此深受启发，通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以大局为重，欣然檄派罗泽南统率所部及增补塔齐布遗部 1500 余人，由刘蓉协助前行。

1855 年 10 月 7 日，罗泽南与刘蓉、李续宾统兵 5000 余人，自江西义宁杭口誓师启行，目标直指武汉，沿途攻占崇阳、通城、蒲圻、咸宁等地，于是年 12 月 25 日抵达武昌城外纸坊，实现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大营大会合，随即在金口商定进攻武昌方略。1856 年 1 月 5 日，按照金口既定方略，罗泽南与胡林翼分兵进击武昌。2 月中旬，罗、胡所部加上增援而来的湖广总督官文一部进逼汉阳，形成了对武昌合围的军事态势。就在此时，江西 50 余州县相继被石达开部太平军攻占，曾国藩在频频告急朝廷的同时，飞函罗泽南回师江西。罗泽南则冷静回复曾国藩，力陈不能火速回师江西的理由：武昌不规复，湖北局势不稳定，即使江西之危暂解，也非长久之策。他细心开导曾国藩：“天下之事，在乎人为，绝不可以一时之波澜，遂自灰其壮志也。”^②江西局势之危是暂时的，只要咬牙坚持，回援武汉成功，危局即可扭转。当然，从私谊而言，罗泽南深为好友曾国藩担心，“江西之事，一何糜烂至此，读之心痛”^③。他决心克服千难万险，为尽速攻克武昌以解江西之危而努力，同时做好了“即一时不能得手，亦必与此城相终始”^④的准备。这就是说，罗泽南志存高远，明确认定回援武汉不仅关系到好友曾国藩江西之危的缓解，而且与稳定两湖大后方、开辟赣皖和江浙新局面，乃至直捣金陵这个大目标紧密相连。所以他要全力以

①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113 页。

②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115 页。

③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114 页。

④ 《罗泽南集》，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115 页。

赴，即使失去性命也在所不惜。然而，武昌是太平军必争之地，就在罗泽南与胡林翼等大兵压境之际，九江、黄州、大冶、兴国等地太平军的援兵齐至，于1856年4月5日发起了对湘军的战略大反攻。做好了“与此城相终始”准备的罗泽南，在与强敌太平军的生死搏斗中，虽身先士卒，英勇顽强，曾三次被太平军击退，又三次组织进攻，但最终寡不敌众，右额被炮火击中，流血不止，仍“踞坐指挥”。归营后，罗泽南头痛剧烈，“危坐不眠，与在营诸将议攻城方略”，直至4月10日病情恶化。次日，罗泽南“气喘神散”已不可救，再一日自知即将离开人世，便握着胡林翼的手说：“武汉未克，江西复危，不能两顾。死何足惜？事未了耳！”^①说完，闭目断气，时年49岁。

罗泽南的死是惨烈的，是悲壮的，是死得其所，是他践履“读书明大义”人生价值观的结果。从而，他的人品、学识和才能，受到了封建官僚士大夫的充分肯定和赞扬。而作为罗泽南同乡好友的曾国藩，对于罗泽南的去世，感慨特深。他在内心无限悲伤的同时，觉得后悔不已，认为是自己五次急促回援江西而导致的结果。因为深念这位良师益友，曾国藩亲自作主定下第三女儿与罗泽南次子的婚约，同时撰写了《罗忠节公神道碑铭》等文，大力赞颂罗泽南的人品、学识和才能：“在军四载，论数省安危，皆视为一家骨肉之事，与其所注《西铭》之指相符。其临阵审固乃发，亦本主静察几之说。而行军好相度山川脉络，又其讲求舆图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积者夙也，非天幸也。”^②曾国藩经常仔细品读罗泽南的遗著，在日记中大发感慨：“夜阅罗罗山《人[太]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服其见理甚真，所志甚大，信为吾乡豪杰之士。”^③综合罗泽南的人品、学识和才能，与他的人生实践经历相融合所产生的效果而言，曾国藩“豪杰之士”的评语，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正如钱基博指出：“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之人归颂焉。……自来言宋儒之理学者，往往小廉曲谨，可以

① 梅英杰等：《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6页。

②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45页。

③ 《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三）》，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05页。

持当躬，而不足以任大事。”而罗泽南则不一样，能做到“义勇愤发，本之问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中间屡遭惨败，而志不挠，气益壮，讨部众而申愆之，或解说《周易》以自遣”^①。应当说，这正是对曾国藩称颂罗泽南为“豪杰之士”最恰当的注脚。

^① 刘梦溪主编，傅道彬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83—584页。

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孤独先行者

——郭嵩焘其人其事及其思想

郭汉民^{*}

摘要：出生于湖南湘阴的郭嵩焘，是中国近代中国首任驻外使节，也是最早走向世界的湖南人。他通过全身心地观察世界、了解世界，完全打破了封闭、保守、排外的旧思想旧观念，成为出类拔萃的启蒙思想家。郭嵩焘对西方认识到：一、西方的富强是以“通商为制国之本”；二、西洋富强之源在讲求实学；三、西洋富强之本在政教修明、君民一体；四、西洋治国有道，自是一种文明。这些认识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夷夏观，超越了洋务派的本末体用观，抓住了向西方学习的根本。郭嵩焘也由此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孤独先行者。

关键词：郭嵩焘；湖南；西方；富强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云仙，别署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晚年读书之地曰“养知书屋”，世称养知先生。他是近代中国首任驻外公使，也是近代中国力主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杰出思想

^{*} 郭汉民（1943—2020），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

家。其一生手不释卷，笔耕不辍，著作宏富，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有《郭嵩焘奏稿》《郭嵩焘诗文集》《郭嵩焘日记》等。近年来，梁小进先生主编之《郭嵩焘全集》凡十五册，八百多万字，纳入湖湘文库，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这为我们认识郭嵩焘提供了空前丰富而完备的资料。

郭嵩焘诞辰 200 余年，回顾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系统考察郭嵩焘整个人生、事业与思想历程，并把他置于 19 世纪 40—80 年代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与其同时代及稍后的重要历史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完全可以说，郭嵩焘是近代中国最早走向世界、最早主张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孤独先行者。

一、最早走向世界的湖南人

1818 年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阴一个富商之家。自幼博学多才，17 岁中秀才，29 岁中进士，供职翰林院。他曾就读长沙岳麓书院，先后结交曾国藩、刘蓉、左宗棠、江忠源、罗泽南等湖南礼学经世派人士，协助曾国藩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1863 年署理广东巡抚，1877 年担任驻英大臣兼出使法国大臣，成为近代中国首任驻外使节，也是最早走向世界的湖南人。在他之前，已经走出国门的留美学生容闳、流亡国外的王韬和奉命出国考察的斌椿、志刚、孙家谷、张德彝等均非湖南人。最早开眼看世界的魏源 1847 年曾到了香港，但未出国门。

我们说郭嵩焘是最早走向世界的近代湖南人，并非如后来或现在许多出国留学、务工、旅游和参观考察的湖南人，而是由于郭嵩焘既有“考求外情”的强烈愿望，又有坚持不懈、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崇高精神，以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奠定了他最早走向世界的历史地位。首先，郭嵩焘具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考求外情”的初心。早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不久，郭嵩焘就开始思索“洋患”的问题。鸦片战争后，如何对待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即所谓“洋患”，如何捍卫自己国家民族利益，就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严肃课题。1843 年郭嵩焘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在鸦片战争中惨遭失败，根本原因是不懂外情，措置失当。1859 年他上奏咸丰皇帝说：“通市

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①，建议教学外语。他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更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犹为〈谓〉国有人乎！京师知者独鄙人耳。”^②他把“无一人通知夷情”看成是中外交涉二十余年中国一再失败的重要原因，把了解世界、了解夷情作为自己对国家民族的一种责任，力求“通其情，达其理”，在对外交往中减少民族损失，为国家谋利益。受命出使英国之后，郭嵩焘受慈禧太后召见，慈禧要求他到英国之后，“一切当详悉考究”。郭嵩焘当即表示，“英国无多事可办，专在考求一切，此是最要紧事”。^③也就是说，在受命出使时，郭嵩焘就把到国外“专在考求一切”视为“最要紧事”。其次，郭嵩焘办事具有极端认真的精神。早在咸丰九年（1859），郭嵩焘面奏咸丰帝要求通下情时，就提出要朝廷立个榜样，遇事认真，挽回大局不过“认真”二字，认真一段工夫，破除积习，切实做去，立竿成影，天下自然从风。郭嵩焘是这样说的，他在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国门以外的新事物、新学理细加了解，勤加考求，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并逐日记下，最后留下了五十多万字的日记。透过郭嵩焘日记，我们可以看到，郭嵩焘曾仔细考察过英法的议会、法庭、工厂、学校、监狱、军营、炮台、图书馆、博物馆、商品陈列馆，阅读了许多政治、经济、哲学、法律著作，涉猎了广泛的科学技术知识，从古代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自然科学家培根、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等，他都潜心研究，不清楚的地方还专门请人为之讲解。这样，郭嵩焘不仅是人走向了世界，而且是全身心地去看世界，了解世界，完全打破了封闭、保守、排外的旧思想旧观念，成为最早走向世界的近代湖南人，成为出类拔萃的启蒙思想家。

① 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② 《郭嵩焘全集》第13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40页。

③ 《郭嵩焘全集》第10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56页。

二、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

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和见解，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第一，西方的富强是以“通商为制国之本”。郭嵩焘看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在于他们重视商务，保护商民，商民获利既厚，国家税收也多，民富为国强提供了基础。这是西方富强的奥秘所在。他上奏清廷说：“西洋各国以通商为制国之本，广开口岸，设立领事，保护商民，与国政相为经纬，官商之意常亲。”^①又说：“西洋立国，专务通商”“一主通商，历久不变。其占据地方，远至数万里，皆以通商为名，初无穷兵之心”^②。郭嵩焘的这一看法，虽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向外侵略扩张的本质认识欠缺，但能从经济上认识西方“通商立国”的本质，在总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西洋富强之源在讲求实学。郭嵩焘认识到，“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③。“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④。西方国家人人向学，而且“凡学皆有会”，英国的皇家学会就是“专务实学”的团体，勤求不倦，所以能够做到“学问日新不已”^⑤。何为“实学”？郭嵩焘首次把“实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赛先生”相提并论，他说“讲求实学，洋语曰赛英斯”^⑥。在郭嵩焘看来，科学发达正是西方富强的根源，而学问之兴，基于教育。他推介西方教育“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⑦。他反观当时的中国，教育落后，不堪闻问，“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悉取天下之才败坏灭裂之”。^⑧

① 《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84页。

② 《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7—98页。

③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6页。

④ 《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⑤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

⑥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页。

⑦ 《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96页。

⑧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页。

他主张效法泰西，开设学馆，培养有用人才。

第三，西洋富强之本在政教修明，君民一体。出使之前，郭嵩焘在《条陈海防事宜》的奏折中，就已经提出了西洋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的想法，出使之后对西方“政教”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认识。他在日记中写道：“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民权常重于君”“用人行政一与民同”。^①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郭嵩焘看到了西方政教的特点是，“君民兼主国政”“君民交相维系”^②，在政体方面实行三权分立，实行法治。他说：“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③ 他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加以比较，认为中国尚德治，西方尚法治：“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已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惠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④

第四，西洋治国有道，自是一种文明。郭嵩焘认识到，世界文明并非只在中国，西洋立国二千年，也有自己的文明，决不当以不开化的夷狄看待他们。在《使西纪程》一书中郭嵩焘指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其至中国，惟务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逼处凭陵，智力兼胜。所以应付处理之方，岂能不一讲求？”^⑤ 正因为如此，中国决不能高谈阔论，虚骄自大，而应当看到“西洋立国自有本末”，如能真正“得其道”，不仅可以“相辅以致富强”，而且“保国千年可也”。^⑥

①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6页。

②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373页。

③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2页。

④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8页。

⑤ 《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⑥ 《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三、郭嵩焘认识的先进性

郭嵩焘上述对西方的认识，在夷夏观和本末体用观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先进人士，对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向西方学习什么做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其思想深度具有毋庸置疑的先进性。

首先，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超越了传统的夷夏观。“天处乎上，地处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① 中国居天下之中，内华夏而外夷狄，华尊夷卑，华上夷下，只能以夏变夷，不可以夷变夏，是传统的夷夏观。这种观念几乎成了中国士大夫和朝野上下的思维定式。到了清代，这种华夷观念更形成所谓的“华夷秩序”，中国不仅居天下之中，而且是文明程度最高、政治权威最大的“天朝上国”，有“抚育四海”教化四夷的责任。由于中国农业文明程度在很长历史时期内高于周边国家，传统夷夏观对于抑制外族侵扰、巩固华夏民族的向心力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更先进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确立并波及世界，中国就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安于现状、闭关自守、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欺人的大清帝国，终究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鸦片战争使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从这时起，打破封闭，学习先进，追赶世界潮流，实现国家富强就成为反抗侵略、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从这时起，传统的华夷观念便成了阻碍中国走向世界、妨碍国人学习西方的思想包袱。顽固守旧之徒为反对“师夷”，声称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而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人士也不得不将西方事物比附中国的“三代之治”，并提出“西学中源说”以自解，反映了认知心理上的唯古取向和中国文化优越意识的深沉积淀。例

①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5册，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3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0—781页。

如，魏源、徐继畲在介绍和赞扬美国民主制度时，说他们几于天下为公，“驳驳乎三代之遗意”。冯桂芬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亦宣称“以不畔三代之宗旨”。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在介绍英国君民共主政治制度时，亦云其“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甚至到了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孙中山，都把“步武泰西”与“远法三代”相提并论，糅而合之。那时的进步人士都相信，“西学源于中国”“礼失求诸野”，学习西方不过是找回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已。郭嵩焘突破了这一局限。他指出，西洋政治“公之臣庶”“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胜，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①。郭嵩焘还认识到，按文明程度的高低和教化之有无区分夷夏，“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②郭嵩焘的这些言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夷夏观，认定西洋文明程度高于中国，“实多可以取法”^③，这就更深刻地论述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必要性。

其次，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超越了洋务派的本末体用观，抓住了向西方学习的根本。洋务派是19世纪60—90年代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派别。他们在清王朝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排除封建顽固势力的干扰和阻碍，力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兴办军用民用企业，筹办海军海防，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但总的说来，他们学习西方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教化、纲常伦理尽善尽美，文明程度远在西洋诸国之上，所不足者唯船舰枪炮而已。所以只要师其长技，即可驾而上之。为了回答封建顽固势力的非难，他们提出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长技以维护中国封建主义的伦理纲常和政治秩序，取西人之器以卫吾圣人之道。郭嵩焘最初也是这一方针的拥护者，但随着对西方认识的加深，他看到西方富强的本源，“长技”不过是“末节”而已。郭嵩焘驻节巴黎时看到李鸿章的折件，通篇谈的都是什么枪好，什么炮利，并计划购

①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548页。

②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4页。

③ 《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买德国轮船四艘，然后发表评论说李相“考求西洋军火，可云精博……蒙甚惜其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①。早先，郭嵩焘与友人论及办洋务时，曾高度推崇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楨三人，说李能“知其大”，丁能“致其精”，沈能“求其实”，而自叹不如。此时，他认为只有自己真正懂得洋务精髓，大有“舍我其谁”之慨，“独所及见透顶第一义，则亦有诸公所未及者”。他与友人讨论“西洋政教风俗本源之所在”，评论说“合淝伯相（李鸿章）及沈幼丹（葆楨）、丁禹生（日昌）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未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② 在 19 世纪 70—80 年代的中国，能达到这种认识水平的，实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历史表明，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后，早期维新派人士才逐步认识到西洋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上下同心，君民一体，至于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都只是“用”，批评洋务派是“遗其体而求其用”。这种批评实际上成了早期维新思潮从洋务思潮中分化出来的标志，反映了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认识上的深化。需要指出的是，郭嵩焘在 1875 年就有了上述认识，而批评李鸿章舍本逐末则是在 1878 年 10 月，比通常被认为的早期维新派还要早一些。

四、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孤独先行者

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逐步兴起的进步潮流，先后产生过一大批前仆后继的卓越人物，郭嵩焘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49 年毛泽东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③ 在这四个主要的代表人物中，只有洪秀全比郭嵩焘大四岁，属于同时代人物，其他三人，至少比郭嵩焘晚出生三四十年，有的还深受郭嵩焘

① 《郭嵩焘日记》第 3 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47 页。

② 《郭嵩焘日记》第 3 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55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69 页。

的影响。康有为（1858—1927）比郭嵩焘小40岁，在郭嵩焘从英法回国的1879年“薄游香港”时才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认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1882年，康有为过上海观外国租界，更知西人治术之有本，从此潜心研究西学，主张向西方学习。严复（1854—1921）在郭嵩焘担任驻英公使时于1877年留学英国学习海军驾驶，留学期间，与郭嵩焘相时过从，成为忘年之交。郭嵩焘非常器重严复，在日记曾写道，“又陵才分，吾甚爱之”^①。孙中山（1866—1925）在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期间的186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孙中山12岁时，郭嵩焘正好在驻英公使任上，当时孙中山第一次离开家乡随母亲到檀香山探望在那里办农场的哥哥孙眉，他后来自述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②。上述事实充分说明，郭嵩焘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驱人物，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先行者都是有特别历史价值的，他们往往成为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但在他们面前往往不是鲜花，不是掌声，而是艰难困苦，甚至是骂声和诽谤。维新运动的先行者康有为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维新，布衣上书，举国目为狂。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最初宣传革命时，“言者谆谆，听者邈邈”，即使亲戚故旧，也掩耳却走，闻而不怪者，只有会党中人。^③先行者都是孤独的，康有为如此，孙中山如此，郭嵩焘处于中国近代的早期，更是如此。1877年，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亲友和同僚都劝他辞掉这一不光彩的职务以保全自己的名声。当时大家耻与为伍，目之为“汉奸”，京师士大夫集经书中的语句写成对联对他痛加讥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家乡的读书人为抗议郭嵩焘“周旋洋人”，甚至集聚玉泉山，欲捣毁其家。郭嵩焘出使两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详考外情，广交朋友，向国人介绍世界，也向世界介绍中国，受到世界舆论的好评。但是，他出使之后所写的《使西纪程》因赞扬西方“政教修明，富强未艾”而引起朝野

①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55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3页。

上下舆论哗然。编修何金寿参其“有二心于英国”，为“天地所不容，万古所不赦”，至谓“大清无此臣子”。^①副使刘锡鸿更援何折罗织郭嵩焘所谓“十大罪状”，例如，“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柏金汉宫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议论黄旗”“勾通英国”，甚至“诬以逆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②清政府当局竟然不辨是非，仅仅将刘锡鸿召回调用，并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郭嵩焘受此凌辱，奏请销差。回国后他写信给曾国荃说：假如当局能明辨是非，“裁之以正”，不要相信那些污蔑不实之词，“嵩焘老病余生，捐弃海外，亦不至乞归”。^③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离英归国，称病迄休，直接返回湖南。据郭嵩焘日记记载，船抵长沙时，不仅无人迎接，长沙、善化两县竟然不允许他乘坐的轮船入境，“士绅至于直标贱名及督抚之名，指以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衢”^④。回乡之后，郭嵩焘隐居不出，青灯做伴，黄卷相陪，潜心著述，1891年7月18日病逝，终年84岁。

五、真理之光是不可磨灭的

郭嵩焘在世之时已是谤满天下，自云“尘秽湖湘”“骂名穷极九州四海”，^⑤死后亦未享哀荣。李鸿章为之请谥立传，清廷上谕说：“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⑥光绪庚子年间（1900），甚至有人奏请朝廷，声称要戮郭嵩焘尸体以谢天下。郭嵩焘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遭不幸，而是由于自己认识超前而深感孤独。

郭嵩焘是近代早期的一位悲剧人物，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悲剧。诚如马克思所说，基于道义原则的中国反抗侵略，禁止鸦片，却是代表陈腐世界，而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特权的英国竟然是最现

① 《郭嵩焘全集》第4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833页。

② 参见熊月之：《论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纷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

③ 《郭嵩焘全集》第13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384页。

④ 《郭嵩焘全集》第11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100页。

⑤ 《郭嵩焘全集》第11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122页。

⑥ 《李鸿章全集》第14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代社会的代表，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落后的封闭的半野蛮的中国遭受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西方列强的侵略，这就是近代中国一切悲剧的根源。历史已经表明，鸦片战争既是近代中国悲剧的开端，也是逐步结束这一悲剧的开端。从此，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一是反抗侵略，维护自己民族的生存权利；二是打破封闭，走向世界，学习先进，争取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最早把这两个课题统一在一起，开辟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沿着这个方向，郭嵩焘勇往直前，找到了许多可使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文明的真理，并不懈地向时人宣传。然而，旧中国这具木乃伊封闭太久，解体的过程自然很长，其间充满着矛盾、冲突和斗争，旧的体制旧的观念积久成是，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新思想、新观念往往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被视为离经叛道。由于清政府与世接触出于被迫，所以很长时期与文明世界格格不入。皇帝最忌的是外国使节驻京，官员最怕的是与洋人交接，中外争执数十年而不决的是觐见礼仪，士大夫信念坚定的是华夏最为文明，夷狄无父无君，全国士大夫都戒谈洋务、耻谈洋务，以不谈洋务为高。曾继泽因家讳从南京赶回长沙只因乘坐外国轮船，引得湖南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那时，奉派出使，人不屑为，“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①。最守旧的大学士徐桐甚至于见到洋人捂鼻子，遇到高楼绕道走。李鸿章打算修铁路，恭亲王奕訢说他不敢做主。李鸿章请他乘便说服两宫，奕訢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在这种政治和社会氛围中，郭嵩焘思想超越，主张激进，曲高和寡，以致被人视为汉奸，不容于时论，就不足为怪了。当时最高统治者西太后慈禧在要郭嵩焘出使时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② 在召见接替郭嵩焘出使英法的曾纪泽时，西太后慈禧还说：

① 《郭嵩焘全集》第13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272—273页。

②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他出使之后，所办的事情不少。”^① 郭嵩焘回乡养病期间，上谕还说他“办事实心，不辞劳瘁”“着俟病体稍痊，即行来京供职”。^② 但最终连清廷都要顾及“物议”，不许郭嵩焘享受哀荣。

郭嵩焘虽然因思想激进受到人们的讥笑怒骂，但他为了救国而寻求真理，故而坚持不懈。当友人劝他少言息祸，免谈洋务时，郭嵩焘在光绪五年四月初二的日记中坚定表示：“所以谈者，欲使人稍知其节要，以保国有余。苟坐听其昏顽而已，不动兵则坐削，一旦用兵，必折而为印度。此何等关系，而可以不谈乎？”“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予于此亦有所不敢辞，于区区世俗之毁誉奚校哉！”^③ 他坚信自己手中有真理，坚信自己可以流传于后世。他致信友人说：“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然其所以犯骂讥笑侮而不悔者，求有益国家也。”^④ 并题诗自勉：“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事实上，郭嵩焘还活着的时候，他的言论已经受到进步思想家的肯定。1890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称赞遭毁版的《使西纪程》对西方政治的说法全然不错。1899年维新思想家梁启超称魏源、郭嵩焘、曾纪泽为“首讲西学者”^⑤，是“维新先驱”。1902年革命宣传家杨毓麟著《新湖南》一书，痛斥湘军将帅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为“汉奸”，而独于郭嵩焘大加赞扬：“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⑥ 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郭嵩焘的思想和命运重新加以审视，许多学者都对他做出了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可见，未及百世千龄后，举国上下已识近代有此人，湖南有此人，湘阴有此人。这是郭嵩焘的光荣，湘阴的光荣，湖南的光荣。

① 戴逸主编：《近代名人日记选》，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106页。

② 《郭嵩焘全集》第11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127—128页。

③ 《郭嵩焘全集》第11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106—107页。

④ 《郭嵩焘全集》第13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339页。

⑤ 尹飞舟编：《湖南维新运动史料》，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4页。

⑥ 《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3页。

民国学者唐大圆行迹考述

——兼评“东方文化”思想

张利文^{*}

摘要：唐大圆作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颇为活跃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为人所知处，往往是其与支那内学院王恩洋等人发生的《起信论》论争，以及主编《海潮音》、辅佐太虚教理革命等事迹。但不论从他后来自已坦承的兴趣“变相”，还是从他实际的文化主张来看，唐大圆都是一位以儒家道德为本位，力倡东方文化的学者，尽管其讲说中富含佛教的种种名相。唐大圆“东方净土”说，也是在太虚“人间净土”的思想上进一步儒化后的结果，而且带有浓厚的“博施济众”家国情怀。唐大圆的思想代表了民初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中一个较具典型意义的文化面相，对其一生行迹的考述有利于我们对他的思想进行全面的把握，由此也能更加清晰地再现“东方文化派”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唐大圆；文化保守主义；东方文化派；近代社会思潮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处在一个政治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同时

^{*} 张利文，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毛泽东研究与湘学专项资助课题“论唐大圆东方文化思想对西学的回应”（项目编号：15ZXC16）。

也是一个思想界风起云涌、中西新旧各种学说交汇碰撞的时代。例如，因西学东渐的发展与欧洲战争的发生，新文化运动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相继兴起，彼此争锋驳难；又如针对明清以来佛教界积弊已极的现状，太虚提出了教理、僧制、寺产三大革命^①，由此开展了新僧运动。唐大圆（1885—1941）就是在这样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下，厕身其间，不仅以积极革新的姿态参与太虚人间佛教的教理改革，倡说“东方净土”呼应“人间净土”，而且更以弘扬东方文化为己任，终身抱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之情怀，力斥鼓吹西方“物质文明”与新文化运动的知名学者。

唐大圆早年修习净土，曾礼拜印光法师，但并未遵照印光“老实念佛，勿学唯识”的教谕，坚持自学《大乘起信论》《成唯识论》和《解深密经》等教门典籍。后皈依太虚，在汉口佛教会下设的宣教讲习所及武昌佛学院先后担任讲师，并主编著名佛教月刊《海潮音》。唐大圆亦曾短暂担任过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的教授，主办《东方文化》《震铎》等杂志，创办法界新莲社、觉国大学院、东方文化研究院等教学机构，其一生办学办刊之努力，无不希求以东方文化挽救世界乱象。而此“世界大乱”的病因，唐大圆屡屡申述，便是西方物质贪婪、弱肉强食的竞争对东方既有精神文明的破坏。唐大圆的文化立场，可比较明确地归属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儒家伦理为本位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东方文化派的一系，尽管其学说中使用了众多佛教名相。虽然唐大圆存世文字很多，但在关涉自己行履的方面，主观遮掩的意味较重，以至于目前学界对唐大圆一生行止，乃至其真实思想的把握，多有淆乱，乃至茫然未知者。这些势必成为我们全面研究民初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起伏，以及太虚麾下居士佛教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本文对唐大圆的学术生平，做了一次尽量细致的梳理。^②

^① 后人援引佛教三大革命的具体称谓略有不同，此据太虚：《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太虚大师全书》第31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② 限于篇幅，学界已然清楚，或与其人学术思想关系不紧密的事迹将作略写。

一、修道学佛，初出茅庐（1885 年至 1922 年 8 月）

唐大圆于光绪十一年（1885）出生于湖南武冈（今属洞口县）一个比较殷实的酒业家庭。^①1904 年，唐大圆 20 岁时，考入湖南游学预备科，后因游学预备科被官方关停，返回武冈高小任教。1908 年，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成立，唐大圆考入该校学习。1912 年，唐大圆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就职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②该年，在游学预备科同学林浩心的鼓动下，唐大圆与之一同加入了共和党。^③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第二年，唐大圆就因一场大病，不得不离职回家休养。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起初非常严重，以至于林浩心闻讯从衡阳奔来与之诀别，但在二弟唐大休的精心照料下，唐大圆最终康复。感慨“天幸相我，再生有庆”的唐大圆开始“阅道书，祈长生”，对仙道、佛教产生了兴趣，^④苦于无佛经可读，1914 年唐大圆携仆步行三日，从县西四十里外的双峰寺借得《华严》《阿含》等大量佛经回家阅读。^⑤1914 年冬，唐大圆母刘氏病故，丧亲之痛使他更加坚定了学佛的愿心。^⑥

① 虽然唐大圆在与幼弟书中自称“吾家处僻守约，非卓然自立、艰难创造，则不能以侥幸而得嘉誉”（《大圆文存》，泰东图书局 1927 年版，第 3 页），但这仅仅是家训语，未有证据显示唐大圆家庭存在“入不敷出”的“经济负担”（引见尹晓彬：《唐大圆及其“东方文化”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 2009 年）；相反，从其携仆出游、其父几不问家事而“申申如”于乡里等文字的记载，以及 1927 年湖南农民运动时家宅受到冲击等事推断，唐大圆家境在武冈一带应算比较富裕。

② 唐大圆：《大圆自序》，《佛光社社刊》第 1 期，佛光社 1926 年 6 月版；唐大圆：《个人心理学之研究》，《东方文化》第 5 期，泰东图书局 1930 年 9 月版；唐大圆：《拙修室文钞序》，《大圆文存》，泰东图书局 1927 年版，第 52 页；唐大圆：《覆友人书》，《大圆文存》，泰东图书局 1927 年版，第 5 页。唐大圆行文对自己经历的遮掩较多，需多种文献互校方能还原唐大圆一生之行止，相对而言，出版时间较早的文字可靠性略大。

③ 参见唐大圆：《答某君书》《林浩心行状》《林浩心伤词》，俱载《大圆文存》，泰东图书局 1927 年版。适时，林浩心刚从湖南第一政法学校毕业。唐大圆虽未明说自己被哪位友人“强持入党”，但从二人入党经历之相似、时间际遇之吻合，以及关系最为亲密等线索来看，林浩心是最有可能的。同时亦见唐大圆对政治的热情并不淡漠。

④ 唐大圆：《个人心理学之研究》，《东方文化》第 5 期，泰东图书局 1930 年 9 月版；唐大圆：《大圆自序》，《佛光社社刊》第 1 期，佛光社 1926 年版；唐大圆：《林浩心伤词》，《大圆文存》，泰东图书局 1927 年版，第 78 页。

⑤ 唐大圆：《游双峰山记》，《大圆文存》，泰东图书局 1927 年版，第 24—26 页。

⑥ 唐大圆：《先妣刘孺人行略》，《大圆文存》，泰东图书局 1927 年版，第 32—35 页。

1916至1917年，唐大圆进行了一次长途游历，先至长沙，再到北京，又南下宁波、杭州，最后绕道长沙，返回家乡。据唐大圆自述：

岁在柔兆执徐（1916）……余以秋七月驾言出游，至长沙，次日谭祖安（谭延闿）方归自沪为督军，湘城谋食者逆旅为塞。逾月不怡于观。九月一日昧爽发长沙……上陆于汉口……日中登京汉车……越日午后四时到京，寓宝庆会馆。初访黄季子（黄侃）于大学夹道之寓，一见倾盖。……余寡交游，时独往图书馆或到法源寺、白云观与僧道谈，后至广济寺，购《成唯识论》《解深密》等经，读之豁然有悟。冬十月，参众两议院举定副总统冯华夫（冯国璋）……翊年春，忽思东游，遂乘京津车到天津……止一宿，即乘津浦车，越青、徐，一夜抵金陵。……是晚乘沪宁车抵沪。……翊日晚乘舟之宁波，居三日复返上海，即坐沪杭甬车到杭……余优游三月于湖山之胜……适北省督军耀兵于天津，予以为天下自此多难矣，不可以不归，遂以夏四月末发杭城，七日抵长沙，又七日发长沙抵家。^①

表面上看，唐大圆此行是一场搜寻书籍、优游山水的国内游学，但实际上这是唐大圆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省城、北京等地谋寻官职的活动。尹晓彬据《洞口县志》中的一句“民国六年（1917），任浙江省督学”的记载，推断“出外谋职是唐大圆此次历时一年出游的目的”^②，应是洞明之察。

二、温州弘法，亲近印光（1922年9月—1923年2月）

1917年出游觅职失败后，唐大圆回到家乡继续研习佛典，并在家族祠堂中以“儒释兼说”的方式讲学。其间，唐大圆也常向太虚主办的佛教月刊《海潮音》投稿，自撰佛学小册邮赠社会名流。《印光法师文钞》中收录了印光法师大约在1924年春回复陈士牧居士的一则通信：“接手书，备

① 唐大圆：《纪游》，《大圆文存》，泰东图书局1927年版，第204—206页。

② 尹晓彬：《唐大圆及其“东方文化”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24页。

悉……《心经口义》，上海印者系唐大圆居士原本，天津流通处陈正有居士所印，系光略修者，较彼原文稍顺畅点。祈向佛经流通处请文。”^①《心经口义》是唐大圆于1921年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辰为圆通庵演讲《心经》的讲义^②，从印光的回忆来看，唐大圆当年曾将该讲义投至上海某书局印刷流通，又寄其本人，求予鉴定。印光允之，并为之酌情修改，再付天津印刷。也大约正是此时，唐大圆与印光建立了比较宽泛意义上的师徒关系。^③所以，1923年春，当印光的皈依弟子吴碧华在温州举办莲池海会的时候，印光推荐了唐大圆前往温州讲经说法。^④

唐大圆携其五弟大定，1922年9月26日（民国十一年八月初六）从武冈启程，途径武汉拜见同乡空也法师（1885—1946）及太虚大师后，沿江直下，终抵温州。^⑤温州的一系列讲法活动，使唐大圆在当时佛教界声名大振，不仅结识了不少军政界、佛教界名流，而且也刊布、印行了不少讲义文章。1923年3月中旬，唐大圆离开温州，上普陀山首次拜谒了通函已久的印光法师，^⑥后溯江而上，于武汉再次参谒太虚。^⑦

三、辅佐太虚，主编潮音（1923年3月—1925年9月）

唐大圆在温州时，除与莲友共办念佛法会外，主要的讲法内容就是明

① 《印光法师文钞》（中），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754页。

② 唐大圆：《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口义叙》，《佛心丛刊》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部1922年1月版。

③ 唐大圆与社会名流间的往来，大多先经书稿、信函邀约。与太虚的结识也是如此，他曾“迭邮两函，徒劳去雁，终趑来鸿”，但后来还是在前往温州的途中，第一次拜访了太虚。唐大圆在与印光、太虚的信函中都谦称弟子，但从思想影响来看，唐大圆显然与太虚亲近许多，而与印光老实念佛的“哑羊僧”观念愈行愈远。

④ 唐大圆自述温州之行与结识印光的因缘云：“普陀印光上人高唱净土……与通函订法缘，因缘机感，遂有温州讲经之行。”（唐大圆：《温州弘法记》，《海潮音》第4卷第8期，武昌佛学院1923年9月版。《海潮音》编号用语多变，本文统一以某卷某期称呼。）

⑤ 唐大圆：《温州弘法记》，《海潮音》第4卷第8期，武昌佛学院1923年9月版；唐大圆：《呈赠太虚法师四首》，《海潮音》第5卷第1期，武昌佛学院1924年2月版。

⑥ 唐大圆以诗记云：“我来礼谒二月初，东风吹雨升篮舆……印光老人寿而健，声如洪钟目如电。”（大圆：《登普陀山放歌》，《海潮音》第5卷第1期，武昌佛学院1924年2月版。）

⑦ 唐大圆自云：“壬戌八月应温州请往说法，便道来鄂，参谒法师。今春言旋到鄂，复蒙留与赞佛事，得当亲近。”（唐大圆：《赠太虚法师四首》，《海潮音》第5卷第1期，武昌佛学院1924年2月版）

代高僧憨山德清的《性相通说》，尤以上卷《百法明门论论义》为主，其讲义叙曰：“相宗广陈万法，归于唯识，匪独佛学，亦一切学术之本。”^①可见唐大圆在学佛之初就怀有净土念佛、不废经论的主张，所以当他返程拜谒印光时，印光的训诫“老实念佛，勿学唯识，徒入海算沙耳”^②，基本上被当耳旁风了，唐大圆丝毫没有减弱对中国佛教教门的兴趣，尤其是抵达武汉后，亲近太虚，更坚定了他深入学习唯识的信念。

太虚对唐大圆颇为器重，太虚麾下的众多居士如李隐尘、王森甫对唐大圆的到来也十分欢迎。甫到武汉后一个月，1923年4月30日（农历三月十五），唐大圆被留任为汉口佛教会宣教讲习所的教务主任兼讲师。^③8月23日讲习所学员毕业后，唐大圆转入武昌佛学院，任《俱舍论》讲师，兼听太虚讲《成唯识论》^④。因《海潮音》原主编史一如染疾，是年第九期编辑事务改由唐大圆负责，该期出版于1923年10月30日，大致编于9月，也就是说唐大圆入职武昌佛学院仅一个月后，即已接手《海潮音》，直到唐大圆编完第五卷第八期（1924年9月18日出版），编辑事务转交张化声负责，唐大圆实际主编《海潮音》的时间有整整一年。

1924年间，唐大圆曾短暂兼职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讲授唯识与国文。^⑤又曾数次返回武冈，与蛰居家乡的好友袁朴共建法界新莲社。^⑥1925

① 唐大圆：《温州弘法记》，《海潮音》第4卷第8期，武昌佛学院1923年9月版。

② 大圆：《十五年来中国佛法之变相》，《海潮音》第16卷第1期，海潮音社1935年1月版。

③ 《武汉癸亥佛教年鉴》，《海潮音》第5卷第3期，武昌佛学院1924年4月版。彼时武昌佛学院已于1922年4月正式成立，太虚任院长。而汉口佛教会为皈依太虚的李隐尘居士主持，其下设宣教讲习所，请太虚任所长。一些传记误传唐大圆一到武昌即担任佛学院的教务主任，实系混淆。

④ 唐大圆：《唯识教义阐微》，《海潮音》第5卷第4期，武昌佛学院1924年5月版；《佛学院甲子四月以来之略历》，《海潮音》第6卷第1期，武昌佛学院1925年2月版。

⑤ 大圆：《十五年来中国佛法流行之变相》，《海潮音》第16卷第1期，海潮音社1935年1月版。唐大圆未留下太多关于执教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记述，彼时黄侃就聘于武昌师范大学，兼教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唐大圆与黄侃相谘，其短期兼讲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可能性较大。

⑥ 唐大圆：《复印光法师书》，《海潮音》第5卷第8期，武昌佛学院1924年9月版；唐大圆：《大休行略》，《海潮音》第8卷第2期，海潮音社1927年3月版。袁朴（1879—1930），字文纯，又字闻纯，皈依印光后改智纯，系唐大圆少年好友，与唐大圆曾订生死交，唐周游各地，袁朴一直在家乡帮助唐大圆经营法界新莲社及觉国大学院等事。

年9月唐大圆离职武昌佛学院，返回武冈，结束了他在武昌佛学院辅佐太虚的第一个阶段。

唐大圆离职武昌佛学院，主要是因为1924年秋杪太虚突然离开武昌佛学院，前往沪、甬。唐大圆在与太虚的信函中将此事说得很清楚：“圆之来鄂，本因仰师高风，心悦诚服，以相赞助。今师既高蹈，圆亦固应远引。”^①太虚突然离开的原因，学界已多有论析，兹不再述，但毫无疑问，如印顺所言，太虚的离任给武昌佛学院院长董与师生留下了一团错愕与混乱，所以唐大圆在信中说“佛学院亦全系吾师一人，师去后，兴衰天壤，不堪言状”。这使得武昌佛学院群龙无首，直接导致了唐大圆的失意南归。至于唐大圆信中又说“适鄙处法界新莲社来函，社址将成，促归筹开觉国学院……圆得信后欣允言旋”，不过托词而已，该年底，蒋维乔来函邀其赴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唐大圆于农历年后旋即启程赴宁，而将觉国学院诸事“托同志妥办”了。^②

唐大圆主编《海潮音》的这一年前后，是唐大圆佛学事业的成熟时期，同时也是武昌佛学院在太虚领导下的黄金时期。唐大圆跟随太虚法师在佛学院、军政学界讲学弘法，同时学习唯识。借此殊胜机缘，唐大圆发表了不少文章和书信，与知名学者展开了丰富的交流，如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王恩洋，学衡派的景昌极，国粹派的黄侃，宗教界的印光、空也等，他甚至为1924年泰戈尔的访华著文热情欢呼^③。怀负“略似儒家博施济众”而“度一切众生出苦海”的宏愿，唐大圆积极地参与了彼时焦点问题的论辩，甚至火药味甚浓，尽管唐大圆自诩“吾修无争三昧，于人何所

① 《唐大圆覆太虚法师书》，《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11期，世界佛教居士林1926年1月版。

② 唐大圆：《覆东南大学校长蒋竹庄先生函》，《东方文化》第1期，泰东图书局1926年5月版。从唐大圆一贯的教育理念等线索推测，觉国学院系一所依托法界新莲社（社址可能即是唐氏族庵）而办的民间书院或私塾性质的教学机构，没有官方注册，校名也比较随意，据唐大圆自述就另有“觉国大学”“觉国大学院”等多种名称，学生常年维持在30人左右。

③ “若为佛化的泰戈尔，则大圆亦将以供养佛化新青年者供养之。”（大圆：《泰戈尔与佛化新青年》，《海潮音》第5卷第4期，武昌佛学院1924年5月版。）然而泰戈尔对佛教本不熟悉。

不容焉”^①。同僚张化声在与友人函中，对此有清晰的记载：“最有趣的是大圆，长不满三尺，而心雄万夫，恰似瓦岗寨混世魔王程咬金，任你天神临阵，他都要大挡三板斧。一时意气之豪，抗孔颜而薄汤武，屈天演而破进化，南征北讨，粗告太平，乃回其锋于同教之支那内学院。课诵之余，开最高军事会议，如何发难，如何应敌，兴高采烈，手舞足蹈。”^②也许其弟唐大休已有所觉察，曾委婉谏言：“兄主持《潮音》，海内外佛学大家相周旋，固弟所馨香祷祝者，然而任重道远、体大用宏，出其言善则天下受其赐；出其言不善，则醍醐为鸩毒矣。弟意凡发明一意，新造一论，务须与贵院各大德再三推敲、慎密以出之。”^③可惜唐大圆毫无自觉，颇为自信地回函说：“《海潮音》得虚老法师指导，发言立论尚鲜过咎，亦颇蒙海内知识大德赞许。吾每有作及编辑稿，均请虚大法师阅过，方敢发表，其谨慎亦适如汝所期。”^④不幸恰恰被唐大休言中，就在此封公开信中，唐大圆因其不谨慎的态度，激怒了印光，以致印光修书欲与唐大圆绝交：“前日至一友人处，见《海潮音》五年第四期，汝与大休之书，不禁令人惊叹不已。此小人挟仇诬谤之语……不忆汝亦不察，相为唱和，竟录于《海潮音》中，得不令具眼正人谓汝之知见不异俗流，不究是非，但据传闻以为定据乎！……以汝谬以光为师，故不禁戒勸。若谓不然，请即绝交。”^⑤克实而论，印光法师的批评是公允的，作为《海潮音》的实际主编，唐大圆无法也不应该以“世道浇漓、人心大坏、邪说横行（导致自己听信流言而撰文）”等遣世之辞为自己的错谬脱责。随后，唐大圆不得不在《海潮音》上登函道歉。^⑥但这并非孤例，唐大圆在《海潮音》上的一篇《起信论料简之忠告》，借庄子语“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直斥支那内学院王恩

① 唐大圆：《再答陶其情君对于答我之内外学观质疑之饶舌》，《东南论衡》第1卷第27期，东南大学论衡社1926年12月版。

② 张化声：《复陈撷宁先生惠函》，《中华仙学养生全书》（下），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250页。

③ 唐大休：《与伯兄大圆书》，《海潮音》第5卷第4期，武昌佛学院1924年5月版。

④ 唐大圆：《答二弟大休书》，《海潮音》第5卷第4期，武昌佛学院1924年5月版。

⑤ 《印光法师与大圆书》，《海潮音》第5卷第8期，武昌佛学院1924年9月版。

⑥ 唐大圆：《复印光法师书》，《海潮音》第5卷第8期，武昌佛学院1924年9月版。

洋“暗效倭人之诡辩”^①，用语颇为激烈。很显然唐大圆的意气激起了王恩洋的不快，王恩洋随即回信答复：“贵刊既以小成荣华诡辩之士目洋，而洋若犹频申共论议以附诸君子之末，哗世取宠，无乃太不自爱，此洋自不宜再于贵刊有所陈献者也”^②，并拒绝再次为《海潮音》供稿。唐大圆对唯识学巨擘欧阳竟无的言辞虽然较为谦逊，但关系也颇为紧张，其曲解欧阳竟无的答函“不得已而抑《起信》”一句，称欧阳竟无的主张“祇是方便，不可执为实法”^③，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理解支那内学院的思想。所以后来唐大圆与欧阳竟无在南京的一次会晤不欢而散，蒋逸雪在追缅其师的《唐大圆先生行述》中，除了为尊者讳，婉饰大圆“闲逸雅量”外，所述事件，基本上还是符合史实的。

时十四年秋也，一日，先生访欧阳渐归。余意两大师把晤，必有胜义可闻，往扣之。先生意态闲逸，徐徐言曰：“吾太痴顽，今日触竟无居士怒。”问何因。曰：“伊以《大乘起信论》非马鸣造，余曾撰《起信论解惑》，意与相左。”问其感想，曰：“理愈辩愈明，论难原非昔人所禁。惟儒以变化气质为先，佛以嗔为三毒之一。贤如竟公，而犹未证此耶！”余问：“先生当时作何语？”曰：“值彼恚愤，余何言乎？意其事过或追悔耳！”其雅量有如此。^④

倘若唐大圆果然主张“理愈辩愈明”，奈何于《海潮音》上忠告王恩洋“辩亦不可过辩”耶？唐大圆之辩，擅长曲解佛教名相为己利用，如云“善辩至善而知止，斯合于中道”，问题在于，对于平等论辩之双方，岂能率意目他为“极端”，而坦然以“中道”自居乎？

四、执教南壅，刊布东化（1926年3月—1927年2月）

1925年11月初前后（农历九月间），唐大圆收到蒋维乔（1873—

① 大圆：《〈起信论料简〉之忠告》，《海潮音》第4卷第7期，武昌佛学院1923年8月版。

② 王恩洋：《致大圆居士书》，《海潮音》第4卷第9期，武昌佛学院1923年10月版。

③ 大圆：《书唯识抉择谈后》，《海潮音》第4卷第5期，武昌佛学院1923年7月版。

④ 蒋逸雪：《唐大圆先生行述》，《南谷类稿》，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292—293页。

1958)从南京发来的邀请函,请他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印度哲学等课程。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是国立东南大学在1925年初发生了严重的易长风波,校董会与北洋政府暂时调停的结果是聘请原江苏省教育厅长蒋维乔代理校长。鉴于此次风波中,国立东南大学出走了不少教授,包括从哈佛留学归国、已在国立东南大学哲学系开设印度哲学史的系主任汤用彤教授(1893—1964)。于是蒋维乔代理校长后的首要之事,便是延揽国内外知名学者和教授。^①蒋维乔自己也是民国时期比较知名的一位佛教学者,他比唐大圆早一年结识太虚,即民国十年(1921)十月底,太虚在北京讲经期间,就曾专门为蒋维乔讲解因明论。^②蒋维乔任江苏省教育厅长时,已在国立东南大学开设佛教哲学课程,也曾在唐大圆主编的《海潮音》上发表过多篇文章,两人应有比较接近的思想观点与主张。

唐大圆于1926年农历新年后旋即启程前往南京,他在给太虚的信函中写道:“圆顷因东大校长蒋竹庄君聘请讲唯识、因明、印哲等科,已于古历正月十九(1926年3月3日)由家启程,至二月七日(1926年3月20日)抵宁。”^③唐大圆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的时间,大约总计一年,这是其事业上最为顺风得意的时期。与在武昌主编《海潮音》时主要对佛教的弘扬不同,执教国立东南大学后,唐大圆把主要的精力投入了对“东方文化”的推介,乃至终其一生,无时不欲以此“拯天下之溺”,由此也定格了唐大圆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基准形象。

所谓“东方文化派”,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兴起的一批以东方文化为本位,不同程度排斥西方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统称。郑大华曾列举了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有:“《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及其后继者钱智

① 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164页。汤用彤在1925年东大“三九”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宣布罢教(参见《申报》1925年3月15日第12版),1925年8月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1927年夏,重返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执掌哲学系。(《汤用彤年谱简编》,《汤用彤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0页。)也就是说,1925年3月,汤用彤罢教后即离开东南大学,1926年夏返回,与唐大圆并无交集。蒋维乔延请唐大圆讲授印度哲学的目的,很可能是想请唐大圆接续汤用彤离职后中断的教学,但两人的学术风格是相差很大的。

② 印顺:《太虚大师年谱》,正闻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页。

③ 《唐君大圆函》,《海潮音》第7卷第6期,海潮音社1926年7月版。

修；有1919年访欧回国不久即发表《欧游心影录》一文宣告西方‘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产’的梁启超；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说的作者梁漱溟；有自称是‘一东方文化之信徒’的陈嘉异；有反对科学对人生观指导的‘玄学鬼’张君勱；有主张新旧调和和‘以农立国’的章士钊”，同时指出“东方文化派这个名词，似稍嫌笼统”“实际上他们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①。尽管东方文化派的成员间并不具有共同认可的纲领，学者的思想主张也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是并不妨碍我们用“东方文化派”这一术语涵括他们。因为他们异中有同，这个共同的思想特点，就在于他们都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思想为本位，拒斥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潮，他们大多有意识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动者出现于世。^②瞿秋白最早把这批崇尚宗法价值、迷恋封建制度的人统称为“东方文化派”，他在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1期上撰文指出：“宗法社会的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而所谓‘东方文化派’的学者还在竭力拥护。……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所以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③

唐大圆1925年秋回到武冈，就法界新莲社筹办觉国大学院时，就已表明了他的兴趣由佛教（尤其莲社净土思想）向“东方文化”的转移。他在给蒋维乔的信中说：“此所组织之觉国大学院即是破天荒之提倡东方文化者，以西洋文化东渐至今，成为已陈之刍狗，未足以起吾华人废疾，乃崭新扶出东方文化之精髓……先就沪上出一东方文化集思社社刊，继从敝地

① 郑大华：《论东方文化派》，《民国思想家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3页。

② 东方文化派成员的思想主张应以当事人的主要主张作判定，如梁启超的思想虽然多变，旅欧归来后对白话文新文学运动亦表同情，对科学也有看似中庸的态度，但不宜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同道或“骁将”，梁启超后期对中西文化的抉择，总体上是偏重中国传统的。正是梁启超“西方重物质文明，东方重精神文明”的倡说，被胡适斥为“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也正是此“妖言”，奠定了唐大圆“东方文化”思想的基线。

③ 屈维它（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1期，广州平民书社1923年6月版。

成兹学院……社刊日内可由沪泰东书局出版，已列大名为发起兼撰述人。”^①唐大圆希望通过办学与办刊所谓“体用具备”的两套方式推行他的东方文化，其所定校名“觉国”也透露出唐大圆希望通过他的东方文化“觉悟”国人的企图。

唐大圆甫到南京，就将他创刊《东方文化》的理想付诸实施，1926年5月，泰东图书局如期出版东方文化集思社专刊《东方文化》，此集思社虽列名了蒋维乔、太虚、江谦、章炳麟、黄侃、章士钊、柳诒徵、欧阳渐、梅光羲、王恩洋、景昌极、缪凤林等文化名流为“发起兼撰述人”，但大概多如唐大圆与蒋维乔的信中所述那样，一经函告即将对方列入名单，因为我们既未发现诸如欧阳渐、王恩洋、梅光羲、柳诒徵等人对唐大圆东方文化的任何评语，也找不到他们在《东方文化》上的撰述。沪版《东方文化》总共五期，除了太虚、江谦、德国旅华音乐人卫西琴（卫中）等人的少数文稿（含二次转载）及书信外，绝大多数都是唐大圆自己的撰述。唐大圆在首篇《东方文化决择谈》中开宗明义，对东西文化进行了颇带情绪化的价值褒贬。

世间最可怜之事莫甚于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老子》有言五色令人目盲……彼出洋留学外国者，其目既为彼五色所盲，除彼色外无能为视矣……但见有人不知有己……虽有极优美之东方文化而弃之不顾，虽有极敝恶之西方文化而趋之如巨鱼之纵大壑焉。……有舍其固有之宝藏，远赴重洋，尊师贫子得敝帚而享之千金者，亦谓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今日谈西方之文化无宁谓达尔文等进化之文化而已。

坦诚地说，相对于章士钊、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学者而言，唐大圆的东方文化思想是比较顽固保守，甚至近于肤浅的。他以流俗的知见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听闻流言就把诬谤语刊诸《海潮音》犯的是同样的不切实际的错误。而唐大圆甚至可能没有知道自己盲目反留学的态度，不仅与章士钊、梁启超的学术经历相冲突，而且与以留学生为主

^① 唐大圆：《覆东南大学校长蒋竹庄先生函》，《东方文化》第1期，泰东图书局1926年5月版。

体，同属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国立东南大学前学术团体学衡派所倡导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主张相抵触。郑师渠先生从相反的视角，对二者作出的评价可资参考：“学衡派强调文化具有世界的和历史的统一性，既反映其文化运思具有开放的特性，而与一般偏狭的东方文化论者划开了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衡派拥有广阔的思维空间。”^①虽然因于人事矛盾及易长风波，学衡派的主力梅光迪、吴宓、柳诒徵、汤用彤等人刚刚离开国立东南大学，但其留下的开明学风，尤其汤用彤主掌哲学系时倡导的“精考事实，平情立言”的研究方法^②，不可能一夜之间消退。这恐怕也是柳诒徵、汤用彤等学衡派成员未见呼应于《东方文化》的一个原因。唐大圆自述故事“十五年应南京国立东南大学聘，授唯识因明，学生二千余、教职员二百余，每圆授课，旁听者尤众”^③，非可实证。

1927年2月，唐大圆在奉寄《东方文化》第一期给章士钊时，附上一函，力斥白话文运动“百言足用者益以千，文愈支离而意愈晦”，乃“非新非旧之文妖”。虽然章士钊在回函中逶迤客套，但还是委婉表达了“世之笃古者，往往不变其可变，而唯形似古人之是务……《尚书》《史记》难识之字诚为旧之可变”的批评。如果我们留意到唐大圆寄章《东方文化》创刊号《弁言》中的第一句话：“世界闕蹟（笔者注：“纷纭”的孤僻字），国家糜烂……斩荆披棘，当仁勿让；经天纬地，舍我其谁”，就可以明白章士钊批评的所指了。

1927年3月下旬，国民革命军逼近南京，城内动荡，国立东南大学首当其冲，被视为“反动势力集合之大本营”^④，3月18日蒋维乔校长向教

① 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② 汤用彤：《评今人之文化研究》，《学衡》第12期，学衡杂志社1922年12月版。虽然汤用彤未必留意到后来接替其教职的唐大圆宣扬的东方文化，但这篇文章批评守旧者对待“西方文化，均仅取一偏，失其大体”，以及牵强附会、浅隘固陋者“不明儒释为二种文化之产物，其用心，其方法，其目的均各悬殊，安可勉强混同。此类妄说，诚乱世妖象也”，恰都与唐大圆的论学方式似若相合。

③ 大圆：《十五年来中国佛法流行之变相》，《海潮音》第16卷第1期，海潮音社1935年1月版。

④ 中央社：《东南学阀将重据最高学府》，《中央日报》1930年9月8日。

授会提请辞职虽未获允，但停课意见获得共识。^①从3月底至7月初，国立东南大学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直至7月被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唐大圆即于停课後只身返回武汉为“女佛学院讲唯识近月”^②，因为是时局动荡导致的停课，唐大圆的行李均留在南京，托付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东方文化》杂志也滞留上海^③，唐大圆应是准备暂时离开南京的。但国民政府迁入南京后，江苏教育界以及国立东南大学几乎完全改组，3月30日蒋维乔离宁隐居上海^④，6月江苏省教育会被解散。更何况新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在7月23日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了大学教员的任职资格，要求严格按照南京国民政府6月15日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办事，也就是说担任助教者一般也需要国内外大学毕业有学士学位者。^⑤由南开大学返回哲学系的汤用彤也因未“完成二年以上副教授之教务”而暂聘为副教授，而唐大圆的学历只是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毕业，若欲重返大学教席已是不太可能了。

五、颠沛困厄，闭门修行（1927年3月—1933年8月）

1927年6月唐大圆在给太虚的信中写道：“自申别后，人事万变，法界无边，业力靡尽。慧眼观之，刹那生灭，亦如如不动而已。自宁之鄂，为女佛学院讲唯识近月，即过长沙，绕南岳，正逢农潮涌沸。几乎大浸稽天，现则农潮一落千丈。”^⑥唐大圆离开南京后，在武汉停留讲学了一个月，再辗转长沙、南岳回到武冈，适逢农运涨落，唐大圆家宅受到冲击，唐大圆寓居长沙湖南居士林读经度日，与同事关系不很融洽，心情应是十

①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第12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05—406页。

② 参见唐大圆致太虚函，落款五月十三日，唐大圆一般用旧历，则书信日期为1927年6月12日。（载《海潮音》第8卷第8期，海潮音社1927年9月版）信中说“自宁之鄂，为女佛学院讲唯识近月，即过长沙，绕南岳归，正逢农潮涌沸”，则唐大圆离开东南大学大约是在3月下旬。

③ 见唐大圆1928年3月13日与弟唐大定函，载《海潮音》第9卷第5期，泰县佛教居士林1928年6月版。

④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第12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18—420页。

⑤ 李钊：《国民党党化教育制度研究（1924—1937）》，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

⑥ 《大圆居士函》，《海潮音》1927年第8卷第8期，海潮音社1927年9月版。

分苦闷。在太虚的介绍下，唐大圆又辗转于杭州西湖、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南京中国佛学会讲学或任编辑，直到1928年秋重返武昌佛学院。时太虚旅欧途中，拟成立世界佛学苑，武昌佛学院遂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唐大圆被推介为筹备主任。

唐大圆这一阶段的工作与生活，都不很顺利。世界佛学苑的筹备工作因经费及房舍问题毫无进展，在国立武汉大学的讲课也不成功，更不幸的是，其亲眷好友又相继病故。1928年唐父与五弟大定相继去世，1929年三弟瑞黄离世，1930年4月在家乡一直帮助唐大圆打理法界新莲社及觉国学院的好友袁朴也逝世，1930年6月唐大圆9岁的长子唐念寿突然病亡于武昌佛学院，一连串的打击使得唐大圆决定于1930年6月返乡闭门三年，专做忏悔修行。

对于遭遇的困厄，唐大圆也十分懊恼，他自述“（余）学佛茹素以来，自维无大过，而近前二三年间，遭父丧，亡其三弟二侄，次第夭四子，恒思不得其故”^①。唐大圆自省的结果是对传统净土宗的念佛往生观给予了进一步否定，在《青年学佛行要》中，他把当初长子病亡前没有及时延医却请人助念佛号以求往生西天形容为“中其魔说”，表示要“绝不厌弃娑婆秽土”“以种种方便，度一切众生出苦海”^②。唐大圆把努力使当下社会转染成净、不必发愿往生西土的主张，称为创造“东方净土”说。显然，唐大圆的“东方净土”主张是在太虚人生佛教、人间净土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儒化的结果。他自己也承认如此主张“略似儒家博施济众”，但若以本质来看，唐大圆大多都是在系列佛教名相下，以忠孝仁义的伦理价值推行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主张。例如，1931年4月佛诞日，唐大圆在武冈举办了一场名为“中国和平统一祈祷法会”的活动，但其真正的主题既非“祈祷中国和平统一”，亦非“佛诞法会”，而是如悬挂在会场大门上的一对联语所述：“论正行孝悌齐家礼让为国，应顿悟一日克己天下归仁”。这实即借佛教的法会，宣化儒家的价值伦理，以图“正行”天下。所以，有

① 大圆：《吾之内省见过》，《海潮音》第13卷第7期，海潮音社1932年7月版。

② 唐大圆：《青年学佛行要》，《海潮音》第12卷第2期，海潮音社1931年3月版。

论者把唐大圆归入以佛教文化为本位的东方文化派学者，粗略而言似无大碍，但应该看到唐大圆在佛教名相下，实质推行的是儒家的伦理及价值观。从学理上看，唐大圆依本《起信论》所说的唯识，与支那内学院佛学亦相对立。史传黄侃曾一针见血指出熊十力的唯识学“阳释阴儒”，熊十力笑而不答。这个评价用在黄侃好友唐大圆的“东方文化”主张上，恐怕也无过无不及。可以说，唐大圆不仅具有非常浓厚的三教合一传统思维，而且其合一的基础是以儒家为本位的，唐大圆应是一个略带特殊性的，仍然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东方文化派学者。

六、称意而行，势又未许（1933年9月—1935年4月）

1933年9月，唐大圆“闭户三年”后复出，重返武汉，汉口佛教正信会的王森甫、会觉、罗奉僧等人为其召开欢迎会。^①经过三年的闭门读书，唐大圆以“东方文化”济拔浊世的信念，不仅更加浓烈，而且日趋理想化了。10月，唐大圆在武昌文化公学（前身为唐大圆归隐前担任院长的汉口文化学院）研究部的基础上扩建东方文化研究院，力图通过办学推行他的“东方文化”主张，但校舍和经费都无从着落。在对新式学校教育抱有负面情绪的情境下，理想主义的唐大圆发明了办学的“三不要主义”，即“一施不要钱之教育，二办不要立案之学院，三读不要文凭之书”，以图“大革西式学制，而纯从东化焉”^②。但现实中这是难以成立的，武昌文化公学的校长唐祖培（字季申）不得已中途退出，其中学部与研究部（东方文化研究院）财务全然划分，以至于唐大圆对来访的记者说：“文化中学另由唐祖培君主持，与东方文化研究院全无关系矣。”^③全然理想而急于求

① 《汉口佛教正信会欢迎唐大圆居士》，《佛学半月刊》第65期，佛学书局1933年10月16日。

② 唐大圆《震铎序》，何键《院训》（1933年10月29日在“东方文化研究院”的讲演），杨志远《记圆公说教育改良之三不要》，俱载《震铎》第1期，武昌东方文化研究院1934年8月版；唐大圆：《东方文化研究院之更始》，《正信》周刊，第6卷第17—18期合刊，汉口佛教正信会宣化团1935年8月15日。

③ 记者：《东方文化研究院之发展》，《正信》周刊第4卷第7期，汉口佛教正信会宣化团1934年6月25日。

成的唐大圆向湖南军阀，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键求助。他写信给何键“倘我公肯断自睿衷，拨湘馆为院舍，又肯偕晋之阎（锡山）、赵（戴文）、川田（颂尧）诸公，联衔向中央政府请求立案，必准无疑”。他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蒋介石“新生活之源泉，实宜吸自拙著《运掌集》”，请求何键代为邮赠一册《运掌集》给蒋介石，以求立案之事“直达蒋委员长……省一切繁难手续”^①。这些近乎天真的要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何键当然也无法办到，只是敷衍安排将旅鄂湘馆临时性租给唐大圆作为东方文化研究院的校舍。但事后却因旅鄂湘馆的产权纠纷，与原租赁者旅鄂湖南职业学校造成冲突，被诉诸湖北教育厅，使唐大圆经营东方文化研究院的种种问题浮出水面，最终被查封了事。《湖北教育月刊》1935年第2卷第4期刊登的“工作纪要（民国廿四年一月一日至二月廿八）”中“取缔东方文化研究院”消息云：“查东方文化研究院未经呈准开办，擅自张贴招生广告……该院秩序凌乱，毫无设备，借名招摇……意图诱骗无知青年，尤属荒谬！”第5期的“工作纪要（民国二十四年三月至四月）”述之具详：“本月复准湖南省政府函请查案解决东方文化研究院强租旅鄂湖南职业学校校舍纠纷见复……已勒令东方文化研究院停办，并飭将借用房屋，一律交还旅鄂湖南职业学校。”

办学失败的唐大圆陷入失意之中，旋即离开武昌，沿江东下，开始了其一生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东南游历。他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南京市政府及中国佛学会等处做过一番演讲，又前往苏州拜访了章太炎与印光法师，滞留“旬日”，于1935年4月重返家乡武冈。他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蒋逸雪曾赶赴中国佛学会，与唐大圆会晤，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翌晨，同登扫叶楼，论及身世，先生慨然曰：‘屈志从人，自爱者弗尚；称意而行，势又未许，子谓我何归乎！’凄然相对者久之。”^②此亦照见唐大圆彼时落寞的心境。

① 大圆：《致何总司令书》《答何总司令书》，《震铎》第1期，武昌东方文化研究院1934年8月版。

② 蒋逸雪：《唐大圆先生行述》，《南谷类稿》，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293页。

七、世衰道微，狂者道艰（1935年5月—1941年2月）

失意寥落的唐大圆回到家乡武冈，就法界新莲社重新起办东方文化研究院，并于1935年12月16日，率学生百余人作转定业法会。可以料想，与过往一样，此名虽是佛教“法会”，但以儒家忠孝为根本的道德宣教是少不了的；而且无可讳言，唐大圆的政治诉求也是比较浓烈的（28岁时就加入共和党可兹旁证），出于旧学立场，唐大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带有敌意的。由于唐大圆与当时军政界交往甚密，颇为高调，民间甚至有传言说他是何键、蒋介石的老师。22日，红军经过武冈时，唐大圆被逮捕并押行，后虽侥幸投湖逃脱，但时值寒冬，浑身湿透的唐大圆被救回家后已奄奄一息了。^①逐渐康复的唐大圆写信给主事《海潮音》时的旧日同僚张化声，自述心情“竿木随缘，逢场作戏，未知其能免于今之世也耶”，化声似已看出唐的颓唐心境，安慰他说今日之观念“不出一种厌世观，与吾兄平日发大菩提，度尽众生之心，似夫颇有出入。岂吾兄饱经忧患，有激而然欤？”^②

晚年回归家乡的唐大圆大约只有一件比较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值得留意，那就是1936年8月雷铸寰（字孟强）与乐天宇（时名乐天愚）在船山中学的基础上创办私立船山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简称船山高农，今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前身），聘请唐大圆前来讲学，唐大圆欣然往赴。^③大约因于雷铸寰的介绍，10月间唐大圆加入了船山学社。^④11月末，唐大圆离任船山高农，但兴致尚佳，与乐天宇同游南岳后，又在长沙船山学社做了唯识

① 《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唐大圆脱险纪闻》，《正信》周刊第7卷第19—20期合刊，汉口佛教正信会宣化团1936年2月29日；《大圆居士被难后致各界快邮》，《佛学半月刊》第6卷第6号第123期，佛学书局1936年3月16日。

② 《湘中两大佛学家之通讯》，《正信》周刊第8卷第11—14期合刊，汉口佛教正信会宣化团1936年7月15日。

③ 乐天宇早年北京农业大学毕业，与武昌公学校长唐祖培都主张农业兴国，1933年在武昌时，就与唐大圆相识，并被聘为东方文化研究院导师。当时乐天宇正处于与组织失去联系中，显然也不会向唐大圆透露任何政治身份。

④ 《本社纪事》，《船山学报》第12期，船山学社1936年10月版。

演讲。^①这是唐大圆最后的一次外出讲学，从此蛰居不出。1939年8月15日《浙江自治半月刊》刊发了唐大圆的旧文《行路难》：“君不见孔子生民未有之圣人，疏食饮水能安贫；又不见颜回闻一知十之大贤，簞瓢陋巷乐无边。今人纷纷轻裘而肥马，人格愈卑志愈下……呜呼！世衰而道微，所以仲尼不从后进之礼乐，宁求先达野人也”。该文曾于1924年6月21日发表于《海潮音》第五卷第五期上，但依张化声的所述，彼时唐大圆正如程咬金般“雄心万夫”地“南征北讨”，孰料十五年后，以“不要钱主义”拒斥西方物质文明，追求孔颜安贫乐道理想的唐大圆在屡次讲学、办学失败后，最终不得不将这一切的困厄，再次归咎于“行路难”。

1941年1月，唐大圆突然被官方逮捕，关押在邵阳警备司令部，遭严刑拷打。其少年时好友欧阳刚中闻讯将其保释出来，送至广济寺调养，但已神色大变，2月26日在寺中病故。唐大圆没有留下任何关于此次突如其来的囹圄之灾的线索，加之正是湖南战场抗战最为激烈的阶段，讯息阻隔，最早披露此则消息的是半年后8月1日出版的《觉有情》杂志，云“其死因闻有某方关系”，似欲言又止。1999年版《湖南省志》中说“国民党当局说他著作中有‘攻击党国’言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残酷迫害”^②，但不详消息来源。唐大圆与国民党党部的关系虽不是很密切，但也看不出有太大的冲突，唐大圆甚至认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与他的“东方文化”道德主张一致，盛赞“蒋公为国努力，劳绩不细”。查其晚年文章，如《世间政府是法轮上的蝼蚁》《总统与乞丐》等，不过是其一贯的言语耸听，内容无非还是宣说克己复礼、安贫乐道（以乞丐般的甘贫成就王者之道）等一套道德说教。正如曾光炎先生对唐大圆与袁朴所作的比较“惟唐之学侈，袁之学谨，得名有狂狷之别”所判^③，唐大圆狂傲激进、文思敏锐却缺乏审慎的性格，或使其招致了多少怨敌，但一定说唐大圆因“攻击党国”而受迫害，似略嫌空疏。

① 唐大圆：《摄大乘论讲录序》，《海潮音》第18卷第2期，海潮音社1937年5月版；唐大圆：《唯识概论》，长沙《大公报》，1936年12月9—10日。

② 《湖南省志·宗教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③ 曾光炎：《乡先辈事略述闻》，《洞口文史》第1辑，内部资料1985年版，第85页。

八、结论

中国传统经学在处理夷夏问题时，时或催生出“华夏中心主义”，尤其在“据乱世”的历史情境之中。^①唐大圆的东方文化思想应时而出，代表了“大变局”时代一部分知识人对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选择，但我们尤应看到在那个中西新旧各种思潮云涌风发、激荡交融的时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内部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观点。作为对“西潮东渐”的应激与反思，如梁启超、张君勱等人提出了“西方文化重物质文明，东方文化重精神文明”之类的倡说，虽然胡适等人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给予了否定，但毫无疑问这种“中体西用”说的民初翻版，被唐大圆等东方文化派学者“拿来”，且进一步阐扬了。^②唐大圆具有非常浓厚的儒家本位思想，这在他为佛教法会亲撰的对联“论正行孝弟齐家礼让为国；应顿悟一日克己天下归仁”中已经表露得非常清晰了；在他早年与支那内学院师生就佛学义理南征北讨，乃至晚年不得已困厄乡土时，两次刊文《行路难》，以孔颜乐处为理想，清楚地透露出那种“吾久矣不复梦见周公”的儒家情怀。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型，不仅是我们今天构建新时代文化自信时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样也是 100 多年来中国知识人孜孜以求，曾经努力探索过的问题，我们有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从历史中汲取。

① 千春松：《“王者无外”与“夷夏之防”——公羊三世说与夷夏观念的冲突与协调》，《中国哲学史》2011 年第 1 期。

② 1934 年，何键因公过汉口，为东方文化研究院校舍与立案诸事一筹莫展的唐大圆院长去太平洋饭店四楼求见，此系唐大圆头一遭乘电梯，不觉双手捧头，连连对同行的唐祖培抱怨：“何苦何苦！拾级而登多自由多清散。”此则茶余饭后之轶闻被记者以《唐大圆怕乘电梯》为名，刊登在《汉口舆论汇刊》上（第 17 集，汉口舆论报社 1935 年 6 月版），并附带评论说：“他是讲究形而上文明的学者，形而下的物质文明，很有点非难”。

论王船山诠释视域下《大学》的 “内圣”“外王”观

李玮皓*

摘 要：根据船山的五种基本学术诠释视域，而这五种基本学术视域亦影响船山对于《大学》之诠释。船山诠释视域下《大学》中之内圣之道，船山所言之“格物”与“致知”，非绝对以外在探求为目的，亦非绝对以内在体悟为旨趣。在船山诠释视域下，格物致知必须是使人能借由自我修养达到真正至善之境地，以达内圣之旨趣。船山诠释视域下《大学》中之外王之道，除了要求君王重视人民之教化，重视尊亲序别，除去不好之习气，以正社会之风俗；亦重视满足人民之基本需求与欲望，尊重人民自主自养。其欲通过办学使民明人伦纲常与经世实学之两端，建制有秩序、人文化成之世界。

关键词：王船山；《大学》；内圣外王

众所周知，《大学》之义理在儒家哲学史中，具有独特且重要之地位，而其中所言之“内圣”“外王”观，亦为儒家哲学史上一重大之论题。不论身处什么时代，儒者之终极目的皆是如何安立天下，而安立天下之途径

* 李玮皓，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王船山义理视域下的儒道经典诠释论探：以《四书》《老》《庄》为核心开展”（项目编号：12310072064038）。

即是由内圣修德工夫扩充至外王经世之功业。职是此故，身处明清鼎革之际之王船山，在经历丧国之痛的情境下，以为圣学不再。是以船山报以“内圣”与“外王”之义理旨趣，通过其诠释视域重新诠释经典，论述儒家圣学之大义，以响应时代课题之需求。

诚如季蒙先生所言：“王夫之的基本理学思想，都集中在其四书学中。”^① 船山对于宋明思想之反省与批判，主要集中于《四学》中。是故研究船山对于《四书》之诠释，具有研究之意义价值。而近十年来，学界通常将船山《大学》之研究视域聚焦在“格物致知”与“明德新民”之论辩上，孙钦香先生在《王船山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反思与重建——以“理一分殊”重释〈大学〉“明德与新民”关系》中指出：“在船山看来，《大学》‘明德’与‘新民’的关系应该是‘理一’而又‘分殊’。换言之，修己与治人之关系可用‘理一分殊’来表述”^②；而在另一篇文《王阳明、王船山〈大学〉诠释的比较研究——以新民和格物致知诠释为中心》中则指出：“王船山也承认致知工夫有其独立性，但与阳明取消格物工夫而偏重致知工夫还是有原则性区别的。因此可以说，王船山对阳明心学的批判和指正是其一生学问思想的一贯立场，也体现船山学之严肃和不苟。”^③ 蔡家和先生在《王船山论〈大学〉的格物致知——以〈读四书大全说〉为中心》中指出：“《大学》部分，且重点放在‘格物致知’上，因为格物致知义是朱子学的重点……有人区分程朱与陆王之不同，认为是‘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不同。”^④ 然上述学者对于船山的“内圣”“外王”观，留下了许多尚待解释之空间。诚如劳思光先生言：“船山以其实在论观点建立其形上学及宇宙论，其根本旨趣仍在‘内圣外王’。”^⑤ 职是此

① 季蒙：《主思的理学——王夫之的四书学思想》，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 孙钦香：《王船山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反思与重建——以“理一分殊”重释《大学》“明德与新民”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87页。

③ 孙钦香：《王阳明、王船山〈大学〉诠释的比较研究——以新民和格物致知诠释为中心》，《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33页。

④ 蔡家和：《王船山论〈大学〉的格物致知——以〈读四书大全说〉为中心》，《台湾“中央大学”人文学报》2011年第47期，第52页。

⑤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3卷上，三民书局2019年版，第644页。

故，吾人要在此进一步追问的是：身处明清鼎革之际的船山，为解决时代课题所不得不对以往诸儒所诠释之经典有所拣择与反省的同时，对于儒家传统“内圣”“外王”之诠释视域是否与其他儒者有不同之处？

是故，基于上述之动机，本文试图立足于王船山诠释视域内在之脉络，通过对其相关重要概念之分析辩证，以揭示船山诠释视域下对于《大学》之“内圣”“外王”观之旨趣，给上述问题一个较为合理之解释。而本文之文献以《读四书大全说》《四书笺解》《四书训义》为主要限定范围，并在相关议题上旁引船山的其他著作以兹作为于研究船山诠释视域下《大学》中“内圣”“外王”观之意义价值。以下即依上述架构，逐步展开疏解。

一、船山诠释《大学》之进路

众所周知，船山并未有针对《大学》之专著，而是以诠释之方式进行梳理，主要有以下书目：在《四书稗疏》中《大学》之音义；《四书笺解》中《大学》之部分共一卷；《读四书大全说》中《大学》之部分共一卷；《礼记章句》第四十二卷论《大学》；《四书训义》中收《大学训义》共一卷。

在上述这些不同之书目中，我们可见船山诠释《大学》之进路主要乃针对陆王心学之批判，以及对程朱理学之承继。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学者注意到船山在不同之著作中，对于程朱理学虽多有所承继；然在义理之要紧处，却又不吝批评程朱理学。会有如此特殊之诠释现象，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因船山诠释成书年代之不同，“对朱子的推崇更加明显。这说明船山前后对《大学》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①换言之，即是根据船山著作之顺序年代，作为对于原作者之诠释视域之发展或转变之理解。^②然我们若

① 涂耀威：《反思与重建——学术史视野下的王船山《大学》研究》，《船山学刊》2009年第1期，第13页。

② 戴景贤亦有类似观点，只是戴先生更强调船山学本有的“批判性质”与义理内部的“动态主义”。详细论述可参戴景贤：《王船山学术思想总纲与道器论之发展》上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3页。

细查船山对于其他著作之诠释便可发现，船山在不同之著作中，乃针对该著作之立论重心而有不同之立论形式。如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中之诠释，多有批判程朱视“恻隐”为情，以为“‘情不可以为恶’，只缘误以恻隐等心为情，故一直说煞了”^①。然在《礼记章句》中，船山选择的是朱子改本之“新民”，而非古本中之“亲民”，且在此书中，随处可见对于陆王心学之批判，却未见对于程朱理学之批评。据此可知，船山之学术立场乃是因为“著作体例与主旨的不同，以及在具体语境中作者论辩对象与立论重心的差异，也是造成作者在不同著作中观点有别的原因。”^②是以我们可知，船山注疏引义之旨趣，乃在于随文以引申而互有异同，故我们不能据某一本书或成书之年代，断定船山之整体义理。

然我们在此须提出一个疑问：究竟船山在诠释诸经之学术立场为何呢？我们可就《张子正蒙注·序论》中见其自言：

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然游、谢之徒且歧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槩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之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蹊影，沈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③

船山于此自序中表露其对于经典诠释之五个基本态度：一即为斥佛老义理之空幻，“皆自欲弘者；无一实之中道。”^④以正儒家之圣学；二是警告学者“不可泥文句而执为次序”^⑤，反对儒学仅沦为训诂考证、纸上空

①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78页。

② 陈明：《“修己”与“治人”——王船山对〈大学〉义理的重构与发展》，《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2辑），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2010年版，第625页。

③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页。

④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5页。

⑤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3页。

谈，缺乏实践理论之工夫；三是严词批判陆王心学“猖狂之言，正告天下而无复惭愧”^①所造成之流弊；四是船山尊濂溪、二程与朱子为儒家义理之正学，批评二程与朱子之传人溺于佛老或流于琐屑；五是肯认横渠之功，“岂非疏洚水之岐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②，为整个宋明理学中最体贴先秦孔孟思想之人。由上述五点我们亦可得出一个结论：船山尝试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外另辟蹊径，是以视船山张载为典范，“神契横渠，羽翼朱子，力辟陆、王。”^③出入心、理、气学，对于不同学派之立基点及论述脉络兼容并蓄的资取，此即为船山在批注诸经之基本学术视域。

在理解船山批注诸经之基本学术视域后，我们便可明白，船山在诠释《大学》时，何以选择的是朱子之“改本”，而非“古本”之理由：

自姚江王氏者出，而《大学》复乱。盖其所从入……故以《章句》八条目归重格物为非，而不知以格物为本。……王氏之徒特未之察耳。若废实学，崇空疏，蔑规矩，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无忌惮之域，则释氏之诞者固忧为之，奚必假圣人之经传以为盗竽乎？^④

船山坚定捍卫朱子之改本之原因乃在于当时便有诸多之版本流传于民间，且《礼记》本身既有错简之问题，而程朱重新疏通经文之条文次序，有助于士人理解《大学》作者之原义。船山以为阳明违背了《大学》本有之修养工夫次序，若仅是强调致知之“不学不虑”先天现成良知，却忽略格物之“能学能虑”，后天下学上达，就船山之诠释视域而言，此并非为《大学》之本义。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无法据某一本书或成书之年代，断定船山之整体义理。

① 王夫之：《搔首问》，《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49页。必须说明的是，船山在此批评的其实是王龙溪与李贽——阳明后学“现成派”所造成的流弊。而船山对于阳明心学之意蕴是否真有深究，抑或者仅是简化了阳明心学之义理，此非本文所欲讨论之问题。

②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页。

③ 徐世昌：《清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69页。

④ 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第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67—1468页。

然我们可以根据船山的五种基本学术诠释视域，而这五种基本学术视域亦影响船山对于《大学》之诠释。对于身处明清鼎革之际之船山而言，“以‘文化的反省’和‘正统的重建’为主要特征，可以视为这一反思和转向时代的开端的代表。”^①其对于宋明理学家们做出一种批判的总结，目的在于重新探讨与回归先秦孔孟“肯定世界”^②之真精神。

二、格物与致知之内圣观

朱子将《大学》从《礼记》中析出，其旨趣在于为提供进德修业的一条门径，而船山亦肯定朱子之功而有言：“《大学》一篇，乃是指示古之大学教人之法，始终条理一贯之大旨，非夫子始为是书建立科条，以责学者。”^③然船山对于朱子极为重视外穷物理之事，则抱持批判之态度：

只下学处有圣功在，到上达却用力不得。……乃朱子抑有‘忽然上达’之语，则愚所未安。……朱子于《大学补传》亦云：“一旦豁然贯通焉。”“一旦”二字亦下得骤。……“忽然上达”，既与下学打作两片，上达以后，便可一切无事，正释氏“砖子敲门，门忽开而砖子无用”之旨。……圣人之上达，不得一旦忽然也，明矣。^④

船山批评朱子将下学与上达“打作两片”，似有流于佛老义理之嫌，以为上达之后，便可一切无事。然就船山之视域而言，“知道者明德新民底全体大用，必要到此方休。”^⑤所谓格物下学、反己自修之事，乃为证体之工夫，亦为达用之事业，“上达”必是在“下学”中用力。在步步格物穷理之过程中，亦有心之德性本知之觉照发用；在时时存养本心之体证

① 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1页。

② 劳思光先生言所谓“肯定世界”，其意义就是建立一种断定，认为吾人当前面对之世界，乃可以成为合理者，即理有在此世界中实现之可能。并指出宋明儒者虽然对于肯定世界之论说有三种不同立场，然却都是试图在此世界中实现此理。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3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77页。

③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页。

④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9—420页。

⑤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页。

中，亦有物理知识之积累。格物穷理即是德性本知之开展必有之事，物理之知是心性本体实现其道德性于生活世界必有之用，至此物理之知方不再仅为体证本体之“敲门砖子”。

其次，船山并不认同阳明与朱子及其后学对于《大学》工夫先后之诠释，讽刺性地说道：

若说在致知前，则已能诚意，何待致知？若说在致知后，则岂致知时任其意之恶而不慎，直待知致后方去慎独？……其蠢至此，可笑可恨。……而慎独自别有加谨之功，则不可以知己致而忽于慎。且知无尽者也，愈致而愈精，则慎独之功愈加密。故致知诚意俱是通梢一样工夫，格物正心修身无不皆然，有何前后之有，而盲人独相争不已，岂不哀哉！^①

对于船山诠释视域而言，“《大学》一书，自始至终，其次第节目，统以理一分殊为之经纬。”^②是以学者争论着格物、致知、诚意、慎独等工夫次序之前后，就如同盲人争路一样，所知有限却无法旁通，坐井观天而自得意满，数十年来只惹得貽笑大方。船山认为，致知、诚意、格物、正心、修身等皆仅为两端而又一贯之工夫，实为功用相资，当兼修并行，内外交相，有因果之关联。《大学》一书自始至终的思想架构，其旨趣在“其教同也，其学同也，则其本同也：修身而已矣。”^③是以工夫何者为先、何者为后，“次序”并非其中最关键之旨趣。

然吾人于此既要提出一个疑问，就船山看来《大学》之工夫既为一贯，那是否既无分别呢？

天下岂有欲为孝子者，而痴痴呆呆，将我与父所以相亲之故去格去致，必待晓得当初本一人之身，而后知所以当孝乎？即此一事求之，便知吾心之知，有不从格物而得者，而非即格物即致知审矣。^④

船山以“致知与格物非一事”批评朱子“格物、致知只是一事”，就

① 王夫之：《四书笺解》，《船山全书》第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14页。

②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页。

③ 王夫之：《四书训义》，《船山全书》第7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0页。

④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页。

如同释父子同为一气，是一人分成两个，由此言人伦事物之理，格之则知道所以父慈子孝全都因一气，如此迂诞鄙陋全指向外求之谬误诠释令人难以接受。父子之间之亲亲相处之道，绝非简单之格其物即可致得其所知之理，此亲亲之理涉本为吾新可知，并非依靠格物之外在认知之进路方可识得。相反，而是致知之内在认知之进路方能。职是此故，我们可以由此而知，在船山之义理中，格物与致知并非为单纯之直线式关系，彼此仍有其相应之事之认知取向。是以，格物与致知仍必须区分为二，否则“功用既一，又云‘致知在格物’，则岂可云格物在格物，致知在致知也。”^① 不仅语焉不详，且就义理而言亦有瑕疵。是以“对于格物与致知二者不同的功用辨之甚详，但在格物致知与知性的关系上，王夫之把格物与致知作为一个范畴来看，它们合起来，作为一个知性的媒介。”^② 格物与致知，不可视其为一，亦不可截开为二，格物致知乃为两端而一致。

职是此故，船山认为如此视格物与致知为两个工夫，方为《大学》之原意：

知至者，“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也。则致知者，亦以求尽夫吾心之全体大用，而岂但于物求之哉？……规矩者物也，可格者也；巧者非物也，知也，不可格者也。巧固在规矩之中，故曰，“致知在格物”；规矩之中无巧，则格物、致知亦自为二，而不可偏废矣。^③

船山所谓之知至乃致知之工夫达成之状态，亦即达至清楚明了之境。是以格物到致知甚至是知至并非一蹴可几，格物之后是物格，物格后是致知，致知后方为知至。且船山指出：“天下之物无涯，吾之格之也有涯。吾之所知者有量，而及其致之也不复拘于量。”^④ 天下之事物乃无穷尽之时，是以人之格至所得受限。格物之事就是指心、耳、目均用，学问、思辨为主，而这样的基本知能拥有了则是“知至”。格致仅为入门之方法，

①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页。

② 张学智：《王夫之的格物知性与由性生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49页。

③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页。

④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页。

其目的是在于“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

船山接着举《孟子》作为例子，以辩证格致之不同。其指出格物与致知之差异，前者所格之物即如工具般之具体事物，可透过感官经验获取其知识，后者所言致之知即如工匠师傅之技巧，乃须经长期经验之积累，亦即须要自我领会的。析言之，我们格物之对象乃可通过经验感知，而致知之对象虽是以格物为基础，然以格物为基础并不意味便可无须作致知之工夫，而是须透过心官之思辨以求其通贯，故致知是着重在自我之体悟，与格物不同。职是此故，“格物与致知，一而二，二而一，‘二’指两者为不同的工夫；‘一’指工夫八条目都是一贯，一能合异。”^①是以就船山之诠释视域而言，“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济也。”^②格致工夫两者不可偏废。

最后，我们仍需提出一个疑问，究竟在船山诠释视域中，“格物”与“致知”之工夫如何体现：

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为辅，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觉其思辨之疑。^③

船山指出学问与思辨是二回事，且分别对应于格物与致知，格物须用心、用耳目观察，以知识为基础不断反思辨别，其所重视对于外在事物的客观把握，戮力于知识上不断扩充；致知须用心感通辨别，我们积累的知识学问在此仅为辅助解决辨别上的作用。致知着重在内，观主体本身自觉。职是此故，船山强调面对生活情境时，我们所面对之事物有不同之境况，此当下须以耳目感官与心互为其用，使人在处事上能有遵循之原则，而非仅依靠耳目感官所得之知识即可，否则心官之思亦将无所用处。

综上所述，船山诠释视域下《大学》中之内圣之道，船山所言之“格物”与“致知”，非绝对以外在事物为探求作为目的，亦非绝对内在体悟

① 蔡家和：《王船山论〈大学〉的格物致知——以〈读四书大全说〉为中心》，《台湾“中央大学”人文学报》2011年第47期，第64页。

② 王夫之：《尚书引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6页。

③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页。

为旨趣。在船山诠释视域下，格物致知必须是使人能借由自我修养达到真正至善之境地，以达内圣之旨趣。

三、明伦与经世之外王观

众所周知，由于宋明儒在儒家传统内圣之层面不断地受到佛、道两家之冲击，是以十分积极建构心性论、天道论以道德为基础抗衡异学。然船山并不仅以内圣工夫为满足，“必要此由内圣透达到外王之道道德事业全面实现，始为善之圆成。”^① 其必要求外王之实现，“‘外王’者、外而达于天下，则行王者之道也。王者之道、言非霸道。此一面足见儒家之政治思想。”^② 进而协助世人改善国家社会、百姓经济生活之制度，建构世风良善之社会：

在昔隆古之代，敦醇厚而尚廉耻，其风俗之美，良有以致之矣。君诚净其心以无欲，而施下者皆爱养之德，则上下相亲而孝友渊睦之化自广，莫不仁矣。君诚好义以无私，而施之下者皆裁制之宜，则名节素定而正大直方之化自成，莫不义矣。^③

就船山诠释视域而言，古代社会之所以敦厚廉耻，世风良善，乃因为政者清心寡欲，有德于心，并“繇有此明德，故知有其可致而致之”^④，施政于下而裁制之宜；在下位者深感其受，亦能效法在上者之心，进而感通扩充于他人，使上下彼此皆能互有感通，如此即能使国家社会自然流行德化之风。亦正如船山言：“新民者固原本于已明之君德，而必加之以齐治平之功。”^⑤ 新民之根基乃据君王之明德为本，而新民亦与明德理一。在上位者治理国家之最终目的在于教化人民、感通人心，使人民风俗醇美，不能仅以法令规章之行政方式去实施，而是以鼓舞人心之方，此即为船山之理想世界。

① 曾昭旭：《王船山哲学》，里仁书局2008年版，第169页。

②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1册，正中书局2012年版，第4页。

③ 王夫之：《四书训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5页。

④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页。

⑤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页。

然船山亦清楚现实世界经世之复杂性,他进而指出:“儒者任天下事,有一大病,将平日许多悲天悯人之心,因乘权得位,便如郁火之发于陶,迫为更改,只此便近私意,而国体民命,已受其剥落矣。”^①析言之,世儒以为只要有悲天悯人之心即可,殊不知要具体实践王道仍需有具体之规划、制度。职是此故,船山提出对如何实践外王之道之总纲:“圣人经世之道,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无他,明伦以立纲纪之原,而礼乐刑政,皆由此出,则久安长治,而立国于不倾。”^②船山主张所谓外王之根基乃在于明人伦制纲纪、各司其职,以立天下之礼乐刑政,如此国家即可安治,人民亦可得到赡养。

“先王通人情、酌中道以致久行远。”^③此即为船山外王之道之总纲而又可分立为两端。然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究竟如何具体实践船山所谓之“外王”之道,船山“人君爱养斯民之道有三:一曰置恒产;二曰裕民力;三曰修荒政。”^④我们可以分为“明伦”与“经世”两个面向而论。

首先谈船山诠释视域下所谓“明伦”,船山指出世风之所以沦丧,乃因“大学之教不行,师儒之传各异,异端之说争鸣而学校坏。”^⑤是以若欲使儒家圣学得以体现,世风得以醇美,船山指出须使人民明了人伦义理,以起人文化成之功效:

先王知道之明与不明存乎教,而民之仁与不仁因乎士。……于乡则设庠、序、校焉,于国则设学焉……庠者,以养老为主,示民孝也;校者,以比德比艺为经,劝民行也;序者,以观德兴能为义,示民礼也。至于学,则贡士兴焉,胄子肆焉,天子诸侯亲焉,教必备而道必隆。……无非以兴起夫尊亲序别之心,而顺成其孩提稍长之能,明此人伦而已。^⑥

船山特别重视庠序之教以达性日生成,学校教育之目的非在外在知识

①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400 页。

② 王夫之:《四书训义》,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704 页。

③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577 页。

④ 王夫之:《四书训义》,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9 页。

⑤ 王夫之:《四书训义》,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11 页。

⑥ 王夫之:《四书训义》,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15—316 页。

之积累；而是在于世人对道德伦理之重视。对于陷溺于习气中之世人，可通过接受教育从习气中逐渐脱离出来，兴起世人尊亲序别之心，并进而朝着圣贤境界不断迈进。职是之故，在船山诠释视域下，办学之旨趣乃以明人伦纲常为首要目的。面对习气充斥之社会风气，船山试图以人文化成之视域从学校教育展现本具之仁心、尊奉人伦纲常，再到爱敬大行，重视通过礼乐教化以扶正世道人心，所谓“三纲五常者，礼之体也；忠、质、文者，礼之用也。所损益者固在用，而用即体之用，要不可分。”^① 伦理不紊乱，则人伦得以立。此亦即为《大学》中由修身、齐家、达至天下之一贯性，即通过自身之仁心仁性扩充至人伦之序最终推广为天下安立之必然之理。

其次，则见船山外王之经世面，所谓“民者，国之本也，产者，心之本也。”^② 就船山诠释视域而言，若欲使民心安定，首要之方式即是要置民恒产，“无恒产而身不安者心不固。”^③ 如能使人民衣食无缺，满足人民基本生存之需求，则国家自然会安定。职是此故，船山提出土地非为天子所有，而是归于民有：

若土，则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间，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资以养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恒畴，不待王者之授之。……其始也以地制夫而夫定，其后则唯以夫计赋役而不更求之地，所以百姓不乱而民劝于耕。^④

就船山之诠释视域而言，“地之不可擅为一人有……天无可分，地无可割，王者虽为天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⑤ 析言之，土地之拥有者并非为君主一人之独有；而是在于广大之人民。是故，不应将土地视为君王授权于人民之财产；而是有其力者治其地，君王应将土地重新分配给人民，使人民耕者有其田，保障人民私人财产与权益，进而能自耕自入，“人可

①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1页。

② 王夫之：《四书训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5页。

③ 王夫之：《四书训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2页。

④ 王夫之：《噩梦》，《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51页。

⑤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92页。

有田而田自均矣。”^① 真正达到赡养人民之目标。

船山除了针对土地提出见解，其对于经济贸易，亦有主张：

夫四海之内，有分土而无分民，商旅行焉，以通天下之货贿，可无用关也。而古之为关者，以非常之变，恐为行者之害，而讥察之以使无变，所以止暴而安商也。乃今之为关也，则暴君敛之，污吏侵之，奸民因起而刻削之，刑罚日加，争夺日甚矣，暴虐商旅而已矣。^②

船山主张应免去无谓的关税壁垒，在先秦时期而言，设立关卡之目的在于保障商旅之安全。然就船山看来，现行之关卡却成为贪官污吏苛刻人民之暴政。是以船山认为免除关税，保障商旅贸易之自由，方能“通市以无所隐，而视敌国之民犹吾民也，敌国之财皆吾财也……利于国，惠于民，择术之智，仁亦存焉，善谋国者，何惮而不为也？”^③ 通过改善制度，保障人民自由贸易之权利，保护商业发展，从而解决人民生活之困境，并积累国家之财富。

综上所述，船山诠释视域下《大学》中之外王之道，除了要求君王重视人民之教化，重视尊亲序别，除去不好之习气，以正社会之风俗；亦重视满足人民之基本需求与欲望，尊重人民自主自养。“船山于政治之本在道德与文化……而政治之目的，在使社会上之一一人民各得其安顿，而非君主之一人。”^④ 其欲通过办学使民明人伦纲常与经世实学之两端，建制有秩序、人文化成之世界。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以王船山诠释视域下《大学》“内圣”与“外王”观为论述之中心，并经由以上之辩证诠释、比较分析，大体可以对船山之诠释视域，能有一个较完整之理解与疏解。

① 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18页。

② 王夫之：《四书训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10页。

③ 王夫之：《读通鉴论》下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68页。

④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论》，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版，第648页。

对于船山之诠释视域而言，其对于经典诠释之五个基本态度，可看出反陆王，修正程朱，尊横渠之立场。而在此立场下，船山所谓之“内圣”与“外王”之道从来就不是次序先后之问题；而是彼此相涵互摄，两端而归于一，这一致即是“至善”。

船山欲借由通过诠释《大学》，重新阐发先秦孔孟道统之延续，并强调“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① 明确表明中国文化中“治统”与“道统”并行之重要性，除了制度一套使国家社会得以安定之秩序外，并使儒家义理中强调道德实践对吾人生命意义上达之工夫得以安立。诚如唐君毅先生所言：“承宋明如重内圣之学之精神，而及于外王……为船山可当之耳。”^② 船山通过重新诠释《大学》之“内圣”“外王”观以重构儒家经世致用之学，亦承继儒家义理之精神方向。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62页。

②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论》，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版，第515页。

湘
学
文
史

湘乡、涟水流域文化与毛泽东

李跃龙*

摘要：毛泽东生于湘潭县西乡七都韶山冲上屋场南岸。因为地缘因素，他受湘乡文化的影响比湘潭县要多得多。古湘乡县（下文称“湘乡县”）的设置，大体范围覆盖全涟水流域，即今涟源市、娄底市、双峰县和湘乡市，二者基本上可以画等号，这里是湘军的核心策源地。毛泽东从小被寄养在湘乡外祖父家，1910年又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他的人生经历从湘乡开始。其深受涟水流域文化的浸润滋养，从口音、人生经历、交游、师承和文化认同上看，与其说毛泽东是湘潭县人，倒不如说毛泽东是受涟水流域文化熏陶的湘乡人更符合实际。湘潭、湘乡两县都是名邑大县，历史和文化的的气质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湘乡相较湘潭更为封闭和偏僻，考察毛泽东与湘乡县的关系，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一代伟人早期活动的轨迹和心路历程。

关键词：湘乡；涟水流域文化；毛泽东；湘潭

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在1968年设立由省直辖的地级区之前，一直属于湘潭县。但在清一代和民国前期，它的物资、人员往来流动和文化归属，更

* 李跃龙，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此文得到胡萍教授在方言学上的指导，深表感谢！

多地偏向湘乡，其与湘潭县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比湘乡多。韶山在地理上属涟水流域，包括现在的涟源市、娄底市娄星区、双峰县和湘乡市，均属于大湘乡概念的涟水流域文化区。这一区域范围内的民众，其语言、民俗、饮食习惯等方面有比较多的文化认同和一致性。这个区域文化发展到清中期，还共同演绎出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文现象——湘军，这里是湘军的核心策源地。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湘潭、湘乡都是名邑大县，但是历史和文化的的气质却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毛泽东虽然是湘潭县人，但其深受涟水文化的滋养，毛泽东的人生之路则是从湘乡开始。

一、毛泽东人生之路，湘乡是第一站

清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出生于湘潭县西乡七都韶山冲。他是毛顺生文七妹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因为前两个小孩夭折，为祈求老三健康成长，其父母按乡俗将一岁多的毛泽东送往湘乡县棠佳阁外婆家寄养。

棠佳阁，又名唐家坵。唐家坵的居民不姓唐，大多姓文。毛泽东的母亲在族中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文七妹十八岁时和毛顺生结婚，共生育五男二女，却只有泽东、泽民、泽覃三兄弟长大成人。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也似孟母，养育出一代伟人。诞下毛泽东后，这位母亲做了三件事：开始吃“观音斋”；让毛泽东拜七舅父、七舅妈为“干爹”“干娘”，再拜通往棠佳阁道路上的一块石头“石观音”为“干娘”，所以毛泽东小名又叫“石三伢子”；替毛泽东向南岳菩萨许愿，后来，毛泽东确实与弟弟毛泽民抬着轿子送母亲到南岳山还了愿。毛泽东出生的时候，外祖父已经去世，外祖母健在。外婆文家还有五位表兄：泮香、涧泉、运昌、梅青、南松。这里是他童年时代的乐园，他的第一个朋友圈在外婆家，一群表兄弟姊妹和他同桌开餐，同床共眠，放牛玩水，一起上山掏鸟窝。

毛泽东在湘乡县棠佳阁文家生活了约六年光景，顺便在八舅父文正莹

开的私塾“旁听”^①读书。八岁时被父母接回韶山，在南岸私塾、关公桥私塾继续上学。

毛泽东人生之路最为关键的时间节点在1910年秋天。当时湘潭县易俗河已是全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父亲决定将毛泽东送往在湘潭县经营稻米生意的朋友米栈当学徒，希望儿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会经商。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回忆：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②

这位表兄就是文运昌。据文运昌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

记得是七月初（阴历，大概阳历8月上旬秋后——笔者注）。那天，早餐吃了钵大蒜煮团鱼，天气炎热，由石板坳走城前铺，经柳树泉坝、两头塘、五里牌、绯紫桥，抵湘乡县城，五十里上下，晚宿县城北正街豫昌旅社。翌日上午，出望春门，过马荡渡，步上东山学堂。他到湘乡县城时问我：“么夹（为什么）街上要垫石板头？”我说：“这座城叫龙城，石头就是龙鳞。”来到东山学堂，见过李堂长，报姓名。因考期已过，李堂长布置了叫《言志》的考题，意思是谈志向。毛泽东作完以后，递给李堂长，李堂长看，字写得好，文章立意高远，决定破格录取。第二天，李堂长还好不欢喜，对其他老师说：“昨天取了个救国才。”后来，毛泽东听说外县的学生要多交一些费子，就跑到堂长室，补交了些铜元。^③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的说法与文运昌大致相同：

① 尹高朝：《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页。

③ 李光华，文热心：《“东山”湘潭生》，《湖南日报》2013年7月10日。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①

湘乡县厚待了毛泽东这位外县籍的年轻人，也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在韶山读私塾期间，邹春培、毛润生、周少希、毛禹居、毛简臣、毛麓钟诸老师指导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基本上是旧学，《三字经》《幼学琼林》《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纲鉴类纂》《史记》《汉书》以及四书五经一类。十三四岁辍学务农时毛泽东才看到过《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等新内容书籍。东山高等小学堂（简称“东山学堂”）则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和世界的全新窗口，他第一次上了地理课，看到清朝地图，接触到天地仪；第一次上格致课，从做实验中明白了热胀冷缩原理；虽说宣统皇帝在朝已经两年，却是第一次听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死去；第一次读到世界上还有华盛顿、拿破仑、叶卡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大人物；他狂热地喜欢上康有为、梁启超，对《新民丛报》爱不释手，读了又读，很多段落他都能背诵，他的文章与“康梁体”结下不解之缘，并取别号“子任”；他喜欢上单杠、木马、游泳、登山等体育运动项目，有些运动爱好保持终生；他经常去校园旁边的东台山游览，山上有很多同治年间书法家萧礼容题写的碑刻，这也使毛泽东养成了热爱书法的艺术爱好。他对斯诺说，在这所新学堂里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②重要的是，在梁启超的影响下，毛泽东开始关心政治和社会改良，阅读《新民说》时他这样批注：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

①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页。

②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页。

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①

毛泽东关注社会变革，实始于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1955年，毛泽东与同班同学谭世瑛谈话时说：“李元甫先生、贺岚岗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②李元甫就是那位破例让毛泽东入学的李堂长。在这里，毛泽东开始了从一个充满抱负的乡下少年到胸怀天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转变，他将个人前途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相连，开启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征程。东山学堂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第一师范”），是影响毛泽东最大的两所学校，他在东山学堂的时间很短，而在一师的时间较长。毛泽东对这两所学校都情深意长，且终生关注。1958年9月10日，他挥笔写了两张内容相同的“东山学校”4个大字，还写了一封回信：“东山学校各同志：你们的大字报早已收到，甚谢。现遵嘱写了校名二纸，请选用，未知适当否？”饶有意味的是，毛泽东一生为多所学校题写了校名，但为第一师范校名的书写却一波三折，最终也没有写成。1950年10月，周世钊请求为第一师范题词和题名，毛泽东当即应允。12月29日，两横一竖的“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和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共四幅字写好。周世钊只好截取其中“第一师范”4个字放大临时应急。1955年6月，周世钊陪同回湘的毛泽东游览岳麓山，再次提出正式为第一师范题写校名，10月4日，毛泽东回信说“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对于老同学周世钊要求正式题写校名一事，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作出了肯定答复，会写。但周世钊等不及了，再致一信催促，11月24日，毛泽东回信说“嘱写的字至今未能应命，你那里还不那样急需罢，我想等一等再讲，如何？”这是第二次答复，中间有点点拖延的意思了，两位老同学为写字一事“杠”

① 苏莉：《孩儿立志出乡关——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开端》，《湖南日报》2019年6月27日。

② 李光华，文热心：《“东山”湘潭生》，《湖南日报》2013年7月10日。

上。周世钊接连发出两函，催要题字。1956 年 12 月 5 日，毛泽东复信周世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过许昌》是 6 年前周世钊送给毛泽东的一首五言律诗，第三次推脱了老同学的请托，其中原因已不可考。自此，周世钊也不好再催，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谁也不再讲这个话题了。不能不说，毛泽东未能为母校题成字，不似有意为之，却又确实如此，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唯求缺而已。

二、毛泽东的口音

语言是文化取向最明显的标志。毛泽东受湘乡文化的影响，首先在于他说的并不是湘潭话而是湘乡口音。湘潭话与湘乡话的区别在哪里呢？

从方言归属上来看，湘潭话与湘乡话同属于湘语区，但分属于不同的片。湘潭话属于湘语区长益片的长株潭小片，而湘乡话属于湘语区娄邵片的湘双小片。从地理范围来看，湘潭话属于北部湘语，俗称“新湘语”，湘乡话属于南部湘语，俗称“老湘语”。从语音特点来看，湘潭话与长沙话接近，尤其在声调系统上趋于一致，有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入声 6 个声调。湘乡话与双峰话接近，在声调格局上与湘潭话的差异较大，例如，湘乡城关话有阴平、阳平、次阳平、上声、阴去、次阴去、阳去 7 个声调，呈“平声三分—上声—去声三分”的格局，这个格局在整个湘方言中都是一种特殊的声调格局。在声母上最大的区别是古全浊声母的今读，湘乡话的古全浊声母保留了浊音，湘潭话的浊音已经清化，这也是区别新老湘语的一个重要特征。^①

湘方言区有一句流传很广的俗语“长沙里手湘潭票，湘乡恩阿做牛叫”。这里的“里手”是“内行、行家”的意思，说明了长沙人喜欢张扬，爱出风头，任何事情都要表现出“内行”的样子；这里的“票”是“票客”而来，史书上记载，“票客”系采购粮食之人。旧时湘潭为一重要

① 《湖南省志·方言志》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1—215 页。

的粮食集散地，粮行经纪善以甜言蜜语诱人，以获取利益。“湘潭票”用以讽刺那些“票客”的行为。湘乡人说话鼻音重，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在湘乡话里念“恩阿”，由于“我”“我们”使用频率高，因此形象地称湘乡人说话好像牛叫一样。

中央档案馆公开的几段毛泽东音频原档里，有开国大典上讲话、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时讲话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讲话的片段，时长少则两分钟，多者五六分钟。毛泽东口音中呈浓厚湘乡话特征有两个地方，一是鼻音非常明显突出，熟悉湘方言的人士辨别很容易；二是湘乡话的典型字词发音，如“人（音‘银’）民”“永（音‘稳’）垂不朽”，等等。乡音既是故乡族群的馈赠，又是一个人天经地义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乡音无改鬓毛衰”，老年的毛泽东也改变不了湘乡口音，湘乡话是湘乡文化刻在他们身上的永恒标识。

三、韶山、湘乡县与涟水流域文化圈

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湘潭县，自然地理分区为四大片：湘水流域的东乡，马家河、朱亭、株洲一带；涓江流域的南乡，易俗河、花石、青山桥一带；靳江流域的北乡，长岭铺、黄龙坝一带；西乡则在涟水流域，姜畲、石潭、银田寺、韶山一带。^① 1936年，韶山属第九区清溪乡，区公所在银田寺。1947年属清田乡。从韶山出发到湘潭县，路程50公里，而转往湘乡县，路程仅20公里。从韶山出发到两地的人流物流成本相差不止一倍。

杨昌济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日记》里记载：“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② 韶山人不在湘潭县置业而往湘乡县买田，说明韶山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是向着湘乡的事实。除毛泽东外，毛泽覃后来也到东山学堂第十三班读书。韶山杨林庙还有一位汤

① 《湘潭县志》第3卷“建置”，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7页。

② 杨昌济：《杨昌济集》第1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44页。

璪真考入东山学堂，与毛泽东是戊班的同班同学，数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代理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在以水运为中心的交通时代，每个区域都是地理的囚徒，如何发展，最终都与它的自然地理特征相关。把韶山比喻为风筝，那涟水就是风筝的牵引线，把韶山融入湘乡文化圈的纽带是涟水。韶山的主要水道韶河，又名云湖河，发源于青年水库正北的金鸡坝，经银田寺码头至河头嘴子入涟水，这条脉络就似一根脐带把韶山连接到母体涟水流域。设置湘乡县的一开始，它的大致管辖区域就是整个涟水流域地区，包括今天的涟源市、娄底市娄星区、双峰县和湘乡市，这一片区域恰好位于湖南省中部。

山峦是交通的屏障，水道自古以来是人们联系的纽带，文化的传播隔山不隔水，涟水河就是古湘乡县的重要载体甚至是唯一载体，把这一片广袤区域紧密联系起来的是涟水河。涟源境内有大小河流172条，其中166条均分别汇入涟水、孙水（杨家滩水）和湄水，呈树枝状水系，最后汇注涟水。涟水发源于新邵县观音山西南麓，初名骆马江，再名甘溪。东北流16公里至马步桥，右合墨溪水；又东北流8公里至磨石桥，左合良溪水；又东北流4公里至涟源县城，左合扶珂河，称蓝田水；又东北流13公里至田家坝，合温江，又东北流20公里，经胡泉寺，至渡头塘，湄水自西北来汇。涟水又东流27公里经娄底市、高车至澄清渡合一小河，又东流10公里至犁头咀，与杨家滩水汇合。涟水由犁头咀向东流38公里至水府庙。涟水合杨家滩水后，东北流6公里经白鹭湾，至西阳河口，西阳水向南流入；又东至谷水附近，纳翻江，此后入水库区，东南经水府庙大坝至双峰县的江口，侧水自南汇合。涟水合侧水后，向东北流至洋潭大坝，韶山灌区总干渠顺涟水流向南东至洙津渡附近分为南北两干渠，均东北流入湘潭县境。涟水流经新邵、涟源、双峰、湘乡、湘潭等县，全长224公里。^①

从涟水流域走出了湘军集团的核心。湘军的关键人物罗泽南是双峰石牛湾人，“无湘乡，不成军”这句话说的就是以罗泽南为首组织起来的湘乡团练。曾国藩兄弟是他的老乡，荷叶乡白杨坪人。我们从涟水源头出

^① 《湖南省志·地理志》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页。

发，搜寻一下除罗泽南、曾国藩以外的湘军著名将领还有：涟源杨家滩刘连捷、刘岳晤，金石镇的萧启江，古楼乡的李续宾、李续宜兄弟，娄星区神童乡的杨昌濬，茶园镇的刘蓉，双峰县荷叶的曾国荃，湘乡市梅桥乡的王鑫，山枣镇的刘松山、刘锦棠叔侄，等等。曾国藩的湘家军以血缘和乡谊为纽带，官兵之间不是亲戚便是老乡，将知兵，兵知将。杨家滩离荷叶塘不到百里，许多青年前去荷叶塘投军。他们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驰骋沙场，凭借自己的非凡才能和过人胆识立下赫赫功勋，也造就了将星如云的杨家滩。杨家滩的刘家将曾名震天下，誉满神州，其中仅记入《清史稿》的就有刘岳昭、刘连捷、刘岳峻、刘腾鸿、刘腾鹤、刘岳昕等人。这些文武官员衣锦还乡后，大修宅邸，一时杨家滩豪宅相连，蔚为壮观。从杨家滩的胜梅桥顺着蜿蜒的孙水往下，老刘家、德厚堂、存养堂、存厚堂、光远堂、佩兰堂、师善堂、云桂堂、静养堂等建筑^①如连绵的群雕，气势恢宏。踏着光溜的青石板路，来到这些古朴斑驳的堂屋老院，仿佛走进了那段金戈铁马的历史，一个个鲜活的湘军名将扑面而来。

在中国，在湖南，再也没有哪条河流像涟水河这样孕育了如此雄壮的军政集团。同是涟水河流域的韶山，一样深受湘军文化的影响，毛家子弟从湘军者众。统计毛氏族谱上的记载，这个家族获军功的总共 63 人，从一品提督衔有毛正明、毛有庆、毛恩翼 3 人；从二品副将有毛际禄、毛祥受、毛祖璋、毛祖述 4 人；正三品参将有毛貽致、毛祖箴 2 人；正四品都司的有毛祖国、毛恩兑、毛貽俭等 7 人。因从军被授县丞以上文职的有毛兰芳、毛祖阍等人。^② 毛兰芳就是毛泽东曾祖父毛祖人的嫡堂兄弟，太平军过湖南时他在家乡兴办团练，在防堵宝庆府战役中立功，被保荐以同知衔补县丞，因系独子而辞官返乡。毛兰芳的孙子毛麓钟、重孙毛禹居都当过毛泽东的老师。毛顺生去浙江，投奔的是驻守定海的一个叫张伟卿的将领。但是，毛顺生当兵并未直接参与重大的战事。因为当时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上海周围，而且清兵一触即溃，未打几仗，就以败退告终。毛顺生在东南沿

① 李藻华：《杨市镇史记》，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97—210 页。

② 胡长明：《参加湘军获军衔的毛家子弟》，《湖南党史》2000 年第 2 期。

海的军中待了几年，无功而返。但他大开了眼界，学会了经营，与韶北的“忠义顺堂”、郭家亭的南杂店、永义亭的“李福胜”、银田的“长庆和”、湘乡章公桥的“彭厚锡堂”都有密切来往，并在银田寺“长庆和”米店入了股；他发行了“毛义顺堂”钞票，与湘乡一个经营药材、肉食、南杂的大商号“吉春堂”流通。^①在毛顺生的下一代，毛泽东在武昌起义后从长沙投笔从戎，被编入第二十五混成旅五十标第一营一连一排当列兵半年，差一点点就参加了湘军的援鄂行动。由此可见毛泽东年轻时曾受到过比较系统的近现代军事训练，包括步操、枪械、投掷等科目。当下广为流传的他大半生戎马倥偬，指挥千军万马，却“一辈子没有摸过枪”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好事者编织的神话。^②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一张毛泽东举起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瞄准的照片，是1964年6月15日他在观看原北京军区、原济南军区训练尖子汇报表演现场拍的。照片中毛泽东姿势非常专业，身旁有高级将领杨得志、杨勇等人。毛泽东一生长于军事谋略和文字瀚墨，而不喜舞刀弄枪则是事实。毛泽民、毛泽覃也都是红军将领，尤其是毛泽民承继了父亲的经营才干，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和新疆省财政厅厅长。毛泽东说过人民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他的长子毛岸英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后来又第一批上朝鲜战场，他的二儿媳邵华和嫡孙毛新宇是军事科学院少将，最小的女儿李讷曾任解放军报总编辑，他的侄子毛远新甚至当过原沈阳军区政委。“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③涟水流域的从军传统在韶山冲和毛顺生祖孙三四代人身上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曾国藩是湘乡人的骄傲，也是毛泽东年轻时期所崇拜的偶像。曾以一介书生，危难之际举兵桑梓，率涟水子弟转战大半个中国，最终成“同治中兴”之局面，集“圣贤”（修养）“豪杰”（事功）于一身。这样的

① 胡蓉：《毛泽东家曾发行股票》，《湘潮》2008年第5期。

② 梁衡：《文章大家毛泽东》，《人民日报》2013年2月28日。

③ 杨度：《湖南少年歌》，《杨度集》第1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小”老乡，对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不能不有着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在致黎锦熙先生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① 1913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写的《讲堂录》中写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② 他把曾国藩与宋代的文正公范仲淹并列，位居孔孟、诸葛亮、韩琦、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左宗棠等人之上，一来曾国藩是他的乡党，里仁为美；二来曾国藩的事功和道德文章也确实让他折腰。毛泽东在前期的革命生涯中不断继承总结湘贤的经验，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曾国藩咸丰八年（1858）在江西建昌大营曾作有《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折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饭。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③

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有太多的内容来自曾国藩《爱民歌》，把湘军处理军民关系的条规灵活运用到人民军队的建设中来，古为今用，善于借鉴前人，这是毛泽东的高明所在。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② 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3页。

③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98页。

四、从湘乡到长沙，走向全省舞台

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学堂学习生活了一个学期，因为在韶山乡下私塾的蹉跎，他比同班的同学要大好几岁，豁然开朗的他迫切想走出家乡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去求索。20多年后他向斯诺回忆那段岁月：

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那时我非常想到那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长沙去，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①

湘乡人没有亏待文家的外甥，毛泽东在湘乡县为本籍子弟兴办的湘乡县驻省中学顺利入学，实现了毛泽东从封闭的农村向省会城市的跨越。在《湘乡驻省中学堂同学录》中，第1页花名册共10位同学，只有毛泽东的住址载明是“湘潭七都”，其他同学均为湘乡人。在省城的一段时期也寄住在湘乡会馆。在童年到省城求学也就是上第一师范之前，毛泽东基本上在湘乡人中间打转转，而鲜有与湘潭人打交道的记录。历史不可以假设，1910年毛泽东如果没有去湘乡读书而是到湘潭米栈当学徒，其人生则是另一道风景。故1950年毛泽东在接见第一师范同学周世钊、畅谈“省中”读书往事时，无限感慨地说：“我虽然是湘潭人，但受的湘乡人的教育。”毛泽东对湘乡人士充满了感激之情，据李元甫之子李笃《敬爱的毛主席和湘乡东山学校》一文回忆，“1927年上半年，主席住在武昌，看望过我父亲，并介绍我父亲到水利局工作。”^②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与东山学堂戊班的同学保持联系，教员樊少清、赵浦珠，同学毛森品、汤璪真、谭世瑛、杨述凡、刘东南和舒融涛等，都得到过毛泽东的关心和资助，有的送钱赠物达五六次之多。

毛泽东在事业上的朋友圈，首先是湘乡人。湘乡县（今双峰）梓门镇的胡崇诚，1910年与毛泽东同班毕业后，又一同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他

①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页。

② 尹高朝：《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俩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同桌，情谊笃深，常以兄弟相称。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发起剪辫子运动，以示反对清王朝。胡崇诚在班里第一个响应支持，接着响应的还有其他 10 多个同学。但是，临到剪辫子时，只有胡崇诚和毛泽东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其他同学退缩了。他俩便拿着剪刀强行将这些人的辫子剪掉了，这一举动，当时在学校震动很大。^① 萧家村桃坞塘的萧子升、萧三两兄弟，尤其是萧子升，与毛泽东在东山学堂、驻省中学和第一师范均先后同学，他们一起游学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办新民学会，志趣相投，成为早期密友。在第一师范杨昌济老师门下，萧子升、蔡和森与毛泽东成为三位最得意弟子，人称“湘江三友”，两个湘乡人，一个实际上也算是湘乡人的湘潭人。在毛泽东早期活动圈子内，核心成员仍是湘乡人。

新研铺文家滩的易礼容，与毛泽东筹办湖南自修大学和文化书社，他也曾是东山学堂和驻省中学的学生。新民学会中，湘乡人最多，蔡和森、萧子升、萧三、熊先楚、彭璜、易礼容、萧青野、陈子博、彭平之、李中、李振翩、蔡畅、张超等都是湘乡人。最后新民学会解散，也是毛泽东与担任总干事的湘乡人萧子升发生重大分歧。

从韶山到棠佳阁，从韶山到东山学堂，再从湘乡到长沙，毛泽东的早年之路一步一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边缘走向中心。他的朋友圈也从文家长辈和表兄弟，到东山学堂、湘乡驻省中学的湘乡同学，再以湘乡师友为核心的圈子扩展到全省。这两条线索都十分清晰，脉络分明，湘乡因素在毛泽东的早期生涯中非常夺目耀眼。他从涟水河畔走出来，湘乡就是他人生的起跳板。《浏阳河》中唱，“浏阳河/弯过了九道湾/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这首歌的艺术感染力非常强，但把人们也唱得稀里糊涂。歌可以“兴”，但歌唱的是湘潭县，却让全国人民阴差阳错地记住了浏阳，而浏阳河与青年毛泽东之路没有半点关系。从地理上看，浏阳河汇入湘江后并不向南到湘潭，而是北去注入洞庭湖，歌词实在经不起推敲。延续的另一个话题是，与其说毛泽东

① [美]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9 页。

是湘潭县七都韶山人，倒不如说毛泽东是受涟水流域文化滋养的湘乡人更符合实际，毛泽东的一生与湘潭的联系甚少，而与湘乡的联系则多得多。1959年5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湘乡县委也接到通知，当年东山学堂的青年学子想回母校看看，后来却因故未能成行。不久，韶山从湘潭县析出单立特区，棠佳阁外婆文家所在的大坪公社也从湘乡县划出给新设的韶山。^① 涟水流域相应增加了一个新的行政区划，在地理位置上依次为涟源市、娄星区、双峰县、湘乡市和韶山市，这样就基本理顺了流域文化的关系，也更符合这一地区人文历史发展的规律。

^① 《韶山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黄河流域先民入湘与南北交通雏形

蒋响元*

摘要：5000年前的涿鹿之战，促成了炎黄部落融合，奠定了华夏民族根基。炎帝、黄帝、祝融、三苗、九黎、欢兜、舜帝、夏禹等族的相关传说和历史遗迹，构成了新石器时代南北交通的雏形。

根据交通地理和文献传说，黄河流域先民沿荆襄道或随枣走廊南迁江汉后，华夏族系多循湘水扩张，栖息长衡盆地及湘南丘地，远及岭南；黎苗族系则溯资水、沅水、澧水退匿，流徙西南。同南阳盆地一样，交通便利、水草丰茂的洞庭盆地是华夏、黎苗两大集团对峙前线，也是争夺焦点。

关键词：涿鹿之战；丹水之战；三苗；南巡狩；禹南征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写道：“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在古文献中保存有古代传说，而在当时未能用文字把它直接记录下来的史料，用这种史料所记述的时代，就叫作传说时代。”^① 先秦史料少有道路记载，我们可从文献传说、

* 蒋响元，《湖南省志·交通志》总纂，湖南省社科院特邀研究员。

基金项目：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基于文旅融合的湖南交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研究”（项目编号：202028）。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3页。

考古成果，窥寻这一时期的交通发展脉络。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历史进入传说时代。根据传说，黄帝以前，有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诸圣；黄帝之后，颛顼、帝喾、尧、舜相继。这些传说，在仰韶、大溪、屈家岭、石家河、龙山文化遗址中多有迹可循。

炎黄对九黎的战争，实际上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角逐，也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冲突。尧、舜、禹时，在华夏联盟持续的追逐征伐下，三苗集团覆亡，部分族人流徙西南山区，苗族长篇英雄史诗《亚鲁王》描述了祖先征战、迁徙的故事。湘境内材料显示，石家河文化后期，黄河流域龙山文化因素明显增强。平江舵上坪、湘乡岱子坪等遗址出土陶器的陶系、造型、纹饰及制作工艺等，与河南龙山文化器物接近，^① 折射出中原文化对南方社会的强烈影响。随着黄河流域先民相继入湘，南北交通道路出现雏形。

一、涿鹿之战与九黎部族南迁

距今约5000年前，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与炎黄联盟发生冲突，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者竺可桢先生认为，东亚大陆新石器时期年均温度比现在高2℃，一月日均温度比现在要高3℃~5℃。^② 如亚热带竹类植物，曾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全新世以来，黄土高原主要为草原或稀疏草原植被，气候温暖湿润。^③ 直到商代，中原地区还有野象出没。甲骨文中商王猎象记载：

“获象七。”（《合集》37365）

“丁未卜，象来涉，其呼□射。”（《屯南》2539）

① 熊传薪：《湖南商周青铜器发现与研究》，《湖南出土殷商西周青铜器》，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419页。

②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01期。

③ 李丰江：《黄土中的微化石，揭示了黄土高原古气候、古植被的变化》，《中国国家地理》2017年10期。

这些气候条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极为重要。

三苗前身九黎，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一个氏族部落，发祥于长江中游，后迁徙环境条件更好的黄河中下游。九黎是当时东亚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部族，最早进入农耕时代。“苗族文化，相当发达，第一发明刑法；第二发明武器；第三发明宗教。后来汉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及甲冑，而信奉之鬼神教，大抵皆苗所创，而汉族因袭者。”^①由此可见，在中华文明演化进程中，苗族先民一度处于领先地位。

南阳盆地西连丹水，北通唐白河，东南出汉水，是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交汇、碰撞的地域。南阳盆地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印证了江汉黎苗北上争雄的历史事实。邓州八里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多遭火焚，室内有未及携走的石器、骨器及陶器，上层堆积屈家岭文化遗存。^②淅川下王岗同期遗址也有类似现象，仅石斧就发现 147 件。^③显然，这两处仰韶文化聚落毁于突发事件，创造屈家岭文化的黎苗部族，通过战争手段驱逐当地居民，在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聚落。屈家岭文化影响一度到达黄河两岸，在河南郸城、禹县、郑州、偃师、浉池、陕县以及山西垣曲都有遗址被发现。

炎帝部落和九黎族人，曾共同栖息黄河中下游流域。后来，蚩尤与炎帝“争于涿鹿之河”，占有了炎族赖以生息的全部地域，使之“九隅无遗”（《逸周书·尝麦》）。炎帝西撤时，又与黄帝发生战争。《史记·五帝本纪》：

轩辕教熊、黑、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后得其志。

熊、黑、貔、貅、貙、虎，可能为黄帝族收抚的游牧部落。炎帝战败后归顺黄帝，炎、黄两大部落联合，复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太平御

①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 页。

② 张江凯：《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 09 期。

③ 王建华，吴梅，余扶危：《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储粮史研究》，《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 02 期。

览》卷十五引《志林》:

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士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杀蚩尤。

这是指南车出现的最早记载。上述“阪泉之野”“涿鹿之野”可能在同一地区。对其地望,多数学者认为,阪泉或涿鹿位于桑干河流域的怀来盆地,今河北涿鹿矾山镇古城村南;一说位于今河南修武西北;另有一说,阪泉在山西运城盐池附近,“涿鹿之战”实为双方争夺食盐资源引起,笔者深以为然。^①

炎帝、蚩尤部落皆以牛为图腾,说明他们可能属于同一部族。故《路史·后纪四》称,“蚩尤姜姓,炎帝后裔也。”吕思勉先生断言,“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②

涿鹿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这场战争促成了炎、黄部族融合,奠定了华夏民族根基。蚩尤战败被杀后,部分九黎族人,如迁居“邹、鲁之地”的“善者”,臣服于黄帝,融入华夏集团。大部九黎族人南迁长江中游,同当地部族结合,组成新的部落联盟,时间大致在屈家岭文化(距今约4600—5300年)中晚期。

这一时期,长江中游存在四个隔河而治的酋邦^③:以石家河古城为邦都的汉水以东、澧水以西地区,以城河古城为邦都的汉水以西、长江以东地区,以鸡叫城为邦都的澧水中下游地区,以叶家庙古城为邦都的澧水以东地区。^④九黎部族南迁,上述酋邦被整合成“三苗国”,引发了石家河文化勃兴。活动区域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圈基本吻合:北至南阳盆

① 对于涿鹿或阪泉的地望,学界尚有不同意见。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一书中认为,阪泉在河北境内,许倬云、李学勤、王北辰等学者皆持此说;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中则提出:“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即涿鹿矣。”张其成在《中华五千年史》、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亦持此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则认为在河南修武。2018年6月,笔者实地考察山西运城盐池后,认同该地为“阪泉之野”。

②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

③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在《原始社会的组织》和《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中认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经历了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即游群、部落、酋邦、国家。

④ 袁建平:《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的邦国与方国》,《历史研究》2013年01期。

地、桐柏山、大别山一线，东至幕阜山脉一线，南至“洞庭之野”及沅、澧中游，西至大巴山、巫山一线。石家河是三苗国都，鸡叫城为三苗在长江以南中心聚落。



天门石家河出土玉鹰和双人连体头像玉玦^①

石家河文化是继屈家岭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考古学文化，因发现于天门石河镇而得名。石河镇以北邓家湾遗址发现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标志石家河文化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玉雕是石家河文化一大特色，主要有玉人、玉虎、玉蝉、玉龙、玉凤、玉玦等小型玉器。

1986年，石门丁家山遗址出土一件玉人首。玉人首正面弧凸，头带冠，后插梳形饰，双耳戴环，厚唇长枕，被认为是三苗形象。该件玉器的出土，为石家河文化向澧水流域传播，提供了实物证据。



石门丁家山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人首^②

苗族奉蚩尤为先祖，九黎南迁在苗族服饰、古歌传说多有反映。苗族服饰绣有黄河花纹，表示祖先来自黄河。《苗族古歌·跋山涉水歌》以及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苗族迁徙歌》《鸺巴鸺玛》等，以很长的篇幅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2014—2016年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7年第7期。

② 石门县博物馆：《石门发现一件玉人首》，《湖南考古辑刊》第8集，2009年12月。

描述了这段征战、南迁的艰难历程。《鸺巴鸺玛》^①中唱到:

我们还要另起锅灶,我们还要向西迁移……

脚步越走越沉,道路越走越险……

从澧州澧县上来,从桃花溪桃花沟上来……

沿着长长的河水上走,顺着高高的大山上迁……

根据苗族古歌推测,九黎族人及后裔的迁徙路线:自“涿鹿之野”南渡黄河,越伏牛山入南阳盆地,沿丹水、唐白河南下,至襄阳附近分成两路:或由荆襄道趋长江北岸,或经随枣走廊抵石家河文化发祥地汉东地区;继循长江、沅水、澧水,迁居西南山区。

二、炎帝、祝融族人迁湘与“厉山国”的建立

《国语·晋语》:“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根据古史传说,炎族发祥地在渭水支流姜水,^②与黄帝部落发祥地岐水相邻。^③即今陕西岐山、扶风县境。炎帝部落循渭水、黄河,渐次迁徙黄河中下游。炎帝曾到泰山祭祀天地。《管子·封禅》:“炎帝封泰山,禅云云。”

涿鹿之战后,黄帝被拥戴为华夏联盟领袖,^④大部炎族融入黄帝部落,另有部分南下。这是文献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战争实现的改朝换代。

南下炎族先迁至今湖北随县厉乡,生神农柱。^⑤柱复率族人南迁。炎陵炎帝陵,当为神农柱之墓。^⑥另传,炎族原栖息长江中游,后迁黄河流域,逐鹿中原失败后,“熊湘江汉之南,犹为炎族割据。”^⑦

① 吴国恩:《民族魂的唱响——苗族史诗〈鸺巴鸺玛〉解读》,《民族论坛》2003年03期。

② 有观点认为,洪江高庙文化早期遗存为人文始祖伏羲氏族创造,晚期遗存为炎帝氏族创造,伏羲是炎帝神农氏的直系祖先。参见肖军,黄巍,周圣华:《发掘怀化高庙遗址:‘高庙文化’颠覆传统认知》,《湖南日报》2016年6月16日。

③ 《水经注·渭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

④ 《史记·五帝本纪》:“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⑤ 《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

⑥ 任国瑞:《炎帝神农氏迁湘事迹综考》,《文献与人物》,2015年05期。

⑦ 蒙文通:《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66页。

随着炎族南迁，怀化、郴州、衡阳、株洲、长沙以及越南^①等地，留下炎帝传说或遗迹。传说，炎帝在会同连山发明“连山易”，并在此会见诸侯。又传，炎帝之世，“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也。后以置县，徇其实曰嘉禾县。”^②赤冀氏曾作耒耜于郴州耒山、作杵臼于宁远春溪。《水经注》云，春陵“盖因春溪为名。”

相传，炎帝在衡南神农山采药，误尝断肠草而崩。“神农山在城南四十里，上有神农祠。”^③神农祠在神农山顶，始建于唐贞观十三年（639）。又传，“衡山降元峰，炎帝少女致斋之所。”^④

《列子·汤问》：“楚之南，有炎人之国。”传说，炎帝建“长沙厉山国”^⑤，宁乡黄材镇栗山（村）为其都城。《荆州记》：“神农生于随县厉山，都于长沙，死葬茶乡。”衡湘间传闻，“炎帝都长沙，凡七世，城在湘阴之滨。”^⑥长沙厉山国，是最早见于古史传说的湘境邦国。

汉时已有炎帝陵，汉末，邑人担心乱兵发掘，将陵墓夷为平地。宋乾德五年（967），建炎帝庙。^⑦淳祐八年（1248），湖南安抚使奏请朝廷为炎帝陵禁樵牧，设守陵户。此后历朝祭祀不绝，衡阳府城至酃县（今炎陵县）炎帝陵，筑有御祭道，遗迹尚存。

南宋学者罗泌在撰写《路史》期间，曾赴茶陵考察炎帝史迹。（唐）《元和姓纂》称黄帝封炎帝榆罔支系于露。罗泌注曰：“神农之兆在于茶陵，而潞水之乡、潞水之山若诸露之名遍于茶陵、攸县、潭衡之境，益以是知诸露之始有在其爵土。”并称：“（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⑧以上说明，炎族某支曾居茶陵一带。炎帝陵或是神农氏后裔奉祀

① 《大越史记全书·外纪》记载，越南民族的始祖涇阳王“讳禄续，神农氏之后也。”参见[越南]陶维英：《越南古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3、47页。

② 王应章：《嘉禾县学记》，嘉庆《嘉禾县志》。

③ 嘉靖《清泉县志·地理志》。

④ 王万澍：《湖南阳秋·衡湘稽古》，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17页。

⑤ 王万澍：《湖南阳秋·衡湘稽古》，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09页。

⑥ 王万澍：《湖南阳秋·衡湘稽古》，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17页。

⑦ 光绪《湖南通志》：“酃县炎帝庙在县西炎帝陵旁，庙在陵侧，宋乾德五年建，六年以祝融配食。”

⑧ 罗泌：《路史·卷一二》。

先祖的衣冠冢，或为南迁炎族首领坟墓。

祝融，本名重黎，传说为炎帝火师，后尊为火神。从文献记载来看，祝融部落或与炎、黄部落均有亲缘关系。^①

祝融部落最初在黄河以南、嵩山以东一带活动。新郑古称“有熊”，传说黄帝在此建都。帝喾时代，新郑为祝融氏之国。《左传·昭公十七年》：“郑，祝融之墟也。”

大约在炎族迁湘同时，部分祝融族人南迁长江中游，徙居衡山之阳。《衡湘传闻》：

祝融重黎，居于衡阳，今衡阳县西有重江，南有黎江，重江乡有重亭，汉以置重安县。

黄帝因“得祝融而辨于南方”（《管子·五行》），对祝融加以重用，命为司徒。^②

《吕氏春秋·孟夏纪》载：“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佐祝融。”1942年9月，长沙子弹库出土一幅战国时代楚帛书（主体藏美国博物馆，局部在湖南省博物馆，参见下图）。内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鼓，奠四极”等语，印证了炎帝、祝融在古史传说中的关系。

① 《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也，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② 《路史·后纪四》：“祝融为黄帝司徒，徙居江水。”



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复原图

祝融族人南迁江湘，留下不少传说和遗迹。

传说，祝融在衡山创造了保存火种的方法，故黄帝封其为火正官，后被奉为火神，与炎帝配。^①

传说，祝融死葬衡山。《水经注》：“岫嶁山，为南岳也……南有祝融冢。楚灵王之世，山崩毁其坟，得营丘九头图。”衡山主峰岫嶁峰，又称祝融峰，上有祝融殿，供奉火神。

三、黄帝南征及“胙土长沙”

据考，公元前 2697 年为黄帝元年。^② 势力范围东到东海，南至江湘，^③ 西抵宁夏，北达蒙古。《史记·五帝本纪》：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岳；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

① 《唐会要》：“天宝六岁正月十一日，敕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殷祀，宜有钦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农，以祝融配；黄帝，以风后、力牧配。”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历史年表》，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7 页。

③ 《庄子·天运》：“（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

逐菴粥，合符釜山。

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或因追逐九黎部族，或为征伐南迁炎族。^① 前述长沙厉山国，极可能毁于这次南征。

熊山即今安化与新化交界的大熊山。^② 大熊山有蚩尤屋场、蚩尤谷和春姬峡（传说春姬系蚩尤妻）等地名。1982年，大熊山林场场部筑围墙时挖出一块古碑，其中刻有“黄帝与蚩尤战三月”字样。说明蚩尤部族南迁时，其中一支溯资水而上，流徙山高林密的大熊山区。

湘山或为洞庭君山。^③ 《史记正义》：“湘山，一名觚山，在岳州巴陵县南十八里。”《湖南风物志》：“洞庭湖君山之上，有轩辕台，传为黄帝铸鼎的地方。”

黄帝后来将长沙赏赐其子少昊氏。《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娶西陵氏之女，是为嫫祖，生子曰玄嚣（即少昊氏），降处江水，是为青阳。”青阳为长沙古名。^④ 《路史》记少昊氏“始于云阳，胙土长沙。”胙，即赏赐。青阳具体位置，可能在沅水上游、宁乡黄材一带。^⑤ 《汉书·邹阳传》云：“越水长沙，还舟青阳”，意为舟船顺湘水出长沙后，转溯沅水即抵青阳。

四、丹水之战与欢兜部族徙湘

梁启超先生认为，“三苗、九黎，一族两名。”^⑥ 九黎南迁后，融合当地族群，组建三苗国。

明代鄂籍学者周祁撰写的《名义考》认为：

①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田千秋上书：“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叛父，黄帝渡江。”

② 《方輿胜览·宝庆府》：“昔黄帝登熊山，意其此也。”

③ 湘山地望，一说桃江（原属益阳）县境修山，同治《益阳县志》：“修山，治西九十里。峻峰如削，卓立资滨，或以即为湘山，黄帝南巡所登。”

④ 《通典·州郡》：“长沙，古青阳地。秦始皇时，荆王献青阳以西，即此也。”

⑤ 喻立新：《楚汉青阳青阳今何在》，《长沙大学学报》2014年1月。《洞庭湖历史变迁地图集》（湖南地图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将战国时期的青阳县标在湘阴县北青山岛上，并注明为战国苍梧郡治。

⑥ 梁启超：《中国上古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3页。

三苗，建国在长沙，而所治则江南荆、扬也。

（清）蒋廷锡著《尚书地理今释》称：

三苗，今湖广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史记正义曰，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又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也。

丹水源于秦岭凤凰山南麓，在荆紫关附近入河南淅川，至丹江口入汉水。丹水背倚宛、洛，前窥荆、襄，素为江汉通关中孔道。丹水中下游是南阳盆地，史前文化交汇叠合区域。

“丹水之战”可能是三苗向秦岭、伏牛山区扩张，威胁到华夏联盟的势力范围而引起的。

丹朱，尧帝长子。《尚书·益稷》：“丹朱傲，惟漫游是好，傲虐是作。”尧以丹朱“不肖”，封其到偏远的丹水流域。^① 丹朱迁居丹水后，入赘三苗有扈氏首领驩头（又称欢兜、驩兜）家族，故称驩朱。

尧初，三苗曾加入华夏联盟。（晋）郭璞在《山海经·海外南经》注为“驩头尧臣”。尧禅让虞舜后，驩头不服。双方战于丹江口一带，三苗最终被逐出这一地区。淅川下王岗遗址自下而上堆积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与龙山文化遗存，证实了尧战三苗传说。

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年代、都城规模及出土文字，结合文献推断，陶寺就是尧都遗址。^② 早期王族墓地与中期王族墓地不在同一区域，表明早中期王族间没有血缘关系。^③ 陶寺遗址考古成果，印证了“尧都平阳（即今临汾）”（《帝王世纪》）传说和尧舜禹时君主禅让制度。

丹水之战后，尧采纳舜的建议，分化、瓦解三苗联盟，将欢兜流放崇山，迁其他族人于三危山。^④ 三危地望，古今学者多认为在今甘肃敦煌一带。《水经注》：“三危山在敦煌县南。”亦有观点认为，三危在“洞庭、

① 《太平御览》卷六三引《尚书逸篇》：“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

② 李韵：《尧都从传说走向信史——陶寺遗址考古成果发布》，《光明日报》2015年06月19日。

③ 何笃：《“地中天下观”肇始于汾河谷地的陶寺》，《中国国家地理》2017年10期。

④ 《史记·五帝本纪》：“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彭蠡之间的山地。”^①

至于崇山方位，唐《通典·州郡》：“汉零阳县地，有澧水，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明万历《慈利县志》：“崇山在县西百余里，欢兜墓在崇山，舜放欢兜于此，死后遂葬于山上。”清同治《直隶澧州志》：“崇山绝顶有巨垄，相传为欢兜冢。”据考，崇山位于张家界后坪镇，当地尚存驩兜石屋、驩兜屋场、驩兜墓址、驩兜庙址等遗迹。

流放崇山的欢兜及其族人，成为湘西苗族最早的先民。湘西苗族中有一支的庙姓叫“仡欢”，他们奉欢兜为先祖，应是欢兜直系后裔。

欢兜迁徙路线，大致自丹水入汉水，经荆襄通道越江，溯澧水至崇山，即今湘西北山区。

五、舜“南巡狩”与虞舜族人迁湘

传说，舜“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记·五帝本纪》）。舜继尧成为华夏集团首领后，德威并重，一方面采取军事手段征伐、瓦解，“伐三苗”（《战国策·秦策》），“分北三苗”（《史记·五帝本纪》）；一方面施行怀柔、感化政策，以德服苗。（《韩非子·五蠹》）：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尚）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淮南子·齐俗训》记载，上古之时，服饰装束因族而异，“三苗髻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鬻髻。”河南淅川、湖北郢县（今郢阳区）石家河文化遗址发掘出笄，印证了“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吕氏春秋·召类》）传说。

在华夏与黎苗集团长期对峙的背景下，洞庭地区以西通巴蜀、东连吴越、北倚江汉、南接衡湘的区位，成为南伐苗蛮前线、会盟诸侯舞台。传说，虞舜禅位夏禹的仪式，就是在湖湘举行的。“三十有二年，冬，（舜）

^① 马少侨：《“窜三苗于三危”新解》，《苗族研究论丛》，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帝会诸侯于洞庭之野，禅位于夏后禹。”^①

虞舜继位后，将其亲族分封湘水流域，以强化对这一沟通南北的咽喉地区控制。《史记·五帝本纪》：

舜之践帝位……封弟象为诸侯。

象封地有鼻（庫），治今双牌江村镇，辖衡山以南、雪峰山以东、罗霄山以西，即湘、资中上游地区。

潇湘之滨古有象庙、象祠。^② 道州古有象祠，祀鼻亭神。^③ 唐元和年间被道州刺史薛伯高捣毁，柳宗元撰《道州毁鼻亭神记》纪其事：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传且千岁。元和九年……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于江。^④

明天启六年（1626），道州知州李嵎慈重修象庙，民国尚存。^⑤

《帝王世纪》说舜“有三妃，元妃娥皇无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登北氏（一说癸比氏）生二女霄明、烛光。有庶子八人。”商均随舜南巡，舜帝驾崩后留居“苍梧之野”，死葬九嶷山。^⑥ 舜庶子分封长沙、巴陵等地。^⑦

虞舜暮年南巡，史上有不同解释。《韩非子·说疑》认为是“禹逼舜”所致；《淮南子·修务训》称“南征三苗，道死苍梧”；《舜葬苍梧考》则云：“舜亲爱弟，禅禹之后，自携二女以访弟象于有庠也。”^⑧

《史记·五帝本纪》：“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苍梧之野”即九嶷山一带，有虞之世“邻三苗之窟。”^⑨ 虞

① 王万澍：《湖南阳秋·衡湘稽古》，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48页。

② 《舆地志》：“零陵郡应阳县（今东安县境）东有山，上有象庙。”《晋书》：“泉陵县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

③ 《括地志》：“鼻亭神在营道县北六十里。”

④ 《柳河东集·道州毁鼻亭神记》。

⑤ 《章太炎文录续编》：“湘人云道州象祠至今尚存。”

⑥ 《山海经·大荒南经》：“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

⑦ 《路史·国名纪》：“长沙、巴陵，皆舜子姓之封也。”

⑧ 郑敦曜：《舜葬苍梧考》，《亦若是斋随笔·卷一》。

⑨ 蒋驥：《九嶷山志》。

舜最后一次南巡，应是征伐反叛的三苗。

对舜帝的祭祀行为历代不绝。如楚灵王“阙石陂汉，以象帝舜”（《国语·吴语》），秦始皇“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史记·始皇本纪》），汉武帝“南巡狩，至于盛唐（湖北宜昌），望祀虞帝于九疑。”（《汉书·武帝纪》）

针对舜帝归葬九嶷的质疑，清人作《舜陵考》：

舜陵本始于《尚书》，详核于《礼记》，杂见于《墨子》《离骚》《史记》诸书，《书·舜典》曰陟方乃死，《礼·祭法》则曰：舜勤众事而野死。《檀弓》又曰：舜葬于苍梧之野。《墨子·节葬下》则曰：舜道死南纪之市。《史记》则曰：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朱子注《离骚》九疑，亦曰九疑舜所葬。又《通考》《十三经》古注、《汉书》《汉纪》各注，暨《竹书》《山海经》《淮南子》《风俗通》《世纪》《皇览》《舆地考》，俱各往往称舜南巡崩，葬苍梧九疑。盖历三千年无一异辞者。^①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所绘区域位今永州、郴州南部及广西、广东北部，九嶷山中心绘有九根柱状物，旁注“帝舜”二字。2002—200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九嶷山玉琯岩进行考古发掘，发现秦汉至宋元时期舜帝陵庙遗存，与马王堆帛书地图标注地点相符。

传说舜帝南巡时，经由湖北松滋入湘。鄂、湘、桂等省区皆有与舜帝有关的地名，如虞氏渡、韶山、虞山、舜潭、舜山、舜水、舜岩、舜皇山等。

清同治《松滋县志》：

虞氏渡，在县南六十里，世传虞舜南巡过此。

明嘉庆《一统志》：

韶山，相传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故名。

^① 罗汝怀编：《湖南文征·卷三二》。

宋《太平寰宇记》：

临桂县虞山下有潭，号曰舜潭，言舜南巡游此。

清道光《永州府志》：

东安县有舜山、玉陛源，皆祀有虞氏。东安近九疑，因舜巡狩所经也。

潇湘流域建有多处舜帝庙宇，为舜帝南巡增添了实据。如宁远舜帝庙、蓝山舜殿、道县虞庙和东安舜庙等。^① 2012年，零陵黄田铺发现一处舜庙遗址。当地传说，舜南巡行船受阻，曾宿于此地，后人建庙祭祀。^②

相传，舜帝曾至九嶷山南麓、楚越要冲南风坳。在南风坳，虞舜以五弦琴伴奏，咏唱《南风歌》：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根据历史文献、民间传说、考古发掘、庙宇遗迹及传世地名判断，舜晚年应在湘水上游流域渡过。南巡路线大致是：自中原出南阳盆地，经荆襄道趋松滋，入湘境后沿湘水河谷南行，经湘桂走廊至桂林，或由湘水转潇水、九嶷河上九嶷。

汉时，司马迁曾赴潇水上游考察，最终确认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舜迹”线状分布，在交通地理上具有合理性。舜帝南巡传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黄河流域先民南下江湘、岭南过程中，探索、开拓南北交通的艰难实践。

舜帝南巡驾崩后，随行宗亲族人不少留居当地。^③ 这些虞舜族人，成为南迁江湘的早期华夏先民。他们和流放澧水上游山区的欢兜族人，对湖湘文明演进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① 《后汉书·郡国志》：“营浦县南三里余，有舜南巡宿处，今立庙。”

② 唐善理等：《零陵区发现一处舜帝庙遗址》，《湖南日报》2012年7月5日。

③ 舜嫡长子叔均留葬九嶷，东夷同族何侯居宁远、道县，舜裔姚人居洮水之滨（今广西全州，即楚《郢君启节》之洮邑）。另有早前封于有鼻的舜弟象，以及分封长沙、巴陵、衡山的虞舜庶子等。

六、夏禹南征与三苗集团覆亡

梁启超先生认为，“苗之本部在湖湘间者，即舜所欲喻教而禹卒亲征之者也。”^①夏禹继位后，对复叛的三苗集团进行了大规模征伐。据《战国策·魏策》，魏武侯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军事家、西河郡守吴起不以为然，认为“河山之险，不足保也”，并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北，而衡山在其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②

战争前夕，三苗国遭遇强烈地震，导致地貌、水文、气象异常，动物不安，人心惶惶。《墨子·非攻》：“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这是中国最早的地震记录。

夏禹抓住战机，出师伐苗。^③禹师渡江扫荡，直入苗蛮腹地。《威宁苗族古史传说》：“敌人乘七十只独木舟，七十对大板船渡江来攻。”华夏文明发展到这一时期，木板船出现为渡江作战提供了可能。

禹征三苗的战争十分残酷。三苗城堡被摧毁，宗庙被夷为平地，祭祀重器被焚毁，战俘及其子孙沦为奴隶。^④考古材料显示，石家河文化中期，以（河南洛阳）王湾三期文化为主体的龙山文化向南扩张，取代当地文化，与尧“战三苗”、舜“却三苗”传说吻合。石家河文化晚期，包括澧阳平原在内的长江中游城垣聚落几乎同时衰落，表明石家河文化遭受了一次猛烈的外来打击。后石家河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受到河南龙山文化强烈影响。这一文化面貌的改变与“禹征三苗”，使其“无世在下”

① 梁启超：《中国上古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4页。

② 西汉初年出版的《韩诗外传》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句；西汉末年出版的《战国策·魏策》原文为“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据此，《战国策》中文山应是岐山，南北二字错倒。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境，衡山在今衡山县境。

③ 《墨子·非攻》：“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搃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微）。”

④ 《国语·周语》：“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

的记载相符。

通过这场战争，三苗集团彻底瓦解，“三苗”“有苗”再未见于史籍。随着大量战俘及其族人沦为奴隶，氏族社会全面解体，导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夏王朝诞生。

人类早期交通路线选择，基本遵循“沿河推进，寻隘拓展”原则，道路沿峡谷或河岸开辟，是人类适应地理环境的必然结果。

先秦文献中，“交趾”泛指南岭以南地区。如《墨子·节用》：“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吕氏春秋》：“禹东至扶木之地，南至交趾。”在中原先民开拓南土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跨越南岭的五条通道，即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故宋人曰：“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①

根据古史传说，至迟尧舜时期，自中原经湖南出岭南的道路基本形成：由荆襄通道或随枣走廊南下江汉，越长江入湘境；继溯湘水、逾越城岭下漓水，或由湘水转耒水、越骑田岭下武水，或由湘水转潇水、穿萌渚岭入贺水。其中沟通湘水和漓水、中国三大地理走廊之一的“湘桂走廊”，是南北交通主孔道。

^① 周去非：《岭外代答·地理门》。

元代湖南学记文与官员教育政绩关系考论

——以衡州路学校为例

彭曙蓉*

摘 要：元代关涉湖南的学记文，十分推崇儒道，有着突出的教育史料价值，从中可梳理出一段由官员主导的学校建设史。正是地方官对学校的积极建设和无私捐助，造就了政学相通的局面，使湖南成为新的邹鲁之邦。湖南官员还非常重视激励教育，即以刻碑和修祠的形式砥砺后学，这对于振拔湖南的学风和士气颇有助力。因此，探讨元代湖南学记文与官员教育政绩的关系，揭示地方官对于湖南教育事业的诸多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启示当代湖南各级学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有效合作，亦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元代湖南；学记文；衡州路；教育政绩；政学相通

元代关涉湖南的学记文创作与官员的教育政绩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学记文反映了官员的教育政绩，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元代湖南的学校建设和教育水平曾达到十分兴盛的局面。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以反映衡州

* 彭曙蓉，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河南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元代湖南学记文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YBA039）；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元代湖南文学与教育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A032）。

路学校的学记文为考察对象，旨在探讨元代湖南学记文与官员教育政绩二者间的重要关系。综合《元史》《衡州府志》《新元史》中关于衡州路的相关记载，^① 可知衡州路是上路，所辖共五县：衡阳、安仁、酃县（今炎陵县）、衡山、新城。而茶陵、常宁、耒阳三地升为州之前，即至元十九年（1282）之前，也属于衡州路管辖。通过梳理和统计元代衡州的官学和书院，发现其地学校共 25 所，包括始建于唐、历史最为悠久的石鼓书院和南岳书院，地方教育水平普遍很高，学校的修建则直接引发了学记文的创作。故考索和论析元代湖南学记文与官员教育政绩之间的关系，由此梳理出一段重要的地方学校建设史，不仅可洞悉元代湖南教育的面貌，对于当代地方政府官员建设地方学校和发展教育，也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元代衡州路学校及其学记文统计

元代衡州路的官学，据嘉靖本《衡州府志》卷 5《学校》，^② 与《全元文》中所涉 10 篇学记文，经整理和统计后，制表如下：

表 1 元代衡州路官学统计表

学校名称	地址、建制	元末遭遇	入明后情况	元代学记文
衡州路学	旧址在石鼓书院西边。宋末毁。元代衡守在易古塔寺地重建。至正年间为寺僧夺取，后买李芾宅重建	毁于兵火	洪武三年，知府高从训同训导杜文德重建	杨倬《衡州路进士题名记》。杨伟《进士题名记》（指衡州路进士）

① 宋濂等撰：《元史·地理志六》，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528—1529 页。《衡州府志》卷一其“衡阳县”后云：“元至元三年，析衡阳东乡置新城县。”其“衡山县”后云：“宋初属潭州，复属衡州，后又属潭州，元属衡州。”嘉靖《衡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 1963 年版。《新元史·地理志六》其“衡州路”后云：“至元十九年，升茶陵、常宁、耒阳为州。后至元二年，分衡阳界置新城县。”柯劭忞《元史二种·新元史》（全二册），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0 页。

② 嘉靖《衡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 1963 年版。

续表

学校名称	地址、建制	元末遭遇	入明后情况	元代学记文
衡阳县学	在县西城外。宋开禧中县令唐烨始建。至正七年金宪周襄收复泮池	毁于兵火	洪武初，知县周岳依旧址重建	刘简《衡阳县学记》。
衡山县学	在县治东北。宋大观元年学士郑居中奏乞御笔，昭旨刻石，立之学宫	毁于兵火	洪武三年，知县陆伯良重建	杨宗瑞《衡山县进士题名记》
耒阳县（州）学	在县东北，汉代侯宾始创。宋元符二年江滋重建	毁于兵火	洪武初，知县徐煜重建	
常宁县（州）学	在常宁县南门外。宋建。元泰定元年（1324）重修	毁于兵火	洪武初，降为县学	李琳《重修州学记》；何元同《二贤祠记》；黄常《常宁州州学儒籍记》
安仁县学	在县西。宋绍兴中徙于西南。嘉定五年，知县王槐迁于县治东南隅	毁于兵火	洪武三年，知县韦衡重建	
酃县县学	宋嘉定中建于县西。元至元年间，徙于县东		入明后依旧址重建	胡云龙《酃县重建儒学记》
茶陵县（州）学	地址不详		入明后降为县学	李祁《茶陵州修学记》；赵天弼《进士题名记》

由上表可知,元代衡州路所建官学,有路学1所,县学7所,大部分均毁于元末兵燹,但在明代洪武年间又陆续得到重建。这7所县学中,茶陵、常宁、耒阳3所学校,在至元十九年前,曾是衡州路的县学。其后,这3所县学升为州学,虽然在地缘上与衡州路分开了,但在教育和文化方面,与衡州路仍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石鼓书院的学田就在茶陵。经梳理,现衡州路官学所存学记文共10篇。官学以外,衡州路的书院也很发达。据《衡州府志·学校》、光绪《湖南通志·学校》、《全元文》中涉及衡州的学记文,《中国书院辞典》湖南书院之记载,衡州路共17所书院。列表如下:

表2 元代衡州路书院统计表

书院名称	地址	创建、重修时间	建制过程	元代记文及资料出处
石鼓书院	原址在衡阳县北石鼓山下,今在衡阳市雁峰区石鼓公园内	唐元和时李宽创建。宋至道三年(997)衡阳人李士真复建。宋景祐二年(1035)赐额“石鼓书院”	原为唐元和年间李宽读书处。宋集贤校理刘沆请示朝廷后,始赐额并赐予学田。 ^① 宋、元、明、清四朝办学不断	傅若金《衡府判于公复学田序》(《全元文》);黄清老《石鼓学田记》(光绪《湖南通志》); ^② 《中国书院辞典》 ^③
城南书院	今衡阳市雁峰区雁峰公园内	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创建,至正八年(1348)重修	元衡州路路学儒生何东厓以其居所改建	陈谊高《城南书院记》(《全元文》);《衡州府志》;《中国书院辞典》

① (明)李安仁等撰,邓洪波,刘文莉辑校:《石鼓书院志》,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4页。

② 《湖南通志》(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1页。

③ 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80页。

续表

书院名称	地址	创建、重修时间	建制过程	元代记文及资料出处
南岳书院 (又名邳侯书院)	衡山县南岳山西麓	始建于唐肃宗、德宗之际，元代加以四次修缮	唐代邳侯李泌曾隐居衡山，唐李繁建为书院。宋宝庆年间张嗣可迁移至集贤峰下	變理浦化《重修南岳书院记》（《全元文》）；《衡州府志》；《中国书院辞典》 ^①
胡文定公书院	衡山县南岳山西南	宋绍兴元年（1131）胡安国创建	宋胡安国退居衡山时创建	《衡州府志》；《中国书院辞典》 ^②
韦宙书院	衡山县南十五里净福山	唐代创建	唐永州刺史韦宙创建	《衡州府志》；《中国书院辞典》
卢潘书院	南岳紫盖峰下	不详	唐代卢潘隐居读书处。	《衡州府志》。
南轩书院	衡山县南岳山后。	南宋时创建。	宋代理学家张栻与朱熹同游并讲学于此	《衡州府志》；《中国书院辞典》 ^③
赵季西书院	不详	南宋创建	宋赵季西建。明弘治以前废，仅存墨池	《衡州府志》；《中国书院辞典》 ^④

① 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70 页。
② 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71 页。
③ 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71 页。
④ 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71 页。

续表

书院名称	地址	创建、重修时间	建制过程	元代记文及资料出处
锦江书院	衡州路安仁县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创建,四年后扩建	元代安仁县倪氏创建,前身为倪氏家塾	王构《锦江书院记》(《全元文》)①
东山书院	茶陵县	南宋创建	原为宋进士陈古迂读书处。宋、元二朝相继办学	《中国书院辞典》②
桂山书院	茶陵县	元代创建	不详	《中国书院辞典》③
紫微书院	茶陵县	元代创建	元代进士陈谊高读书处	《中国书院辞典》④
杜陵书院	耒阳县北二里杜陵墓侧	唐大历五年(770)创建	为纪念杜甫而建,后改为杜陵祠	《衡州府志》;《中国书院辞典》⑤
芹东书院	常宁县儒学之左	南宋创建。明万历四年(1576)修复	原为宋龚梦锡、王习隐讲学处	《衡州府志》;《中国书院辞典》⑥
清溪书院	安仁县东南三里之西清溪	宋嘉定年间始建,元至正二年(1342)重修	嘉定年间知县王槐在周必大读书处建书院。元至正二年县尹王雪岩重修	陈元明《清溪书院记》(《全元文》);《衡州府志》

① 衡州路安仁县锦江书院,嘉靖《衡州府志》、光绪《湖南通志》《中国书院辞典》均无记载。《全元文》(第13册)收录王构《锦江书院记》,文后注明出自清同治十一年《安仁县志》卷30,第141—142页。

② 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68页。

③ 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68页。

④ 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68页。

⑤ 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72页。

⑥ 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72页。

续表

书院名称	地址	创建、重修时间	建制过程	元代记文及资料出处
玉峰书院	安仁县东玉峰山下	始建于南宋	宋宰相周必大曾游息和读书于此	《衡州府志》；《中国书院辞典》 ^①
台山书院	酃县西二十里	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创建	宋酃县人尹沂创建。宋、元、明、清四朝办学不断	光绪《湖南通志》（二） ^② ；《中国书院辞典》 ^③

通过表 2 可知，元代衡州路共 17 所书院，元人学记文现存 6 篇。与衡州路的官学相比，书院的分布显然更多更广，对地方教育的贡献更普遍，甚至逐渐演变为官学的另一种形式。正如邓洪波先生所说：“书院是中国士人为了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整合传统的官学、私学以及佛道宗教教育制度的长处之后，创造并日渐完善的一种全新的学校制度，它既与官学、私学相联系，又独立于官学和私学。”^④

据《中国书院史》第四章“元代书院统计表”所述，湖南在元代的书院总数共 31 所，其中新建 22 所，兴复为 9 所。^⑤ 又据该书中“元代书院分省统计表”可知，元代书院总数排名第一为江西 91 所，次为浙江 58 所，再次为安徽 32 所，第四是湖南共 31 所。而湖南与安徽的书院总数基本持平。^⑥ 遗憾的是，包括湖南书院在内的各地书院，邓洪波先生并未列出具体的名目。又据季啸风先生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中国书院名录》中所录湖南地区的书院，并结合元代学记文中所录而被其他文献所遗漏的书

① 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77 页。
② 《湖南通志》（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27 页。
③ 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68 页。
④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8 页。
⑤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02 页。
⑥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03 页。

院，经反复梳理后，可知：元代创建、重建与宋建元存的书院共 61 所（或有遗漏亦所难免），其中元代创建（含重建）的书院 29 所。这样看来，元代实际上湖南书院总数的排名应居全国第二，而非邓先生所说的排名第四。又如表 2 所列举，元代衡州路书院（含宋建元存的书院）共 17 所，其数量已超过元代湖南书院总数的 $1/4$ ，而创建于元代的就有 4 所，则占元代湖南新建书院总数的 $1/7$ 。从这两个占比看，元代衡州路书院的建设不可谓不发达！故可作为元代湖南学校建设的重点对象加以个案考察。

本文将依据记录元代衡州路学校建设的学记文，考述其所反映的官员的教育政绩对衡州路学校建设的重要贡献，并论析其所形成的政学相通的局面。

二、元代湖南学记文创作与官员教育政绩关系的考察

元代湖南的学校建设，包括官学、书院、学田的建设，多来自官员的积极倡导、推动和捐助，从而形成了政学相通的局面，并促成了学记文的创作和传播。学记文大力推崇儒道，秉持化育人才的理念，注重思想启迪，讲究学派传承，风格刚健昂扬，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气。

（一）政学相通——从学记文看地方官对湖南官学的建设和贡献

元代的官学是理学，整个国家高度推崇儒学，使之成为学校教育最重要的内容。虞集《考亭书院重修朱文公祠堂记》云：“国家提封之广，前代所无。而自京师通都大府，至于海表穷乡下邑，莫不建学立师。授圣贤之书，以教乎其人。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之。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书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① 因此，凡重视个人政绩的地方官，往往首重治下学校的建设和教育的水平。从现存湖南学记文的内容来看，地方官教育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学校的建设，他们号召与联合各方力量，使地方教育呈现出发达兴盛的局面，并造就了一批科举

^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26 册），凤凰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24—525 页。

人才和文学之士。如李祁的《茶陵州修学记》，^①就是一篇如实记载政学相通事迹的重要文章，对于主政者吴思义的教育政绩的记述详略得当。录如下：

学校视科目为盛衰。科目兴士，多由学校，故所以崇祀吾夫子，无不其至。科目且废，学徒春秋朔望，鲜有至焉。而为政者，又从而轻之，其视夫子庭宇之圯，祀事之阙，漫不加省。虽道之污隆，未必在是，而人心世道，深可感矣。茶陵学湖湘为盛……至元丁丑冬，郡守吴侯莅事，明日祇谒先圣，阅殿宇栋梁椽桷、盖瓦级砖无完者，慨然任为己责。遂捐俸以表众，命校官饶进曰：“毋侈用，毋妄支官储，勤以待事。”于是僚佐协谋，材备日积。越明年，大司鸠工并役，不更朔而告成……盖侯之用心者学校，以为己事之当然，而非以科目盛衰为作辍也。以为事当经久，而非可以因陋就简，苟且一时也……自三代迄今，几千百载，而人伦之道不废，是果谁之功与？今之人，相聚而居，相侣而食，以安夫日用之常，而不知夫子之道实维持之……况夫子之道，不可一日无，则所以崇祀吾夫子者，不可一日废。此侯之用心，其去流俗甚远。^②

顺帝后至元三年（1337），吴思义上任茶陵州次日，即发现学庙殿宇栋梁破败的情况，于是以重建学校为己任，首捐俸禄作为表率，并利用公事闲暇之际，亲自率领僚佐重建茶陵州学，可谓深晓政学相通之道。第二年州学修成，修葺精良，大大推动了当地教育的进步。李祁指出“科目兴士，多由学校”，学校教育对于培养士人非常重要。所谓“科目盛衰”“科目且废”，指后至元元年（1335）间国家废科举之事，^③但吴思义重修茶陵州学却并非功利之举，而是不愿“因陋就简”“苟且一时”。因此，他首“捐俸以表众”，且“为政宽简”，故深得士心民心。作者李祁是茶陵名士，他对于吴思义的兴学之举，表达了高度的赞誉之情，并指出：千百年来，

① 李祁（1299—？），字一初，号希蘧，又号危行翁。湖南茶陵人。元统元年（1333）左榜进士第二，官至江浙儒学副提举。著有《云阳集》十卷。

②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5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04—505页。

③ 《元史·顺帝本纪一》：“（至元元年）十一月庚辰，敕以所在儒学贡士庄田租给宿卫衣粮。诏罢科举。”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29页。

人伦之道始终不废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夫子之道”即儒道的“维持”。当科举在顺帝时期再一次遭受废止时，吴思义却能高瞻远瞩，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弘扬儒道为己任，重建茶陵州学，故能流芳后世。

常宁州同知元光祖在其执政期间，也把主持重修州学当成一件大政，从而赢得了当地士人的感佩与颂扬。李琳《重修州学记》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至始初元冬，武陵元侯貳牧常宁州。明年政成，乃计储程工，捐俸率倡绅佩，载新棣星门、戟门、两庑、先圣塑像暨侑坐十哲并诸贤从祠。泰定元年夏，功毕备……余慨然曰：学校为教，圣朝于州郡牧守资之以承流宣化，古循良可书者，莫先于此。侯之为政，经患益多，掾（同“救”）患益力，悉愿效分寸。郡民富者，咸相其志，相率捐金，攻石砌址……不啻壮于旧而已。至若严律己，协同寅，抑豪杰，均赋役……以发义廩而使之活。信有道矣。是邦之士，必有观感作兴，如进士龚盖卿紫阳绅佩之清风者乎？侯名光祖，字起崇，号南山。自河南而家于鼎之桃源，登延祐庚申甲科。授承事郎，同知常宁州事。^①

据该文可知，元光祖，字起崇，号南山，进士出身，以孝行著称。本次是元氏第二次主政常宁州，第二年取得一定政绩后，即考虑重修常宁州学的工程，首捐俸禄牵头修学，并倡导当地绅士集资捐赠，泰定元年（1324）修成新学。此文可注意者有四点：一、作者认为，郡守的责任在于承续道统、施布教化，故古代良史作人物传记首选教育政绩卓著者。二、元光祖以身作则，倾心尽力，感化富绅，“相率捐金”，重修州学。三、元光祖施政有道，政学相通，以重视学校建设造就一方清明的政治。他为官清廉，严于律己，协助同僚，抑制豪强，体恤百姓，平均赋役，开仓济民，使百姓能安居乐业。四、郡守兴学之义举，对于促成地方名士“观感作兴”之文学创作风气有一定影响。

上述两篇学记文，其所写地方官有三个共同点：一、主政者皆深知政

^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355页。

学相通之道，而学校教育与地方风气有着重要的关系，因此建设学校的目的是发展教育并净化社会风气。二、主政者倡导重建学校，皆能身先士卒，首捐俸禄，从而顺利带动其他僚属与当地士绅集资捐赠。三、主政者为政皆宽简仁爱，以扶持人伦之道、培植人才、教化百姓为己任。

（二）邹鲁之邦的兴起——从学记文看地方官对衡州路三所书院的建设和贡献

地方官不仅重视地方官学的建设，对地方书院的建设也颇为用心，他们主持兴建或重修书院，拨放专款，指定专人，为书院的兴盛局面，奉献了决定性的力量。兹以城南书院、南岳书院和清溪书院的重修之事为例，考察地方官对书院的建设和贡献。

陈谊高《城南书院记》一文，^①详述了城南书院的重建始末及其意义。他认为，书院的兴起始因“世远道微”“学者一意为进取之文”，即只知醉心功名，故先儒志欲改良学风，才有书院的兴起，其初衷在于使学者知行合一。元朝开疆拓土以来，“崇儒兴学，育才待用”，设立科目，选拔明修之士，以求合乎古道。所谓：“褒然充贡者，非必尽出于学校之一途，实乡党师友之效，是可以观文运世道之盛矣。”即人才的培养不必来源于官学之一途，因为地方书院的兴办，不仅可以培育更多的学人，为官学减轻压力，使学子们有更多探讨学问的空间，亦足以观当世“文运”的兴盛。城南书院的始建者何东厓，是衡州官学的一位生员，临终前留书命其孙何寿孙，把自家在雁峰山下的房屋改成书院，作为乡党学人们切磋学问的地方，令取韩愈诗意，题为城南书院，并捐献个人田产十顷作为学田。后来，何氏向朝廷请命赐额而未得到批复，导致所捐田产亦需缴纳赋税，书院因无学田作为后盾而被废弃十七年。至正八年（1348）春，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司廉访副使普□实理公^②与佥事周襄，一度欲重建城南书院而未

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313页。

②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原文中缺一字，用“□”代替。

果。是年冬，回纥人宪佖通议主管衡州路工作，^①亲往废弃的城南书院勉励何东厓的后人，书院才得以重建。由此可知，城南书院始建于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佖通议在重建书院前的讲话颇有深意，从中可知地方官乃是推动兴建和修复书院的决定性力量，并可知元顺帝时期衡州路书院兴盛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动向。录如下：

公至衡诣院勉励，慨然曰：“今缁黄之流满天下，^②而吾夫子则自郡县昼院亦无几焉，岂道之不振欤？抑有司不能表倡欤？城南精舍今幸有所久矣，而草创数椽，欹倾将压，寒筵尘豆之不歸（同“饰”），良可叹也。虽部使留意及焉，卒不克成者，岂时之未至欤？”时郡通守卜颜不花初任，适长官缺员，专领郡事，拳拳学校，值四方多垒，军饷日不暇给。公顾谓郡推吏侯秉彝曰：“刑罚既清，汝其董役焉。”于是泮之未完者，如礼殿、讲堂、两廡、棂星、应门、仓库、庖湢之室，罔不备具。复諏地于院后最高处，获吉壤焉。雁峰倚屏，湘江澄练，前望南岳，诸山献秀于前，峙屹天表，苍松翠竹隐映其间。玄孙等感公之谊，请以其地砌为崇台，以象杏坛之规……钦承明诏以宣化兴学为己任，不旬而僦功。修藏游息于是者，如沐时雨菁莪，沛然生意，而弦歌之攀，蔼然邹鲁之邦。则公化民成俗，俾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其过化存神之妙，置小补哉！^③

从佖通议的训话可知，城南书院重修前后的情况如下：一、元顺帝之前，僧侣道士遍布天下，相形之下，儒道不振。二、地方官没有做到及时表彰已建的书院和倡导修复书院，应负有一定责任。三、时运不济。书院没有及时得到重修，与地方主政者政务繁忙，财政紧张有关。四、顺帝至正更化时期，重开科举，推崇儒学，重用贤才，刑罚清明，故得以形成兴办书院之风。五、顺帝下诏，“宣化兴学”，地方官应负起首要责任，以修建各类学校作为重要的政务，重振儒学，教化百姓，净化社会风气，使所

① 据欧阳玄《高昌佖氏家传》可知，佖姓，伟兀人，亦元时回纥人，以所居之地佖犂杰河为姓。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4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90页。

② 缁黄，《全元文》所录陈谊高《城南书院记》，“缁”为“缁”，实应为“缁”，指僧人所穿黑衣。缁黄，即僧侣道士之流。

③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313页。

在之地，人人皆有士君子操行。六、书院的选址非常重要，应可居高眺远，使人在广阔天地间体会到自然至理，而要戒除使之成为耳目娱乐的处所。七、衡州路书院众多，前有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后有雁峰山脚下的城南书院，最终“化民成俗”，君子之风盛行，俨然成为又一个“邹鲁之邦”。这是书院对于地方文化和向学风气的重要贡献，其中官员的兴学之举实功不可没。城南书院历尽劫难，六百多年后，今在其遗址上重建的书院位于衡阳市雁峰公园之内。

再来了解清溪书院的历史。据陈元明《重修清溪书院记》，清溪书院位于安仁县风景名胜清溪，“熊峡蹲其前，凤冈翼其左”，原为宋孝宗时名相周必大读书的学校。到了顺帝年间，岁久院坏，书院的重修已势在必行。陈元明记述了清溪书院的重修过程：

至正壬午，雪岩王侯下车，首谒书院，叹其倾圯，即命修葺，不日落成讲堂。捐己俸易庙地以益之，而两庑始宽。复与廩给一十八石，命教官吴本诚学诗礼益生徒，俾礼义成化，人人有士君子之归。侯之作邑，可谓知本矣。书院旧以南桥蔽其前，侯撤之而置浮梁于下流。于是诸峰涌翠踊碧，而山水之秀，毕见于前矣。后之贤邑宰相继而谋之，则书院之不朽，殆与凤冈、熊峡相为久长矣。^①

据此可知：一、清溪书院的重修，实为安仁县长官王雪岩一手促成。至正二年（1342），王雪岩到任即首谒清溪书院，观其倾颓景象，即命人重修，很快建成讲堂。王雪岩又捐献了个人俸禄换取附近的庙地，从而增广了书院，并拨给十八石学粮，命教官吴本城学好诗礼扩招生员，传授礼义，教化民俗，使人人皆有君子之风。这是王氏主持重修书院的根本目的。二、书院附近的景观非常重要，需眼界开阔，汲取山水灵秀之气。因此，王雪岩撤去了清溪书院前方旧有的南桥，而在下游构架了浮桥，书院因此视野辽远，峰峦涌翠，清溪漾碧，尽收眼前。书院如此布局，方可期为不朽。

^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199页。

最后，可通过燮理浦化《重修南岳书院记》，考知南岳书院在至正三年到四年间的重修历程。南岳书院初为唐代李泌的读书之所，位于南岳之左，宋理宗宝庆年间，张嗣可将其迁于南岳集贤峰下，始具书院规模。随后，“胡立定公父子讲明《春秋》于此，宦游于此。既而晦庵（朱熹）、南轩（张栻）相与讲道唱酬其间，湖南道学于斯为盛。国家龙兴之初，太祖皇帝金戈铁马，削平西北；世祖皇帝风飞雷厉，混一海宇。天下龙蟠凤逸之士兴起，倡明道学，于是前代四大书院聿然重兴。诸先儒过化之区，复赐旧额。斯文之盛，未有过于此时者也。”^①由此可知，南岳书院实为四大书院之外另一重镇，自宋理宗至元世祖时期，这里都是孕育和发扬湖南道学的中心所在。至大元年（1308），翰林学士杨宗饰任南岳书院山长，曾“易敝更新”使“百废俱举”。至顺元年（1330），衡山县尹石抹允再度修创南岳书院。这之后十余年，继任的山长多不负责任，致使南岳书院“上下两旁，风雨侵袭，栋挠屋坏，视如传舍。田夺于豪强，而师生无以自给，弦诵之声几至废绝。”直到顺帝至正三年（1343），南岳书院才得到全面的修缮和扩建。录如下：

至正三年秋，今翰林承直欧阳公从子述兴教之初，奠先圣先师，顾瞻殿堂门庑、斋舍庖库亦皆倾圯，惕然于怀，曰：“学校之废，责诚在我。”值岁荒，廩稍不给，白之郡县，俞允其请。乃捐俸为多士倡，新明伦之堂，甚盛举也。朝廷作新风宪，命勋旧重臣分镇诸道。湖南肃政廉访使帖木儿不花公仗节来振风纪，首以学校之教作养人材、移风易俗，郡县学院无不修举，委宪史译史王必、石温日赞襄之，又以承直兴学之言，语之山长。明年，宪副刘昱行部至邑，山长以其事闻。时湖南道宣慰司同知元帅赤剌马丹、照磨欧阳逊、天临路知府事颜普、知事杨文质亦以代祀岳庙，因造书院。宪副公相与督勤，下其事于县。县尉马聪、典史谢斗祥承命而往，县尹赵忠力疾复起，民欢趋之。前衡州路经历埜石帖木儿、岳市巡检朱文显以相山长，度材鸠工，不踰月，而燕居之堂、先贤之祠成。未几，尹复谢事。县丞黑沙督饷海运未还，改命主簿李伯渊董役，府委其吏曾果

^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继促成之……不三月而焕然一新。衡云增高，湘水飞立，山川为之改观矣。是役也，非山长以学校为己任，不能以成其事；非宪府以勉励为己任，不能以化其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①

由此可知，至正三年（1343），欧阳述亲临南岳书院，痛感于书院的颓败境况，即首捐俸禄，倡导众儒士捐款，才揭开了重修盛事的序幕。其后，湖南肃政廉访使帖木儿不花亲临湖南视察工作，振拔风纪，把学校建设当作首要任务，认为学校教育负有“作养人材，移风易俗”的重要责任，于是各郡县学院均得到重建，堪称一大盛举。至正四年，廉访副使刘昱至衡山县，南岳书院山长拜谒刘昱并告知重修之事。刘昱即与湖南道宣慰司同知元帅赤刺马丹、照磨欧阳逊、天临路知府事颜普、知事杨文质共同督促和勉励山长，将任务下达到南岳书院所在衡山县，重修南岳书院之事被提上日程。随后，县尉马聪、典史谢斗祥承命亲往督工，县尹赵忠大力协助。前衡州路经历埜石帖木儿、岳市巡检朱文显亦亲自探望山长，度量材料，召集工人，不超过一个月，休息室、先贤祠已建成。其后，衡山县主簿李伯渊、县吏曾果又继续敦促重修工程，于是，书院内部所有建筑，在三月之内焕然一新。重修后的南岳书院，“衡云增高，湘水飞立，山川为之改观”，极为壮观。變理浦化就此事总结道：一、重修书院，若非山长以之为己任，全心奉献，难成其事；二、重修工程，若非廉访使和副使以勉励和督促为己任，就不能上行下效，感化执行之人。综观至正三年至四年间南岳书院重修之事，山长的努力以外，众多上下级官员的大力督导和协助，其前赴后继不断提供支援，才是南岳书院得以新生的重要力量。

（三）收复学田和泮池——从学记文看地方官对维持学校日常运作的贡献

“学田指所有权属于儒学，其收入归儒学开支的田地。元代儒学、书

^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154页。

院、义塾都有学田，它是儒学的收入来源，也是儒学运行的物资保障。”^①无论官学还是书院，祭祀先贤和培育生员，都要依靠学田的收入得以维持。然而，一些地方豪强或僧人，不仅不赞助学校的建设，反而侵占了学校师生赖以生存的学田，这就使得官学和书院的日常运作难以继续下去。于是，地方官借助职权帮助学校收复学田，就成为当地士人歌颂并记述的大事。此外，位于学宫前的泮池，对于增补学校的收入也有一定补益作用。就当时文献看，泮池也存在被侵占的情况。兹以二文为例，考述地方官对于维持学校日常运作的重要贡献。

1. 石鼓书院学田的收复

傅若金《衡府判于公复学田序》，^②记述了石鼓书院在茶陵州的四百亩学田（另外还有二百亩学田被划分给了茶陵州学）被灵岩寺僧四次侵夺，又四次收复的史实。最后一次的收复，虽因山长程义孚的告官而起，但完全依靠衡州总管府判官于公的不畏强权、秉公办案，最终才得以回归石鼓书院。据该文可知，石鼓书院在茶陵州的学田，经三复三失后，因为寺僧贿赂了官员，最终连田契都被僧人买去销毁。直到后至元三年（1337），程义孚任石鼓书院山长，适逢监察御史等会同来衡，程向御史讲明学田被侵夺之事，这才开始了最后一次艰难的收复战。案子被移交给湖南两府即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肃政廉访司。但监察御史离去后，灵岩寺主僧泰又贿赂藩府的文法吏，其人即发檄文给衡州总管府判官于公，令其详究是非，实为缓兵之计。僧泰又欲继续贿赂于公，于公拒之，并亲自到灵岩寺调查案情并上报泰的罪行。文法吏因受贿赂，而驳回公文。于公并不妥协，派人到寺庙抓捕泰送往茶陵州法办，州官不仅不受理反而支使他逃走。于公即再赴茶陵州，亲自审讯泰，泰只得伏法。最终，于公为石鼓书院收复了学田，使士气大振，赢得士人纷纷作诗赞颂于公，所谓“衡之士德公者，各为诗歌以道其实”，作者则应邀为之作序。文章的最后，傅若金总结道，书院的学田具有重要的财政功用，既是祭祀先圣的来源，也是国家培育人

① 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9页。

②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9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276页。

才的重要资本。但于公之前的官员皆收受僧人贿赂，不顾是非曲直。总之，于公治理衡州时收复学田之事，不仅表明了政学相通之理，也反映了因官员致力于教育事业而引发的文学创作动力和热情，相关诗歌虽已难考，幸有学记文可证当时创作之盛况。至于“于公”为何人，查《衡州府志》卷一《郡邑职官》，“衡州府”下于姓官员只有：“于守忠，至元五年，任承直郎。”^①若此“至元”指顺帝“后至元”纪年，则于公即于守忠也。

2. 衡阳县学泮池的收复

泮池，即古代学校前的水池，属于学田的一种。孟繁清先生认为“元代学田种类很多”，有各种田地，也包括“芦荡、菱荡、水池、鱼场、渡口等”^②。只是，“山地、荡田、水塘等地不种粮食作物，而另有其他经济收益，故多收取货币地租。”^③然而，“有元一代寺院侵夺学田的现象很严重。”“寺院不仅在政治上很有地位，在经济上也很有力量”。^④刘简的《衡阳县学记》，^⑤就记述了衡阳县学前的泮池被当地豪民侵占并获取不法收入的事件，后经过湖南肃政廉访司两任佾事的干预，才得以收复。衡阳县学位于城内重门的西边，学校前有水池名为“西湖”，宋景定年间知府王宗丞建置，长广一顷有余。然而，教官一度“规利忘义”，任由豪民养殖并收租，致使水边围满竹篱和土墙，纵横曲折，形若棋盘，很不美观。至正七年（1347），教官何纳到任后，欲开复衡阳县学前泮池，时值湖南道肃政廉访司佾事周襄莅临，即命衡州路总管府推官史秉彝撤除衡阳县学泮池周围的建筑，没收其租赁收入，用于学舍的建设。至正十年（1350），当地豪民因贪图利益，被人游说而再度侵占了泮池。职校蒋希畊奋然欲再

① 嘉靖《衡州府志》影印本，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版。

② 孟繁清：《元代的学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6期，第52页。

③ 王立平：《元代地方官学的建筑规模及学田》，《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第55页。

④ 孟繁清：《元代的学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6期，第54页。

⑤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8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307页。

次收复，肃政廉访司佥事甄允中片言断案，事情乃得以平息。甄允中曾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御史，巡行经过衡州路时，曾发文给湖南宪司，帮助石鼓书院收复过被伊山寺所侵占的学田，并被刻石记功。蒋希畊恐后人不知周襄和甄允中两任佥宪收复泮池的盛举与苦心，便嘱咐刘简写下了这篇记文。

三、砥砺后学，不言之教——从学记文看元代湖南官员刻碑修祠的激励教育

元代御史台掌管“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①其下属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所统领的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司官员在巡查湖南各地时，不仅在主持官学和书院的建设上，领导有方，而且在刻学碑和修学祠两方面，对于督促地方政府振拔一方学风和士气也颇有助力。相关学记文中所述刻碑与修祠的激励教育，总结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砥砺风节，振拔学风

后至元三年（1337）冬，湖南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姚绂（字子微）巡行到衡州路，^②对于名教废弛未备之事“悉加振举”，并指定衡州路总管杨倬作《衡州路进士题名记》。^③文中云衡州旧有进士题名碑，因岁久而湮没，而后追述了衡州的进士及第史。衡州自宋朝以来教育水平甚为发达，士人向学之风历来浓厚，宋代由进士登第者61人。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恢复科举以来，至顺帝后至元元年（1335），共开8科，衡阳有5人及第。人数虽少，却因元朝一度废除科举和每科所录进士较少所致。关于姚绂督刻进士题名碑之事如下：

① 宋濂等：《元史·百官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77页。

② 杨倬《衡州路进士题名记》中的“湖南金宪陝郡姚公子微”，即后文所引杨宗瑞《衡山县进士题名记》中的“部使者陝郡姚绂于微”。综合二文看，当时湖南肃政廉访司佥事姚绂，字子微，由于“于”“子”字形极为相似，故杨宗瑞文中的“于”为讹字。关于姚绂生平详细的考证，参见吴建国，汤军：《元人姚绂生平事迹考略——兼论元代肃政廉访司及地方教育》，《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98—103页。

③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2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页。

今之进士选者，必题其名辟雍，郡县学校亦然，盖所以宠异彰显之也。至元丁丑冬，湖南金宪陕郡姚公子徵按部至衡道，谒宣圣，入学引试诸生，勉励切至。凡有关于名教废弛而未备者，悉加振举。以进士阙于题名，乃命教授赵君应诜、学正卜霖特具石刻，昭示后来，砺风节以作士气，真可谓知所本矣。俾余记之。窃惟学校人材乃风化之所系，安敢缓！继此以往，教养作新之不已，日加月益，将见文风大振。长材硕德之士，济济跼跼，接踵并进而不绝，此其权舆。重望后之有志于学者益加焉。^①

由此可知，元朝恢复科举以来，地方上凡考中进士者，必题名于当地的学校，旨在“宠异彰显”读书有成之人。姚绂来衡后，首先拜谒学庙先圣，继而至学校考试诸生员并加以勉励。因发现衡州路学校缺失历来进士题名碑，故命总管府儒学教授赵应诜、学正卜霖备办石刻，^② 以便昭示后进，砥砺士人的风骨气节，振作一方学风和士气，使士人有本可依。杨倬承命以后，认为进士题名碑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学校所培育的人才紧密牵系着一方的风俗教化，故勒石为碑，铭记历代进士之事不能再拖延。二、碑成后，学风士气都将为之一新，更为精进，同时在文章创作上也将“文风大振”。三、进士题名碑也将激励有特殊才能和道德杰出的人士，接踵并至，后继不绝，因此，这是一个激励地方学风的良好开端。

（二）不言之教，勉励之要

后至元三年（1337），湖南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姚绂在巡行衡州路路学之前，曾先访衡山县，并命县官汪哥勒石为进士题名碑，杨宗瑞《衡山县进士题名记》可证。录如下：

五岳在宇内，衡为最远。在赵宋时，赵忠肃以《春秋》登第，为宋名臣。其子忠清，继登右揆……南北既一，天运更新。与计偕者，恒不乏

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2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页。

② 参见《元史·百官七》：“诸路总管府，至元初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儒学教授一员，秩九品。诸路各设一员，及学正一员、学录一员。”故可知，杨文中儒学教授赵应诜、学正卜霖，为衡州路总管府学官。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16页。

人。其光岳之英华发于文而得之赋秉欤？抑自唐以来，若李若韦，励志读书，遗风未泯欤？抑亦胡氏昆季米张师友，^①讲明洙泗濂洛之学于此地，定生人之大纪，发经籍之微绪，有以致之欤？不然，文质彬彬辈出，皆自衡山，而他亦无闻焉……至元丁丑春，部使者陕郡姚绂于徵戾止邑庠，询访咨嗟，将勒坚珉，以示激劝。命邑长汪哥进义，以其事来属宗瑞书之……用是不敢固辞。大书姓名以垂不朽，俾后之学者踵前修，孜孜不怠，笃学力行，登名大府。继兹以往，当不一书。是谓不言之教，勉励之要也。率先于此，将天下是励，岂惟一邑而已哉。^②

由该文可知，衡山县在宋代所出进士，有一代名臣赵忠肃，其子赵忠清后亦荣登右丞相。元朝统一南北后，衡山县也不乏人才。作者认为，这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一、南岳人杰地灵，英华之气化为此地士人的禀赋。二、自唐代以来，衡山县先贤励志读书，遗风犹在。三、自南宋以来，胡安国、胡宏父子，张栻等学者，在衡山传授“洙泗濂洛之学”，议定人生大道准则，阐发经籍微言大义，对衡山一脉学者和湖湘学派影响深远。姚绂巡查衡山县学后，即欲督刻进士题名碑，从而激劝后学。杨宗瑞总结此次勒石为碑的意义在于：一、前贤名垂不朽，可激励后学继承前修之业，笃学力行，登名史册。二、进士题名碑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它是勉励后学的“不言之教”，意在言外。三、顺帝后至元三年，衡山县进士题名碑在湖南率先揭开风气，具有激励天下学子的重要意义，并不只是局限于此一地而已。

（三）崇儒重道，修己自警

元代湖南官员所督刻的石碑，不仅有进士题名碑，也有一方儒籍碑，从而成为系列碑刻所形成的激励教育中的一部分。元统二年（1334），常

① 杨宗瑞《衡山县进士题名记》所称“胡氏昆季”，指宋代理学家胡安国、胡宏父子。胡宏（1102—1161），号五峰，师承二程弟子，又传其父学，隐居衡山授学二十多年，是湖湘学派的开创者。“米张”之“张”指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号南轩，曾往衡山拜胡宏为师，后讲学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是湖湘学派的一代学宗。“米”氏则难以考证具体指何人。

②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2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页。

宁州知州黄常在其《常宁州州学儒籍记》中，对其事始末言之较详：

儒者之业，听以讲先圣之道，明人伦之纪，其于治国之体，化民成俗，非小补也……圣元肇兴，世祖皇帝混一区宇，崇儒重道，为致治之本。凡业儒之家，悉蠲其役，中统、至元之治，宪章具在。元统二年三月，德音飞下，所以尊崇学校、进贤待士之礼甚至，仍俾业于儒者，蠲其差役，遵祖训也。州庠旧有儒籍，岁久，编简蠹蚀，莫得而考。于是劾实其故家暨后进之俊秀者，列其姓名，一新其籍，复镌之坚珉，为不朽计。碑成，进多士而告之曰：“诸生蒙圣天子莫大之惠，得自异于编氓，复其身以及其家，所以使之逸其惠以习其业也，其将何以报耶？其必曰颂其诗，读其书，切磋琢磨，明夫修己治人之方，以无负国家作养人才之意，其亦庶乎其可也。”予既哀其姓名而刻诸石，复为之记，俾来游来歌之士，视此得以自警焉。^①

关于重修常宁州儒籍并刻碑之事，黄常的看法有四点：一、儒学儒业，有关治国之体，担负化育民俗的重要责任。因此，儒士居四民之首，儒道甚被推崇。二、元朝自世祖以来，“崇儒重道，为致治之本。”也即以儒学为治国的统治思想，凡儒士之家尽皆蠲免其赋税徭役。三、顺帝元统元年登基以来，“尊崇学校、进贤待士”，对儒生礼遇甚厚，遵从祖训，继续蠲免儒者差役。四、常宁州学旧有的儒籍，因年久而被蠹蚀，已难以考知昔日盛况。因此，重修和增广儒籍，并刻于坚石，可垂范后世。碑成以后，黄常召集常宁州众士人训诫，认为当今儒生承蒙天子莫大恩惠，而有别于平民，正宜复身安家，修习儒业，除了精研诗书外，还必须掌握修己治人的道理，方能不辜负国家培育人才的本意。因此，黄常作此记文，意在使后人明此而“自警”奋进。

（四）表扬先儒，以风后学

元代湖南官员对地方学子的激励教育，既有刻石碑之举，也有修学祠

^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9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14页。

的工程，后者更为耗时费力。学祠纪念和祭祀的是当地的儒学先贤，旨在激励后之学子，继承先贤德业，发扬儒道，正心明德，使当地学子世代皆有先贤榜样，从而进一步发扬儒学事业。常宁州判官何元同《二贤祠记》，^①详细记载了他为常宁当地先贤龚盖卿（字梦锡）和王居仁二位先生搜寻著述和建立学祠的全过程。延祐七年（1320）冬，何元同将往常宁州任职时，湖南大儒欧阳玄与其谈心，告之昔日朱熹有位门生龚盖卿是常宁人，但因地方上缺失了学祠，今已无闻，并嘱咐他：“抑表扬儒先，以风后学，为士者责也，将责之他人乎？”即地方官员的重要责任之一即表彰先贤和激励后学，对此不能推卸责任。因此，何元同上任的次日，就在当地进士题名碑上找到了龚、王二人之名。下属又告之，王居仁为张栻的门徒。何元同不禁叹道：“夫潇湘洙泗，乐育盛矣！”此后两年，何元同尽力搜集二人著述却“一字弗获”。最终，他寻得了龚盖卿初见朱熹时的书信。英宗至治元年（1321）八月，何元同龙在故贡士徐高龙家又访得常宁州学曾经的《二先生答问》之教材，其中有王居仁手书四贴，深为感慨“绝学之不继”。本年九月始，何元同选定学宫南面的山岗，建屋三间，树立了朱熹和张栻的塑像，并陪祭以龚、王的塑像，又重新编订《常宁二先生渊深录》刊行于世。至治二年（1322）建成该学祠。事后，何元同感慨道：“是邑昔有其人，来者固可期也。诸君子仰局斯堂之上，亦思夫明天理，正人心……是所以觉后知，欲不立不可也。”概言之，即修建该学祠的目的在于：明天理、正人心、觉后知、崇儒者、推无穷。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以反映湖南衡州路学校建设的学记文为个案考察对象，探讨了元代湖南学记文创作与官员教育政绩之间的重要关系。一方面，湖南学记文具有重要的教育文献价值，以此为窗口，可以较详尽地梳理出湖南官员建设学校的地方教育史。正是地方官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大力投入和无私捐助，才造就了政学相通的局面，使湖南在南宋形成了湖湘学派之后，在元代又继续成为新的邹鲁之邦。另一方面，湖南学记文也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其共同特点是推崇儒道，重视湖湘学派的渊源，注重思

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7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8页。

想启迪，哲理性较强，从而形成了一种刚健昂扬的文学风气，有利于振拔湖湘文风和士气。因此，探讨元代湖南学记文与官员教育政绩之间的关系，发掘地方官对于元代湖南教育事业的诸多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复兴当代湖南教育，对于开展各级学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有效合作，亦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明代班军家族的军役承充

——以衡州卫罗氏为个案

张爱萍^{*}

摘 要：衡州卫罗氏在经历数代的繁衍之后，逐渐分户别居，形成同籍而异财的军户家族。在这一家族之中，有的分支已在事实上摆脱世袭军役。面对沉重的军役，罗氏家族逐渐建立制度，订立合约，发展出各房依序轮替军伍、司理屯田的军役承充机制。对于军费分摊，四大替军房采用“均平起派”的方式，替军房内部则采用量力摊派的做法。班军的处境十分艰苦，其所在军家的差役也十分沉重，但由于屯田的存在，军户身份的保持仍是家族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明代；卫所；军户；军役；班军

明代自京师达于郡县，悉置卫所。同时，为加强军事战略要地的防御力量，依托卫所制度，明永乐年间开始抽调卫所旗军定期赴京师或其他重点防区进行轮戍，班军逐渐形成。班军是以卫所军户为主体的旗军离开自己所隶属的卫所，周期性地到指定的、相对固定的地点或地区，从事以军

^{*} 张爱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事戍守为主的活动,它既区别于临时征剿带来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军队调动,也不同于新建、合并、改调卫所而带来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军队调动。^① 彭勇全面考订了班军制度建立的背景、类型、组织管理、发展沿革,并围绕京操班军、边操班军、广西班军为中心,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对明代军事体制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② 在其研究中,彭勇亦对班军的赴班程序、班军的基本生活状况、职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从中可以透视班军制度的实际运作,其研究角度颇具启示。

本文所关注的衡州卫班军,其轮戍地为武冈、广西二处,既有本都司内部的番戍,也有对其他都司的番戍。笔者在衡山县开展田野调查时,于衡山县档案馆获得衡州卫班军罗氏所纂修的族谱一部,族谱中保存了不少与军役承充相关的记载以及为分配军役义务而在家族内部签订的当军合约,这为我们考察班军制度的具体运作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通过研究族谱中收录的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合同文书等材料,笔者发现衡州卫罗氏自远祖罗成投充衡州卫正军后,在卫繁衍生息,逐渐发展为规模较大的军户家族。罗氏以班军为主的军役承充按照房支进行分配,并渐趋制度化、规范化。而轮戍赴班的军役负担以及屯田等基本物质资产的存在,是罗氏得以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家族之关键所在。

一、衡州卫罗氏军役构成及其世系源流

罗氏祖籍江西庐陵秀川,明洪武初年(1368),祖成公因避元明之际的兵燹,由秀川徙衡山黄华站荐子园,是为入衡始祖。^③ 罗成投充衡州卫右所第九缺,成为一名卫所旗军,其后军役主要是十年之内定期轮班戍守

① 参见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② 代表性成果可参见彭勇:《明代班军制度——以京操班军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彭勇:《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彭勇:《明代广西班军制度研究——兼论班军的非军事性移民行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③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旧序·雍正癸丑》,一经堂刊本,1943年版,衡山县档案馆藏。

武冈、广西二处。^① 罗成生二子，长子汝高、次子汝霖，两公派衍五房。汝高公原配刘氏生子四，子贵、子权、子贤、子忠，派衍梅冲、滩头、晓庄、山体四房，继娶武氏，生子一，子欢，派衍嘴头房；汝霖生子一，子福，派衍罗陂房。^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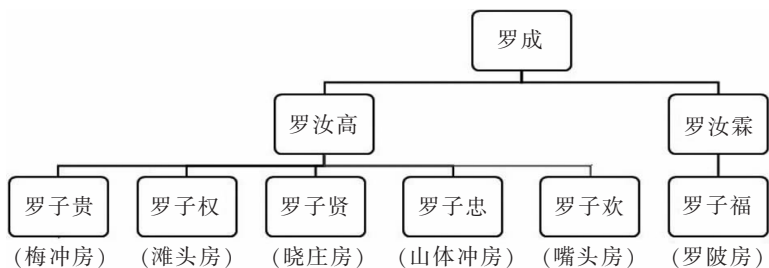


图1 衡州卫罗氏三世世系图

罗成长子罗汝高及其后代继承了罗成衡州卫正军身份。弘治、正统年间，武冈和广西皆因地方苗叛而借调衡州卫兵前往平乱，“武岗（即武冈，下同）戍因正统年间诸苗侵掠而设，柳州戍因弘治年间借兵剿苗而留，是皆始于一时之权宜而后卒沿为例也。”^③ 衡州卫既有本都司内部的番戍，也有对其他都司的番戍。相应地，罗汝高这一支也继承了戍武冈、广西两班军役。

衡州卫旗军戍武冈，缘于正统元年横岭一带峒苗劫绥宁，峒苗又与流民相聚蜂起，明廷派总兵肖绶偕同副总兵吴亮、都指挥郑通等统率官兵前往镇压，起义平定后，设立武冈守备司，抽调长沙、宝庆、衡山三卫旗军备御戍守，三卫戍守官兵共二千二百七十六名。^④ 湖广巡抚郭惟贤在奏疏中称，载入册籍的三卫班军共一千二百四十八名，与方志记载相比，减额了一千零二十名。三卫皆分上、下两班，衡州卫上班班军三百一十名，下

①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晓庄房子贤公子孙析三为六议派替军合约》。

②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军租合约》。

③ 《明经世文编》卷406《郭中丞三台疏草·酌议两省班军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414页。

④ 嘉庆《武冈州志》卷15《兵书》，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

班名数亦如之。^①

明前期，广西地方动乱频繁，借调而来的贵州、湖广等卫所旗军随同备御，驻防当地，后渐成班军定例。备御广西的湖广官军员额一万名，来自湖广都司及行都司所辖卫所，包括荆州卫、荆州左卫、荆州右卫、长沙卫、永定卫、衡州卫、常德卫、九溪卫、澧州守御千户所、德安守御千户所等14卫8所。^②湖广班军轮班周期为一年，新旧班交接者若违限达半年以上，则要受到惩罚，“弘治十六年，湖广备御广西班军俱以一年为期，至广西交代，若违限半年以上者，问罪，仍罚操三个月”^③。湖广班军分为上、下两班，每年十月初一交接，“广西地方先年奏定湖广荆州等一十余卫，官军一万余员，分作两班，一年一拨广西，协守地方，□年以十月初一日交替。”^④本文所关注的衡州卫，其原调额定官军四百员赴桂林府永福县并苏桥堡等地上班。弘治二年对湖广班军的轮戍地点进行了大的调整，衡州卫与长沙卫、岳州卫、夷陵守御千户所官军俱留广西城操，轮流巡哨府江一带地方，不许再分拨重瘴地方。^⑤也就是说，衡州卫罗氏在弘治二年以后上班的地点从永福县、苏桥堡等地转换到了广西首府附近。

衡州卫罗氏的军役构成主要是赴武冈、广西两地上班以及耕种屯田，对于被抽调轮番的班军，下班返回原隶属卫所后，是否还需要服其他的役，罗氏的文书上没有详细记载。不过，通过同样轮戍武冈、广西的益阳高氏遗留下来的合同可以发现，班军除了要定期到指定地区戍守，下班回到卫所后仍要在卫操点，应付各项杂差等，“武冈班军每房十年轮流，以下班回卫操点。……广西班军每房三转十一年轮流，以下班回卫，在官操点月分，下首每月帮饭米二斗，不操月分免帮。……其钱粮并各项杂差，

① 《明经世文编》卷406《郭中丞三台疏草·酌议两省班军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414页。

② 嘉靖《广西通志》卷31《兵防五》，明嘉靖十年刻本。

③ 《大明会典》卷131《兵部十四·镇戍六·广西》，明万历内府刻本。

④ 嘉靖《广西通志》卷31《兵防五》，明嘉靖十年刻本。

⑤ 《大明会典》卷131《兵部十四·镇戍六·湖广》。

俱照四房当管，再不许争论变乱。”^① 郭惟贤亦言：“一户之军差至七八，有兄戍粤西，弟守武岗者；有叔充城操，侄赴远调者；有班满回家，而屯局门哨之差且骈至者。”由于承充两班军伍，在实际操作中，更有班军刚从武冈下班，便被派往广西上班的情形，毫无喘息之机。郭惟贤因此上疏呈请：“届期听领班官管押上班，在武岗下班者不许就派广西，在广西下班者不许便派武岗，必休息一年而后可。”^② 由此可见，班军的军役负担颇为沉重。

随着后代不断繁衍，在卫军户成为规模较大的军户家族，且分门别户，在实际上分化为几个小家庭。^③ 衡州卫罗氏亦然，然而，明初规定，军户不得分户，以避免役军丁额减少、确保军役持续不断。罗氏作为卫所军户，分户显然不被允许。^④ 制度规定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的现象反映出，罗氏在第三、第四代时的分化，形成不同的房支结构，实际上是在家族内部进行的分户析产活动。罗氏子孙虽已析产分居，各个房支在经济上彼此独立，但仍处在同一军户户籍之下，即析产而共户，同籍而异财。当然也不排除有的子孙通过购买民田，纳粮当差，脱离军籍而成为民籍的情况存在。

罗氏衡山双园山田山产业系祖军罗成于洪武年间垦屯而得，在正统八年奉命清丈时，勘明测量丈出民粮二亩一分六厘，又有园土、山林、水塘、屋宇等业，该业先期为二世祖罗汝高交给他的次子罗子权单独管业，以作殉难抚恤之用，罗子权将其更立为罗正松户。正统奉丈之时，罗子权之子罗可冕将户名再次更立为罗成户，纳粮当差。^⑤ 作为抚恤之用的部分屯田已然转化为民粮，履行纳粮当差的义务。除此交与罗子权一支的抚恤

① 湖南益阳《资阳高氏合同》1935年渤海堂木活字本，收入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1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② 《明经世文编》卷406《郭中丞三台疏草·酌议两省班军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414页。

③ 参见顾诚：《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60页。

④ 参见于志嘉：《明代军户家族的户与役：以水澄刘氏为例》，《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第3分2018年，第541—604页。

⑤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上《嘉靖二十八年给屯田受恤与军人罗子健帖》。

田之外，其他诸如衡阳等处的屯田，仍是归四房子孙依照当军合约管理。就罗子权一支而言，可以明确的是他们内部已经有成员拥有了民籍身份。

在分门别户后，罗氏承担军役的人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罗氏发展至第二代，因汝高公继娶武氏所生之子子欢年幼，差务难办，于是将军田转售汝高原配刘氏所生四子，而军役也交归四房承充，子欢房只是略帮盘费。清初裁革卫所后，罗氏无须再承担广西、武冈二班军役，祖遗屯田的租额亦由梅冲、滩头、晓庄、山体四房收管，嘴头房无分。为防日后人心不一，有变更混争的情况出现，五房签订合同，约定嘴头房“与四房军租不得混争，倘后本军差复有，梅冲、滩头、晓庄、山体四房仍照替军老约轮当，嘴头房亦照老约帮费，不得推诿”。^①由此可见，嘴头房实际上已经脱离军役，其军田也已易主，正军职役也由罗氏族内其他支系分摊，嘴头房只是“略帮盘费”，事实上可能已与民户无异。

衡州卫罗氏在经历数代的繁衍之后，发展成为由统合在同一军户名籍之下的众多分支组成的军户家族。而在这一军户家族之中，有的分支共同承担世袭职役，也有分支不再承担世职而与民户无异。

二、按房轮当的军役分配机制

班军制度以卫所制度为依托，而军户制度是卫所制度存在的基础。明代以军户世袭确保兵源的持续不断，保证军役的稳定与延续。罗氏自充衡州卫旗军后，其最主要的军役是定期赴广西、武冈二地轮番上班。随着人丁的繁衍生息，罗氏发展至第三代时分为梅冲、滩头、山体、晓庄、嘴头、罗陂等几大房支。明代班军军役十分沉重，所费甚多，为避免纷争、保证后代子孙继补军役的顺畅，当军房各房支子孙就两班军役轮替的军费筹措达成协议，订立协议。

衡州卫罗氏至第三代时，析居晓庄、山体冲、梅冲、滩头、嘴头、罗陂等地，人丁兴旺。当军房为罗汝高一脉，该脉派发晓庄、山体冲、梅冲、滩头、嘴头五房，五房建立制度，订立替军合约，除去罗子欢嘴头房

^①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军租合约》。

不当军役外，其余四房形成了“四房轮充，十年一换”的军役分配机制。^①

前文业已阐明，正统、弘治时调拨衡州卫戍守武冈、广西的制度已经形成，前往两地轮番上班成为罗氏军役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此时期内，罗氏具体如何分配军役不得而知，但通过康熙二十一年（1682）签订的《四大房替军合约》可知，四大房在万历六年（1578）清丈田亩后，其轮序更替上班的脉络已经非常清晰：

从（万历）十二年（1584），轮滩头房罗日伦，已当十年；至二十一年（1593），轮晓庄房罗大燧，已当十年；至三十一年（1603），轮山体冲房罗潮簪，已当十年；至四十一年（1613），轮梅冲房罗栋，已当十年；至天启三年（1623），轮滩头房罗轅，已当十年，至崇正五年（1632）；轮晓庄房罗大素，已当十年，至崇正壬午年（1642）；轮山体房罗大美，已当十年，至康熙壬寅年（1662）；轮滩头房罗晨贞，已当十年，至康熙壬子年（1672）；轮晓庄房罗一正，已当十年，至壬戌年（1682）。^②

四大房编排轮替年份的基本规则是“逢壬议办军需，逢癸应替军伍”，十年一个周期，周而复始。合约中的滩头房罗日伦当军年份为万历十二年到万历二十一年，万历二十一年交接军役。按照天干纪年的算法，万历十二年为甲申年，与逢癸应替军伍原则不符，但根据当军原则可以知道，滩头房所服役的时长是十年无疑，而万历十一年为癸未年，综上推断，滩头房实际服役的年份是万历十一年至万历二十一年。

罗氏有两班军役，广西班军班期为一年，每年十月初一日交接，武冈班期因未找到史籍记载，尚不明确。罗氏替军合约规定，当军的四大房每十年一轮替，也就是说，在这十年内，无论是赴广西上班还是赴武冈上班，军役都由某房一体承担。因此罗氏《四大房替军合约》中还规定，“其班卫误事，当军人承管，不及众房”“其老军负债，老军自行备还，不与新军相干”。^③ 在轮值的十年中，若在班正军出现老疾、身故或逃亡等特

①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当军合约序》。

②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四大房替军合约》。

③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四大房替军合约》。

殊情况，由当军房另出人丁补役，与其他三房无关。罗氏在“成化间有族子奇翁承役，征进广西病故”，即“以其兄金满翁补伍”。^① 综上可见，罗氏在班正军逢壬年满，逢癸接替，如遇变故，当军房承管，其制简明清晰，渐趋制度化，数百年后仍行之有效。

除了提供赴班军士外，班军赴卫应伍，军装、上下班盘费等基本生活物资也由所在军家承担。按照班军交接年份，罗氏众房“逢壬议办军费，逢癸应替军伍”。各房应该承担的军费主要是两部分：一是盘费，即新军赴卫应伍的盘缠路费；二是使费，即班军上下班的班费。罗氏众房议定盘费为十五两，其中当军房自行备凑盘费使用银一十两，不当军三房各凑出银一两五钱，另外，嘴头房虽然不承担赴班军役，但也要出帮费，“罗潮纪、潮绋、潮景男罗道、罗选系一大分，该出银一两”^②，或是量力帮助，总共加起来凑足十五两的额数。使费则“共有上下两班（班）盘缠额”^③，大略由三部分构成：军田租谷二十五石，折算成银子二两五钱；当军房出银二两，余众帮房凑银五钱，共银二两五钱；嘴头房帮上下班费银一钱五分。^④ 至于在班在卫，有特殊用费的话，五钱以上分派其他三房，五钱以下则由当军房自行出办。由此可见，无论是盘费还是使费，抑或是未来的应急用费，都由当军房承担绝大部分，其他三房只是“量力帮费”“凑备资助”。^⑤

若再往细微处探究，则会注意到，在四大房十年一替、轮充军役的同时，随着各房人丁的繁衍、支系的分化，房支内部的军役承充也形成了更为细致的制度。晓庄房作为罗氏的一大分支，其军役承充的方式极具代表性。

晓庄房一支乃罗子贤公后裔，子贤公生三子，长子可仁、次子可义、晚子可初，轮当晓庄房当军时，军役即按可仁房、可义房、可初房的顺序

①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军田原委议》。

②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四大房替军合约》。

③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晓庄房子贤公子孙析三为六议派替军合约》。

④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四大房替军合约》。

⑤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晓庄房子贤公子孙析三为六议派替军合约》。

轮替。罗氏四大房十年一轮，晓庄房则三十年一轮。实际上，从万历六年（1578）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裁撤衡州卫，晓庄房只轮替了可仁房、可义房子孙各一次，即万历二十一年（1593）至万历三十年（1602）可仁公曾孙大燧替军，崇祯五年（1632）至崇祯十四年（1641）可义公曾孙大素替军。由此可见，这种轮替法只是一种按照惯例的做法，因其轮替时间过长，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军役分配不均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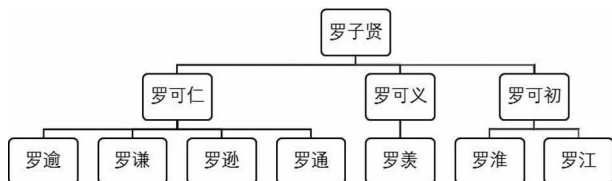


图2 衡州卫罗氏晓庄房世系图

对于军费的分摊，晓庄房则略有不同。罗氏四大房中，当军房在轮值时承担军费的绝大部分，其他三房量力帮费，盘缠额固定不变，并不因房分大小贫富而异。这种“均平起派”的方式虽然看起来公平，但其原则是“不论房分人丁多寡，不计房分家产富贫”，对于人丁稀少、家道不丰的房分而言，是十分沉重甚至不能承受的负担，以致有贫困、人丁微薄的子孙逃役外窜。同时，由于屯田亦由当军房耕种打理，若该当军房人丁稀少，屯田可能面临无力耕作甚至撂荒的境地，进而会导致当军房负担加重。

万历二十一年（1593），罗氏第七代晓庄房大燧替军时，因房分不均，人丁有多寡，家产有富贫，加之须给卫差打点陋规，出费艰难、应伍怠慢的问题愈加凸显。为避免军役搁置、缺伍，晓庄房中长辈罗澜与房弟罗画计议，将“可仁公一分子孙繁庶解作四分，析三为六”。^①自此之后，晓庄房析三为六，而其军费分摊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六分之一内，若有某一房人丁稀少、家业全无，公众则“怜之减之”“自增之捐己而周急之”；另一方面，各分之中，如果也存在贫富不等的情形，则本房中家业富裕者多出力助益，以补助本房的缺口。崇祯五年，晓庄房户长罗澜主持可义公曾孙罗大素等替军事宜，六分派费明细如下：

^①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晓庄房子贤公子孙析三为六议派替军合约》。

计开议派替军盘费，原先额例，初当军房分不派外，今将晓庄五个房分人丁计多寡、量贫富重轻，照数开列于后：

一分罗澜、罗祚，系可仁公第二房曾孙罗谦之后，共派银二两五钱，澜、祚各派银一两二钱五分。

一分罗大箴、绍二、绍三、绍四、曾四等孙，系可仁公三房罗逊曾孙，共派银二两五钱。内大箴人力不足，量派银八钱三分；本房绍二、绍三、绍四叔侄人产颇盛，倍增共银一两六钱六分，包补本房叔大箴之不足。

一分罗大美、历三、大经、大绘、甫一、甫四等，系可仁公第四房罗通曾孙，共派银二两五钱。内大经、大纶、大纬兄弟，该银八钱三分；内大美、历三兄弟，该银八钱三分；甫一、甫四兄弟，该银八钱三分。

一分大绅、大鼎、大缙、辰一叔侄，系可仁公长房罗逾曾孙。今因人少家贫，姑从末减，大绅、大缙派银九钱，辰一派银八钱。

一分罗大学、大魁，系可初公曾孙。此房人产极贫少，姑息存留以俟后昌，量派银八钱。

以上共银一十两，各分照数速备凑附。^①

从上述派费明细可以看出，晓庄房该年为当军房，所以需出备银十一两，然后十一两的任务再派给各分，不仅六房分按人产多少、贫富摊派，而且各房分内也照此标准量力摊派。在这一制度下，人少家贫者相应给予减免，如可仁公长房一支、可初公一支、可仁公三房大箴一支；而人产繁盛者可能倍增，如可仁公三房绍二、绍三、绍四叔侄一支；人产均平者则按惯例均分，如可仁公二房一支、可仁公四房一支。由此不难看出，这一量力摊派的做法较“均平起派”更为合理。同时，以富济贫，使贫寒孤单之辈得到一定喘息发展的机会，增强了家族的凝聚力，促使“家庭和睦、人心固结”，更有利于整个家族的团结和发展。

罗氏家族在逐渐壮大、形成四大替军房以后，订立“替军合约”，形成每房十年、依序轮替军伍的军役分配机制，军费也由四大房共同分摊。

^①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晓庄房子贤公子孙析三为六议派替军合约》。

而在替军房内部，军役承充虽然也按照长房、次房、三房等的顺序依序轮充，但为使军役不坠，以晓庄房为代表的房支发展出一套更为合理的量力摊派的做法。实际上，不管以何种方式轮替军伍、摊派军费，都体现了班军家族面对繁重军役的应对策略。

三、班军家庭的生计状况

衡州卫罗氏班军所戍武冈、广西二地。武冈离衡州较近，虽舟楫可达，但仍免不了风波险阻，而广西更是距离上千里，瘴疠交侵，且地方动乱频繁，条件艰苦。班军在赴班之后，其军役也十分沉重。万历年间，湖广巡抚郭惟贤曾上书朝廷，极言班军军役之苦：“年来行伍消耗，如宝庆卫军五千五百，仅存一千二百，他卫可知已。一户之军，差至七八，有兄戍粤西，弟守武冈者；有叔充城操，侄赴远调者；有班满回家，而屯局门哨之差且骈至者。昔以数户垛一军，今以数军累一户。在垛户丁繁者犹可言也；单户孑身，倏来倏去，岁无宁日，终归于毙耳。”^① 军伍消耗，减额甚多，两地轮戍，一户为军，多人同时应役。另外，班期结束回卫所后还要承担卫所其他的杂差。班军制度“行之既久，内兵有土木营造之劳，外兵有执役官司之苦”，^② 明中后期军士身故、逃亡等情况十分普遍，班军家族因此破产甚至绝户者不在少数。

班军之役本已十分沉重，地方官员还巧立名色，层层剥削，郭惟贤的奏疏反映出班军占役的情况也十分严重：“良以贫军穷伍，终岁不得休息，动辄怨咨。而不肖武弁，巧立名色，替役有折见，上班有卖闲，居则有柴火，行则有輶重。领班指挥，敛之以充守备之常例，而半入私橐”，是以“军之多调，乃官之奇货”。^③ 班军虽居有月粮、行有行粮，但经过军官克扣、折银给发等操作，供应上班所需已是勉强，常常要靠军家资助，甚至

^① 《明经世文编》卷406《郭中丞三台疏草·酌议两省班军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414页。

^②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当军合约序》。

^③ 《明经世文编》卷406《郭中丞三台疏草·酌议两省班军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414—4415页。

完全仰赖军家，更谈不上养活家小。

明制，为保证军粮供应，卫所分军屯种，每军授给一定亩数的屯地。^①屯田所获籽粒以贍军用，一部分听本军支用，一部分供作本卫官军俸粮。正如罗氏族谱所说，军田“佐膏火而壮行色”^②。罗氏入衡始祖成公曾辟垦坐落衡阳县查陂塘的屯田二十五亩，以供军需。前引嘉靖二十八年（1549）给恤军人罗子健田帖中显示，罗氏洪武年间辟垦的屯田还分布在衡山县双园山等地，只不过在正统八年清丈之期将屯粮转换成民粮，纳粮当差。

衡州卫罗氏四大房替军合约规定，当军房前往广西、武冈上班之年，屯田亦随该房管理。在该房人丁兴盛的情况下，屯田打理也更为容易，可以安排其他家庭成员去管理屯田。但若该房人丁单薄，加之赴班之军在班期内可能出现因地方动乱而战死的情况，需要再派当军房其他成员去补伍，屯田则很可能面临无人耕管、抛荒失业，甚至是被人旁占的境地。据嘉靖三十二年（1553）《退给军田执照》记载：成化年间，罗子奇承充军役，征进广西，中途病故，其兄长罗金满补伍轮戍广西，衡阳查陂塘屯田遂无人打理，被民人王友朋、王应容、张谦和卫所舍人常昇等人悉数占种；成化二十三年（1487），常昇又将所占七亩屯田捏作兵乱荒田，卖给王应容，得银一十六两，王应容影射入民粮二斗三升一合。^③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罗金满翁之子罗旸才访察得知二十五亩军田被占的事情，而王有朋、张惟明坚决不承认，罗旸遂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将二人告到官府。

罗旸以势要官豪罩占屯田，坑军虚应，将王友朋、张应容控告至湖南按察司副使处。经官府审讯，王友朋供称：“有衡州卫官民张惟明故祖张谦并故常昇于成化二十三年凭故军颜，宣称作无主荒田，卖与蚁故祖应容为业。”^④衡州卫官民张惟明故祖张谦及舍人常昇等人之所以能够将他人屯

①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6页。

②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晓庄房子贤公子孙析三为六议派替军合约》。

③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军田原委议》。

④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退给军田执照》。

田占种、典卖，主要是因为其身份不是普通的卫所旗军。他们借助身份的便利，将屯田宣称为无主荒地，卖与县民。明中后期，军屯渐趋败坏，屯田丧失颇多，衡州卫罗氏屯田的丧失，既有豪民兼并影射，也有卫官官舍占种、典卖，反映了明代军屯遭到破坏的某些面相。

衡州卫罗氏屯田被占耕一案，经过官府审讯和里老临地踏勘，确定张惟明隐占、典卖的罗氏祖遗屯田，共得实在田三十八亩，全数退还罗氏，并追补缴应上仓籽粒三石，登记入卫册籍。王友朋影射的二斗三升一合民粮则将其性质改正，拨归县征税。罗氏被占屯田，历经六七十年才得以追回。屯田被占耕期间卫所很可能无法掌握屯田的状况及征收籽粒，王友朋等人还将其民粮射入其中，于县而言也无法对其征收税粮，这部分田地自然就隐匿了，反映在册籍上或史籍记载上就成了“失额”。

另外，衡州卫罗氏屯田诉讼一案还值得注意的，就是明中后期军屯破坏、屯田失额引出来的屯田民田化问题。王友朋等人占屯田及影射民粮等种种事情，虽然这些田很可能没有纳入州县民田管理体系当中，但因为耕种者已经不再是卫所军士，这部分的军屯土地的基本性质也已经起了变化。^①

一方面，班军轮戍路途遥远，戍期漫长，耗资巨大，班军家族因此破产者不在少数。罗氏四房轮充，十年一换，“行者疲筋骨以效行役，居者殫钱财以供军需”，^②虽军伍数百年不缺，然而军家早已精疲力竭。另一方面，在罗氏军田被占六七十年之久的事件当中，虽说最初是由于军余补伍而导致屯田无人打理，但一直经过了这么长久的时间，罗氏才去追踪屯田的下落，且按照替军合约十年一轮替的原则，军役已经交接至少六七个回合，屯田司理权限也相应地转交了六七个回合。假若罗氏替军的军费非常倚赖该被占耕部分的产出，不太可能这么长时期内都未察觉到屯田被他人占去的事实，推测衡州卫罗氏屯田实则不止有查陂塘的二十多亩，应该还有垦辟、置买坐落在其他地方的田地，查陂塘的只是所有田产中的小

①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7页。

②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当军合约序》。

部分。

班军的处境虽然艰苦，军户的差役亦很繁重，但由于屯田的存在，军户身份还是有利可图的，屯田成为“先人全归之地，子孙发脉之基”^①。有了土地，家庭生计就能够保障，家族繁衍就有了条件。正如学者指出，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屯田是不能轻易割舍的重要资源，那么，军户身份的保持就是必要的。^②即使到了卫所改制后，屯田依旧是一笔很重要的资源。康熙二十七年，裁撤衡州卫，罗氏四大房十年一轮赴广西、武冈上班的军役已不复存在，但四大房替军合约仍发挥效力，只是裁撤卫所、无须服军役后，最重要的问题是屯田的管理权限。依照替军合约，四大房仍然按照十年一轮的原则，轮流管理屯田，并再次与不当军的晓庄房签订军租合约，申明其无管理屯田之权，不得与四房混争军租。^③无军役负担后，屯田的收入更成为罗氏构建宗族时的重要组成部分。清道光十二年，梅冲房罗昌升等倡议成立子贵公系的贵公祭会，逐年定期祭扫祖先，整合梅冲一房，其祭会会资构成就有轮收之军租。^④

四、结语

明代以役定籍，役皆永充。因有军役，而有军籍。为保障军士来源，而设立军户制度。为确保军户稳定存在，而提供屯田等生活物资，保障其基本生活。反过来，军户因有军田，而要承担军役，提供兵源。罗氏自远祖成公投充正军，徙居衡州，逐渐繁衍壮大，成为几大分支分户别居、同籍异财的军户家族。在这一家族中，晓庄、山体冲、梅冲、滩头等四房共同承担军役，而嘴头房已在事实上摆脱世袭军役。为应对沉重的军役，罗氏家族逐渐建立制度，订立合约，形成各房依序轮替军伍、司理屯田的机制。对于军费分摊，四大替军房采用“均平起派”的方式，替军房内部则采用量力摊派的做法。班军的处境十分艰苦，其所在军家的差役也十分沉

①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上《公祠契约》。

② 王毓铨：《明代军屯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其特点》，《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第54页。

③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乾隆三十八年军租合约》。

④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上《梅冲房子贵公祭会引》。

重，但由于屯田的存在，军户身份的保持仍是家族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面对沉重的军役，军户家族必须团结一心、共同应对，凝聚力必然强大，这也使整个家族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其乐融融、十分和睦。事实上，在各种利益交织下，庞大家族的存在极为难得。在康熙年间裁革卫所后，罗氏家族内部的各种矛盾便浮出水面。罗氏故祖“原遗茔子园内熟土一大所”，康熙五十三年（1714），奉衡山县知县葛亮臣清丈，不料“外房子召”私自将土地“投册成庄，踞为私业”，后经族内讨论，以还是本族人掌握田产权，未致旁落他人之手为由，划定界限，将土地交其管理。^①土地是农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此类族中子弟霸占族田的情形也屡见不鲜。卫所裁革后，罗氏虽不再提供军士，但军田仍按替军老约，由四大房轮流司理。康熙五十二年（1713），轮到晓庄房经理屯田，不料该房支中有人秉持替军合约，仍然按照以前的惯例，需索上班酒席、盘缠、陋规等费，且将军田“任意权握，钳制族口”。^②晓庄房中长辈得知此事，遂清查本族田亩租数，掌握其公器私用的事实。但连年构衅，过程曲折，时隔八年才将屯田退还完公。晓庄房在此次的诉讼中赢得了辛壬二年的军田租税，虽不足以抵偿数年讼狱的盘缠花销，但之所以不惮烦琐地去上诉，就是为了获得军田的管理权及其收益。

①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上《公祠契约》。

② 《衡山罗氏七修族谱》卷15下《军田原委议》。

湘学文献

《湘勇原流记》的版本流传与湘军史实解构

李超平 朱耀斌*

摘 要：湘军源自湘勇，湘勇创办最早得益于朱孙诒任湘乡知县时对创办团练的大力倡导与支持，并得到王鑫、罗泽南、刘蓉、李续宾等人的积极响应。关于肇创湘勇、湘军的始末，最早形诸文献者无疑是彭洋中的《湘勇原流记》。彭洋中（1803—1864）字彦深，又字晓航，系清湘乡县青兰彭氏（今双峰县梓门桥镇），清道光八年（1828）举人。初官邵阳县训导，首条列保甲团练诸法，后随巡抚骆文忠公移督四川，总理通省厘务，官至潼川知府。他与曾国藩、刘蓉、罗泽南、郭嵩焘等湘军要人均为好友，熟知湘勇内部组织架构与起始脉络。他与原湘乡知县朱孙诒亦颇有渊源，朱孙诒调署宝庆知府时，彭洋中官邵阳县训导，且一起在宝庆府合办过团练，工作上有上下级隶属关系，空间上亦多有交集。其所著《湘勇原流记》全文计五千三百余字，成稿于清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亦即湘军李续宾部惨败于安徽三河镇之后、湖南巡抚骆秉章奉调督川之前。迄今一百六十多年来，该文献曾经先后出现过八个版本，是研究晚清湘军史的重要档案。本文以钩稽《湘勇原流记》版本为抓手，深入辨析，试图还原晚清湘军相关史实，廓清前因后果，以期补正湘军史研究的历史盲点。

关键词：湘勇；湘军；朱孙诒；曾国藩；湘勇原流记

* 李超平，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区域文化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朱耀斌，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法学院教授、博士，曾国藩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编号21YJA810010）。

一、版本钩沉

湘勇创立于清咸丰二年（1852）七月，《湘勇原流记》撰成于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从酝酿湘勇到创练湘军已近十年，尤其湘军刚经历了三河之役的巨创，李续宾及所部五千余人，八成死伤。此时，曾国藩刚复出还不到半年。湘军自咸丰四年东征以来，罗泽南、王鑫、李续宾等三位当年肇创湘勇的首要人物已经先后凋谢。从这个角度来说，《湘勇原流记》似带有为朱孙诒表功，同时对湘勇的历程进行总结的用意。

（一）版本次序

因篇幅有限，《湘勇原流记》似未随即作为单行本刊布。已知首个版本出自朱孙诒编《团练事宜》^①内附录的刘倬云所编《节录奏疏》。《团练事宜》初稿于咸丰九年（1859），成书于同治二年（1863），汇集他在湖南的宁乡、湘乡、宝庆三地及广西、四川办理团练的相关文告、规章和条约。而《节录奏疏》编印于同治十二年（1873），主要是节录湖南巡抚骆秉章、毛鸿宾的相关奏稿，并附入《送都转朱石翹先生回江序》《东台山宴游记》《湘勇原流记》，刘倬云为朱孙诒遭受骆秉章贬抑进行伸张的用意十分明显。

《湘勇原流记》文末有继任湘乡知县的黄淳熙的跋文，这是《湘勇原流记》的第一个版本，也是唯一未删除跋文的版本。

同年，刘倬云还应朱孙诒之请编印《宰湘节录》一书，内含刘蓉的《东台山宴游记》、刘典的《送朱石翹都转回江西序》、曾国藩的《诰封太淑人伯母张太淑人八十寿序》、罗泽南的《召伯〈甘棠图〉题奉石翹老夫子大人钧政》和彭洋中的《湘勇原流记》五文，并附录了原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数篇奏稿摘要和周寿昌的一封信。

2013年《湘军丛刊》出版，所辑入的《宰湘节录》底本是刘倬云于

^①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五十五册，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光绪二年重编，补入了自称骆秉章门生的刘锡鸿之序，可视为《湘勇原流记》的第三版。

之后，《湘勇原流记》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被收入盛康所编、思补楼刊行的《皇朝经世文续编》第八十二卷的《兵政八》中。此为《湘勇原流记》第四版。

朱孙诒后裔所藏族谱录有曾国藩、郭嵩焘、彭洋中、刘长佑、刘典等人的赠序和家传，也有刘蓉的《东台山宴游记》、彭洋中的《湘勇原流记》《石翹先生观察大人〈戎马省亲图〉录请钧政》和《张太淑人家传》。

《石翹先生观察大人〈戎马省亲图〉录请钧政》是彭洋中应朱孙诒请题记朱孙诒率湘勇援南昌时顺道探母之事的写意画《戎马省亲图》，《张太淑人家传》则是因咸丰八年朱孙诒母亲去世而作，时值朱孙诒署理宝庆知府。其文有言：

太守令湘乡四年，于利害无所不兴除，湘人屡请留于大吏，犹恐其以他故去也。嗣清江人至，辄相与讯太淑人起居，又设问太淑人所以教子治家甚悉，以相矜效。洋中往来里门，故知其行为详。东安之变，大守方驻军五峰铺，而太淑人讣至，邵人相顾失色，谋走台省留之，已见大守威容不忍发而止。去之日，自邵至湘，民送者数百里不绝也。^①

耐人寻味的是该文由彭洋中“顿首拜撰”、郭嵩焘“顿首拜书”，可见彭洋中、郭嵩焘与朱孙诒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与彭洋中的遗集《古香山馆存稿》未收入《湘勇原流记》一文相比，朱氏族谱收录此文应是有意标榜先人厥世事功。该版本可作为《湘勇原流记》第五版。

鲜为人知的是，湘勇创始人之一罗信南之孙罗轡重留美归来后创办“陶龛学校”，以湘军“血性”为校训，并在抗战时期翻印《湘勇原流记》，可作为第六版。

其首页标明刊印时间为1945年，并附献词和介绍词。其介绍词有云：

^① 《吴江中村朱氏十修族谱》首卷，江西清江县中村朱氏1936年。

本文被选入国学扶轮社印行之《清朝文汇》^①中丙集卷六，外间很少流传。卅二年夏，日寇侵陷湘乡县城时，金陵郭焘先生，以曾任长沙警备司令，寄寓城中，匆卒走避于白鹭湾之陶龛学校，日就校内仲渊阁浏览群书，无意中见此文，如获至宝。以今日之世情考证之，何其似咸同间之世情也？一位贤明县长及几位书生，而竟造成清朝中兴大业，彪炳史册。从常识推断，几不可能，然刚只他们那种远见、那种公而忘私、那种负责不推诿的精神，已经可以把天下运诸掌上了。历史虽不会重演，但历史是一种纤尘不染之明鉴。故广为刊布，以告之今之贤宰、贤自卫队长及有澄清天下之大志的智识青年。^②

全篇还见多处批注，可见罗鹗重刊印《湘勇原流记》带有一种传承湘军精神而鼎力同心抗日之意。且从陶龛版的介绍词中可知，《湘勇原流记》又入选过《国朝文汇》，可视为第七版。

1937年，郑振铎先生所编《晚清文选》（上海生活书店出版）选入《湘勇原流记》，可作为它的第八个版本。他在序言中提道：

这一册里有许多文字，对于我们这一个时代，还是对症之药，并非泛泛的搜集名篇佳文的一部‘文选’而已。

这也就意味着，他不仅借此“重温了一遍转变期的中国的历史”，还有试图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寻找中国未来方向的用意。为突出历史反思与借鉴之意，该版本把“湘勇功半天下，而实自孙诒创厥始。予故特志其原流，以告来者”结束句删除，以忽略彪炳个人之倾向。

据此可知，《湘勇原流记》的历史文本在一百六十年间流传了八个版本。这些版本间的些微变化既有时代更迭的问题，又藏有主体的价值选择倾向。尽管其间的总体变化不大，但蕴含的历史语境与脸谱描述值得关注。

① 《清朝文汇》原名为《国朝文汇》，共二百卷。由沈粹芬、黄人、王文濡等人辑刊，初刊于清代宣统元年（1909），由于“国朝”已成历史，故后人改称今名，上海国学扶轮社刊本。

② 辑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民国图书数据库”，系手刻蜡印版扫描件。

（二）版本变化

若以《节录奏疏》中的《湘勇原流记》（第一版）为基准进行参照，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历史语境。《宰湘节录》版、《节录奏疏》版、朱氏家谱版文本中都沿用了“阅邸报”，其他版本均改为“当是时”。两者之间其实存在显著区别，“阅邸报”表明对于当时战局动态的了解来自官方信息渠道，“当是时”则是平实地陈述事件发生在该时间段。版本中关于“为首匪类”的描述只存在于《节录奏疏》版、《皇朝经世文续编》版、《国朝文汇》版、《晚清文选》版中。至于其他个别词的变更应是刊印或抄誊偏差所致，无碍文本的真题原貌。

第二，个人私情。湘军集团内部存在大量的地缘、姻缘、业缘等宗法纽带关系，是私情与公义冲突之间流离或冲突的根源。《节录奏疏》版首次录入了黄淳熙之跋语，是因为黄淳熙和朱孙诒同是江西老乡，且黄淳熙是朱孙诒湘乡县令的继任者，自然要仰仗前任，且后与朱孙诒一同随骆秉章入川。黄淳熙的跋语相当于读后感，主旨是赞誉朱孙诒首创湘勇和识拔人才的功勋。因为跋语属于非正式文稿，所以其余七版未采录。

朱孙诒曾知宁乡县事，县人刘典、刘倬云是其旧交。刘倬云尤其深得朱孙诒的信任，因此他在《节录奏疏》《宰相节录》中均以引用骆秉章、毛鸿宾涉及举荐朱孙诒的奏言来为朱孙诒辩白，其目的性、倾向性都是十分明显的。

同治二年（1863），郭嵩焘在署理广东巡抚时因朱孙诒私下推荐而邀刘锡鸿佐办团练，并于同治五年向朝廷举荐刘锡鸿，后来又应朱孙诒的力荐携其担任出使伦敦的副使。由此看来，朱孙诒对刘锡鸿应有知遇之恩，刘锡鸿的序言有附和恩人之意。刘锡鸿后来与郭嵩焘交恶尽管是两人之间的思想分歧、私人矛盾所致，也夹杂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上曾与骆秉章结下私怨的因素，朱孙诒显然是始作俑者。

值得注意的是，朱孙诒与湘系集团的矛盾爆发后，除外刘典、刘倬云兄弟，湘军人物的自述和相关著述均有意回避了与朱孙诒往还的细节。

第三，政治博弈。从最初的原始版本来看，彭洋中撰写《湘勇原流记》意在“志其原流，以告来者”。但从当时两人在邵阳的上下级隶属关系、空间交集与结拜私情来看，实质是应朱孙诒之请为其创办湘勇叙功，从而在客观上记述了湘勇创建始末。彼时湘军集团早已确立曾国藩为核心，朱孙诒与刘蓉等湘系核心人物的交情尚在，利益冲突尚未真正爆发，但影响力显然已经下降。

第四，事与愿违。从刘蓉在咸丰六年（1856）所撰《东台山宴游记》及其后记来看，前后分别有十二人、十八人同游东台山，纵论时局，表明朱孙诒与湘系人物来往还是较为密切，但已是局外人。刘蓉在其后记中言：

太守继观察宰吾湘三年矣，令行而不扰，法立而不苛，闾里安之。惜乎其将去而不得久于斯土也，并记之以诏来者。^①

《湘勇原流记》记录了朱孙诒在湘乡创办团练的全过程，不仅再次提高了他的社会声誉，也为骆秉章邀朱孙诒、彭洋中入川加分不少，尤其是朱孙诒、彭洋中还占有体制内优势，和当时湘军本身所处的颓势（三河之败与江西糜烂）存在一定的反差。后来“湘勇功半天下，而实自孙诒创厥始。予故特志其原流，以告来者”的表述在部分《湘勇原流记》版本中被删除，应与后来湘军集团从低谷中崛起，军事、政治能量相应扩张有关，加之朱孙诒后来与湘军集团的矛盾公开化，声誉下降，显著地被冷落和边缘化了。

二、湘军史实解构

综合《湘勇原流记》《湘军志》《湘军记》及湘军人物日记、信札、著述等相关文献史料来看，湘勇成军始末还是有诸多线索可寻觅并得到厘清。史书传记中一直惯常有“自述”与“旁观”两种方式，主体价值偏好可见一斑。从湘军形象构建来看，湘系集团所请撰写者或自述皆有标榜自

^① 刘蓉：《刘蓉集》之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2页。

我历史功勋以流传后世之意。从私史角度来说,《湘勇原流记》显然是以朱孙诒在湘勇创建经历与贡献为主线,同样存在宣扬个人事功,贬抑曾、罗的倾向。这一文本客观记述了时代风云,却不失独特面相。

(一) 被大书的事迹

湘军史的编纂无法绕开朱孙诒和曾国藩两位关键人物。起初,曾国藩回籍丁母忧后并不愿意参与地方练团,因不素习行军用兵,其早期书信也常把熟谙军事的江忠源当作是湘军的领袖人物,后来其“帮办”团练的不官不绅的身份也给他造成诸多掣肘,可见朝廷在初期的授权并不充分。从相关记载来看,湘乡勇赴长沙后的曾氏色彩较为浓厚,但援南昌之役仍然由朱孙诒、夏廷樾等主导,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可见朝廷与湖南官方对于湘勇的控制还是比较严。尽管《湘军志》《湘军记》等刻意淡化了朱孙诒在湘勇创建早期的独特地位与贡献,但同时期诸多历史文献、书信和日记都坐实了朱孙诒在早期湘乡团练和湘勇创建的诸多事实。彭洋中撰《湘勇原流记》更是因两人之间特殊的交集与私情而对此不惜笔墨,大书特书。

朱孙诒起初出于地方治理的考虑办理乡团,与湘乡绅士合议团练《条规》,初拟《合邑绅耆酌议条约》,继而发布《谕速行团练》,对湘乡练团的宗旨、组织办法、经费筹措、练勇训练、奖惩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其初是“所练壮丁专为保守本邑城乡而设,并无调遣出征之事”。可见,湘乡团练是官方主持并由官绅合作而建。王鑫率先响应,“爰创具规约,遍晓谕,于三坊倡之,余四十七都亦次第行。”^①

《湘勇原流记》中直接涉及创建湘勇的历史人物有二十六人之多,以朱孙诒创建湘勇和援助江西战场为主线,湘勇作战大多依托地方督抚行政指令和“廷旨”,对于曾国藩着墨不多,而在文末引用骆秉章的评价进一步突出了他的事功:

自咸丰三年迄今,文则督、抚而下,武则提、镇而下,自湘勇中来

^① 朱汉民,丁平一等:《湘军丛刊》(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

者，更仆未易悉数矣。骆秉章疏荐孙诒云：‘湘军朴勇敢战，由该员办团而起’岂虚语哉！^①

从《湘勇原流记》的记载来看，朱孙诒主持湘乡县练勇时的组织架构为：

（清咸丰二年）七月，王鑫等偕文士易良幹各集团数百人，造县听调。命分三营：易良幹领中营；王鑫领左营，武生杨虎臣、团长王开化、张运兰隶焉；康景晖领右营。以诸生罗信南综理三营粮糈，谢邦翰治兵械。县学两司教官并廩饩生魏万杰等，分投劝捐助，以济军食。^②

咸丰三年（1853），朱孙诒率湘勇首次出省援助南昌时的组织架构为：

罗泽南领中营，廩饩生李杏春、团长李续宜佐之；易良幹领前营，团长罗信东佐之；谢邦翰领右营，团长李续宾佐之；康景晖独领左营；杨虎臣独领后营；罗信南领亲兵；王鑫留剿郴桂土寇。候补道夏廷樾、庶常郭嵩焘偕行。^③

尽管罗泽南、李续宾师徒所率湘勇中营、右营于南昌解围后正式立名为“湘军”，但它前后组织架构中并无曾国藩的身份与地位，可能与曾国藩的团练“帮办”身份有关，这支部队事实上掌控在骆秉章和朱孙诒手中。曾国藩提议由朱孙诒率湘勇赴援，也凸显了以朱孙诒、夏廷樾控制湘勇指挥权的官方色彩，而他自己显然甘愿在后方一心筹办团练和军饷。咸丰三年（1853）五月十八日，曾国藩为此致信朱孙诒：

……拟招宝庆勇二千人，请魁太守帅（率）之以出；招湘乡勇千人，请阁下帅（率）之以出。阁下大义炳著，为吾党所推重，勤王之志，伟抱素裕，此次旌旆北首，知阁下不辞况瘁也。^④

部分湘军将领的信函与记载也印证了朱孙诒在湘勇创建中的主导作

① 朱汉民，丁平一等：《湘军丛刊》（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页。

② 朱汉民，丁平一等：《湘军丛刊》（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

③ 朱汉民，丁平一等：《湘军丛刊》（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8页。

④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第155—156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用，如李续宾致信：

忆自军兴以来，夫子筹办团练，保荐人才，吾乡之膺艰巨、享大名者，大半皆出门墙。桃李之盛，罕与伦比，虽酈侯之功人不过如此。^①

郭嵩焘在咸丰八年（1858）七月廿三日面圣时的对话也可以侧面证明曾国藩当时的职责主要是协办团练，朱孙诒才是这支湘勇的统领。

上曰：汝江西带勇，是何名目？

曰：湘勇。

上曰：几多人？

曰：二千余人。

上曰：二千余人是你一人带耶？

曰：曾国藩初起，营制每营五百人，二千余人是五营，每营皆有营官。朱孙诒统带，臣是帮带。是时罗泽南、李续宾皆充当营官。^②

事实上，曾国藩成为湘勇正式统帅应该始于朱孙诒升任宝庆知府之后，此举也有骆秉章和稀泥的意图。刘典所撰《送都转朱石翹先生回江序》一文用“虽其间公多未从其役”从侧面验证了朱孙诒就此出局，但还是对其创建湘勇之功溢美有加：

而后领其军者守其成规，袭其旧制，仍不失为精锐之师，故湘勇之功半天下。虽其间公多未从其役，而追溯其源，首事之功非公莫属焉。^③

从曾国藩的角度，湘军集团对朱孙诒的地位采取了故意遮蔽的方式。他在咸丰八年（1858）所撰《湘乡县宾兴堂记》对湘勇原流有所概述，但通篇只言及湘乡义旅创办时罗泽南及其九位弟子，仅以“官斯土者”引出先后担任湘乡县令的朱孙诒、唐逢辰、黄淳熙、赖史直等四人，且着重突出了唐逢辰的政绩：

① 李续宾：《复朱石樵太守》，载《李续宾史料三种·李忠武公书牋卷（下）》，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151页。

② 朱汉民，丁平一等：《湘军丛刊》第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7页。

③ 朱汉民，丁平一等：《湘军丛刊》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我湘乡实兴义旅……号曰湘勇。湘勇之名闻天下……其官斯土者，则有朱侯孙诒、唐侯逢辰、黄侯醇熙、赖侯史直，又皆一方贤俊，有循良之绩……咸丰癸丑，唐侯临莅兹邑，倡捐助饷，练勇防堵……湘乡山邑，多狷介自守之士。唐侯礼贤惠众，所以爱士者甚重。^①

曾国藩在同治八年（1869）撰《湘乡昭忠祠记》一文则以湘军征伐为线索，对于湘勇的由来和组织结构只字未提，略去了带队上省的朱孙诒：

咸丰二年十月，粤贼围攻湖南省城。既解严，巡抚张公亮基檄调湘乡团丁千人，至长沙备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壮武公鑫等以诸生率千人者以往，维时国藩方以母忧归里，奉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奏言团练保卫乡里，法当由本团醴今养之，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由是吾邑团卒号曰‘湘勇’，此湘勇之名自此始。^②

无独有偶，后来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都对湘勇创建初期的历史也是简略处理，只在《湘军记》里简述了湘军援助江西的人事与军事安排：

江忠源援江西，乞师湖南，国藩遣夏廷樾、朱孙诒、江忠淑、罗泽南等率三千六百人赴之。湘军援邻省自此始。^③

曾国藩对由接手湘勇到以湘勇为基础组练湘军做了明确的交代，但王闿运和王定安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湘勇和湘军两个概念，这二者并不能简单等同。

两人也明显有意淡化了朱孙诒作为湘勇关键创办者的地位。可以说，因为湘军集团的地域特性与中后期湘军人物之间的交情离合，诸多自述性记载都有意回避了朱孙诒在早期湘勇创建中的地位和作用，仅在王鑫、李续宾、郭嵩焘等少数人的日记与往来书信中仍然保留了较为客观的记述。

①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8—149页。

②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72页。

③ 王闿运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49页。

（二）被回避的历史

《湘勇原流记》对于南昌之战后朱孙诒的经历有比较明显的回避，叙事跳跃度较大，包括朱孙诒在岳州之战的失败责任、他本人在湘勇集团中的职务安排问题以及与湘系集团产生嫌隙的由来。

该文先是以“国藩既得旨，大募湘勇，尽调孙诒所部将士为东征计。忠源抚皖，又驰疏调孙诒，以秉章奏留，乃止”掩饰朱孙诒作战时以营官奔溃的不堪，再是以“（咸丰四年）四月，孙诒署理宝庆府事”一笔带过被曾国藩彻底放弃的事实。

朱孙诒从此成了湘军的局外人，与湘系集团的关系很快由密而疏。这种状况导致湘系集团的诸多人员在之后的自述、旁观与文集整理中对他均采取了淡化或回避的方式。如同治《湘乡县志》与陆宝千所撰《刘蓉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均对刘蓉被朱孙诒识拔与协助朱孙诒办理团练有所交代，而刘蓉本人的文集都刻意回避了此事，显然与两人后来同在骆秉章幕的矛盾冲突有关。

梳理相关文献与史料，《湘勇原流记》对朱孙诒的下述经历采取了故意回避的态度，似有成人之美和彪炳其人之意。

一是衡阳练兵，朱孙诒的参与程度不明。曾国藩初练湘军的时期里能够依仗的力量也就只有朱孙诒、王鑫、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等人，而朱孙诒作为体制内的官员显然与曾国藩独树一帜是相互冲突的。咸丰三年（1853）七月南昌解围后，湘勇撤回湖南，朱孙诒应湖北巡抚吴文镕之招直接去了武昌。十月十九日，曾国藩致王鑫信中提及：

顷朱石翹书来，渠自鄂省十一二日即可起行，大约日内可到长沙。观其书词，则逆贼全数下窜，武昌业已解严……朱石翁杀贼之志，甚锐且坚，此次归来，必且大有兴举。若中丞能从仆言，停止援鄂之行，则望足下与朱石兄同来衡城，就仆熟计，讲求水战之道，精析练勇之法。^①

①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84页。

十一月初十日，曾国藩致信朱孙诒：

敬悉台旆尚滞鄂垣，为吾甄师所留……务望阁下星速归湘，扯璞、筠、罗、霞诸人，同来衡城一商。^①

不难想见，曾国藩在初创湘军的时期里与长沙官方以及绿营之间存在不少的矛盾，他能够倚仗的力量也就只有朱孙诒、王鑫、郭嵩焘、罗泽南、刘蓉这些人，而朱孙诒究竟参与到何种程度，《湘勇原流记》中并未明确记述，仅称曾国藩为东征计，尽调朱孙诒所部将士，湘勇因此成为创立湘军的初始班底。

二是湘勇成军，朱孙诒的职务和地位被淡化。湘勇创建之初就发生了第一次内部的分裂，说明湘勇内部的领导体系尚未成型并得到权威性认可。王鑫所部与曾国藩阵营离析后投归巡抚骆秉章麾下。时值江忠源庐州遇难，原本商调朱孙诒领兵援助庐州的计划泡汤，曾国藩遂与骆秉章函商人事安排，拟让朱孙诒协助自己，负责陆师营务处，但随后又迅即改变了主意，并致书骆秉章言曰：

从前朱石翹（即朱孙诒）来衡，力请自往江西、广东劝捐接济，人方笑气迂阔无当，侍亦欲其总统陆路，不遣之他往也。近来思之，石翹之见，实不可易。刻拟奏请派夏憩亭（即夏廷樾）、郭云仙（即郭嵩焘）专办湖南捐务，黄莘农（即黄赞汤）、朱石翹专办江西捐务，胡咏芝（即胡林翼）、王子寿（即王柏心）专办湖北捐务，庶一月可少接济。^②

平心而论，曾国藩在这个时期里对朱孙诒的作用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他将朱孙诒等人的名字列入《请派大员办捐济饷折》，后来也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复。

咸丰四年（1854）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苦心打造的湘军水师从衡阳出发，计有十营，其中湘潭四营共两千人，以储汝航、夏銓、胡嘉垣、胡作霖为营官；衡阳六营共三千人，以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

①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第332页。

②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38页。

邹汉璋、龙献琛为营官；陆师五千余人，以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及曾国葆等人为营官。留下罗泽南、李续宾的两个营驻衡阳，防守后路。而接到吴文镕调令从贵州赶去的胡林翼，则在半路上才得悉吴文镕殉城的消息，曾国藩遂接下他六百人规模的队伍，由骆秉章供给粮饷军械。王鑫的两千人马没有再往黄州救援吴文镕，随同曾国藩所部作战。

自此，湘军在衡阳成军后基本上洗刷了官方的色彩，成了曾国藩自创的军队。朱孙诒担任陆师营官之一，从属于陆师序列，这是曾国藩最终给他的定位。

三是岳州之战，朱孙诒未被追责。早在咸丰元年（1851）五月十四日，身在京城的曾国藩致诸弟信中便对担任湘乡县令的朱孙诒的地方治理能力颇为称赞，并对他拔取刘蓉这样的真士给予了肯定。但在湘勇援赣之初，曾国藩便对朱孙诒的领兵能力有所怀疑。他在咸丰三年（1853）六月二十八日致左宗棠的信中提道：

此间应援之师，以江幼陶所带之勇一千为上，罗山带勇三百六十次之，兵六百次之，朱制（刺）史所带千六百余之勇恐难倚恃。然石樵忠勇勃发，要自血性男子，遂能挟盛气以趋新集之卒，而立书生之勋，亦未可知。^①

咸丰四年（1854）三月初七，湘军水师会战于岳州，战斗经验的不足加上突然的北风使得水师的首战失利。王鑫所部先败于羊楼司，再溃退回岳阳。初十日，太平军尾随而至，围攻岳阳城。幸得曾国藩正在水师营中，派营官、知府衔知州朱孙诒与补用府经历周金城率南勇数百人前出救援，邹寿璋、曾国葆等带兵跟进，曾国藩调炮船到岳阳楼下开炮轰击，掩护王鑫所部从城内撤离，随后陆师撤回长沙。事后曾国藩坦陈：

朱孙诒、周金城所带之南勇，因畏惧敌军太众而奔溃，无法阻止，唯有管带湘勇的邹寿璋所部五百人毫不畏惧，血战竟日。故而该次陆军战

①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71—172页。

败，水师小胜。^①

王鑫因为此次败战而遭撤职留用，而朱孙诒未受任何处分，反而调任宝庆知府。四月二十日，曾国藩在致四位弟弟的家书中提道：

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战败，逃奔数次。昨到省城，仍令其署宝庆府事，已于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屈徐图。昨当面将朱石樵责备，渠亦无辞以对，然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②

这些言辞无疑透出曾国藩对湖南巡抚骆秉章袒护、任用朱孙诒之举颇感不快，内心已激起不少愤懑。显然，朱孙诒的三个月实战表现并不称职，被免除营官职务是必然的事，曾国藩与朱孙诒的友好合作关系至此也彻底终结。

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三月为朱孙诒母亲所撰《诰封太淑人伯母张太淑人八十寿序》一文在日后也未再被任何一个版本的《曾国藩全集》收录，仅存于朱氏自编《宰湘节录》和朱氏族谱，说明两人交情已绝。朱孙诒转而投湖南巡抚骆秉章，后来又跟随他去四川总理营务，因与骆秉章和刘蓉等不和，称疾辞官而去，此系后话。

概而言之，《湘勇原流记》全篇对朱孙诒的军旅经历处理较为简略，似是有意回避一些隐衷。《清史稿》关于朱孙诒的传记也以“南昌围解，凯旋，加知府衔，擢宝庆知府”十五个字略过了他在咸丰三年至四年的征战历程，仿佛那一切从未发生过，显然有所饰非。最后以“朱孙诒提倡团练，振兴人材，实为湘军肇基”为结语。

曾国藩奉旨协助办理湖南团练事务后，起初对朱孙诒颇为尊重，尽力做好自己的“帮办团练”的工作。但始于岳州之战的分道扬镳，为日后入川后的石翹（朱孙诒）与霞仙（刘蓉）之争，乃至同治年间伙同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弹劾恭亲王及曾国藩、曾国荃、刘蓉等湘系将领埋下了伏笔，表

① 《曾国藩全集（奏稿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第146—147页。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25页。

明朱孙诒与湘系集团的决裂不是偶然的。

三、从私史到信史

其实私史和信史的背后都隐现了写作者的意图。从《湘勇原流记》有意回避一些历史事实的意图来看，它显然不符合信史的客观标准，更多呈现出作为私史的特征。但从该文本所撰的前后历史关联来看，又具有信史的某些特征。自述也好，旁观也罢，都不可避免渗透和凸显了个人采用史实倾向，但后人需从相关文献的相互佐证与支持中才可一窥历史真相。

（一）交情离合中的自述与私情

彭洋中为朱孙诒母亲撰写的传记《张太淑人家传》中有记载：

太守令湘乡四年，于利害无所不兴除，湘人屡请留于大吏，犹恐其以他故去也。嗣清江人至，辄相与讯太淑人起居，又设问太淑人所以教子治家甚悉，以相矜效。洋中往来里门，故知其行为详。^①

这一段文字表明彭洋中对朱孙诒颇为了解，出于两人之间的上下级情谊而撰写朱孙诒创建湘勇的历史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他的遗集《古香山馆文存》中只收录了《致邑侯朱石樵明府书》，并未收录《张太淑人家传》与《湘勇原流记》两文，表明《湘勇原流记》所述与后期曾国藩集团对于湘军史自述的思路框架并不对称。

该文确以溯源的方式记叙了湘勇的创立，清晰揭示了团练、湘勇、湘军三者的递进关系和主要人物的角色分工，但因为私情的影响，刻意回避了一些问题如朱孙诒后来在湘军集团中的地位演变与自身不足，只突出早期事功。

毫无疑问，朱孙诒在湘勇创建早期与湘系集团保持了比较好的合作关系。湘勇援南昌时，朱孙诒的叔父辉三公也慷慨相助，博得了湘人的好感。郭嵩焘也因此与朱孙诒订金石之交，并赠《敕授儒林郎孙裔公德配敖

^① 《吴江中村朱氏十修族谱》首卷，江西清江县中村朱氏 1936 年。

安人六十寿序》，落款时间是咸丰六年（1856）春三月，当是朱孙诒署理宝庆知府之后，有言为证：

今春三月，为安人六十初度，焘备职词垣，与小郎石翁大守往岁订金石交于马上，谈家常事颇悉。昨宝庆府署函书告予，予重其请，不容辞，爰综壶范可为闺阁式者屡述之，以附宾筵之次。^①

显然，在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交的同时，郭嵩焘与朱孙诒也存在鲜为人知的“金石知交”，由此未能坚定地与曾、刘站在一起。

清咸丰八年（1858），朱孙诒被广西巡抚劳崇光调赴广西，因假满未出，被降一级调用，仍治湘、宝团防。此时，湘军因三河之败而士气大受打击，曾国藩刚复出督办浙江军务，唯有曾国荃、萧启江、张运兰等人可以倚重。《湘勇原流记》于此年底问世，显然不是偶然的。除有借他人手笔为自身表功之意，抑或有提醒各当事人不忘初心之考虑。

此时刘蓉尚未获得施展才干的机会，早期骨干罗信南已退出，寄情于山水之间。《湘勇原流记》所涉及的二十二位当事人已有八位在征战中阵亡或者病故，其中包括罗泽南、王鑫、李续宾等三位核心人物。

尽管此时已经与曾国藩形同陌路，朱孙诒仍需要得到一个评价，作为湘勇创建和崛起的关键人物，更期待得到进一步的升迁，所以他特意保留了黄淳熙的跋文：

叙次详明，直合班、马为一手。非是文不足以传朱公。然非朱公之盛德，亦何由为此可歌可诵之文也？余尝见朱公座悬左驾部宗棠篆书楹联云：“时遣儿童吓饥鼠，不教兰芷隐荒榛。”上句言其倡起湘勇，下句言其振拔人才。左君，天下奇杰士也，于朱公犹佩服之深如此，心窃慕之。及今待罪湘乡，距公鸣琴时已五载。湘人士道及朱公惠爱百姓，训练士卒，辄亹亹然若形容之未可遽罄，余虽谫陋，欲为文以纪其详，俾人知一县令之微，苟殚心为之，固能功及天下也。读此杰作，不禁阁笔矣。^②

① 《吴江中村朱氏十修族谱》首卷，江西清江县中村朱氏 1936 年。

② 朱汉民，丁平一等：《湘军丛刊》（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69 页。

清咸丰十年（1860），朱孙诒会刘长佑克广西柳州，开复处分，赐花翎，加按察使衔。是年冬，骆秉章赴四川督师，奏调朱孙诒总理营务。尽管他在四川的仕途并不如意，但至少说明骆秉章起初还是认可他在创立湘勇、湘军过程中的贡献。

清同治二年（1863），郭嵩焘已署理广东巡抚，朱孙诒因与刘蓉争夺营务处一职落败、与骆秉章在四川团练事宜上意见相左等事，已经引疾请辞。

同治四年（1865），蔡寿祺弹劾湘系集团与恭亲王等一案始发，笔者曾有专论述及^①。蔡寿祺手中的“黑料”即朱孙诒所提供。刘蓉倍受责难、曾国藩备受压力，独无涉及密友郭嵩焘之论，推测是郭嵩焘、朱孙诒两人存有私交之故。郭嵩焘该年有日记：

四月初五日，万本仪自京来，带到万藕舫（即万青藜）、陈宝珊信，询知蔡梅庵以新得讲官，首劾湘乡昆仲（即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左季高（即左宗棠）、官秀峰（即官文）、骆吁门（即骆秉章）、刘霞仙（即刘蓉）、薛觐堂等多人，次乃及恭邸。天下乃有此狂悖善噬之人，于时为妖矣。又倭艮峰、万藕舫亦各有参劾刘霞仙之折。朝政之乱，尤可知也。^②

日记中的蔡梅庵即蔡寿祺，与万青藜均系江西九江府德化县人，早年与朱孙诒也有私交。郭嵩焘不思考他何以能“独善其身”，反以“朝政之乱，尤可知也”结语，似有事不关己，作壁上观之态，颇为寻味。

九月，郭嵩焘日记记言曰：

霞老书发明应人接物之宜，极有远见，谓或可以免于罪戾。而据张友山言，在上海见京报，霞老已降二级调用，陕抚赵长龄补授。此陝事之不幸，抑亦世道之忧，而吾特为之一快，以山中伴侣之可以不孤也。^③

按情理而言，郭嵩焘应知道朱孙诒、蔡寿祺勾连翁同龢一伙弹劾湘军

① 李超平：《刘蓉与骆秉章之关系新考》，《湘学研究》2017年第1辑，第123—135页。

② 郭嵩焘：《郭嵩焘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2012年，第81页。

③ 郭嵩焘：《郭嵩焘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2012年，第150页。

集团之幕后缘由，他尽量和曾国藩、刘蓉的立场保持一致本是应有之义。在晚清中央与地方政治博弈的大背景下刘蓉、蒋益澧、杨昌濬及他本人等先后被免职归里，朱孙诒和蔡寿祺等人的合作只是为晚清朝廷打压湘军集团提供了契机而已，根本原因还是清朝对湘系崛起的防范，郭嵩焘的这些日记内容似表明他对事件的本质、对朱孙诒的心机尚未完全看透。

清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初四，朱孙诒抵至长沙，与郭嵩焘等叙旧，不久他们还将在京城多次往还。朱孙诒在长沙盘桓了四个半月之久，显然与编定《团练事宜》《节录奏疏》《宰湘节录》三本册子相关。《节录奏疏》侧重于体现骆秉章、毛鸿宾对他的赏识与举荐，《宰湘节录》侧重于在湘乡县任职期间的政绩回顾。由此也不难看出，彭洋中与刘倬云都是朱孙诒的写手。

自正月初五日至五月二十二日，郭嵩焘与朱孙诒共往还二十余次，且先后有胡恕堂、裕时卿、陈又铭（宝箴）、朱香荪（克敬）、易笏山（佩绅）、张力臣（自牧）、刘克庵（典）、吴南屏（敏树）、李寿蓉（篁仙）、裴岑樾、吴松岩、罗研生（汝怀）、龙皞臣、王梦虎、刘竹亭等十多人与之共酌。其间，郭嵩焘记述朱克敬赠二律与朱孙诒，内中仍有同情其际遇的意味：

朱香荪见示赠朱石翹二律：

九江东下接平芜，慧日甘棠问旧途。骑竹儿童皆将相，转蓬身世独江湖。苍头却敌功谁论，白发朝天影更孤。闻说汉廷方吁俊，循良犹记寇公无。长剑生尘久不磨，偶逢奇士一高歌。千秋信史空佳传，百战云台同逝波。论相只应惭李蔡，推贤安得尽常何。渝汾淡宕名儒老，为话沧桑泪更多。^①

刘典所撰《送都转朱石翹先生回江序》则赞其首倡湘勇之功，明显有呼应刘倬云之意：

“以吾湘号称多材，其起草茅，任将帅，布丰功伟绩于天下，生膺簪

^① 郭嵩焘：《郭嵩焘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78—579页。

绂彝鼎之荣，歿享俎豆馨香之报者，半由公拔擢而起也，其遂忘之也欤？”^①

此时刘蓉尚健在但是不可能参与，湘系其他要员也均未对他此行有所表示，显然与朱孙诒幕后协助蔡寿祺指控的后果有关，他们往昔的交情早已消弭难续。

同治十三年（1874）冬，在郭嵩焘将要赴京担任礼部侍郎之际，其弟郭崑焘曾致信朱孙诒，对他的所作所为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和提醒，以郭崑焘在湘军中的地位、与曾国藩的亲密程度，他这种态度无疑是带有一定代表性的，与郭嵩焘的暧昧与高冷对比鲜明：

昨见致中丞书籍，悉奉旨入都，业将料理启程。朝廷求治方殷，需才孔亟，阁下政声卓著，天下所共闻。大任之加本意中事，不足为阁下贺。区区所祷祝者，望阁下更进于光博宽大之域，少发牢骚，少着议论。取人必取其能进直言者；用人宜用其不为苟同者。持此以宏济，艰难斡旋宇宙，当额手为天下庆。使酒骂座，乃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愿阁下包涵容纳，不必多所怨尤也。^②

光绪元年（1875）、二年（1876），郭嵩焘在京城与旧交朱孙诒、刘锡鸿往还密切，刘锡鸿何以攀附到朱孙诒、朱孙诒何以愿意向郭嵩焘大力推荐尚是一个谜。朱孙诒在明面上得到的回报就是刘锡鸿为《宰湘节录》补序：

石翹先生负经世才，初官西曹，勾稽案牍，务谨且慎。高平祁恭恪、长白恒宜亭尚书、潼关张兰芷中丞、旌德吕文节侍郎咸以远到期之。迨改官楚南，所至有声，治行称最。桐乡陆费瑀春帆中丞、铜山张石卿制军悉奇其才，特保荐之。尹湘乡时，粤西乱作，先生以国家承平日久，营兵多不可恃，乃创团练乡兵之法，不惟保全境土，而成就人材，肇造老湘营，卒平大难，自是又以知兵闻。内外诸公钦其名而荐于朝者，盖指不胜屈。

① 朱汉民，丁平一等：《湘军丛刊》（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② 郭崑焘：《云卧山庄尺牍》卷四，清光绪十年清闻山馆刻本。

吾师花县骆文忠尤倚重之，疏荐不一而足……吾师卒从先生议，决策西征。以此与幕府不和，遂潜构蜚语以耸动吾师，致有‘可小知不可大受’之奏。客有谓吾师者曰：‘朱某化民成俗，除暴安良，可治一乡一邑，即可以治天下国家，大小以事言，非以位言也。子何以‘不可大受’目之？’吾师颇悔，屡欲斡旋，已无及矣。夫吾师非信谗之人，先生本无召谤之理，偶因军事力争，竟至莠言动听，潜移是非于不觉，使先生闲旷多时……吾欲为吾师表明心迹，不能无言，特补序之。^①

但不得不指出，所谓“肇造老湘营，卒平大难，自是又以知兵闻”之说未免言过其实。从朱孙诒个人的履历和能力来看，他离开军务前线似在情理之中。王鑫早在咸丰三年湘勇往援江西时就在致曾国藩的信函中提及：

石翁率新招之勇往援江西，其忠勇固可师矣，然鑫尝与诸友窃议，石翁优于吏治而拙于将才，先生虞其稍涉疏阔，诚为至当之论。^②

（二）历史罅隙中的突兀与真相

《湘勇原流记》客观上真实记录了湘勇首创、首战的相关细节，这是被后来史学认定为信史的重要基础，其演进过程也能够从诸多版本的序次和细微变化得到印证。如第五版、第七版《皇朝经世文续编》版、《国朝文汇》版均系官书采入，只是删除了“湘勇功半天下，而实自孙诒创厥始。予故特志其原流，以告来者”等句，有意淡化私史色彩，逐渐成为史家研究湘军历程的重要文献。

朱孙诒与骆秉章闹翻并在同治四年（1865）居京期间伙同蔡寿祺、翁同龢参劾曾国藩湘系集团与恭亲王，就此卷入朝野的政治纷争，越来越令其进退失据。当朝廷面对刘蓉与蔡寿祺各执一词的自辩时，选择以骆秉章对朱孙诒才具操守的评价为定论：

① 朱汉民，丁平一等：《湘军丛刊》（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

② 王鑫：《复曾涤生侍郎》，《王鑫集》（卷八），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505页。

前任浙江盐运使朱孙诒，在湖南历署长沙、湘乡各县及署宝庆府。任内颇有贤声，乃自荐道员之后，性近乖张，与人时相齟齬，且议论每多谬妄，待人接物轻信善疑，前后判若两人，殆所谓“可小知不可大受”者也。^①

“可小知不可大受”的结论，直接扼杀了朱孙诒的政治前途，朱孙诒对此必然心犹不甘。从光绪二年版《宰湘节录》的内容编排来看，自称骆秉章门生刘锡鸿的赠序之举，显然是欲替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朱孙诒进行澄清。刘倬云甚至还把骆秉章、毛鸿宾当年涉及他的奏稿也附入。其中骆秉章在咸丰六年和咸丰九年的两份奏疏都以官方文件的形式肯定了朱孙诒办理湘乡团防和选拔将才的事迹；所附毛鸿宾在同治二年连续四次向朝廷上奏举荐朱孙诒才堪可用的奏疏，致有上谕朱孙诒赴陕西多隆阿军营襄办军务之命。但显然，这些材料都不能脱离相应的时间与空间，并不能真正为朱孙诒背书。两年后，朱孙诒在郁郁中客死异乡。

早在刘蓉遭劾之初，曾国藩于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初五写信给曾国荃时也显示出他的洞见：

霞仙仍为陕抚，不失旧物。此近数十年未见之事，朱石翹之伎俩始终不得一逞耳。^②

反观郭嵩焘因与朱孙诒私交不浅，在晚年的《玉池老人自述》中虽未提及湘勇创建历程，但公开披露了他跟朱孙诒的个人交谊：

其后刘锡鸿营求出洋，充当随员，知朱石翹与吾至交，托之斡旋，石翹一力任之。^③

此外，他在《罗忠节公墓志铭》中的有关表述也与《湘勇原流记》的叙述基本保持了一致：

邑令朱公孙诒召公，与故记名道壮武王公鑫、今四川藩司刘公蓉募勇

① 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川中稿》第7卷，第18页，刻本影印件。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397页。

③ 郭嵩焘：《郭嵩焘全集·集部三·文集年表》，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775页。

守御……与鑫各募三百人为一军，从今相国公治兵长沙，署其军曰湘勇……旋从故湖北藩司夏公援江西……①

所以，郭嵩焘一方面承认朱孙诒弹劾湘系集团人物时并未将矛头指向自己，另一方面又意识到朱孙诒所荐之人极大拖累了自己：

朱石翹晚年与楚人构难，独于鄙人始终无间言。丙子京师赞成刘锡鸿偕行，则石翹之力为多。楚人为所齟齬，而未尝一受其累，其为累鄙人，固已至矣。②

这恐怕是曾国藩、刘蓉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事。

一言蔽之，郭嵩焘并没有真正看清楚这个所谓的“金石之交”的朱孙诒是何其处心积虑，更没有意识到刘锡鸿借助朱孙诒引荐实质是一种投机，并有为骆秉章泄愤之嫌。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期间，骆秉章对其处理骆氏祖坟纠纷不公一事十分不满，他在致朱学勤的信中曾有非常直白的评价：

郭筠翁在湘与弟相好，在幕数月，觉其人甚正派，今观其抚粤，竟是糊涂任性，勒捐之虐，京中已饫闻之，不待弟言。③

在朱孙诒辞世近二十年后，《湘勇原流记》被《皇朝经世文续编》采入，表明其史学价值开始得到主流的认可，并在民国时期又被《国朝文汇》采入。至于罗鹗重将《湘勇原流记》最后结尾部分删除“湘勇功半天下，而实自孙诒创厥始”之句，究其原因，可从陕甘总督谭钟麟为他的祖父罗信南所撰《云浦罗先生事略》中窥见端倪，中有“先生以诸生谒邑侯朱君孙诒，倡办团练。旬日得二千人，军械、糗粮俱备，旋奉檄援长沙。先生部署既定，乃招致罗忠节、王壮武分领其军，是为湘乡有勇营之始”④

① 郭嵩焘：《罗忠节公墓志铭》，《郭嵩焘全集·集部三·文集年表》，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24页。

② 郭嵩焘：《郭嵩焘全集·日记（四）》，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32页。

③ 骆秉章：《致朱学勤》，《历史文献》杂志第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3—101页。

④ 谭钟麟：《白鹭湾罗氏族谱·序》，湘乡罗氏光绪二年第四修卷首。

的表述，这显然与原文中“实自孙诒创厥始”一语相冲突，所以他可能并不认同朱孙诒的创始人地位，遂改以“湘军名震天下”来加以调整。

而朱氏族谱中收录的朱孙诒家传则着重记其在湘乡讲求团练乡兵之法，不仅全境得以保全，罗泽南、王鑫、李续宾、刘蓉等均由他识拔而起，并率湘勇解南昌之围，因功署宝庆知府，入川后总理营务处，“偶因军事力争，竟至莠言动听，潜移是非于不觉故，先生遂由川南旋。”^①在表功的同时明显有鸣不平之意味。

凡此种种，皆是撰写者的立场所致。尽管有私情因素的干扰，是非与功过交织，荣光与怨愤并存，仍难以掩盖《湘勇原流记》所框定的史实的真实性与逻辑性，毕竟很多当事人当时还健在，故它是一份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原始文献。但因为撰写者本人固有的局限，既不能全盘采信，也不能简单否定。诚然，朱孙诒的湘勇创立人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最终走向了湘军集团的对立面，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未能与之相始终，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遗憾，更是他囿于自身的性格局限、受制于晚清复杂而动荡的政治军事环境使然。

^① 德馨：《诰授光禄大夫都转两浙盐运使司孙诒公传》，《吴江中村朱氏十修族谱》卷二，江西清江县吴江中村朱氏1936年。

濂溪学序跋的内容与价值

王晚霞^{*}

摘要：在濂溪学史料中，有一些出现在濂溪学专门文献或理学相关文献卷首或卷尾，主题与周敦颐著述、思想相关的序跋，可称为濂溪学序跋。这些序跋部分被收录入已有濂溪学文献中，还有大量散见于相关地方志、别集中，大致有一百多篇，其内容在追忆周敦颐生平、阐述文献编订因缘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不同侧面阐发、传播了周敦颐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濂溪学，更有其文学和文献学上的辑佚考证价值。

关键词：周敦颐；濂溪学；序跋；周敦颐集；濂溪志

围绕周敦颐（1073—1017）编纂的文献，一般可称之为濂溪学文献，濂溪学文献在历代皆有刊刻，这些文献的刊修和传阅，是周敦颐思想学说传播的重要方式。在这些文献的卷首或卷尾，一般都有理学家、地方官员、编纂者等所写的序跋，这是濂溪学序跋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其他相关的文献，其主题并非周敦颐，而是与宋代道学、或理学思想相关，这类著述前后也有不同作者的题跋，比如孙奇逢《理学宗传》，清贺瑞麟《朱子五书》，清黄宅中《古希濂堂小草》、唐文治《洛学传授大义》

^{*} 王晚霞，女，天津科技大学副编审，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亚濂溪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BZX070）。

等，其中不仅提到周敦颐，且涉及对其思想的阐释或评价。这些与周敦颐著述、思想相关的序跋，称为濂溪学序跋。目前学界有关周敦颐的成果有不少，然集中研究濂溪学序跋的成果几稀，原因主要在于已有濂溪学文献中的序跋数量不多，不便开展整体研究，而其他大量序跋则淹没于烟海古籍，一时又难于充分占有。本文通过笔者经年累月的文献整理工作，在梳理濂溪学序跋的基础上，对其内容与价值展开论述。

一、历代濂溪序跋

濂溪学序跋是周敦颐思想搭便车式传播的一种有意或无意的体现。周敦颐思想在南宋以后，对于儒学者来说，或是深入佐证，或是议论反驳，很难避而不谈。因而，除了围绕周敦颐编纂的专门文献以外，在更为宽广一些的范围内，与理学、道学相关的文献中，也有不少针对周敦颐思想而阐发的议论，这些序跋目前除了在已有濂溪学文献中收录以外，还有大量分布在多个省市的历代地方志和多位学者别集中，经过笔者较长时间的翻检，发现这类濂溪学序跋至少有 100 多篇。为下文论述方便，笔者将检索到的濂溪学序跋选择部分列表统计如下^①。

序号	时间	作者	篇名	时间	作者	篇名
1	宋	叶重开	春陵续编序	明	鲁承恩	濂溪志序
2	宋	王梦龙	婺本三书序	明	谢颢	濂溪志叙例
3	宋	度正	书文集目录后	明	陈鉴	赠博士周冕荣还序
4	宋	度正	书萍乡大全集后	明	方琼	濂溪遗芳集序
5	宋	胡安之	书萍乡大全集后	明	黄佐	道源书院集序
6	宋	朱熹	书濂溪先生《爱莲说》后	明	王会	濂溪集序
7	宋	朱熹	建安本太极图通书后序	明	胡直	刻濂溪先生文集序
8	宋	朱熹	南康本太极通书后序	明	李嵎慈	濂溪周元公志序
9	宋	朱熹	延平本太极图通书后序	明	李桢	刻濂溪周先生志序
10	宋	朱熹	题太极西铭解后	明	郭惟贤	濂溪先生志序

① 本表所统计的内容已被收录入笔者编纂的《濂溪志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濂溪志补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需要说明的是，一者，这两本书中还有部分序跋尚未计入此表；二者，本文集中于中国史料，在日本、韩国的相关濂溪学序跋未计入其中，因而也不在讨论范围内。

续表

序号	时间	作者	篇名	时间	作者	篇名
11	宋	朱熹	通书后序	明	林学闵	濂溪先生志后序
12	宋	张栻	太极图解序	明	刘曰宁	刻周张二子书序
13	宋	张栻	太极图解后序	明	徐必达	合刻周张两先生全书序
14	宋	张栻	通书后跋	明	吕柟	宋四子抄释总序
15	宋	胡宏	通书序略	明	吕柟	周子抄释序
16	宋	祁宽	通书后跋	明	程爵	周子抄释序
17	宋	朱熹	通书后录	明	徐可行	周元公世系 遗芳集汇序
18	宋	游九言	书太极图解后	明	周京	周氏汇辑先世遗编叙
19	宋	叶采	近思录集解序	明	丁懋儒	刻濂溪周元公集序
20	宋	翁西	太极图解序	明	吕藿	宋濂溪周元 公先生集序
21	宋	陆游	跋周茂叔通书	明	崔惟植	刻宋濂溪周元 公先生集跋
22	宋	陈亮	伊洛正源书序	明	蒋春生	宋濂溪周元 公先生集序
23	明	黄廷聘	刻宋濂溪周元 公先生集序	清	汪元进	濂溪书院兴学编序
24	明	林山	刻濂溪集后跋	清	吴大镛	刻濂溪先生志序
25	明	王汝宾	刻濂溪集跋	清	张	道国元公濂溪 周夫子志序
26	明	宋圭	重刻濂溪集跋	清	清丁	道国元公濂溪 周夫子志叙
27	明	廖道南	崇道内纪前篇序	清	朱士杰	道国元公濂溪 周夫子志叙
28	明	孙奇逢	通书述解原序	清	姚淳焘	濂溪周夫子志序
29	明	孙奇逢	通书述解跋	清	石国纶	濂溪志后序
30	明	曹端	太极图说述解原序	清	常在	修濂溪志跋后
31	明	舒芬	太极释义通书释义提要	清	汤金钊	重修濂溪志序
32	明	邵宝	湖南道学渊源录序	清	白延禧	重修濂溪志序
33	明	陈献章	书莲塘屋册后	清	杨上容	重刊濂溪志跋
34	明	程崧	褒崇道学制序	清	周诰	濂溪遗芳集序
35	明	仇熙	太极书院重刊周子书跋	清	孙奇逢	理学宗传叙
36	明	蒋春芳	周子全书叙	清	贺瑞麟	周子全书序
37	明	鲁承恩	跋濂溪谥	清	贺瑞麟	朱子五书序
38	明	钱尚青	刻濂溪志序	清	贺瑞麟	朱子五书又序

续表

序号	时间	作者	篇名	时间	作者	篇名
39	明	郑满	濂溪遗芳后序	清	贺瑞麟	周子爱莲说跋
40	明	张国玺	周子全书后跋	清	贺瑞麟	周子拙赋跋
41	明	黄焯	刻周元公年表序	清	杨廉	太极图纂要序
42	明	张韶舜	周氏族谱序	清	彭玉麟	周子通书讲义序
43	清	胡宝琮	周子全书序	清	方宗诚	周子通书讲义跋
44	清	彭玉麟	希贤录序	清	耿介	理学正宗序
45	清	张伯行	周子全书序	清	邓显鹤	周子全书编后记
46	清	张伯行	濂洛关闽书原序	清	汤斌	理学宗传序
47	清	张伯行	濂洛关闽书·周子序	清	张沐	理学宗传叙

以上略举 94 篇序跋，时间跨 800 余年，作者群体可说是各个阶层都有，理学大儒，如朱熹、张栻、陈献章；地方官员，如邓显鹤、鲁承恩、吴大镛；一方大员如李桢、郭惟贤；布衣乡贤，如常在、谢颀等。下文在此基础上，分析濂溪学序跋的内容和价值。

二、濂溪学序跋的内容

古代文学史上的序跋，内容主要不外乎介绍著作主旨、成书经过、对作者、作品、或著作围绕的中心人物展开评论等。统揽历代濂溪学序跋，也基本在此范围内，具体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追忆周敦颐生平

这类内容大同小异，在序跋中也最多见，如祁宽在《通书后跋》中云：“濂溪先生姓周名惇颐，字茂叔，世为营道人。少孤，养于舅家，以恩补官，试吏郡县，以至持节外台，为政力行其志，所临必有能声。卒官朝奉郎，守尚书虞部郎中，分司南京。酷爱庐阜，乃买田筑室，退乐濂溪之上，人因以是称之。名贤赋咏，及墓志所载，皆专美其清尚而已。”^① 在周敦颐名声并不显著的时候，许多人对周敦颐还比较陌生，这类记载有益

^① 王晚霞：《濂溪志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23 页。本文下文所引史料凡来自本书和笔者编纂的《濂溪志补遗》，不再出注。

于读者对周敦颐的了解。到明清以后具体的生平概述也有，只是相对简略，更多在思想阐发。

（二）阐述文献编订因缘

这是各类序跋基本都会涉及的内容，给读者交代文献编订背后的故事，陈述编纂者的初衷，肯定其功绩等，濂溪学序跋亦如此。因周敦颐著作“其传既益广矣，然既不能无谬误”，朱熹对于周敦颐著作的整理尤其重视，其整理工作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厘定书目、校勘文字及注释文本。朱熹对周敦颐著作的校定前后历经三次，首次校订在乾道二年，是为长沙本，其底本为胡宏传程门尹焞本，而用以参校的本子有舂陵本、零陵本、九江本。第二次校订在乾道五年，是为建安本，撰有《周敦颐太极通书后序》。第三次校订在淳熙六年，是为南康本，撰有《再定太极通书后序》。在南康本之前，朱熹还曾为延平本太极通书作跋，记延平本与杨方所得九江故家本之异同。

文献整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内容厘定正误，另一方面是因为已有文献体例混乱，故而编订新本，这也体现在濂溪学序跋中。如明谢颙《濂溪志叙例》：“旋得旧志，漫漶不易读”，这里的旧志，指旧本的《濂溪志》，明胡直《刻濂溪先生文集序》：“道州故刻，亦漫漶久矣。”明李崧慈《濂溪周元公志序》：“求先生书读之，则漫灭繁芜，令人有杞、宋无征之叹。”清汤金钊《重修濂溪志序》：“道州旧有《濂溪志》，修于康熙二十四年，岁久漫漶，”明蒋春芳《周子全书序》：“旧本讹蚀。”故而编者“参以善本，补正讹阙”并刊行之。

不只是文献本身，更让儒者忧虑的是儒学自身的发展走向歧途，故而拣出周敦颐以图改善。张栻在《通书后跋》中慨叹：“自圣学不明，语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则割裂而无统，高则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说不参乎事物之际，而经世之务仅出乎私意小智之为，岂不可叹哉！”明郭惟贤《濂溪先生志序》：“孟軻氏歿，斯道几熄，即迂犹能以世家尊孔子。而其后俗儒云兴，门户决裂，权谋功利、训诂枝叶之习，入于统之内，而为道蠹；弃伦绝圣、悠玄空寂之谭，出于统之外，而与道敌。历千余禩，而卒

未有嶢然一明孔子之道者，何恣恣也！”在这种忧患意识作用下，周敦颐挺生于南服，上继孔孟之绪，下开洙泗之统，其著述的编订，于此正有助益，正如明钱尚青《刻濂溪志序》说：“慨自孔孟绝学之后，异端滋炽，分门标榜，事诡僻以为高，惊奇袤，以为能而圣贤之学几于蠹蚀矣。濂溪先生起而倡明之，天下晓然知所宗，依群而居，聚首而语，孰不曰先生之道，孔孟也？又孰不曰师先生，师孔孟也？”作为儒学发展史上的枢纽，周敦颐著述的编订，是为衔接儒学统绪的中重要一环，让天下士人知其所宗，为儒家道统再获新发展提供了契机。

（三）表明观点立场

纵向看，理学在宋代的发展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从绍兴学禁到庆元党禁，都极大左右着理学的传播。横向看，儒林对理学的看法从来就不是众口一词，北宋有荆公新学之昌盛，南宋有陈亮倡导的永嘉学派，都对理学持有不同看法。在党争激烈的宋代，几乎所有士大夫都卷入到思想上不得不选择站队的局面里。到明清两朝，理学虽已位居官学，而阳明心学、乾嘉朴学都先后对朱子学形成强烈冲击，此外，对与周敦颐相关的一些问题的异议之声，历来存在。在濂溪学序跋中表明观点立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肯定周敦颐与二程的师承关系。这是儒家道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周敦颐与二程若无授受关系，那么朱熹构建的儒学道统从逻辑链条上就会出现断裂，其影响是巨大的。以弘扬理学为内容的濂溪学序跋中，无一例外对此表示肯定。例如：张栻《太极图解序》：“二程先生道学之传，发于濂溪周敦颐。”朱熹《建安本太极图通书后序》：“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明徐必达《合刻周张两先生全书序》：“尝考二程亲受《太极图》于周子。”胡宏《周敦颐通书序》：“今周敦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清吴大谔《刻濂溪先生志序》：“周氏，楚南道州人，生于有宋天禧间。阐图著书，倡明绝学，为二程子之师。”明宋圭《重刻濂溪集跋》：“二程夫子亲受业于先生。”清石国纶《濂溪志后序》：“先生独起而修明之，阐图著书，手授二程先生。”肯定了周子与二程的师承关系，就是肯定了道学上

有所承，下有所继，儒家道统也便渊源有自了。

二是肯定《太极图》为周敦颐自创。该图是周敦颐思想的重要体现，若否定该图的创造性，周敦颐思想的根基就会受到重创。有关该图来源历来有多种说法，最具竞争力的是道教起源说，宋代朱震、清代黄宗炎、毛奇龄是代表^①，当代学者中陈鼓应先生直言“《太极图》源自道教系统”^②，而在濂溪学序跋中，无一例外表示此图为周敦颐自创。体现为周敦颐之学不由师传，完全是自学自悟成才，如朱熹：“然后知果先生之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者。”《通书后序》：“莫或知其师传之所自。”张栻《太极图解序》：“而《太极图》乃濂溪自得之妙，尽以手授二程先生者。”明鲁承恩《濂溪志序》：“先生之学，不由师传，默契道体。”清胡宝瑛在《周子全书序》中引用乾隆皇帝诗曰周敦颐“学不由师传，理已臻极致。”清贺瑞麟在《周子全书序》中说周敦颐“绵圣传于不坠，振道统于中兴，所谓不由师传，再辟浑沦者，于此亦可知矣。”清窦克勤《理学正宗》：“周子去孔孟千有余年，不由师传，独能默契。”没有明确师承，也就没有明确承袭某个人所画图的证据，而这并不影响个人独自学习思考，周敦颐《太极图》便是其自悟所得。

三是对周敦颐在儒学发展中枢纽地位的肯定。这种地位可概括为上继孔孟，下启二程，有多种相似说法来表达这个观点，如明方琼《濂溪遗芳集序》：“周子生于舂陵，得孔孟不传之绪，启伊洛百世之传。”丁懋儒《刻濂溪周元公集序》：“上接孔孟之传，下衍程朱之绪。”吕藿《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序》：“上接孔孟千载如线之绪。”明张韶舜《周氏族谱序》：“继孔孟千载不传之绪。”对周敦颐上继孔孟之学，下启二程之序的道学传承脉络的肯定，对周敦颐在儒学统绪中地位的认可，这不仅关涉到整个宋学与孔孟之道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关涉到宋学学术流派的流衍，更是朱熹

① 大致认为此图是由“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或认为是来自道教的“无极图”等。王晚霞编著：《濂溪志补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② 陈鼓应：《论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道家学脉关系——兼论濂溪的道家生活情趣》，《哲学研究》2012年第2期。

构建的儒学道统脉络的关键一环。这种评价在思想史上具有定位作用，尤其是一些重要理学家的这种评价，最早者如宋胡宏、朱熹、张栻，之后每个朝代都有朝廷官员，如明代湖广巡抚李桢，和代表性大儒，如明陈献章、曹端，清汤斌、孙奇逢等，都在序跋中表明对这种评价的肯定。

（四）阐发周敦颐思想

对于一个学派来说，其核心学者本人或多人的思想固然重要，但若缺乏后人的反复阐发、歌咏，则难以流传久远，作为一门学问的“学”的存在价值也将大打折扣，甚或难以为继。以朱子学为例，朱子本人著述思想当然了不起，但若没有后人历代反复诠释，则只能说有朱子本人之学，却无流衍千年之朱子学。濂溪学也是如此，濂溪本人之学当然重要，而或许更重要的是从北宋就开始的对濂溪之学的反复阐发与诠释，正是因为后人的这种诠释而发展了濂溪学。这些诠释在濂溪学序跋多有体现，主题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有关无极太极的思想。虽然无极、太极的词汇古已有之，而周敦颐赋予其新的思想和用法，这也是周敦颐思想备受关注的的一个关键点。这种论述一般都很长，数量也很多，在此仅举一例，宋翁西《太极图解序》：“周子云无极而太极，于体之间而有至中之理。用之精，本无极也；无极之真，即太极也。世之言一物各具一太极者，固非所以尽其本；而谓太极之上别为无极者，是有二本也。学者不观太极，无以知气之所由始；不观无极，无以知理之所由充。非先生穷深探微，得其旨趣之大，则周、朱之言何由取信于人哉！况时之人察理未精，讲论未明，徒务新奇，泥于名数，而不思无极者，乃至极之得名，不知太极者，即不可加之至理。老师宿儒纷纷附和，以误天下后世者多矣，未见若先生此书之明且尽者也。然则圣贤之心法，得周、朱而传授；周、朱之太极，得先生而益显。其光绍前绪，揭示后学也，厥功盖不细矣。”这种论述和单篇主题论文也差不多了。

二是有关“诚”的思想。《中庸》中有关“诚”的思想，周敦颐多有采信，并在《通书》中进一步发挥。濂溪学序跋中有关诚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各类《通书》注解本的序跋中，如清方宗诚《周子通书讲义跋》，清

孙奇逢《通书述解原序》，唐文治《周子大义序》等。也有个别体现在其他文献中，如胡直《刻濂溪先生文集序》，从叙述尧舜的“人心，道心，精一执中”开始，继之从《通书》内容分为道心、精一、执中三方面展开论证，最后得出论点：周敦颐思想中的道心，即“诚”的思想，周敦颐思想中的精一，即无欲的思想。

还有一些针对《爱莲说》《拙赋》《养心亭》等展开的零星议论，数量不多，此不论述了。序跋由于篇幅所限，一般不会对周敦颐思想做长篇大论，观点鲜明，深刻不足。

三、濂溪学序跋的价值

从宋代起，理学家别集前后附有序跋之风，已较为普遍，其作者或为编者，或为编者邀请其他人所写，包括地方官员、儒林翘楚等。与周敦颐相关之文献亦不外乎此，其中序跋之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传播学价值

撰写序跋是文人之间以文会友的常见沟通方式，序跋文献的丰富也让有关研究应运而生，一篇序跋会灵活地出现在多个不同地方，会被收入作序的对象书稿中，也会被收录进其他相关文献中。具体讲，该序是为A书刊行所做，后来在B书刊行时，也将该序收入其中，当然这两书一般是会具有某种相似性，客观上B书刊行的同时，也宣传了A书。如明鲁承恩《濂溪志序》，本是鲁承恩为自己所编《濂溪志》撰写的序，收录入该书卷首，而在明胥从化编《濂溪志》卷首，也可见到该序，则在胥从化本刊行的同时，也传播了鲁承恩本。又如明丁懋儒《刻濂溪周元公集序》、吕藿《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序》、崔惟植《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跋》，蒋春生《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序》，黄廷聘《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序》，本是为王俸、崔惟植所编《濂溪周元公集》撰写的序，后再次被收入明周与爵编《周元公世系遗芳集》中，则周与爵的刊行，也同时传播了王俸本。

有时在A书的序跋中会提到B书的刊本，无形中也是一种宣传。如清彭玉麟《周子通书讲义序》：“今桐城方存之宗诚为《通书讲义》一编，

即以本书前后互相发明，使人读之有豁然贯通之趣。予重修周子墓成，既编《希贤录》以表周子之德行，政绩进退出处之详，复得此书，因复为表章之。”这一篇序，不仅传播了彭玉麟《周子通书讲义》，又宣传了彭玉麟编《希贤录》、方宗诚《通书讲义》，这三书都是与周敦颐相关的。

此外，濂溪学序跋还有多种栖居方式。这些序跋还会被其作者收入自己的文集中，随着作者别集的传播而传播序作对象。还会被收入到其他多种多样的分类序跋文献中，无论古今都有很多这样的文献，如按照年代编，如《宋集序跋汇编》^①，按照主题编，如《朱子学著述序跋题记资料汇编》^②，《历代四书序跋题记汇编》^③《小学文献序跋汇编》^④。按照地域编，如《苏州旧志序跋汇编》^⑤《清代方志序跋汇编》^⑥。按照体裁编，如《清词序跋汇编》^⑦，按照文献载体编，如《石刻题跋索引》^⑧，围绕某个人编，如栗品孝教授的《历代周敦颐文集序跋目录汇编》。还会被收录进地方志中，每部地方志中都能见到许多与本地相关的序跋文献，不胜枚举；还会被用作专门序跋研究，如《中国古籍序跋史》^⑨。可想而知，在这些序跋文献的流传中，序跋作品的对象书稿，自然也得到了传播。濂溪学序跋也是如此。以朱熹为例，他为自己先后整理的周敦颐文献分别作序，这些序作既会收入周敦颐文献中，也会收入朱子个人别集中，也会收入相关序跋文献中。上述一百多篇濂溪学序跋，大致也呈现这种分布，其对濂溪学的传播是毋庸置疑的。

（二）文献学价值

通过序跋来鉴定文献，是文献学中一个常用的方法。其具体指向主要

- ① 祝尚书：《宋集序跋汇编》，中华书局 2010 年版。
- ② 顾宏义，许起山：《朱子学著述序跋题记资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 ③ 戴扬本：《历代四书序跋题记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 ④ 李国英等：《小学文献序跋汇编》，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 ⑤ 苏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苏州旧志序跋汇编》，广陵书社 2018 年版。
- ⑥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清代方志序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
- ⑦ 冯乾：《清词序跋汇编》，凤凰出版社 2013 年版。
- ⑧ 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 ⑨ 王国强：《中国古籍序跋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序跋来判断对象书稿的刊修时间。古籍一般没有明确的版权页，而著述出版发行的坐标性信息，有时可以通过卷尾的牌记来辨识，而诸多古籍并无牌记，或牌记页在流传中损毁丢失，这时对古籍的出版信息判定，序跋是一个可靠的常用手段。一般序跋中都会留有序作者的姓名、时间，则可大致判断出古籍的刊刻时间，濂溪学序跋几乎每篇末，或是文中都写有作序或文献刊修的明确时间。若遇到收录的是其他书稿的序跋，则需另找途径。序跋中一般会有刊刻者相关人的信息，一般都是赞美其辛劳与贡献，通过对这些相关人生活朝代的确定以确定书稿刊修时间，则又是一个判断方法。

二是通过序跋来判断对象书稿的文献传承情况。序跋中时常会记录对象书稿在编纂时的刊本继承情况，有的是指出该本所参考底本的不足，有的是提到一些参校本，这为确定文献的先后承传次序提供了线索。比如朱熹《建安本太极图通书后序》：“右周敦颐一编，今春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异，长沙本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也，然犹有所未尽也。”由此一篇序作，同时了解了周敦颐文献的五个刊本。又如清周诒《濂溪遗芳集序》中云：“弘治四年辛亥，州侯方公刻有《濂溪遗芳集》，后之守土者辑其大纲以为志，至今因之。其余诗赋之未尽登者，别为一册，仍以‘遗芳集’名之，存其旧也。”则可清晰见到周诒本遗芳集即承袭周冕本而来。明王会《濂溪集序》：“退而访其嗣孙翰博绣麟，求家传遗书，出《濂溪遗芳集》一册相示。”可知王会本是在周绣麟本基础上改刻而成。

三是序跋上的印章所具备的文献考证价值。许多序跋卷端或卷尾会盖有序跋作者、刊修者、收藏者等的印章，这些印章都与序跋有某种关联，研究这些印章，离不开印章下的序跋。印章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在图谱学、文字学、篆刻学、文书制度等方面，皆有其价值，此外，印章还可用在辨伪学中鉴定书稿真伪。有时通过序跋上的印章，还能看出书稿的收藏流传的先后节点。濂溪学序跋大部分上都有印章，此不列举了。

四是可用来辑佚古籍史料。兵火战乱、天灾人祸、政治禁毁等外在原因，和图书本身的自然淘汰，都让古籍大量亡佚，既可能是整个刊本亡

佚,也可能是古籍内容部分亡佚,如其中章、节、篇、目之亡佚。文献整理中的辑佚工作“即把亡佚之书、散佚之篇从浩如烟海的图书文献中辑录整理出来,使其复见天日”^①。辑佚是文献学中常见的一个方法,对于古籍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既可以为学界提供被浩如烟海的古籍淹没的极有价值的个别史料,也可提供散佚史料的系统文献,增补已有存书之不足,在客观上重现失传典籍,在学术上丰富科学研究的论据,提高科学研究成果质量,推动文化发展,也可通过辑录古籍书名等成书,了解文献流传和学术演进轨迹。

在濂溪学序跋中辑佚濂溪学文献刊本,比较多见,如宋易纶、易统在绍定元年(1228)编《周子大全集》,虽已无存,可通过胡安之《书萍乡大全集后》中的内容,推知此本曾存在。又如通过在嘉靖十八年(1539)黄佐《道源书院集序》之内容,可知有明侯廷训在嘉靖十八年(1539)编有《道源书院集》。再如国内罕见的鲁承恩本《濂溪志》,学界一度以为此书已亡佚,但公认此书的存在,正是因为通过胥从化本中收录有鲁承恩所撰《濂溪志序》,此序中详细说明了鲁承恩所编本的缘起和目录,事实上此书的确现存于韩国。

(三) 文学艺术价值

纵观多篇濂溪学序跋,其记叙、议论、抒情等各种写作手法兼有。有的以说明为主,可用于考据。有的以记叙为主,或叙述周敦颐的身世生平,或述书稿刊修过程,如明方琼《濂溪遗芳集序》。或写自己与周敦颐结缘的经过,如朱熹的《通书后序》中云:“熹自早岁既幸得其遗编,而伏读之,初尽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然后始得闻其说一二。比年以来,潜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文中描写朱子努力读书的形象跃然纸上。又如明代李桢《刻濂溪周先生序》:“余不敏,寤寐见先生久矣。余年十三四时,颇知志学,获性理书读之,开卷即读先生书,于是志学之念益切,益恶世利世色,苟终身盘谷焉久矣。既读先生书益久,

^① 曹书杰:《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恍然如遇故人”。文章像讲故事一样，表达作者对濂溪先生的崇敬与喜爱，读来令人产生共鸣。

有的以议论为主，旨在表达某个明确观点。如宋张栻《太极图解序》《太极图解后序》，宋度正《书萍乡大全集后》，都是全篇议论，论证周敦颐思想中独特所在，阐发濂溪思想，抒发个人观点，勉励后学。又如明胡直《刻濂溪先生文集序》，全文也是大部分议论，只在最后用少量文字简陈了刊刻缘起。

在具体文学写作技法上，濂溪学序跋的特点是逻辑严密、修辞多样。因为是围绕周敦颐这样一位理学家而作，其往往会牵涉有思想论辩，逻辑严密是确保在写作中论证有说服力必要条件。如张栻在《太极图解序》在论述“诚”的思想：“夫曰‘圣人之本’，‘诚之源者’……至于乾道变化……其篇云五行、阴阳、太极……道学之源，实出乎此。”逐步铺展，层层深入，逻辑严密。修辞手法的使用上十分多样，论据极多，在此每种仅举一例佐证之。有比喻，如“今周敦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尽在孔孟之间矣。”将周敦颐类比孔孟，又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突出周敦颐的功劳作用。有夸张，如明郭惟贤《濂溪先生志序》：“尼山日月结为大年，而叔季漫漫之长夜昭然如昨。斯岂非再辟浑沦、千钧一发者与？”明蒋春芳《周子全书叙》：“而先生垂训之旨，昭然如日中天。”有对仗，如明黄廷聘《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序》：“继孔孟真传，开程朱来学。”有排比，如明陈献章《书莲塘屋册后》：“周茂叔濯缨于濂溪，而世濂溪；程叔子著书于龙门，而世龙门；朱晦庵讲道于考亭，而世考亭。”

综上所述，分布在各种周敦颐文献、或相关理学文献中的濂溪学序跋，内容丰富多样，不仅追忆、歌咏了周敦颐，也在对其思想的阐发中发展了濂溪学，其在传播周敦颐思想、考究周敦颐文献、探究序跋的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均有可观价值。通过探究濂溪学序跋，也可大致获知历代理学家文献序跋的一般写作特点，并体现了序跋在一般文献学上的意义和价值。

人物年譜

谢振定年谱

梅国华 梅 婷

谢振定（1753—1809），字一斋，一字竹湖，号芑泉，湖南省湘乡县（今涟源市）人。

谢氏先世系出会稽，其后徙至吉安，为世族。有讳惟兴者，迁湖广，居湘乡、邵阳之交，至敏湖公始居湘乡之藁潭，六传至珩玉公，配易氏，是为振定高祖考妣。珩玉公康熙元年（1662）故后，珩玉太婆率子添荫、添弦、添蒸，迁居今涟源市金石镇桃林村，康熙十七年修建三进九厅的乐恺堂，现保存完好。曾祖父添弦，字培先，号懋建，配易氏，生子三：如运、如辉、如浑。祖父如浑，字宁朴，号素庵，乾隆壬申恩贡生，以孙振定贵，赠文林郎，晋赠朝议大夫。配刘氏，赠儒人，晋赠恭人。生子四：再诚、再谏、再诏、再谐。父再诏，字凤书，号金门，邑优廪生，乾隆壬午科副举人，以子振定贵，赠文林郎，赠承德郎，晋赠朝议大夫。配刘氏，赠儒人，赠安人，晋赠恭人。振定兄弟五人：长振宇，字元亭，号松淦，邑优廪生，乾隆甲午科举人，充武英殿四库馆誊录官，后任山西五寨等县知县，赠文林郎。次振宙，字缉亭，号熙载，以弟振定赠承德郎。次振宁，字立阶，号栗园，一号枫亭，邑优廪生，乾隆丁酉科举人，署祁阳、新宁等县教谕，实授清泉县学教谕，例授文林郎，以曾孙曷麟贵，赠中议大夫。次振实，字愚谷，号玉峰，邑优廪贡生，候选训导，例授修职郎。次振定。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诞生

五月初四子时，振定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锦石三十六都（今涟源市金石镇桃林村）。〔见谢徵广等纂修民国八年本湘乡式南堂《谢氏大宗族谱》（简称《族谱》）〕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3岁

振定发蒙。老师为长兄振宇。振宇大振定十九岁。

谢振定《哭家大兄元亭之讣》：忆兄授书刚三龄。

谢振定《嘉庆壬戌五月廿八日，同人以余与法梧门学士、贺虚斋侍御、祁鹤皋、杨蓉裳二农部俱于是年五十初度，聚而觴于正乙之祠，雅音引和，谈宴弥日，胜情盛举，余固不足以当之，第念四君于余皆同年，诸君子又皆以文章意气相洽，不约而同，斯亦曩昔嘉会中所罕有也，感而有作，用述鄙怀，兼以志良友殷勤之雅意云》：三龄学伊吾。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9岁

秋，父亲再诏中乾隆壬午科湖南乡试副举人。

法式善《清秘述闻三种》（上册）记载：（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科乡试）湖南考官：侍讲钱大昕，字晓征，江南嘉定人，甲戌进士；修撰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辛巳进士。

题“必也射乎”三句，“宪宪令德”三句，“今夫鼓麦，又同”。

赋得“秋露如珠”得“清”字。

解元丁姓，字鹿友，清泉人。

谢振定《次韩城太傅赋别诗元韵二首》系次王杰诗韵作，有注：“先君壬午乡试出公门下。”

《论语·八佾》：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中庸》：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

命之，自天申之。”

《孟子·告子上》：“今夫粳麦，播种而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淳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

秋露如珠：南朝梁江淹《别赋》有“秋露如珠”之句。唐朝师贞有《秋露如珠赋》。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10岁

读完十三经。（见于《墓表》《墓志铭》及《湘乡县志》）

振定《与李嵩生书》：“仆自十岁习举子业。”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20岁

弱冠参加湘乡县童子试，名列第一。湖南学政褚筠心试而黜之。

长洲吴云时以贡生佐褚筠心幕，对振定文字赞赏有加，因而提出疑义。褚筠心曰：“非文之不工，以神锋太隼，姑少挫而厚殖。”〔见《诰授朝议大夫赐进士出身礼部员外郎前翰林院编修江南道监察御史芑泉府君行状》（简称《行状》）〕

褚廷璋，字左莪，号筠心，长洲人。乾隆癸未进士。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九年以侍读学士官湖南学政。

吴云，字润之，号玉松，长洲人。乾隆戊申举人，癸丑进士。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21岁

参加长沙府试，又为第一，褚筠心卒拔以冠诸生。长兄振宇中举。（见《族谱》）

法式善《清秘述闻三种》（上册）记载：（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乡试）湖南考官：编修李殿图，字桓符，直隶高阳人，丙戌进士；刑部主事洪朴，字素人，江南歙县人，辛卯进士。

题“女为君子”二句，“使天下之”三节，“若夫润泽”一句。

赋得“楚岫千峰翠”得“飞”字。

解元卢达凤，桂阳人。

《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中庸》：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孟子·滕文公上》：“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楚岫千峰翠：唐代诗人韦迢《早发湘潭寄杜员外院长》有“楚岫千峰翠，湘潭一叶黄”之句。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24岁

八月，再诏率子振宁、振实、振定等赴长沙，参加湖南乡试。振定中举人，第四十名。三兄振宁同科中举。《行状》有云“大父率之应科岁”。

湖南贡院正门两旁悬有前湖南巡抚陈宏谋写的对联：

矮屋静无哗，听食叶蚕声，敢忘当年辛苦；文星光有耀，看凌云骥足，相期它日勋名。

法式善《清秘述闻三种》（上册）记载：（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乡试）湖南考官：侍讲王大鹤，字露仲，顺天通州人，丁丑进士；内阁中书李棻，字文翰，江南长洲人，壬辰进士。

题“三年学不”二句，“大哉圣人”一句，“其事则齐”二句。

赋得“风骚列屈宋”得“篇”字。

解元刘定进，武陵人。

“三年学不”，语出《论语》：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大哉圣人”，语出《中庸》：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

“其事则齐”，语出《孟子·离娄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25岁

在岳麓书院读书，与周鏊（号春田）同学。

嘉庆五年六月振定作《江亭话别图序》：“余与春田自麓山同砚席，迄今二十余年。”衡山聂镐敏撰《栗园公墓志铭》：“（栗园）公幼从伯兄山西知县振宇、仲兄勋赠承德郎振宙，及弟廩贡、候选司训振实，翰林院编修、历官礼部员外郎振定肄业岳麓时，均为楚南冠冕。”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26岁

五月十七巳时，长子兴峣生。兴峣，字心兰，号小泉，一号果堂。（见《族谱》）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27岁

是年，乾隆七十大寿，增加一次科考，称乾隆庚子恩科。振定赴京参考。

三月初六，确定会试正考官礼部尚书德保（满）、曹先秀，副考官工部尚书周煌、内阁学士胡高望，同考官程晋芳等十八人。

振定会试房师程晋芳，字鱼门，号戢园，安徽歙县人，辛卯进士。

三月初九，第一场开考。

会试四书诗题：“则众物之”一句，“罔之生也”一句，“尽信书则”一句，赋得“春日载阳”得“风”字。

三月十一巳时，父亲再诏亡故，享年六十岁。

三月十二第二场开考。

三月十五，第三场开考。振定忽怦然心动，几乎不能终卷。

五月初九，贡士录取完毕。

五月初十，殿试。

殿试策：孟子述道统之传，自尧、舜以至于孔子。盖谓心法、治法，同条共贯也。然帝王之学，与儒者终异。保大定功之要，其果在观未发之气象，推太极之动静欤？永嘉学派，朱子讥为事功。真德秀作《大学衍义》，其目自格致、诚正至于修、齐而止，治、平之经略不详焉。抑又何欤？

殿试读卷官纪晓岚、曹文植、谢墉等八人。

五月十五，传胪：录取新科进士一百五十五名。其中一甲三名，汪如洋、江德量、程昌期；二甲五十一名，关槐、程维岳、初彭龄、甘立猷等，振定为第十六名；三甲一百零一名，法时帆、萨彬图等。

五月十八，馆选出炉。振定与关槐、初彭龄、吴蔚光、甘立猷、法时帆等二十六人改庶吉士。程维岳、萨彬图等十八人分部学习。陈鸿举、周拱、李光时、罗拔、刘具斌、张涟以知县即用。余俱归班铨选。（以上见《清实录·乾隆朝实录》《清代职官年表》《清秘述闻三种》等）

“则众物之”一句，语出《大学》：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

“罔之生也”一句，语出《论语·雍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尔。

“尽信书则”语出《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赋得“春日载阳”，语出《诗经·国风·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几日后，家讣至。知父故，回家丁忧。

出任湖南常宁双蹲书院山长。双蹲书院始建于宋绍熙五年，重建于清康熙二十五年，“规画措置，与岳麓、石鼓等观”。（见儒宗堂《贺氏五修族谱·卷四》）

谢振定《贺母邓孺人八一寿序》：“岁庚子，余谬主双蹲书院讲席。”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28岁

丁忧。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29岁

正月初九亥时，母亲刘氏亡故，享年六十六岁。（见《族谱》）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30岁

二月初六子时，次子兴岨生。兴岨，字紫亭，号湘帆，一号切庵，别号季实。（见《族谱》）

秋，作《桦美公讳逢璫七秩寿序》。（见光裕堂《湘乡凌氏三修族谱》）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31岁

冬，丁忧将满，北上进京。未果。到离湘乡县城二十余里的湖山朱同文家。正值朱氏修谱，应邀作谱序。（见《湖山朱氏族谱序》）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32岁

正月初一，诰命赠祖父如浑、父亲再诏为文林郎；赠祖母、母亲为孺人。（见《谢氏大宗族谱·首卷上·诰敕》）

正月，离家赴京，入翰林院学习。

《行状》：“乙巳服闋入都。丁未散馆授编修。”

时翰林院掌院学士阿桂（满）、嵇璜（汉）。（见钱实甫著《清代职官年表》）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33岁

正月十三，为湘乡秀溪萧文炳作《文炳公八十寿序》。

翰林院学习。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34岁

四月二十，乾隆帝召见汪学金、曹振鏞、谢振定等翰林院散馆庶吉士。曹振鏞、谢振定等二甲之庶吉士授编修，充国史馆纂修。三甲之庶吉士俱授为检讨。（见《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接夫人周氏及小孩入都，住顺治门外椿树三条胡同东口第一大门。

时兴峣八岁，兴岨四岁。兴岨出天花，病危，同乡罗国俊为其治愈。罗国俊，字宾初，号九峰，己丑进士，振定同乡。

陶澍《初庵公墓志铭》：“余有知心交，曰谢初庵（兴岨）……四岁随乡贤公入都，出痘濒危，而阁学罗国俊活之。”

三兄振宁（号栗园）进京参加丁未科大挑，二等，署湖南祁阳县教谕，后署新宁县教谕，实授清泉县（今湖南衡南县）教谕。

谢振定嘉庆十二年八月《祭栗园家兄文》：“弟别吾兄二十有一年矣，溯丁未计偕之岁，聚首对床仅数阅月耳。”衡山聂镐敏撰《栗园公墓志铭》：“丁未大挑，截取知县，以教职用。”《族谱》亦有记载。

五月下旬，因文渊、文源两阁所贮四库全书讹舛甚多，根据永瑢、阿桂、刘墉等奏请，振定与法式善、程昌期、初彭龄、甘立猷、罗国俊、王鍾健、顾宗泰等二百五十余员抽往两阁校阅四库全书，每日看书二匣。〔见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质郡王永瑢等奏现办复校文渊文源两阁书籍事宜折（附清单二）〕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35岁

四月二十，应英和之邀，与法式善、王正亭、萧云巢至丰台看芍药。此行振定与法式善均有诗存世。

六月初三，应法式善之邀，清晨出发，与萧云巢、英和到法式善居住的海淀观赏荷花，再到极乐寺。有诗。同年法式善已是侍读学士，奉旨充日讲官起居注官。

绰络·英和（1771—1840），初名石桐，字树琴，一字定圃，号煦斋，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官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銜。著有《恩福堂诗集笔记》等。

法式善（1752—1813），姓伍尧氏，原名运昌，字开文，别号时帆、梧门、陶庐、小西涯居士，蒙古正红旗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授检讨，迁侍读，官祭酒。著有《存素堂集》《梧门诗话》《清秘述闻》等。

六月二十五，乾隆帝下旨“以内阁学士胡高望为江南乡试正考官，编修谢振定为副考官”。（见《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胡高望为振定会试座师。此次以礼部侍郎出任江南乡试主考官，两人相得无间。（见《江南乡试录后序》）

法式善作《送谢芴泉编修主试江南》。

立秋前一天，法式善与同人再游极乐寺看荷花，想起振定，作诗《立秋前一日再游极乐寺看荷花有怀芴泉》。

立秋之后，法式善作《怀芴泉》一诗。

江南乡试在南京江南贡院举行，考生为江苏、安徽两省士子。

法式善《清秘述闻三种》（上册）记载：江南乡试四书诗题：“巍巍乎其”二句，“日月星辰”一句，“孔子登东”四句。赋得“珪璋特达”得“真”字。

“巍巍乎其”，语出《论语·泰伯第八》：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孔子登东”，语出《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日月星辰”，语出《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

唐朝诗人皎然《桃花石枕歌送安吉康丞》一诗中有“珪璋特达世所

珍，吾知此物亦其伦”句。

九月十二，江南乡试揭晓。〔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谢振定奏稿（简称《奏稿》）〕

初得元卷，振定谓其文醇厚，必是端人。榜发，果然是江南孝子季惇大。第二名赵文楷。录取季惇大、赵文楷、吴云、程元吉、石葆元、吴赓枚、彭希郑、杨名升、张士元、严钟铭、黄钺、黄丕烈、雷莹等为举人。〔见《谢振定行状》《清诰授朝议大夫、礼部员外郎加二级、前翰林院编修、江南道监察御史谢芾泉先生崇祀乡贤录》（简称《崇祀录》）等〕

江苏松江府华亭县学附生雷莹为第七十九名举人，其硃卷仍存于世。雷莹硃卷后，同考试官安徽来安县知县王某阅后，签一“荐”字；大主考、国史馆撰修、翰林院编修加一级谢振定批：“取！”又批：“铸史镕经，光焰万丈。”大主考、文渊阁直阁事、尚书房行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加三级胡高望批：“中！”又批：“閤深肃括，积健为雄。”（见上海图书馆藏本《雷莹乡试硃卷》）

季惇大，字濂溪，一作濂期，泰兴人。乾隆五十三年戊申皇太后万寿恩科江南乡试解元。嘉庆初举孝廉方正，授六品衔。事母以孝，接人以恭。于诗文外，尤精绘事。著有《洗心编》《濂溪全稿》。

赵文楷（1760—1808），字逸书，号介山，安徽太湖县人。嘉庆元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嘉庆五年出使琉球。嘉庆九年，出任山西雁平道，署山西按察使。嘉庆十三年卒于任上。

石葆元，字镜心，宿松人。清朝官员。嘉庆乙丑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著有《清贻馆遗稿》。

张士元，江苏震泽人，中举后，授以教谕，不就，主讲诸暨书院。其《述谢振定》称：“方公典试江南时，士元幸获收录，后一再至京师，客车最久，蒙公之慰诲亦最厚。”

严钟铭，字策勋。幼孤，母冯氏慈而严。四上公车不第，课徒养亲。嘉庆六年谢振定《赠严生策勋序》：“严生钟铭，余戊申典试江南乡试所得士，性愿恇而苦志于学，屡上春官不得志。”

黄钺，字左田，安徽芜湖人。中举后两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銜，军机大臣。刘大观《知耻斋文集序》：“振定门下士黄钺位跻正卿，为辅弼大臣，多建树；吴云抗疏劾权贵，直声满天下：先生未竟之志，惟两君继之，两君所行之事，惟先生倡之。”

作《江南乡试录后序》，提出国家设科取士之意，乃明体达用，备异日任使。

回京后拜访褚筠心，聊及吴云。褚曰：“君与吴生何针芥之合耶！”言振定补诸生时，其卷固吴生激赏者也。时为美谈。（见《行状》）

邀请法式善等喝酒。法式善有诗《芄泉编修招饮》。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36岁

正月十三，雪后，应英和之邀，与法式善、陈士雅、萧云集、李莲石辈饮篆香书屋。法式善有诗《上元前二日雪后煦斋招同谢芄泉陈每田士雅萧云集李莲石辈饮篆香书屋》。

陈士雅，字莓田，湖南长沙人。乾隆五十二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后辞官，历任常德朗江书院、衡阳石鼓书院、长沙城南书院山长。著有《山右遗迹考》《考古辨正》《春草堂诗钞》《春草堂文集》。

兼充武英殿纂修。（见《行状》）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37岁

正月初一，诰命敕封振定伯父谢永清为承德郎、伯母为安人。（见《谢氏大宗族谱·首卷上·诰敕》）

三月，振定担任殿试掌卷官。（见《崇纪录》）

八月十三，乾隆帝八十大寿。振定作《皇上八旬万寿赋谨序》。[见《四库全书》之《集部集成·诗文总集·清·董诰·皇清文颖续编（武英殿刻本）·卷四十八·赋》]

九月初九，重阳节，接长兄振宇手书。（见《九日感怀二首》）

缪晋赠诗《赠谢芄泉编修即用其和褚筠心前辈题花卉画册韵》，称爱

君文笔如芳春，爱君书法如秋霜，楚南才多君最著。（见缪晋《缪寄庵诗稿》）

缪晋，字申甫，也作申浦，号寄庵，江苏江阴人。乾隆四十年进士。

十二月二十一，长兄振宇亡故，年仅五十八岁。振宇中举后，曾充武英殿四库馆誊录官，后议叙知县，先后代理山西猗氏县、马邑、黎城县、崞县、神池县、宁武县知县，题补五寨县知县。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38岁

作《哭家大兄元亭之讣》七言长诗一首，怀念长兄。

二月初八，翰詹大考：翰林院满汉侍读学士（从四品）以下、检讨（从七品）以上，詹事府满汉少詹事（正四品）以下、赞善（从六品）以上共九十六人，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参加考试。振定为三等第五名，总第十八名。

题为“拟张衡《天象赋》”“拟刘向《封陈汤甘延寿疏》”，并陈“今日同不同”，赋得眼镜诗。

二月十二日，下谕：此次考试翰詹各官，按其文字优劣，分为四等。一等：阮元、吴省兰；二等：胡长龄、刘凤诰、陈嗣龙、汪廷珍、刘镗之、蔡共武、曹城、程昌期、崔景仪、吴树本、邵晋涵等十一员；三等：潘绍经、陈崇本、余集、俞廷樛、谢振定、朱理、曹振鏞、裴谦、祁韵士、汪如洋、钱樾、甘立猷、法式善、关槐等七十四员。四等：李鼎元等八员。不入等：集兰一员。

一、二等仅十三人，均有升职。其中吴省兰从侍讲（从四品）升授詹事（正三品），阮元从编修（正七品）升授少詹事（正四品）。

考列三等之员，只有一人提拔，即排名谢振定之后的编修曹振鏞（三等十名），“虽考列三等，但观其才具，尚堪造就，且系曹文植之子，着加恩升授侍讲”。

振定、罗国俊（三等四十七名）等三等中间以前的不升不降。

三等中偏后的另行分别录用、改任、降职使用。如少詹事恭泰降补侍

读，少詹事罗修源降补右庶子，侍读学士达椿著降补侍讲，侍讲学士陈崇本著降补侍读，侍讲学士王坦修著降补洗马，侍读德昌、陈万青，侍讲文宁中、允朱紱，赞善刘种之、裴谦，各降留编修检讨。

甘立猷考列三等五十一名。

法式善考列三等五十三名，由从四品的侍读学士降为从五品的兵部员外郎。

关槐考列三等五十八名。

三等六十名以下经朱笔单点之程嘉谟、李骥元、杨祖纯、吴玉纶、瑚图礼，罚俸一年；七十名以下之汪滋畹、翟槐、翁树培、邵玉清、汪鏞，俱罚俸二年。

考列四等之员，诗赋俱属庸谬，但观其才具，尚可录用之周琮、刘锡五、邵瑛、吴灼、李鼎元，俱加恩以内阁中书用。达林、朱依灵、永安，俱着休致。

不入等之侍讲学士集兰革职。（以上均见《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复充《八旗通志》馆纂修。（见《行状》）

九月初九，作《九日感怀二首》，怀念长兄振宇。

是年，纪晓岚任《八旗通志》馆总裁。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39岁

二月十三，乾隆帝接见二百五十九名京察保送一等及以上人员。谢振定与秦瀛、蒋予浦、曾燠、朱白泉、高三畏等一等加一级。（见《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忽然一梦：仿佛为人书黄山谷“淮南二十四桥月”诗一幅，字大如斗。卜筮崇效寺，言振定会重游江南。（见振定《出都门口占》诗自注）

黄庭坚诗《往岁过广陵值早春尝作诗云春风十里珠帘卷》：淮南二十四桥月，马上时时梦见之。想得扬州醉年少，正围红袖写乌丝。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40岁

正月二十，参加翰林院侍读学士罗国俊（九峰）上六十寿宴，作《罗

九峰前辈六十寿》诗一首。

二月初四，座师褚筠心生日，振定与诸同年前往祝贺。不久前，褚筠心喜迁新居（药圃兰房），曾邀人小聚。顾宗泰有诗《正月十日褚筠心学士招集新居之茶墨间即席有作》，褚廷璋有《癸丑新正十日邀顾员外星桥、冯侍御实庵、钱殿撰湘舫、周主政约斋小饮，星桥以诗见视，次韵二律》，又有《移居二首用星桥唱和诗韵》。振定《和褚筠心师移居四首用顾星桥吏部韵》自注“二月四日师寿辰及门毕集”。（见顾宗泰《月满楼诗集》卷三十三、褚廷璋《筠心书屋诗钞》卷十二及《知耻斋诗集》卷一）

春，应邀为河南郑县纪村卫氏作《纪村卫氏族谱序》，提出“谱，孝思也”“子孙之贤在于读书明理、敦本务实而已。其贤者引绳削墨，相率而为善，则不类者耻焉。耻心生而善气旁溢，上可以备国家之用，下可以树乡里之型”。

五月，湖南善化唐仲冕中进士，未进翰林院，出任荆溪（今江苏宜兴）知县。振定送唐至潞河（通州），舟中话别，作诗《题唐陶山〈清湘欵乃图〉》《送陶山宰江苏即题其深柳听莺小照》。

门生吴云中进士拜访，示其两年前偕友游虎丘之《岁除游山图》，振定欣然作《题吴玉松〈岁除游山图〉》。

褚廷璋《为吴玉松题〈夕除游山图〉》有注云：“玉松于辛亥除夕偕邹紫珊、袁竹室、汪墨庄游虎阜，竹室为图，同人皆有诗。”

同月，同年初彭龄以光禄寺少卿提督湖北学政，振定作《送初颐园光禄视学湖北》。

初彭龄，字绍祖，号颐园，山东即墨人。

七月，应湖南安仁欧阳青田之邀，作《欧阳母周太安人五十一寿序》。

为湖南桂阳李其文父作《学博李绣麓先生六十寿序》。李绣麓曾任安乡、辰州、茶陵、安化等地学官。振定提出“学校之设，其非徒校艺、修文之谓，其谓经术行义诲导诸生，有躬问学、端矩矱，出入不悖所闻者，庶几敦本立教以移风而易俗焉。”

八月初四，法式善因儿子桂馨出生，在诗龛做三朝酒，振定赴宴并赋

诗《贺法时帆举子》。

立冬前一日，缪晋召集罗九峰、谢振定、马雪峤、邵二云、王一斋、洪亮吉小聚。振定有诗。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41岁

五月，擢都察院江南道监察御史，不愿就任，经乡试副考官李燾再三劝勉才去上任。（见《送李沧云夫子南归步留别元韵》诗中自注）

秋，褚筠心告老归籍，作诗《恭和筠心夫子归里述怀原韵即用送别》和其《甲寅秋老病归田述怀四律》。

九月，奉命巡视南漕。

十月十七，上折谢恩，恭请圣训。乾隆帝召见，嘱咐：漕务以速为要。观汝才具，能办事。但闻旗弁漕丁皆甚苦，汝此去，须为朕怜惜之。（见《奏稿》《崇祀录》）

十月二十四出京，作《出都门口占》诗一首。近月来，赠诗送行者甚众。胡黄海（翔云）同行。振定有《和胡黄海任邱旅邸偶作韵》《和胡黄海途中微雪作》《董子祠和胡黄海》《和黄海齐河感怀》等诗。

胡黄海将赴淮扬，作《赆诗图》一幅，七律四首，索同好和题，翁方纲、法式善、谢振定、吴云、张问陶、方维熊、甘立猷等题诗，前后凡八十三家。

途经山东，游泰山，作诗多首。

过泰山一天门后，在跨虹桥看到唐仲冕勒石绝句，欣然如见故人，赋诗一首：“失喜陶山入望来，丹崖赤字独徘徊。吟情正忆鸣琴暇，罨画溪头日几回。”寄给在荆溪担任县令的唐仲冕。

途中作《芟泉三癖》组诗，即《小醉癖》《觅句癖》《爱才癖》；作《三恨词》，即《酒慳》《茶厄》《璞猷》。

十一月十六，到达淮安清江浦，总督漕运部院设于此。会漕运总督管干珍。

管干珍（1734—1798），字复阳，号松崖。阳湖人。清乾隆三十一年

（1766）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工部侍郎。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元年任漕运总督。

十一月十七，与管干珍盘验泗州前帮二十四艘粮船（米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八斗七升五合），因干洁无亏，当令开行前进。大河前帮二十五船粮米已由管干珍于十五日验签。于是，两人联名上奏南粮重运头、二帮船过淮日期。（以上均见《奏稿》）

十二月初，抵达瓜州巡视南漕御史衙门。

过江到达京口，督催漕粮，顺便拜访王文治。

振定《王梦楼先生哀辞》：“乾隆五十九年，余奉命视漕江南，督艘至京口，乃得执后进礼踵门求见，先生一见如旧相识，因与定交。”

十二月十六，王文治过江拜访，邀振定次日游焦山。

十二月十七，到达京口。王文治、朱白泉（朱尔赓额）、鲁铨（选堂）、诗僧借庵等陪同游览焦山。两淮盐运使曾燠（宾谷）因事爽约。半夜，与朱白泉泛舟金山，坐玉带桥玩月，及晓而归，画《玉带桥观月图》，并作《游焦山记》。

李祖陶《国朝文录》收有《游焦山记》，评点曰：宛然如画，如出东坡先生手。

吴嵩梁作《题谢芗泉侍御玉带桥观月图》。

王文治作《嘉平望后二日，同谢芗泉漕使、朱白泉观察暨门人鲁选堂焦山待月次谢韵》，又作《游焦山同谢芗泉漕使有怀曾宾谷都转即次宾谷拟游焦山不果诗韵》。（见《梦楼诗集》卷二十三）

作《王梦楼前辈用焦山韵成长律见赠依韵奉答》。

作《焦山待月醉赠诗僧借庵》。焦山定慧寺主持借庵和诗《梦楼先生同谢芗泉漕使、朱白泉观察暨鲁子山进士过山中，即次芗泉漕使见赠韵》。（见《借庵诗钞》卷一）

鲁铨作《陪谢芗泉、王梦楼两先生游焦山》。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书法家，诗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殿试中一甲第三，有“淡墨探花”之称。官至云

南临安知府。著有《梦楼诗集》《快雨堂题跋》。

朱白泉（？—1824），即朱尔赓额，汉军正红旗人，字述堂，号白泉，原名友桂，字丹崖。纳赉为兵部主事，累迁郎中，出为江安粮道，为官有直声。嘉庆间，官江南盐巡道，治太平河水利，有绩。后坐事戍伊犁。

曾燠（1759—1831），字庶蕃，一字宾谷，晚号西溪渔隐。江西南城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十一年（1806）任两淮盐运使。后升任湖南按察使、广东布政使、贵州巡抚。

借庵（1757—1836），名清恒，字巨超，浙江海宁人，为乾隆道光间焦山寺僧，诗名甚盛，著有《借庵诗钞》十二卷。

鲁铨，字选堂，号于山，丹徒人。乾隆庚戌进士。嘉庆十六年后官广平知府，保定知府，河坊道。工书，嘉庆年间与洪亮吉等纂《宁国府志》。

吴嵩梁（1766—1834），字子山，号兰雪，晚号漱翁，别号莲花博士、石溪老渔。江西东乡新田人。嘉庆五年举人，授国子监博士，旋改内阁中书。道光十年擢贵州黔西知州。后曾两任乡试同考官。

十二月二十一，京口，风顺升旗，镇江卫前帮飞攒渡江北上，后帮亦陆续前进。谢振定奏报京口开坝、镇江帮船渡江日期。同时奏报“两江总督臣苏凌阿亲督道府州县，克期挑竣。抚臣奇丰额亦抵丹阳，于十二月十八日开坝补水”“漕臣管幹珍专飭备弁逐帮迎催”。附带奏报“大江南北瑞雪后，天气晴和，于麦苗有益，民情亦甚恬洽”。（见《奏稿》）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42岁

正月初七人日，与曾燠、王文治、借庵等游焦山。曾燠作诗，振定和诗《和宾谷人日登焦山韵》，王文治有《人日同曾宾谷游焦山次韵六首》。

二月十二，与管干珍联名上奏，恭报首进重运帮船过淮安情形。（见《奏稿》）

二月十五晚，袁枚到达扬州。

二月二十一，振定与王梦楼到扬州拜访袁枚。是年，袁枚七十九岁。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人。乾隆四年进士，曾官县令，后隐居

南京小仓山随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九·一三：乙卯二月，在扬州见巡漕谢香泉先生，乃程鱼门所拔士也，倜傥不凡。《游泰山》五古数章，直追韩、杜。

二月二十二，与王文治、袁枚等再次聚会。袁枚“教香岩拜巡漕为老师”。香岩姓张名培，金陵人。（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〇·一七及《袁枚日记》）。

应两淮都转盐运使曾燠之邀，与王文治、袁枚等至曾燠题襟馆喝酒吟诗，后在曾燠幕府清燕堂观看戏曲演出。王文治作有记事诗《宾谷都转招，同袁简斋前辈、张警堂同年、谢芄泉漕使清燕堂观剧，归途大雪有作》。振定和诗《清燕堂雪夜观剧和梦楼前辈韵》，注明“是日演剧即简斋《子不语》中事”。

二月二十五，袁枚前来辞行。

二月二十七，袁枚写信给振定。

闰二月初十，袁枚到达京口一带。

闰二月十三，与王文治去拜访袁枚，同约至张柯斋处吃酒。张柯斋夫妇拜袁枚为师。振定与袁枚、王梦楼、左兰城、胡黄海及主人，边喝酒边聊天，一更后才散。

闰二月十四，振定与袁枚、张柯斋、左兰城、胡黄海到袁廷极（岸夫）家喝酒，毛五爷、鲁铨与王梦楼后至。席间振定提及编选本朝古文，袁枚记“谢大人要选本朝古文册一本”。（上述振定与袁枚往来，均见王英志整理之《袁枚日记》及《随园诗话》）

振定《与徐夙辉书》：采访一时遗佚、好古之士之文，编为一帙，以存昭代化成人文之备，稍稍求之，日积日富。时随园主人亦有采选古文之举，偶相见邗江，闻仆有志于此，遂举其家手抄名人文集二百余见赠，曰：“余老矣，想不能竟厥事，今以此为托，愿君之无欲速成也。”

闰二月十八，与管干珍、奇丰额联名上奏，恭报二进帮船过淮谨遵圣谕查验米色情形。（见《奏稿》）

春，上千漕船齐集京口，欲渡至瓜州，入运河，然非东风不能入，但连日西风强劲，船不能进。振定“斋洁致祷江神，并望空默祝，倘得风顺速漕，必筹费请建风神专祠，以答神庥”。是夜，东南风起，“每日渡船百余只及百七八十只不等”。

闰二月二十八，江浙六十四帮三千二百二十二艘粮船全数渡江攒进瓜州口北上。

三月初一，振定上奏，恭报江浙重运漕船全数渡江并捐建风神庙恳请敕赐御书匾额以崇祀典。乾隆帝准奏，并亲书“翊灵佑顺”四字以赐，且在振定奏稿后朱批“即书发去”。（见《奏稿》）

常镇道、淮扬道、镇江府、丹徒县、镇江卫等文武主官共同商量，筹资、选址、规划，择基于银山之东北麓，背崖面江，建屋两进，堂其内而门其外，并筑墙垣。乾隆御书“翊灵佑顺”牌匾悬于门楣。自此，风神始有专祠。此后，每次渡江，甚或一日数次往返，无不顺利。京口一带，有“谢公风”之称。（见《奏稿》《清史稿·列传·谢振定》《行状》及陶澍《重修京口风神庙碑记》）

三月十三，所有湖广、江西重运十九帮全部挽入瓜口。

三月十五，振定奏报南漕重运全数挽入瓜口。（见《奏稿》）

王文治作《送别谢芑泉漕使》，自注云“芑泉登岱诗苍奇似杜”。（见《梦楼诗集》卷二十四。振定作《和梦楼前辈赠别韵》）

曾燠作《送谢芑泉漕使》：“别有歌声忘不得，汪伦情似潭千尺。”（见曾燠《赏雨茅屋诗集》卷之二）

在扬州与尤荫等游尺五楼赏芍药，作诗《和尤水村布衣》。

是年，王文治将曾燠、谢振定、借庵、王文治、张铭、胡翔云、陈燮、王少林、詹肇堂、黄道开、程元吉、胡香海、郭厚菴、骆佩香等十四人所作的五言诗七十八首，结集为《焦山唱和诗》并书写，请刘次山摹镌，刻石十六块，立于焦山。今存石刻两块，石刻拓本七十八页。

振定督船北上。

四月十四，与管干珍联名上奏，恭报重运军船尾帮全数渡过黄河，妥速前进。

四月二十七，重运帮船全数攒出江南汛境，即日入山东台庄闸河。济宁巡漕御史祝云栋自济宁迎催至此，山东兖州镇总兵富成由闸河提攒至此。于是，管干珍、祝云栋、谢振定、富成四人联名奏告。同时奏告“上年尾帮全入山东系五月初四日”，云南运铜船十一艘“亦星催出汛并无事故亦无迟逾”“沿途所见麦秋收获、村户安恬大田播种”。五月初六，乾隆帝朱批“欣悦览之”。

振定巡漕任务完成，由陆路回京复命。

五月十九，振定上折，恭复恩命：“臣奉命巡视南漕，所有各省重运帮船，均经全数攒过台庄，跟接北上。臣谨照例驰复恩命，为此缮折恭奏。”（见《奏稿》）

五月，经山东滕县，正值枣树开花，作诗《滕县道中》。

六月底，热河复命。乾隆帝询及江南年岁及湖南苗疆情形，振定一一作答。乾隆曰：“汝风尘满面，此次甚辛苦，可即回京歇息。”振定告退，离开热河回京。乾隆想复又召见，振定已经走远。（见《崇祀录》）

游古北口长城，作诗《至古北口》。

振定往视南漕之前，大学士和珅以代购异玩为托，振定心里不愿，口里应承，更未留意购买，返京没有回信。和珅间接问及，振定亦“顾左右而言他”，和珅自然不满。（见《行状》）

七月，振定兼任京畿道监察御史。

八月，署兵科给事中，监视海仓。

十月，奉命巡视东城。（见《崇祀录》）

两次接同年李嵩生信，作答介绍巡城情况及心态：“顷奉巡视东城之命，戴星出入，自矢冰兢，剔弊摘奸，闻风者稍为敛迹。庶几少资历练，以免迂儒无用之消。”并求帮助搜集本朝古文。

嘉庆元年丙辰（1796）43岁

正月初一，接唐仲冕信，知唐不甚安心，想另谋出路，振定回信：“改图之说，再四思维，断乎不可。”认为不应该舍难取易、舍险就夷、安于清贵，而应该有所济世，“一介之士苟存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况县

令，亲民之官，诚易达而惠易周，试经纶之才者莫先乎此，奈何欲舍而他适？”（见《与唐陶山书》）

正月二十八，四兄振实亡故，年仅四十五岁。（见《族谱》）

三月十八，京师优伶神会，振定巡城归，至珠市口，遇有乘违制车，从奴十余辈，彪彪前闯道者，隶卒辟易，呵斥不理，执而讯之，为和珅妾弟。语不逊，振定命痛笞之，遂焚其车。曰：“此车岂堪宰相坐耶？”且令将骡头发坊，变价入官。

三月二十三，巡视中城给事中色克通额、王钟健希和珅意，上奏称“京城为商贾云集之地，此等飞车任意驰骤，动至碰坏物件，轧伤人口，自应严行究治”，但谢振定处置不当，“焚毁车辆、骡头变价，从无此例……殊属不合”“请旨将该御史交部议处”。

振定被革职。（以上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色克通额、王钟健奏稿、《清史稿·列传·谢振定》《行状》）

御史管世铭笑曰：“今日二公各有所失。”有问之者，答曰：“谢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过一身。失名之患，致传千古矣。”（见昭槁《嘯亭杂录》之《谢芗泉》）

是时，振定名动京师，且有童谣讥讽相府，有人担心振定安全，振定怡然于诗酒，自题所居曰“心太平书室”。（见《行状》《墓表》）

礼亲王爱新觉罗·永恩为八大铁帽子王之首，看重振定人品学识，聘请振定为儿子昭槁（汲修）老师。（见《行状》）

时年永恩 69 岁，昭槁 20 岁。昭槁记载：（振定）与余交最善，尝屡戒余之浮妄躁进，余懃服之。尝曰：“君子之交，可疏而厚，不可倾盖之间顿称莫逆，其交必不久也。”（见昭槁《嘯亭杂录》卷之《谢芗泉》）

四月，门生赵文楷殿试钦点状元，嘉庆帝御批称赞他“文楷佳名期雅正，为霖渴望副求贤”。

七月初六，立秋后一日，应同年甘立猷邀，与法式善、王友亮、宋云璽等游尺五园，欣赏残荷。王友亮称其在扬州写的诗句“酒痕红到绿杨城”，江南士人至今津津乐道。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集部三·知耻斋诗集六卷》：杨钟义《雪桥诗话》卷九亦称其在扬州时有“酒痕红到绿杨城”之句。

十月初六，嘉庆帝召见新任知府以上官员，向吏部尚书刘墉询问新选浙江处州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刘墉说“尚可”。实际上戴十分庸劣，难以胜任。振定对刘墉颇为不满，以《否》卦彖辞予以讽刺。《否》卦彖辞有言：“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见昭槁《嘯亭杂录·刘文清》）

十一月初，振定出都，为吴越之游。

二游泰山，再谒岱庙。

冬至后至峒嵎山，即今江苏省新沂市南马陵山支脉峒嵎山，作《峒嵎山下题壁》。

嘉庆二年丁巳（1797）44岁

春节前后到达扬州，与两淮都转盐运使曾燠相聚题襟馆，作诗《柬曾宾谷》。

到平山堂，吊唁江德量。（见题《诗龕图》）

江德量画作遗笔即为《诗龕图》。振定嘉庆五年庚申岁作《题诗龕图，图为江秋史遗笔》自注云：“余三过扬州，哭于其家，稍为经理旧业，愧未能周也。”

二月初七，重游京口，王文治、祝德麟（芷塘）、茅元铭（耕亭）、汪廷昉（研芎）等同游焦山，会饮于归帆读书之堂，晚宿自然庵。醉后作诗有“为访梅花信，三年两度来”之句。

二月初八，晨起听祝芷塘、毕汝山弹琴梅竹之间，作诗有“江山有清气，泻入七条弦”之句。（见《知耻斋诗集》卷二）

作画，题为《自焦山放舟金山观月》。赵翼、鲍之钟、周鏊等题诗。

二月中下旬，到达金陵。

到随园看望袁枚，闻袁枚腹泻一月有余，见面却见鹤发童颜，作诗《抵金陵过随园问病》。

与张香岩、朱涧东等游栖霞山，作《题朱涧东画兰卷》《同张香岩、朱涧东同游栖霞山，宿般若台》《叠浪岩》《紫峰石丈歌》等诗。

多方打听，找到会试房师程晋芳先生儿子程翰、程溧等亲人。程晋芳本为殷富之家，但他不善理财，又好施与，家道逐渐中落，乾隆四十五年任会试同考官时，已是极度贫困。乾隆四十九年，因负券山积，势不能支，便乞假赴陕，找巡抚毕沅谋归老计。到陕不足一月，即于六月二十一卒于巡抚衙署，年六十七岁。毕沅赠费，松太巡道赠地，袁枚操办，葬于金陵冯家山。袁在祭奠时，焚毁程所欠五千金借据。其家人从此自京城迁住金陵。振定其时在家丁忧，次年期满入京，才知房师死葬之情。此次出京之前，振定便谋划收集房师经说文稿付梓。程翰、程溧说已找到父亲《周易知旨编序》《尚书今文释义序》《尚书古文解略序》《春秋左传翼疏序》《毛郑异同考序》《礼记集刻叙》等文章，编成《勉行堂文集》，只未付印。振定大喜，即答应出资刊刻。聊到兄弟前程，程翰已是候选县丞，程溧才十八岁，正在读书，振定认为程翰任职为当务之急，再次出资以助。不久，程翰分发陕西任职。（见《崇祀录》）

清明前夕，抵达苏州，游狮子林，作诗称“云林画石气浩浩，此是云林一画稿”。

三月初八，清明，黄丕烈等陪同虎丘泛舟，作诗有“东风未到我先到”之句。

因黄丕烈介绍，知著名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侨居于此，遂往拜访，意犹未尽，次日又写信，提出古人作品之所以流传，“其心理同也，有同乎其同者，有同乎其不同者。文以载道，此同乎其同者也。文生乎情，此同乎其不同者也。六经为载道之文，亦秉情酌理之文也”。（见振定《与段若膺书》）

三月初九夜，与唐仲冕胥江舟中相遇，长谈，作诗《胥门舟中别晤唐陶山夜话》，称“君来非我迎，梦寻巧相赴”。又会其子唐鉴（翁泽），观其《琴鹤图》并题诗。

一名叫虔化的读书人寄居吴门，求斋额，振定取名“寄巢”，并作诗。夏，到达上海，前往拜访王昶，未果。

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芗泉……性好山水，为东南汗漫游，尝访予青溪，以病未见。乃历五茸、三泖，过嘉禾，至西湖，又渡曹娥江，览鉴湖、葺山之胜。所至士大夫虚左迎之，酣畅淋漓，酒痕墨沈中，获其存纸，珍为拱璧。

到达杭州，住万峰山房，与诗僧小颠相处甚欢。小颠法名禅一，其诗清雅稳健，诗名甚高，振定作《赠万峰山房诗僧小颠》《薄暮同小颠碧华看莲花》等诗。

浙东著名藏书楼二老阁传人郑简香，以孝廉方正就征到杭州，访振定于万峰山房，振定“亟问所谓二老阁者，故无恙，而其所藏书，半轶于四库采辑写本还真之日，后又不戒于火，虽有，存焉者仅矣”，作《赠郑简香征君序》。

浙江布政使谢启昆辟东园屋，得永平砖八块，大喜，定为晋惠帝时物，赋诗纪之，邀振定至藩署欣赏，振定作诗《永平砖歌为家蕴山方伯作》，在藩署蓬蛮轩中见一大铁镬，又作《铁镬歌次蕴山方伯韵》。

应浙江学政阮元之邀，泛舟西湖，作《阮芸台学使招饮湖上赋谢兼示同人》。

游灵隐寺、飞来峰、通天洞（龙泓洞），陪客中有人见洞中有蒋之奇、贾似道等人的题名，欲刻振定诗于通天洞，振定婉言谢绝，称“洞可通天路已迷”“多少游人不肯题”。

游览并宿于西湖西南之云栖寺，赏观香光（明朝董其昌）《金刚经》墨迹。

游览西湖之西的九溪十八涧，作诗《理安寺》。

游浙东天台山，观赏国清寺、石梁飞瀑、华顶归云等景点，作《天台万年藤枝歌谢僧信传》。

诗僧小颠告别，作《次韵和小颠送别》。前往绍兴，还在回忆杭州之游，想念小颠，有“倚醉呼明月，同僧听子规”句。

到达绍兴。在同科进士、绍兴府知府高三畏及性海上人等的陪同下，振定登兰渚山，游兰亭，颇多感慨，夜宿兰亭右后方不远的天章寺。作

《游兰亭憩天章寺》《再题兰亭》。

观禹庙，游鉴湖、若耶溪、云门寺，登吼山、戢山、塔山，三江闸观潮，望海亭晚眺，拜谒刘宗周祠，上天镜楼追忆蒋心余先生。

再到上海，同孙恒堂游五石山房。苏松太道李廷敬（宁圃）在嘉荫堂宴请。

与汪潮生（饮泉）等观画、喝酒、吟诗，作《题汪饮泉林屋幽居图》。接到王梦楼赠诗，闻说其已生病，作诗奉答。

应袁廷桢之邀，赴宴五砚楼赏桂花。

秋，再到苏州。

友人方台山、陆铁箫带袁枚门生贾崧拜见。方台山、陆铁箫介绍：上年，顾光旭编成《梁溪诗钞》，内收无锡诗人自东汉至清朝共一千一百四十九位诗人的诗歌。没有收入此书的诗歌，由贾崧（字景乐，号素斋，邑诸生）瘞埋于惠山脚下，成为一个“诗冢”。九月初十举行仪式，一时名流咸往会葬。方台山、陆铁箫请求谢振定将此事写成文章，振定急于回京，没有答应，仅赋诗一首送给贾崧。（见振定《梁溪诗冢图咏跋》）

中秋后，离开苏州返京，惟载书稿数十麓。振定《胥江留别二首》自注：余以中春来，以中秋去。

到达山东沂州，观琅琊八景之孝河凝冰，作诗《过沂州》，感叹“如何不朽业，只让古人能”。

回京后，将江南之行百余首诗结集为《云将小草》。法式善有《题云将小草后》。

邀请法式善共同编撰本朝古文《今文淳》。未果。

法式善《诰授朝议大夫礼部员外郎前翰林院编修江南道监察御史谢君墓表》：“约余仿黄梨洲选《明文海》例，辑国朝文为一编，曰《今文淳》，上继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苏天爵《元文类》。自江南载十数书麓而归，执余手相谗托，以其事为不可不慎。”

腊月，闻袁枚故，作《挽袁简斋前辈》。

嘉庆三年戊午（1798）45岁

某日宿礼亲王家，晨起，和礼亲王观花，作诗一首，和诗一首。《和礼亲王早起观花韵》有“花随笑口开，不知花醒未”句。

五月初八，与法式善等宴别同年吴树萱（典试粤中），和诗一首。

六月初八，参加法式善组织的西涯雅集。翌日为明朝大学士李东阳生日。李东阳所居之处曰西涯，法式善参考李东阳《怀麓堂集》及其他书籍，考证出李东阳故居在“今得胜桥东南汇通祠前，所谓积水潭者”。翁方纲复核确认。故法式善在西涯故址组织西涯雅集，谢振定、大兴县令章石楼、宛平县令郭虚堂等十六人参加。因李东阳系湖南茶陵人，法式善安排谢振定为“貳主”。与会者祭拜后，积庆亭以澄心堂琴，弹奏《平沙》一曲，何兰士（道生）、凤仲梧依次弹琴。四人作画：笄绳斋（立枢）布垣庐及所来径，马秋药绘水增草树，谭湘琴写隔岸柳色又益石，罗两峰补图中人物苔点。

六月初九，再聚，三十二人参加。振定暴病，上午未去。中午，宋鸣琦（梅生）前来相邀，振定抱病参会。此次聚会，振定以《六月九日为茶陵李文正公生日，先一日法时帆祭酒招同人集积水潭拜瞻公像，盖西涯旧址也，是日即席口占》为题，赋诗五首，并作《西涯雅集记》。李祖陶《国朝文录》收有此文，点评曰：“此真雅集，不料软红尘中有此事也，惜未获身与其间。”

法式善、胡逊、郭虚堂等人在畏吾村大慧寺西找到李东阳墓，然墓地已属寺产。

英和冒雨来访，两人喝酒赋诗。英和诗为《雨中过访谢芗泉侍御》，振定诗为《英煦斋学士雨中过访留饮，有诗见贻，依韵奉答》。

七月十九，立秋，与宋梅生、谭湘琴、瞿邳亭、潘芝轩等会饮于玉泉庵。

顾宗泰（星桥）出任高州知府、罗两峰倦游回扬州，振定请客知耻斋，谭湘琴、门南田作陪，喝酒至三更。约定三日后在门南田家再聚，同时约定谭湘琴作《金台话别图》，振定作序。

送别罗聘，作《送罗两峰归扬州》。

八月十四，礼亲王永恩七十寿辰，振定作诗相贺。

作《和汲修世子秋声八咏》组诗，即《林声》《雨声》《柝声》《角声》《铃声》《砧声》《嶋声》《虫声》。

十月十五日，二兄振宙亡故，享年六十一岁。（见《族谱》）

冬夜，与朱白泉、昭槁小集绿筠堂，挑灯剪烛，谈论天下古今事，潸然泪下。（见昭槁《嘯亭杂录》之《朱白泉狱中上百朱二公书》）

与尤维雄饮酒，两人大醉。尤维雄《同谢芎泉饮铁门酒楼醉后赋赠》诗有“嫉恶心犹在，休官道乃光”之句。

腊月，礼部郎中张祥云出任庐州知府，振定为其《扬子饱帆图》题诗，有“君去且沽京口酒，居人应说谢公风”，并自注云“余视漕过江往来十余，皆遇风顺，时人称谢公风”。

嘉庆四年己未（1799）46岁

正月，乾隆驾崩，嘉庆亲政，和珅伏法。

三月十七，与周兆基、叶绍棿游钓鱼台，归途过白云观，作诗。

王昶从上海寄诗相赠，诗为《题谢侍御芎泉振定〈云将小草〉二绝》，诗后署名“七十六岁老人王昶手题”。振定和诗回赠。

五月十五，礼部侍郎罗国俊逝世，作挽词二章。

七夕、立秋，同人集赵怀玉亦有生斋消暑。

中元节，邀宋梅生食羊肉。宋梅生有诗《谢芎泉侍御招饮食全羊戏柬奉谢》，自注云“饮罢即得腹疾”。振定和诗《中元邀宋梅生食羊辱示以诗次韵即答》。

重阳节前，法式善自净业湖移居钟鼓楼，宴请振定等人。法式善作诗四首，振定和诗四首。

十月，朝廷起用振定，以额外主事籤分礼部行走。

十月二十三，振定作诗《移官主事自述》，法式善、尤维雄等和诗。

十一月十八，雪后初晴，振定到礼部上班，心情愉悦，赋诗一首，首句为“心如天光一样明”。

是时言路大开，振定认为以前任台谏将近两年，言事不够，应该竭忠尽智，于是条陈时务数大事。典礼是非可否，多所匡正。（见《行状》）

嘉庆五年庚申（1800）47岁

正月，得同年、云南巡抚初彭龄信，作《复初抚军书》，就盐政、用人、民族政策诸事发表看法、提出建议。

二月二十八，修撰赵文楷、中书舍人李鼎元出使琉球。中午，谢振定率同馆门人饯别于普济堂之西厢，作《送赵介山修撰出使琉球国序》《李墨庄舍人册封琉球》。

李鼎元《使琉球记》：嘉庆五年（庚申）二月（己卯）二十有八日……编修吴衣园（裕德）饯于堂之门内，礼部谢芑泉（振定）率其同馆、门人饯于堂之西厢，各进三觥。

四月十六，应邹莲浦员外邀，同人聚会紫藤花下，分韵赋诗，振定得竹字。

五月二十九，初伏日，在城西护城河，观宫廷所养之八条大象洗澡。

六月初九，李东阳生日，与汪学金、赵怀玉、鲍之钟、张问陶在法式善诗龕聚会，用西涯“秋风吹芰荷，西塘凉意早”之句分韵，振定分得“芰”字。

六月，法式善、萧昆田倡议为李文正公建造墓祠，振定作《募修明大学士李文正公墓碣祠宇序》，识其缘起，提出“今其墓地属浮屠氏，是宜请于典土者，而敛值为之偿，以次封崇之，碣表之，更得建祠或墓屋三数间，庶几好事者岁时蘋荐，以妥乡先贤之灵，以垂之永久”，因而“遍告夫当世士大夫之乐与人为善者”。

不久，宛平县令胡逊（蕙麓）捐俸八十五两银子，赎回李东阳墓地21亩。一时闻风慕义者，咸捐资协助。

法式善《赎李文正公墓田记》：“计地二十一亩，主之者为百祥庵僧。”《修李文正公墓祠记》：“商于宛平知县胡君逊，胡君捐八十五金赎归，并于县中税契存案。”

六月十六，立秋前二日，邀法式善、鲍之钟、吴锡祺、汪学金、赵怀玉、张问陶聚于知耻斋，举行迎秋诗会。

同月，周鏐出任贵州学政，其门生约聚陶然亭话别。振定因与周为岳麓书院同学，关系密切，应邀与会。朱鹤年即景作画，其他人赋诗纪事。振定为之作序，称选人与作画相通，必须“品高而识伟”。

七月初七，汪学金招同人小集，分赋七夕景物，振定拈得穿针线，法式善分得赋洗车雨（七夕前后下的雨）。

八月初九，应宛平县令胡逊之邀，与法式善出西直门，在松泉寺小憩，至李东阳墓址，胡逊独往西山寻找木料石材（修李东阳墓祠），法式善、谢振定到极乐寺，再到大慧寺，盘桓竟日。法式善有诗。

九月初八，法式善招赵怀玉、鲍之钟、吴锡麒、汪学金、谢振定、姚椿等十四人为西山之游。（见赵怀玉《收庵居士自叙年谱略》卷下）

秋，振定组织工匠，选购材料，开始修建李东阳墓祠。

立冬日，应赵怀玉约，与法式善、吴锡麒、鲍之钟、汪学金、张问陶、戴敦元等至赵味辛亦有生斋消寒，作诗题唐子畏（伯虎）像。不久又集汪学金芥室，作诗题《华严世界图》。

初冬，应孙仲清之邀，与法式善、吴锡麒等游西山，共五天五夜，作诗二十八首，总题《西山游草》，归途得病。

十余天后，病稍愈，令大儿兴峒南归，与湘潭李氏结婚。

李鼎元十月底自琉球回国，振定作《题李墨庄〈归槎图〉》。法式善有《李墨庄自琉球归，出〈归槎图〉索诗》。张问陶有《题李墨庄前辈〈归槎图〉》。

应鲍之钟之邀，与法式善、吴锡麒、汪学金、张问陶、姚椿等在鲍之钟斋中消寒，分赋饮中八仙，振定拈得焦遂。法式善拈得汝阳王璵，张问陶拈得李适之。（见《知耻斋诗文集》《法式善诗文集》《船山诗草》）

应法式善之邀，与吴锡麒、鲍之钟、汪学金、赵怀玉、张问陶、姚椿等在法式善诗龕消寒。

原浙江布政使时任云南巡抚谢启昆知振定搜罗海内古文，抄呈自己所作的二十篇文章。桂林李秉礼，风雅好义，乐助两百金，支持振定编印本

朝古文。（见谢启昆《树经堂文集》之《复谢芑泉仪部》）

腊月十九，苏东坡生日，与法式善等十人在汪学金芥室集会祭拜，各和《东坡八首》共六十韵。

嘉庆六年辛酉（1801）48岁

正月，李元沪（鹤坪）出任湖南清泉县县令，振定作诗相送，称“阿兄同宦处，送望倍情多”。时振定三哥振宁在清泉县任教谕。（见振定《题〈泛湘图〉送李鹤坪令清泉次时帆韵》，《法式善诗文集》之《送李舒园元沪之任清泉》《李舒园赴清泉任寄秦小砚廉访》）

三月初，同年韩崱（桂舲）出任湖南岳常澧道，作诗相送。

三月，王文治写信给振定称：“足下当海鹏敛翼之时，得究心千古之业，俯视尘浊真如野马吹空、苍狗幻影，当自有乐其所乐者，某在数千里外，不为公惜，且为公庆。”（见振定《王梦楼先生哀辞》）

春，李文正公墓祠告竣。墓前建祠三楹、小屋两间，并筑围墙。墓旁立碑，刻有法式善所作碑文。

法式善称：“胡君董其事，而庀材鸠工以底厥成，则谢御史振定之力也。”七八年后，法式善组织重修，回忆初次修建时说：“倡议者余，而始终其事者，谢芑泉振定也。”（见法式善《修李文正公墓祠记》《重修李文正公墓祠记》）

三月二十六，立夏后二日，法式善招同人游极乐寺、万寿寺、泉宗庙、圣化寺，饭于万泉庄，遍观长河一带诸名刹。法式善先成五言古诗四章，振定次韵奉酬。法式善还作《先同人抵极乐寺柬谢芑泉同年》。

作《赠严生策勋序》。振定乾隆戊申典试江南所取举人严钟铭，字策勋，四上公车不第，辛酉下第后愿留都门，业图再举，既而念母綦切，常夜不能寐，决定回家侍母。严生已五十五岁，其母年七十有六。振定赞成，作文送别。

四月十六，诰命赠振定父亲再诏为承德郎，母亲为安人；赠胞兄谢振宙为承德郎，嫂子李氏为安人。（见《谢氏大宗族谱·首卷上·诰敕》）

五月十二，夏至节，同人集聚春云书屋，为本年消暑第一次集会。振定分得“集”字。

吴嵩梁记载：夏至日同法梧门侍讲（式善）、吴谷人祭酒（锡麒）、谢香泉礼部（振定）、戴金溪（敦元）、张船山检讨（问陶）、杨蓉裳员外（芳灿）、吴玉松编修（云）、吴山尊编修（鼎）、蔡浣霞礼部（奎扬）、李虎观户部（邦燮）、谭兰楣礼部（光祥）、陈石士庶常（用光）、陈玉方刑部（希祖）、李春湖学士（宗瀚）、蒋师退大令（知让）、胡香海大令（森）、黄贲生大令（郁章）、陈云伯孝廉（文述）、郭厚庵明经（埜）、姚春木上舍（椿）集春云书屋，分韵得“为”字。

五月十七，同人集知耻斋举行消暑第二次集会。振定分得“瓜”字，法式善分得“蝉”字。

五月，礼部以谢振定“自到部以来，行走勤慎，办理典礼、学校事宜，俱无贻误”，奏请实授主事。未准。旨批“仍俟扣满三年，方准实授，与各项人员一体升转”。（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觉罗长麟、纪昀、扎朗阿奏稿）

六月初九，李东阳生日，法式善、谢振定等祭告墓所，颜其堂曰“怀麓”。（见振定《六月九日拜西涯先生墓得十六韵》及《黄山谷先生生日诗》）

六月十二，为黄庭坚生日，吴山尊组织同人集会于藤花书屋。振定分韵得“六”字。

七月二十一，与法式善等在陈用光斋中举行消暑第五次集会，同赋射雕行。

九月初九，重阳节，李铁珊监督招同人泛舟二闸，冒雨登九龙山。

年末，收到振宁自湖南清泉官署寄来为叔祖维南公遗像所作赞语，有感而发，作《维南公传》。叔祖谢顺衡为振定父凤书公及振定兄弟所钦仰。

胡永焕自号雪蕉，得元人《雪蕉图》一幅，振定应邀作《胡雪蕉同年索题〈雪蕉图〉》。

嘉庆七年壬戌（1802）49岁

三月，充会试提调官（例设二员）。（见《崇祀录》）

五月二十，得知王文治已于四月十二日去世。时振定正在病中，得讯泪流满脸，夜里梦中惊叫，病情加剧。（见振定《王梦楼先生哀辞》）

五月二十八，同人聚会正乙祠，祝贺法式善、谢振定、贺贤智、祁韵士、杨芳灿五十初度，雅音引和，谈讌弥日。振定作诗。法式善作诗《五月二十八日诸同人张宴于正乙祠，为贺虚斋贤智侍御、祁鹤皋韵士、杨蓉裳二农部、谢芼泉祠部暨余，作五十生日，芼泉即日成五古四章，余效其体》，内有“小谢诗先成，滔滔肆清辨”“来日幸方长，晚节期共勉”之句。

五月三十，房中设位，拜祭王文治，大哭一场，作《王梦楼先生哀辞》。

六月初一，祭祀李东阳，墓前读《祭李文正公墓文》。

六月初九，与法式善、朱珪等拜李东阳墓，作诗《六月九日拜西涯先生墓得十六韵》，称“一从游西涯，五度为公寿”。

朱珪作《六月初九日法时帆学士邀予游极乐寺遂至畏吾村拜李西涯文正公墓纪此》，振定和诗，作《又次朱石君先生韵》。朱石君即朱珪，曾是嘉庆皇帝老师，时任户部尚书，太子太傅。

入秋不久，门生昭槿在振定宅畔摘吃葡萄，询问如何种植。振定详加介绍，并作诗《汲修世子谢饷绿葡萄诗意在得种法次韵奉答用酬下询老圃之意》。昭槿答诗《谢芼泉祠部见赠葡萄诗以致谢》称“谢公种植得妙理”，并称已学得秘方。（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五一七册《蕙荪堂集》）

十月十八，日讲起居注官、礼部尚书（满）、翰林院掌院学士、镶黄旗汉军都统觉罗长麟与礼部尚书纪昀（汉）、礼部右侍郎扎朗阿联名上奏，称谢振定任额外主事三年期满，“该员遇事认真，始终奋勉，理合照例题请实授”。（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觉罗长麟、纪昀、扎朗阿奏稿）

十一月，游丰台。作《初到马神庙》《野坐》《小憩龙泉寺》《过李

庄》等诗，结集为《丰台吟草》。

嘉庆八年癸亥（1803）50岁

法式善诗论当时二十六位诗人，第一篇《谢芴泉礼部》，有“万古留此一支笔”之句。（见《法式善诗文集》上册）

应刑部主事蒋云宽（湖南江永人）之请，为其母撰《卢孺人墓志铭》。

三月初一，爱新觉罗·裕瑞（思元）《萋香轩文稿》编成，振定为其《法梧门诗序》《张居正论》《卢沟晓月记》《赵普论》四篇作跋。（见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1966年出版之《萋香轩文稿》）

《法梧门诗序》：超淡冲穆，东坡之后，惟归熙甫能之，青田尚嫌叫嚣也。琴韵霞鲜，即自道其诣耶？

《张居正论》：公私之际，真有快剑寒犀，劈分两界，手段如此，论人不为俗眼瞒也。

《卢沟晓月记》：境超，人超，思超，笔超，《诗品》云“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是也。强学古人以为肖，似徒向木佛求舍利耶！得此自在神通。

《赵普论》：秋水太阿，高台明镜，有功名教之文。

振定题补仪制司主事。（见《行状》《崇祀录》）

四月中旬，与法式善等春游，出红石口抵黑龙潭，至大觉寺，夜宿于此，法式善作《宿大觉寺和谢芴泉韵》。

唐仲冕抵京，振定与法时帆邀唐游极乐寺，再至李文正公墓。法式善作《偕唐陶山谢芴泉杨蓉裳吴山尊何兰士朱野云由极乐寺抵李文正公墓下作》。

唐仲冕出任海州知州，振定作《送唐陶山刺史之海州》，法式善作《西涯小集钱陶山之任海州，兰士野云即席作图余为题后》。

五月初四，振定生日前一天，法式善作《五月四日为谢芴泉生日前一夕赋》祝贺。

五月初八，兴岷妻陈氏（振定同年、长沙陈培英之女）故，年二十

岁。（见《族谱》）

六月十五，参加纪晓岚八十寿宴，作《寿纪晓岚先生八十》。

八月，休假。与曹定轩父子、法式善、张雨舟、何兰士、郭可亭、赵象庵、朱鹤年等九人作房山上方山、蓟县盘山之游。振定作《游上方山记》等诗近二十首，总题为《盘山吟草》，其中《盘龙松歌》为名篇。

山东巡抚铁保、学政刘凤诰为好古饱学之士，征得《左传精舍志》一书，并访得肥城人邱明善为左丘明之七十三世孙，两人经“往复考订”，认为《左传精舍志》所述确凿，邱氏为左丘明之裔可信，于是上《申请增设左邱明世袭五经博士即请令邱明善袭充》一疏，奏请立邱明善为五经博士。据云：汉有左起，因避王莽之征，改姓邱氏。

因所请五经博士世职归礼部管理，嘉庆将其疏批付礼部研究。时任礼部尚书纪昀仔细考究，上《礼部议奏山东巡抚疏请增设左邱明世袭五经博士折子》，认为铁保所奏疑窦甚多，《左传精舍志》所记颇难置信，建议“交该省巡抚、学政详细复查，如果确有实据，再行题请”。

无锡贾崧到京，至知耻斋，出示《梁溪诗豕图咏集》，请振定作跋。原来，贾崧瘞诗后，请人绘《诗豕图》，请翁方纲、伊秉绶、法式善等人题咏，并将图与所征之诗编成《梁溪诗豕图咏集》一卷。振定读罢，感叹贾崧用心诚挚，欣然作《梁溪诗豕图咏跋》。

应邹文瑛之请，为其父作《邹朴斋封君诔》。振定巡视南漕到达京口时，王梦楼曾推介邹朴斋，称其“孝友允敦，于善靡不为，其懿行不可殫纪”。不久，邹朴斋之子邹文瑛官于京师，与振定来往较多。

嘉庆九年甲子（1804）51岁

正月初七，接到儿子兴峒伊阳（汝阳）来信，知去冬得一孙，赋诗一首。

正月二十四，兴峒长子出生，名邦钧，字梦高，号和轩。

二月初二，得一外孙（女婿李家茂子），赋诗一首。

法式善编《明李文正公年谱》修订本在京师刊刻，“其义例，则谢香泉核正之”。

四月，受礼部委派，振定与满左侍郎瑚图礼、满主事升寅，赴内务府主持笔帖式、库使（各一百名）考试并阅卷。（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礼部致内务府函）

六月，朝廷“以翰林院编修李宗昉为陕西乡试正考官，礼部主事谢振定为副考官”。李宗昉，字芝龄，江苏山阳人，嘉庆七年榜眼，授编修。

陶澍作《送谢芑泉先生振定典试秦中》。

七月初，与李宗昉等起行赴陕西。到达河北涿州，谒张飞庙，作《张桓侯古井歌》。

七月十五，中元节，到达山西平定州，作诗《中元日次平定州见上冢者有感》。

七月十六，夜宿寿阳。

过绵上（山西省介休市东南四十里介山之下），怀念介之推，作《绵上行》。

过平阳（山西省临汾市），作《平阴道中》。

进入陕西，作《望华山》。

八月，抵达西安。

陕西乡试考场设西安陕西贡院，也称“陕甘贡院”。明清时期来这里参加乡试的考生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湟地区以及新疆乌鲁木齐、哈密一带的书生，最多时有近万人。此次参考者五千余人。

四书诗题：“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载华岳而”二句，“以友天下”一节；赋得“东来紫气满函关”得“东”字。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语出《论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载华岳而”，语出《中庸》第二十六章：“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

“以友天下”，语出《孟子》。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

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东来紫气满函关”，为杜甫《秋兴八首》中的一句，传说老子过函谷关前，关尹喜见有紫气从东而来，知道将有圣人过关。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比喻吉祥的征兆。

九月，取士完毕，作《陕西乡试录后序》。

拔解元康节。康节，字邵亭，祖籍陕西武功，后迁居会宁。

九月十七，开始返京。

九月十九，到达华山脚下，宿玉泉院。华阴县令何某前来看望。振定言及游览华山。何某脸露难色，说几十年来，在此任职的，只有陕西巡抚毕沅登上华山，但战战栗栗不敢下山。县令只好用酒把他灌醉，抬下山来。深夜，振定“为文祷岳神，乞二日晴”

九月二十晨，红日满窗，振定与正考官、翰林院编修李宗昉及华阴巡检冯浩等游览华山，夜宿西峰院。

九月二十一，黄日衔山时，归至青柯坪，“及玉泉院，漏二下”。振定感慨良深，认为华山是“天地清肃之气之所聚而钟也。昔人云，华山如立。余游天下名山多矣，其壁立万仞，绝无依傍者，惟华为然。”作七律《别华山》。

九月二十四，父亲再诏生日。振定烧纸祭奠，作《途中遇先大夫生辰》一诗纪念，感叹自己“无闻空白首，何以慰重冥”。

到达山西省灵石县两渡镇两渡村弥福堂，拜访何元烺、何道生兄弟，作《双渡访何兰士昆季至其书室》。两渡何氏人才辈出，何元烺、何道生（兰士）是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进士，其父何思钧为乾隆四十年乙未科进士。

回京复命。嘉庆帝详细询问振定罢官之由，及历官所办之事。振定一一回答，嘉庆帝频频点头。（见《行状》）

执门生礼拜访李燾，述说典试秦中取士诸事。（见振定《送李沧云夫子南归步留别元韵》自注）

夏，铁保就增设左丘明世袭五经博士一事具疏再申前议，且采俞正燮等之说，对纪昀关于左丘姓氏的考证予以辩难。清廷再次下礼部讨论。纪晓岚再次考证，仍持己见，上《礼部议奏山东巡抚申辩前疏并另请增设汉儒郑元世袭五经博士折子》。该折列出《左传精舍志》十处问题，逐条批驳，其中最为简明的是，《左传精舍志》中有金朝（1115—1234）王去非诗“请看廿一简多少，独有先儒冠汗青”，而金朝尚无廿一史。纪昀还请时在京城段玉裁进行研究。段玉裁与纪昀观点一致，代礼部作了《驳山东巡抚请以丘姓人充先贤左丘明后博士议》。

十月十四，嘉庆帝就铁保“申请增设左邱明世袭五经博士即请令邱明善袭充”一事下谕：“礼部所驳甚是，余具著照部议行。”

振定为礼部主事，对此亦有研究，观点和纪昀不同。嘉庆帝一锤定音后，振定发布《邱氏非左氏后驳议》一文，旁征博引，举左丘明之姓邱氏史证班班，肥城邱氏系出左邱渊源可考；再自《魏书·地形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中检出左邱冢墓之记载，为肥城冢墓提供可信之凭据。其搜采之精，论断之确，出乎纪氏驳议之上，为时人所折服。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集部三·知耻斋文集二卷》：《邱氏非左氏后驳议》据《广韵》引《风俗通》定邱氏确为左丘明之后，至唐林宝《元和姓纂》不载者，以《姓纂》今非完书之故，不得以此致疑，考核颇为精审。

十一月，升员外郎。《登太华山记》完成初稿。

嘉庆十年乙丑（1805）52岁

正月十五，元宵节，《登太华山记》定稿。李祖陶《国朝文录》录有此文，评点曰：“千古奇人，千古奇文。”

三月十八，振定等组织同人在陶然亭集会，整日下雨，黄昏雨止。吴嵩梁作有《三月十八日陶然亭雨集》一诗，并记载了集会之人“自法学士式善以下，容凡四十人。主人则谢礼部振定、杨户部芳灿、李兵部鼎元、陈兵部同文、蔡礼部銮扬、张检讨问陶、伊知府秉绶、陈编修用光、陈刑

部希祖、谢吉士学崇也”。法式善作有《陶然亭雨集》《日夕雨止》诗。振定诗已佚。

五月二十，振定同年、亲家长沙陈培英（字月查）父亲满八十，振定应邀作《陈松岩先生八十寿序》。

六月，李燦致仕归籍，振定饯别，作五言长诗《送李沧云夫子南归步留元韵》。

闰六月十七，夜宿极乐寺国花堂，作诗有“梦中诗句亦生香”句。

应湖南宁乡陶章沔邀请，与法式善等集会陶然亭。

九月初九，重阳节，为礼部主事梁章钜所著记录、考证礼部典章制度和掌故的书，取名《南省公余录》，题字作序，期望梁“不倦于丹铅，他日拓成巨编”。

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53岁

正月初四，嘉庆帝在重华宫茶宴诸王、大学士及内廷翰林等，作七律二首。振定参加此宴，并和嘉庆帝诗二首。

正月十七，法式善生日，陶章沔邀请法式善、秦瀛、谢振定、杨芳灿、吴嵩梁、陈用光，集赵松雪蕉山园观赏梅花。

正月之吉，应邀为陶澍父陶必铨作《莫江陶公墓表》，为湘乡冠曹胡为仁先生之亚配作《尹老孺人六秩寿序》。

振定画梅花扇面，谭湘琴、顾宗泰等题诗。顾诗为《题谢香泉侍御梅花画扇用湘琴韵》二首。

清明前夕，秦瀛邀请法式善、谢振定、杨芳灿、蔡式斋、陈用光、陶章沔，游崇效寺赏花。

振定与法式善等在赵松雪紫云新院聚会，约定共游西山等地。

次日开始，游苍雪庵（宝藏寺）、红石山、景帝陵、普觉寺、退谷、五华寺、玉泉山等地，作诗多首。

六月，收到仪征画家尤荫的诗集及《石铍图》咏。尤荫曾客礼亲王邸，与亲王切磋画技，授昭槁以画法。其时振定尚未中进士。振定认识尤荫，是在江南，由王文治介绍。王文治故去已经五年，尤荫因脚疾不能出

门，也是十年未见。振定感慨万千，作诗以答。

八月二十四，应爱新觉罗·裕瑞之邀，与法式善、徐松游大觉寺，作《思元主人招游大觉寺》。

八月，搬家至宣武门外上邪街路北，租住官房二十三间，月租银五两六钱五分。（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户部致内务府抄单）

九月初九，振定邀吴貽咏、吴云、杨旸谷等，并带儿子兴峣、兴岵到崇效寺赏菊，归集知耻斋，作诗。

吴嵩梁作诗《蕉山园赏菊赠赵象庵中翰，兼呈谢芄泉礼部》。

作《渡平吴翁六十寿序》。安徽泾县吴敬恒、吴念恒兄弟先后进京跟随振定学习。这年十月，吴父六十寿，振定应吴生兄弟俩之请作文以赠。

十二月，任通州坐粮厅厅丞（满丞玉轺），腊日抵任。时任仓场侍郎萨彬图（满）、李钧简（汉）。萨彬图，乌苏氏，满洲镶白旗人，为谢振定同科进士。（见《清代职官年表》）

漕仓吏胥以浮收、漏税渔利为奸，每官府至，则盛饰供帐，醵金为寿。一入其彀，则恣所为不得问；或拒之，反怏怏，百端相齟齬，号最难治。振定至，一切谢绝之，查访陋规积弊，一一涤除，事无大小，不假胥吏手。（见《行状》）

原来厅丞吃用悉由县官供给，振定到任，即除此陋规，一饭一器皆自备。（见《崇祀录》）

张士元《湘乡谢公述》：“自公受命，坚却赂遗，各省兑运者，望风肃然，不敢以私奉公。”（见张士元《嘉树山房集》）

最迟于此年，振定与三兄振宁各捐田六十亩（振定费银一千七百余两），由（从兄弟辈）子侄中不能读书的人耕种，许租谷用来周济贫乏、补充祭费。（见《崇祀录》）

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54岁

正月，兴峣、兴岵去京师上学，振定作诗送别。

坐粮厅署还是雍正三年（1725）重建的，已八十余年，堂舍“栋宇倾仄，上漏下濡，往往籍椽杙为支柱，每当朔风饕夜，梦凜心惊”。振定觉

得“惕惕乎日在岩墙之下也”，于是筹划全面维修坐粮厅东署，所需费用约两千两银子，由户部借支，再在自己的养廉银中每年扣除二百两，实际是自己捐资维修。户部同意这一方案。振定立即请来工匠进行维修。

清代五品文官年俸80两，禄米80斛，养廉银2400两。但坐粮厅厅丞实际正常收入高于这一标准。据《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嘉庆二十四年户部刻本）记载：坐粮厅满汉二员，旧例每年养廉银各1200两，雍正六年各加银1000两，于茶果银内动支；又，通济库平余各分给银1000两，旧袋变价各分给银300两至600两不等。

三月初一，第一批漕船抵达通州的漕运码头，仓场侍郎萨彬图、坐粮厅厅丞谢振定、巡仓御史等漕运官员主持盛大的祭坝神的仪式。

五月，坐粮厅东署维修完毕，从大堂到马厰修葺一新，且仅耗银千余两，远低于原计划。

五月十八，萨彬图改任漕运总督，正蓝旗汉军副都统达庆（蒙古族）接任仓场侍郎。（见《清代职官年表》）

六月初某夜，忽然梦见三兄振宁、四兄振实一起来京，而四兄振实已故多年，心甚诧异。几天后，杨健（刚亭）侍御自湖南衡阳老家归京，带来振宁（时任清泉县教谕）三月初八的书信，知振宁康健如故，心乃稍安。（见振定《祭栗园家兄文》）

七月，赴天津收北仓所截留湖广、江西粮米，悉却供给。（见《行状》）

八月十四晚，庭院设位，祭祀三兄振宁。振宁五月初三亡故，享年五十九岁。振定百日后才知，作《祭栗园家兄文》。自振宁乾隆五十二年进京参加大挑，兄弟不见已有二十一年。兄弟姐妹八人，只剩两人（还有四姐）。振定悲痛至极，“不见齿者月余”。

九月十九丑刻，北仓迤南王家庄军船停泊处所，江西吉安帮第三十二号旗丁康胡梁重船失火，火势蔓延。谢振定急忙赶往现场。有人阻之曰：“救火，系地方官事，且此去尚二里许，昏夜路险，何往为？”振定正色道：“平人有难，犹需救。粮船为天储所系，我为朝廷命官，安可坐视不

管？”率仆徒步赶往现场，亲上火船，指挥兵役扑救，望空跪祷，风折桅断，火船沉水。

次日，振定备羊豕谢神。捐五十两银子，奖赏救火之人。

事后统计，共计烧毁重、空军船二十五只，烧毁米一万三千余石，烧死副丁舵工水手男妇大小二十六人。天津巡漕御史贾允升、天津镇总兵本智、江西押运同知何启秀暨吉安帮领运千总张星垣等受到处分。（见《清实录·嘉庆朝实录》《崇祀录》《墓表》）

秋，法式善、陶章沅由大通桥泛舟至潞河看望振定，三人以秋泛二字为韵赋诗。

闻乡试座师王大鹤家颇为潦倒，亲访其子为之改葬，复取其《啸笠山房试帖》旧选重刊之。

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55岁

二月，振定到达天津，督促北仓米转运通州仓。

三月，张士元到天津看望振定，见座师颜色憔悴，若恒有所忧者。退问门客，曰：“公盖忧仓米之腐也。”（见张士元《嘉树山房集·湘乡谢公述》）

通州大水，康家沟坝冲决成河，张家湾河道遂淤。朝廷命疏浚张家湾运河故道，塞康家沟支河。上年冬开始施工，至今年三月尚未完工。有人说是老鼋潜居其下，故坝无法合拢。振定认为自己有“监河之责”，乃以酒肉投河，以饲老鼋，为文以告，“天地之道，以生物为心”，警告老鼋迅速迁走，不得冥顽，否则将“抉汝肠，糜汝肉，坼汝甲，歼汝族”，沉铁釜数十镇之，堤乃合。

七月底，胡黄海、吴云、黄依宣到通州看望振定。“晚凉残暑退，新雨故人来”，四人喝酒聊天，振定非常兴奋，但明显感到酒力不支。

秋，兴峣顺天乡试中举，振定无悦容。（见《行状》）

季冬，两年任满，回京。（见《行状》）

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56岁

正月初一，诰授振定为朝议大夫，夫人周氏为恭人。此时振定为礼部仪制司员外郎加二级。赠振定父亲再诏为朝议大夫，母亲刘氏为恭人。（见《谢氏大宗族谱·首卷上·诰敕》）

镶白旗支放甲米，该旗都统等奏称，北新仓米色霉烂，难于全数支领。嘉庆帝降旨派令大学士禄康、费淳二人，前往北新仓查验。

仓场侍郎达庆、蒋予蒲上奏：收米上仓及坐粮厅验收，均无不合，此项变色米石，必须照例按旗支放，方于仓储无亏，恐镶白旗一处不领，别旗效尤，请旨飭令承领。

嘉庆帝又另派尚书德瑛等六员，同赴北新仓，并禄米仓、南新仓、海运仓、富新仓、兴平仓等各仓，遍行查验。德瑛等查验后奏称，米色实系不纯，霉变者多，将各仓米样包封呈览。

嘉庆帝又复特派军机大臣庆桂、董浩、戴衢亨三人，再行赴仓覆加抽验。庆桂等抽验后上奏，米色有刚刚霉变、尚分颗粒者，亦有严重霉烂、现已结块者。所有各仓米色，均与德瑛等所进米样相符。

嘉庆帝大怒，三月初一降旨：除北新仓监督灵椿、和泰二员先已革职外，所有米石霉变较多之禄米仓监督观保住、赵玉，南新仓监督祥庆、廷璧，海运仓监督扎勒杭阿、张棕龄，兴平仓监督珠隆阿、郑裕国，均著革职离任。至部议该员等照例限一年赔完即准复还原职之处，不足示惩，将来赔完后，亦不准竟复原职，均著降一级调用。如赔补不完，照例不准补用。霉变较少之富新仓监督麟祥、范正容，亦均著照议降三级离任。限一年赔完，赔完后准复原职。如逾限不完，即实降三级调用。至于坐粮厅验收米石，是其专责。今米石到仓之时，即有潮润，岂能辞咎？礼部员外郎谢振定，亦著照议降一级调用。其在北仓收米转运之坐粮厅玉铭，该员既在北仓办理截卸及转运事宜，上仓之米，现多潮湿，岂能邀请免议？并著一体交部议处。达庆三任仓场侍郎，不知实心经理，致多赔误，其咎较重。部议只降二级调用，尚觉过轻，著降三级调用。蒋予蒲初任仓场侍郎，于所管仓储，漫不经心，著照部议降二级调用。（见《清实录·嘉庆

朝实录》)

振定降为主事的消息传开，多人为他鸣不平，有人建议申辩。振定只是笑笑，摇头。（见《行状》）

振定与法式善等人游览大慧寺、李东阳墓园，见所种之树皆枯萎不振，计划凿井灌溉。然家无余银，乃典质得数十金，交法式善凿井。井成，泉甘而冽，不仅可资灌溉，而且可供周边数十户人家汲水饮用，众人将此井称为“香泉”。（见姚文田《邃雅堂集》卷之三《香泉记》）

吴云率诸同年看望振定。（见李祖陶辑《国朝文录》）

李祖陶《国朝文录·知耻斋文录引》：己巳入都，吴玉松师率领诸同年晋谒时，先生已被病，师预戒以见，无多言；再拜时，微窥其容，长身修髯，肃然具严正之气。

五月十四，振定知道来日不多，命兴峣、兴岵汇集其手稿，送吴云编修校阅，口述七律二首（《病中即事口占示儿子》）。（见吴云所作《墓表》）

五月十五，振定振笔书“光明正大、通天达地”八字。弥留之际，无一语及家事，但肃然有严正之气而已。申时去世，享年五十有七。（见《行状》）

郭则沄《十朝诗乘》：陈散原尝见其遗墨，以片楮书“光明正大，通天达地”八字，其子兴岵旁注，称为“临终之笔”。

葬湘潭县七都潮江冲之廖公冲凤形乾山巽向（坐正西北向正东南）。（见《族谱》）

法式善作《哭谢芴泉同年》，又作《诰授朝议大夫礼部员外郎前翰林院编修江南道监察御史谢君墓表》。

吴云亦作《诰授朝议大夫礼部员外郎前翰林院编修江南道监察御史谢君墓表》。

秦瀛作《礼部员外郎谢君芴泉墓志铭》。

嘉庆十五年（1810）春，振定家人搬出上邪街路北官房，尚欠租银二十二两八钱。续租者翰林院编修贺长龄自愿在其职俸银内代扣。（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户部致内务府抄单）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七月二

十九，吴云将振定手稿编成文一册，诗二册。（见《知耻斋诗集》卷六吴云所作跋）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湘乡县儒学教谕章仁溥、训导文运升根据李罕、蔡世瑛等绅士的请求，呈请将谢振定入祀乡贤祠，并开列履历清册共十项。湘乡县知县胡钧、长沙府代理知府吕恩湛、长宝道胡麟签署意见逐级上报，湖南巡抚吴荣光复核无异，会同湖广总督卢坤、湖南学政岳镇南合词上奏朝廷。礼部根据朱批审议，称“所有谢振定题请入祀乡贤祠之处，实属名实相副。臣等谨拟准其入祀乡贤祠”。道光帝于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批复：依议。钦此。谢振定正式入祀乡贤祠。（见《崇祀录》）

妻子周氏，生有三子一女。

长子谢兴峣，字心兰，号小泉，一号果堂。嘉庆二十四年（1819）进士，朝考一等第一名，选庶吉士，散馆授武英殿纂修，后选授河南固始县知县，调任宝丰县知县，荐升裕州知州、陕州直隶州知州，升补四川叙州府知府，调补成都府知府，署四川通省盐茶道。夷匪滋事，带兵出力，赏戴花翎。峣有乃父遗风，素性强直，不肯阿附，以是忤上官，因事罢归。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五月十七巳时生，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二月十二午时卒。李氏生子二：谢邦钧、谢邦钰。王氏生子四：谢邦镛、谢邦锜、谢邦锦、谢邦麟。白氏生子一：谢邦铭。

次子谢兴垣，字紫亭，号湘帆，一号切庵，别号季实。嘉庆己卯顺天乡试挑取誊录，充国史馆誊录官，后授福建安溪知县，议叙加四级纪录，三次例赠奉直大夫。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二月初六子时生，道光十八年戊戌十二月十六丑时卒。陈氏生子一：谢邦钺。路氏生子二：谢邦鉴（道光丁酉举人、乙巳进士），曾任江苏高淳知县；谢邦鏹。郭氏生子一：谢邦剑。吴氏生子一：谢邦鏊。

三子兴堃，早殇。

女一，适洛阳县典史、湘潭李家茂。

《湘学研究》 征稿启事

千年湘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张力，孕育了一大批经邦济世的杰出人才，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湘学、弘扬湘学乃发展湖南和当代中国、繁荣中华文明之要务。《湘学研究》系湖南省湘学研究院主持的学术丛书，拟收录湘学研究的高水准成果。本书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两辑。

《湘学研究》主要设置以下栏目：湘学专题研究，湖南人文历史，湘学文献整理研究。发稿方向和范围包括：湘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湘学与国学的关系，湘学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国内各地域文化与湘学的比较研究，湘学传统与湖南现代化研究，湘学与当代湖南发展研究，湘学与当代中国发展研究。

本书不收版面费，出版后奉致稿酬并样书两本。

本书来稿要求如下：

一、来稿须是未经发表的学术论文，一般以不超过 1.2 万字为宜，要求政治导向正确，学术观点新颖，论据充足，论证严密，文字通达。

二、来稿须提供中文摘要 200—300 字，关键词 3—5 个。

三、作者简介务必简洁，所任职务、职称不超过 2 个，并在文末附以联系电话与电子邮件地址。

四、所有来稿，编辑部有权做适当修改，如不同意者请予以注明。

五、文献整理来稿请同时提供原文献影印附件。

六、正文采用 5 号字体；注释采用小 5 号字体，一倍行距，A4 纸页面。文内章节序次语采用如下顺序：“一、”“（一）”“1.”“（1）”。

七、注释格式:

(一) 总要求

1. 来稿需仔细核对引文。注释及引用文献标注采用页下注形式。注释序号用①, ②, ③……标识, 每页单独排序。卷数、册数、页码均使用阿拉伯数字。多页码之间使用一字线连接。

2. 责任方式为著时, “著”可省略, 著者后接“:”; 其他责任方式不可省略, 不接“:”。

3. 中国作者无须标明所属朝代; 国外作者须加国别, 例如: [美]。

(二) 出版物主要引用格式

1. 专著

(1) 标注顺序

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文献题名, 出版者出版年版, 页码。

(2) 示例

赵景深:《文坛忆旧》, 北新书局 1948 年版, 第 43 页。

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175 页。

[日]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谭汝谦、林启彦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年版, 第 11—12 页。

2. 析出文献

(1) 标注顺序

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 “载”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文集题名, 出版者出版年版, 页码。

文集责任者与析出文献责任者相同时, 可省去文集责任者。

(2) 示例

杜威·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 载王宁、薛晓源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247—266 页。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载《鲁迅全集》第 9 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325 页。

3. 古籍

(1) 标注顺序

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册次数，丛书项，卷册次数，版本或出版信息，页码。

(2) 示例

管志道：《答屠仪部赤水丈书》，《续问辨牍》第2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8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3页。

4. 期刊

(1) 标注顺序

责任者：文章题名，期刊名年期。

(2) 示例

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5. 网络

若存在相同内容的纸质出版物，应采用纸质出版文献。若唯有网络来源，则标注顺序为：

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网站名，文献标注日期，访问途径。

6. 其他文献类型请参考本刊往例。

赐稿邮箱：xiangxueyj@163.com

通信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德雅村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湘学研究》编辑部，410003。